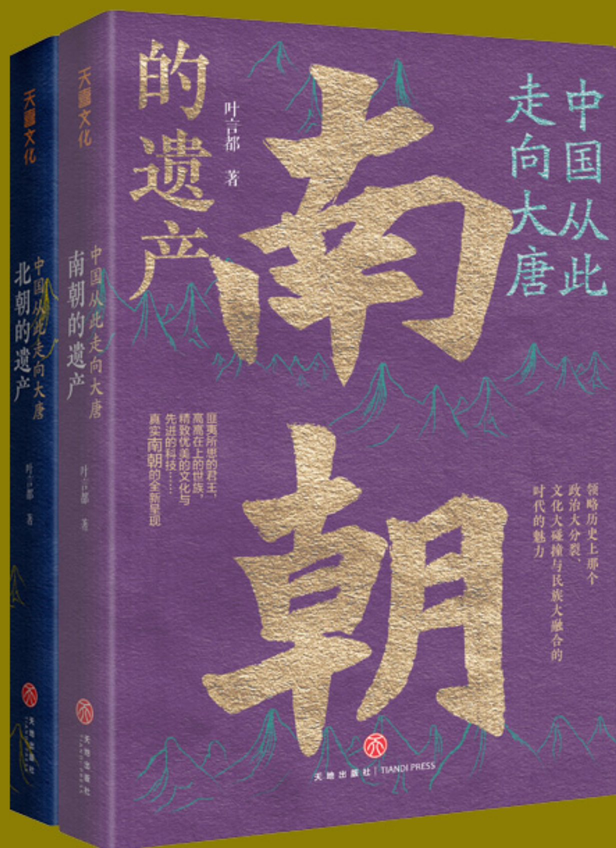
中国从此走向大唐

南北朝的遗产

（全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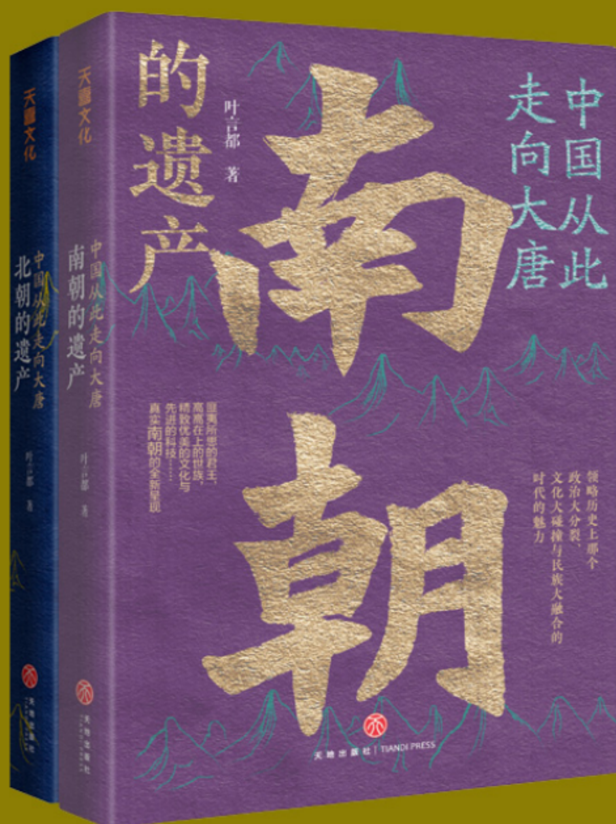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从此走向大唐

南北朝的遗产

（全二册）



南朝的遗产

中国从此走向大唐

叶言都 著

匪夷所思的君王、高高在上的世族、精致优美的文化与先进的科技……真实南朝的全新呈现

领略历史上那个政治大分裂、文化大碰撞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的魅力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南朝的遗产

作者：叶言都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3-01

ISBN：97875455623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导读 走入江南烟雨花落尽的南朝
始与终
南北战争开启的历史
梁武治世与侯景之乱
门阀衰落与皇权重振
飞入寻常百姓家
自序
楔子
南朝风貌概述
南朝（420—589年）
南朝人口变化
第一章 索虏、岛夷，烽火扬州路——大分裂与南北战争
南北分裂
索虏、岛夷
南北战争
南北朝后期局势的变化
南北战争第三阶段：三国鼎立与南陈北伐
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互别苗头的南北关系
第二章 捕鼠达旦狎客宴，步步生莲半面妆——昏君、乱君、暴君与宫廷女性
南朝皇室乱象
南朝皇室的昏、乱、暴实况
南朝历代皇帝的昏、乱、暴事迹
昏君、乱君、暴君辈出的历史背景与家庭原因
昏君、乱君、暴君辈出的社会原因
南朝皇室女性
南朝世族出身的闺秀皇后
南朝昏乱的皇族女性
第三章 长檐车，高齿屐，熏衣剃面，坐至公卿——高高在上的世族
南朝世族阶级的形成：阀阅、郡望与谱牒
高门甲族
世族的特权
高门世族的两面性
南朝世族的腐化
南朝后期世族的式微
第四章 归去来词山居赋，吴声西曲子夜歌——南方生活面面观
自成天地的世族庄园岁月
知识分子的隐居生活
家庭生活：大家族的改变
南朝民歌中的南朝生活
第五章 算圆周，辩神灭，儒玄文史释道医——精致优美的南朝文化

南朝文化
南朝文化的历史定位
第六章 四二年间花落尽，南朝青史岂成灰——南朝终局
茹素留宝忏，舍身论功德：梁武崇佛
国运急转直下，文化兵火凋零：侯景风暴
花开花落不长久，景阳宫井又何人：后庭花里送南朝
后记
附录一 参考资料
附录二 南北朝历史大事年表

导读 走入江南烟雨花落尽的南朝

陈识仁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分裂时代，人们对其印象，多半与战乱、落后、黑暗、“野蛮胡族”等负面评价有关。也因为如此，一般人对它的了解除了三国那一段之外，往往不如汉唐盛世或明清帝国深刻，并且也没有多大兴趣。

这是一个价值重整与制度重建的时代。当时的人们，不论帝王或世族，总在步履蹒跚中摸索着未来可行的道路。魏晋，历经的是儒家道德失序后，社会核心价值重整的时代，随后的南北朝，则由北方游牧民族带来强大的动力与活力，为瓦解后的汉帝国重构了各种制度以因应局势的需求。由此可见，在这乱世之中，处处充满着引爆各种可能性的巨大力量。

现在，摆在读者眼前，由叶言都老师畅谈南北朝的这两册普及读物里，他要说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后半段。他将带领读者当个穿越时空的旅人，俯瞰那个令人惊心、惊异又惊艳的时代。我相信在叶老师渊博的知识与说书人般的生动口吻下，一定能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的南北朝飨宴。只是，在启程之前，且容我权充领队，先以这篇导读向读者们介绍南朝的重要大势。

始与终

公元420年，出身北府军团将领的刘裕，结束南方的东晋国祚，创立国号为“宋”的新王朝。大约二十年后（439年），鲜卑拓跋族人所建立的“魏”国，在拓跋焘的领导下，结束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乱局，统一北方。南北双方在相当接近的时间里，各自终结旧时代，成立新王朝，并揭开对峙竞争的局面，此即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天下再度统一为止。

南北战争开启的历史

东晋晚期，北府将领刘裕趁黄河流域政局混乱，屡次出兵北伐，消灭十六国中的南燕与后秦，将东晋版图往北推进到黄河以南一带。刘裕北伐，是东晋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行动，不仅一度收复长安、洛阳两座古都，更将疆域大幅扩张。这些军功不但是刘裕日后篡晋的政治资本之一，收复的领土也被刘宋王朝继承下来。然则，这也成为北魏与刘宋王朝间的重大争端来源，并随之引发几次大规模的南北战争。若说南北朝的历史始于宋魏交战，也不为过。

宋魏之间的战事，彼此互有胜负，但整体而言，还是刘宋受创更重。宋文帝刘义隆在位近三十年，他建立制度、鼓励农桑、减赋税、避力役，创下“内清外晏，四海谧如”的“元嘉之治”。

可惜的是，不擅长军事、兵法的宋文帝，却喜爱遥控指挥前线将士，屡次的战败，竟拖垮难得一见的治世，史称“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更糟糕的是，宋文帝对北伐的坚持，引发太子刘劭的不满，发生弑父夺位的惨剧。

梁武治世与侯景之乱

梁武帝萧衍，是南梁王朝的建立者，他不仅是南朝史上在位最久的帝王，在其治理下更缔造出南朝盛世，特别在文化、宗教与艺术等方面，是东晋渡江后二百余年来的高峰。

这与萧衍的出身背景有关：他既是兰陵萧氏世家子弟，也是萧齐宗室子弟；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私德更是南北朝帝王所罕见；在文学方面名列“竟陵八友”，更主持了国家典籍的整理与收藏。莫怪乎，王夫之点评他，言“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钱穆称赞他，谓“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

然则，历史上的梁武帝也饱受批评：多次舍身同泰寺，逼得群臣动用朝廷巨款为其赎身；因崇信佛教的关系，使得治国手段过于慈悲，无法遏止官场的贪污舞弊恶习；首都附近的寺院数量高达五百余所，建筑穷极奢华，僧尼众达十余万，不断侵蚀国家的财力和物力。

更令人扼腕的是，梁武帝晚年接纳且误信东魏叛将侯景，引发南朝历史上极大的政治、社会动乱。

这场动乱范围广及长江下游地区，更使南朝世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史籍形容灾乱后的建康城，“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其惨况仍能让今日的读者们歔欷不已。

所以，有人把梁武帝在位的后期，视为南梁国势的分水岭，其一手打造的南方盛世，从此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门阀衰落与皇权重振

南朝历史的另一特点，是魏晋以来由门阀世族垄断资源的现象延续了下来。只是在延续的表象下，发生了各种微妙的变化。

例如，东晋百余年来，门阀通过能文能武的几个大家族与司马皇族“共天下”的局势早已不再。南朝从刘裕建宋开始，各朝开国君主均以建立军功累积政治资本，逐步掌握朝政后进而谋夺大位。这样的出身背景，正是高门世族所瞧不起的，哪怕贵为皇族，他们也还是不放在眼里。

门阀高族不愿插手政治，但仍在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占尽优势、垄断资源，过着凡人望若神仙、优游自在的生活。长期养尊处优下，门阀子弟的能力一点一滴丧失，逐渐成为社会上毫无贡献的蠹虫，更不可能再受到帝王重用，共参朝政。

换个角度看，世族不屑参与政治，恐怕正中南朝各代帝王之下怀。因为他们也不想回到东晋那个与世族共享皇权的时代。世族不愿参政，对朝廷也毫无忠诚度可言，但国家官僚体制仍得运转，帝王遂不得不起用寒门、庶族出身的人物，与他们共商国是、同断决策。于是各朝帝王为了重振皇权，防止世族重返政坛，祭出各种手段持续削弱门阀的权力，这也成为南朝政治发展的主旋律。

飞入寻常百姓家

南朝后期，我们通过颜之推的文章，可以看到高门世族总是过着衣食无缺、出入从容、望若神仙的生活。他们不需与旁人竞争，自幼即占去官僚体系里的清望高位——不需亲自管理事务却享有高额的俸禄，还真有几分符合今天“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的戏谑语。

门阀子弟不但毫无才能，平日出门还要搭乘车舆，入门要下人扶持，未经锻炼的身体，肤脆骨柔、羸弱不堪，受不起半点风霜雨雪的折磨。他们长期不涉俗事，看见嘶鸣的骏马，竟然吓得以为是猛虎出柙。侯景之乱时，因体气衰弱而不堪行走，不耐天气的寒暑变化而倒卧路边，猝然而死者比比皆是，看来是连逃难的能力都没有了。如此娇生惯养、缺乏意志能力的王谢高门子弟，又怎能不随着历史的洪流，成为寻常百姓呢？

南朝的大势既如上述，其间的细节与故事又是如何呢？这就要请叶老师用其生动的笔法，带领各位来一趟深度的南朝历史之旅了。

自序

这部书的内容是对中国南北朝历史的普及性叙述，著作目的是提供普及性的南北朝历史给社会大众，并推广历史书写的普及化，构想是效法观光事业，将了解南北朝历史视为一次专题旅游。我愿借这部书将自己过去接触这段历史的经验与感想提供出来，尝试以导游的身份，陪同诸位读者回到将近一千六百年以前，走一趟南北朝的历史之旅。

我们生活在四度空间中，时间是第四度空间。有了时间这个维度，我们可以从现在向前方眺望，想象以后的状况，想出的就是科幻；我们也可以从现在向后方眺望，观察从前的状况，看到的就是历史。

人在实质的旅游中，身体会移动到不同的地理位置，亦即在三度空间中向他方转移，去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人的心智也可以在第四度空间中向后方转移，移动到以往的某个时间位置，去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历史。这种心智的活动，其探访的意义等同实质的旅游，可以称为“历史旅游”。这部书就是以历史旅游观点写出的南北朝历史书，若称为“南北朝历史旅游导览”亦无不可。

写这部书以来，我一直努力把握它的内容与风格，希望采用较为宽广的角度，放大对南北朝历史的视野，在“宏观历史”的概念下，不汲汲于对一人、一物细节的描述，而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对那段时期的整体概念性理解。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缺乏的，其他中文地区也类似。南北朝史事纷纭，这部书并不追求全面性的涵盖，仅愿先提供必要的记载原文，作为资料来源的见证，然后从宏观视角考察，以普及历史的笔法发挥，就事论事，对当时影响重大的关键深入分析，为有志进一步探索南北朝史的人提供一条入门途径。

任何后代人写的历史书，必然受到作者背景与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然而也就因为如此，历史才能被重新诠释，重新发现。太史公司马迁因此以“成一家之言”为职志，著作《史记》；意大利史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也因此有“一切真历史皆当代史”的

名言。我热爱历史，也热爱文学，曾习作中国古典诗词，写作这部书时，为追求历史的厚度，会引用古代诗家词人的相关作品，都注明作者；然而如此一段时间深深浸沉于南北朝历史的情境下，写作之际，有时竟会有某些符合古典诗词章法的只句片语突然在我脑海中浮现，当即记下，再加以连缀完整，就是各章最前面的诗词。于是这部书的各个章节，成为以我习作的诗词开篇，居然有些古典说书的风格，也算历代史家先贤著述的各种南北朝史书之外的另一种叙述方式吧。

时间是延续的，历史是延续的，面对这种不断延续的特性，接触历史时不妨先进行宏观的历史探访，再深入研究符合自己志趣的各个历史单元。然而值此网络文化涵盖一切的时代，普及历史的叙述呈现碎片化，以致社会大众视接触历史为猎奇，得到的碎片知识就以为谈资，还不见得是真实的，这是历史教育与历史传播的危机，也是历史的危机，应该得到重视，史学界也有义务提供解决的方法。

中国南北朝的历史特色鲜明，意义重大，值得进行普及式的历史旅游，更不应被碎片化、猎奇化、谈资化，我因此敢于不揣简陋，抱着提供南北朝历史旅游基本资讯的心愿，将这部兼具宏观性与重点性的南北朝历史书以现有的面貌，呈现于诸位读者面前。

叶言都

2019年7月

楔子

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持续17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分裂为两半，一南一北，各据一方，互相对立。它们各自统一了传统中国一半的领域，却都无法征服对方，将全部中华江山置于版图之中，这段时期就称为“南北朝”。两方水土养成两方人，时间久了，住惯南方或北方环境的两批人，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在中国的大地上并存。那个时代，曾出现过这样的情景：

> 这边，梁武帝不理会群臣劝阻，动身前往同泰寺舍身，这是第三次了；吴明彻将军正在一艘战船上指挥攻击属于北齐的寿阳城，乘船攻城是他的独门战法；谢灵运则得意地带着几百个随从，用他发明的特殊技巧登山，还不时吟上几句诗；陶弘景仍在油灯下挥笔疾书，为快要完成的《本草经集注》再添加一些自己发现的药；而江南水乡泽国的弯曲河汊中，一位裤褶被春水溅湿的年轻采菱姑娘展开娇美的歌喉，曼声轻唱《子夜歌》……
>
> 那边，北魏孝文帝刚发布命令，规定以后大家在朝堂上都要说汉语；杨白花将军从北魏的南方前线向南眺望，他有一个不得已的决定，已经下定决心执行；颜之推将家里的子弟聚集一堂，教导这些年轻人怎样在胡人政权下做官；贾思勰满脑子都是和面、揉面，他的《齐民要术》已经写到第八十二章《饼法》，就快写完了；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上，一位长裙曳地、雍容华贵的大周三品官夫人正带着一群侍女，走进一座满墙佛画的石窟还愿……

南方气候温和湿润，草木茂盛，物产丰富，鱼羹稻饭足以温饱，又有长江天险，得以长期立国，也容易较为安定。南朝在这种条件下立国江南，发展出以精致优美著称的文化，充满浪漫乃至颓废的气息。

实际控制这优美之地的是世族。南朝是世族发展的高峰，南朝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被世家大族全面控制，成为中国自周朝以后极少数近似贵族社会的时代。相对地，南朝的皇室则常因出身门第不高，显得欠缺教养。既然政治格局已定，少有发展空间，很多年轻的皇帝便成为带着世纪末色彩的放纵者，在颓废中狂乱享乐。

宗教与思想发达是南朝的另一特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唐代大诗人杜牧的名句，其实南朝香烟纷纷，钟鼓处处，何止四

百八十寺？南朝曾有过举国家之力以崇佛的皇帝，所以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南朝具有关键地位。面对佛教大举传播，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已不足以应付，南朝的儒家学者遂不得不起而应变，于是出现了儒家对“神”的看法与解释，独步中国。

这样一个时代与它在烟雨楼台中精致优美、深刻思辨还带着一些浪漫颓废的风景值得一趟历史旅程，且让我们开始一次历史的探访之旅，进入《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南朝的遗产》，亲近它纤柔绮靡的芳容。

华北连接塞外，地理上以小麦为主的农业地区紧邻草原上肉食为主的游牧地区，胡人与汉人频繁接触，影响所及，此地的文化长期受到胡风感染。北朝文化因此开阔宏大，朴素粗犷，表现在石碑上，就是字字方正，笔画分明。在此种文化下孕育出的三长制、均田制、府兵制等，都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影响深远。

北朝的统治者或出自塞北的鲜卑族，或与鲜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北朝时期始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鲜卑文化，当然也存在着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矛盾与融合问题。鲜卑族文化传统对北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典章制度都有深刻的影响。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交会的结果，使北朝文化独具特色。北朝的汉人世家大族面对异族政权，特别恪守家风，强调家学的传承；反而是北朝的女性受到游牧民族社会风气的影响，担责任事，大胆热情。

北朝对中原地区的长久统治，带来了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在中国历史上从无前例。汉族虽被统治，北方诸族却逐渐被汉族同化，最终融合成为同一民族。南北朝长期分裂与北方长期被少数民族统治，为中国注入新血液，增添新气质，奠定下一轮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这样一个时代与它在铁马金戈中粗犷宏大又带着质朴直爽的景色值得一趟历史的旅行，且让我们开始另一次的历史探访之旅，进入《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北朝的遗产》，亲睹它实事求是、未脱草原风的样貌。

正是：

铁马金戈跨猎雕，杏花烟雨步虹桥。

二分天下兴亡事，看了南朝看北朝。

南朝风貌概述

人们对南朝的印象有一部分来自唐诗。唐朝距离南朝不远，南朝的许多旧事犹记，遗迹犹存，唐朝的诗人往往触景生情，面对南方已经逝去的繁华与美丽发出咏叹，留下不少千古名句。在启程前往南朝之前，就让我们品赏玩味以下四首唐代诗人的七言绝句，暂时不去理会诗中的典故，只是嗅一嗅南朝的丝丝气息，先隐约感受南朝是怎样的时代：

江南春

唐 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金陵图 二首选一

唐 韦庄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南 朝

唐 李商隐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
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

泊秦淮

唐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带着从这些唐诗染上的幽美与感伤，现在，让我们回到南朝的世界，在六个不同的领域里探访南朝。我们将首先从军事与外交角度了解南北关系，以下从统治者与政治，世家大族与社会、生活、文化各个主题接续展开，再通过宗教、动乱与世纪末狂欢的角度，呈现南朝最后的岁月。

南朝的历史探访之旅即将展开，现在我先做一些行前预备性的整体说明。

南朝（420—589年）

南朝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各朝，开始于公元420年东晋权臣刘裕篡东晋建刘宋，结束于589年隋灭陈，经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共170年。这四个朝代皆建都于建康，与前曾建都于此的孙吴和东晋合称“六朝”。南朝和同时存在于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等朝代合称“南北朝”。

南朝四代为：

●宋：420—479年，历60年，因皇帝姓刘，也称“刘宋”或“南朝宋”。

●齐：479—502年，历24年。因皇帝姓萧，也称“萧齐”或“南齐”。

●梁：502—557年，历56年。因皇帝姓萧，也称“萧梁”或“南梁”（554年以后，梁在湖北的残余势力称为“后梁”：555—587年，历33年）。

●陈：557—589年，历33年。因皇帝姓陈，或称“南陈”，无其他别称。

宋、齐、梁、陈都是短命的朝代，最长的宋不过60年，最短的齐仅有24年，可见当时朝代更迭快速，政治难得安定，充分显示乱世的特色。

南朝的领土继承自东晋，辖有中国南方，大约即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四代中刘宋疆域最大，北边曾达黄河；南陈最小，只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领土；后梁大致与陈并存，仅保有荆州一隅。

南朝是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朝廷。虽然南朝的四个政权都只存在了几十年，但总算能在100多年时间里在南方保住汉族政权的命脉，不致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又将汉族文化广泛传播至秦岭与淮河以南地区。中国南方在南朝时进一步开发，建康、江陵、扬州、成都等城市繁荣起来，工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形成属于南方的特殊文化，与北方不同。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在南北朝时已可清晰看出。

南朝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和传播都有贡献，她的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色彩鲜明，不可磨灭。

南朝人口变化

这段南北对抗的时期如此之长，表示双方长期势均力敌，也都有内部的问题与局限，力量起伏不定，才导致双方皆无法在短期内消灭对方。由于人口是古代最重要的国力指标，此种状况可由人口的变动看出。南朝方面，中国南方原有被称为“百越”的原住民族，但其人口数并无资料，故仅就汉族言，从东晋建国起到南朝末年止，依照邹纪万在《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归纳的历代史书资料，可以得出当时南方汉族人口的变动大致如表格所述：

年　代	东晋至南朝南方汉族人口概数变化
318 年	540 万（东晋建国后，北方人口南迁）
376 年	665 万（淝水之战前不久）
407 年	1000 万（东晋孝武帝淝水之战后东晋全盛期）
464 年	750 万（刘宋后期，因东晋末大乱，人口减少）
520 年	800 万
539 年	1103 万（梁武帝全盛期）
555 年	200 万（侯景之乱大破坏后）
581 年	314 万（陈宣帝时的恢复期，不包括四川与荆州）

从人口的角度观察，南方自东晋建国到南朝后期，270年间汉族人口竟然没有增加！由此看来，南朝在精致优美之外其实战祸连绵，导致的人口损失持续存在，还带有悲剧的色彩与性格，也难怪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另有一首咏南方六朝的诗：

咏 史

唐 李商隐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历史之河的流动必然有其或浮或潜的原因，南朝非但不例外，还有

其特殊之处。当南朝朦胧的轮廓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接下来就有几条线索诸如“南朝的开创者是谁？”“为什么南朝会由他在这个时间点开创？”“南朝历史的进程大致如何？”等，我们必须先行掌握，才能将南朝看得更清楚。

南朝的到来：刘裕篡晋

南朝从刘宋开始，刘宋的开国之君是大军阀刘裕。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行称帝建国，国号宋。刘裕能够推翻在南方存在已超过百年的东晋政权，自立为帝，除了自身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环境因素。

刘裕的出身，传统上认为是寒门，最近也有史家认为是低层世族。不论如何，刘裕因为家贫又性格豪勇，放弃传统士大夫以“文”为出路的方式，改采被一般文人，尤其是世家大族通常不屑为之的武将作为出路，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寒门甚至低层世族经由“正途”翻身的机会已经极为微小。这种状况反映出自东晋南渡以来，世家大族在南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日益巩固，并经由世代相承，成为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一块铁板，其人口数量也与日俱增，更导致在九品中正制这个“正途”之下，优选官职被他们全面垄断，包括位高事少的“清流”中央官员与能够得到实际好处的地方长官。

如此一来，低层世族及寒门的有志之士不得不另寻出路。当高层世族在世代簪缨后日趋文弱，纵情于清谈、山水、宗教、文学、艺术与享乐，能写出《兰亭集序》却不知世事之际，低层世族与寒门以军功起家而登上政治最高点的机会就产生了。

有趣的是，对于世家大族而言，只要皇帝承认他们的地位与特权，则皇帝由谁来做，其实并不重要，但如果具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可能危害到他们的地位与特权，他们必然全力反对，自己的武力不足时，则将乐见一个不会危及他们地位与特权的人出头，刘裕即属此型人物。

刘裕能够篡晋成功，除上述的深层背景外，尚有其他因缘际会的条件，与东晋后期的政治形势有关：

淝水之战（383年）是东晋的重大胜利，克敌立功的是由陈郡谢氏领导的北府兵。战后东晋孝武帝却将政权交给皇室司马家族，使领导淝水之战的世族陈郡谢氏政、军势力消失，引起世族反感，但也制造出低层世族与寒门取得北府兵权的机会。

荆州世族桓玄不服，发兵反晋，篡位成功，却引来各方反对，也造成刘裕以“勤王”为名义起兵的机会。结果桓玄失败，荆州势力与桓氏家族势力均告消失。

随后来自社会基层与秘密宗教的力量加入竞争，即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之乱”（或称起义）。刘裕对此采用强力镇压政策，又摧毁掉社会基层与地方宗教的力量。

至此，南方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与刘裕抗衡，刘裕遂借北伐进一步扩充本身势力。不料北伐有进展之际，刘裕安排在东晋首都建康的心腹死亡，刘裕立即自北方退兵，代表他早有以南方为根本，视东晋政权为囊中物，北方则可有可无之意。刘裕退兵时派一些功臣在北方留守，结果孤立无援，被胡人武力解决，等于他又借刀杀人，消除掉同样凭北府兵起家的功臣问题。

至此刘裕成为唯一的军事与政治强人，东晋随之走到尽头。刘裕既然承认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于是再也没有反对的声音。就在没有世族大臣为东晋死节的状况下，420年，刘裕顺利篡晋称帝，南朝开始。

南朝概况

在南朝的政治结构中，皇室来自寒门或低层世族。起自低层的军阀固然能够篡夺皇位，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却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迫使宋、齐、梁、陈四代的新皇室都不得不承认，故南朝时期政治地位并不等于社会地位。南朝的皇帝与宗室为争夺皇位时常发生血腥斗争，世族则基本上不予理会，因为不论谁当皇帝，他们的地位都不会改变。

但就因为世家大族的地位极为稳固，他们坐至高官，根本不需要在政治上努力表现，结果变成袖手享乐，不食人间烟火，在实务上百无一用。因此南朝皇帝多提拔寒门的才智之士任官，执掌机要，处理实际政务，南朝政府才得以运作。

比起北朝，南朝局面大致较为安定。南方的经济开发得以持续进行，使中国式的农业、手工业确定生根于南方。经过二百年的发扬光大，南方，尤其是长江下游，商业和手工业在南朝时都有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境内米谷、丝绸、瓷器、茶叶、纸笔墨砚等的主要生产区，奠定了江南成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基础；过去距离中原更遥远的福建、两广地

区也得以深入开发。南朝时期，中国南方的经济已经自成体系，并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这种情况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深远，从此只要北方经济体系受到破坏，南方就可立即支援，并顺势取得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可以说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条件就是在南朝时出现的，其趋势与基础也在此时形成。

至于南朝人的生活，一方面，高高在上的世族凭借其经济优势，当然可以充分享受；另一方面，由于政治黑暗，知识分子间自魏晋以来的隐逸传统此时仍然盛行，可以举生活年代跨越东晋与刘宋的陶渊明为代表。

南朝在刘宋建国初期经济发达，国势强盛，曾大举北伐，抵达黄河边，并一度占有山东半岛，但由于战略错误与北朝武力强大，北伐终归失败，从此连连失地，边界逐次南移，疆域也逐次缩小。到萧梁时因梁武帝推行善政，南朝实力复兴，国家再度强盛，但梁武帝晚年老迈昏庸，自毁根基，最后发生“侯景之乱”，使南朝四分五裂，元气大伤，称霸二百余年的世族至此濒临全面崩溃。此后虽由陈朝暂时维持住局面，但国力已衰，丧失四川、湖北等地，只能依托长江抵御北朝，成为长江下游的小朝廷，国家的北界撤退到长江边，梁的残余势力则在荆州一隅成为北朝的附庸。等到北方统一，隋朝建立后，南朝被吞并的命运就已经确定。

南朝历史的轮廓大致如此。如此的南朝，怎能不惹人幽思，发人感叹，引人探访？

第一章 索虏、岛夷，烽火扬州路——大分裂与南北战争

争城争地起征尘，烽火扬州路几春。
淮水秦山兵气凛，战魂犹是梦中人。

南北朝是分裂的时代、战乱的时代，距离太平盛世的景象甚远。当时虽然已不至于像五胡十六国那样遍地烽火，但南北间的对立与战争仍在持续。既然当时的大环境是对立与战争，就让我们探访南朝之旅从此开始。

南北分裂

顾名思义，南北朝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二元对立的状态。南北朝分裂的时间甚长，与12至13世纪南宋与金、元对立的分裂时期大致相当，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段南北两个政权长期对抗的时期之一。此期间内对抗的双方都曾努力要消灭对方，统一天下，但都未能成功。

整个南北朝期间中国的分裂状态大致是南方、北方各由一个政府统治，亦即仅剩两个对立政权。南方与北方都只有一个政府，表示南北双方内部的地方割据政治势力已大致被双方的中央政府解决，中国已经脱离东汉末年开始的地方全面崩解，也度过了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混战与割据，成为南北双方直接而且全面对立的状态。此种情势表示南北朝其实是中国大分裂时代的后期阶段，只剩南北双方的最终对决有待完成，可视为一段缓慢趋向重建统一帝国的过渡时间。

到南朝开始时，中华大地上的乱世已经持续二百三十多年，虽然极端的战乱与极端的分裂状态总算过去，但对立依旧存在，战争也依旧频繁。

索虏、岛夷

南北朝既然是一段缓慢趋向重建统一帝国的时期，南北双方当然都会以统一天下自许，如此一来双方的关系必然对立，冲突必然发生。故南北朝一百余年间，南北始终处于敌对状态，战争频仍，双方彼此敌视，因而产生蔑视。对分开二百余年，彼此又始终对立的双方而言，为对方取个轻蔑的绰号是无法避免之事。于是在南北朝，南朝称北朝为“索虏”，意思是梳着小辫子的野人；北朝称南朝为“岛夷”，意思是住在海岛上的蛮夷。南朝人还沿袭东晋以来的习惯，蔑称北方人为“伧”，意思是鄙贱庸俗的人。

当然不论“索虏”或“岛夷”喊得多响，对方都不是单凭骂几句就会消失的，所以双方都曾主动出击，发起过以消灭对方、统一天下为目的的战争。当时双方大致的分界线就是中国地理的南北自然分界线——秦岭与淮河，所以淮河流域常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多场战争在此爆发，使这一地区遭受严重破坏，终南北朝都不能恢复。

南北战争

南北朝时，双方边界地区经常发生战争，刀光剑影、血流漂杵的场面几乎贯穿整个南北朝历史，为一种不断间歇发作的武力对抗，很像疟疾，成为此时代的特色。这些南北战争双方都曾经发动过，所以南朝虽然文化优美，其帝王将相却绝非爱好和平之人，他们造成许多血淋淋的战场与惨案，史不绝书。

南朝北伐与北朝南侵

南朝发起战争的原因大多是希望扩张领土，当然最好能消灭北方政权。由此可见，当时南方的最高政治与军事领袖虽然不见得对本身实力有自知之明，却仍然胸怀大志，奋力向前，并未只顾偏安，这是南朝与南宋的基本不同之处。

南朝主动的北伐战争有：宋文帝时的元嘉北伐（430年、450—452年）、梁武帝萧衍的北伐（505—507年、514—516年、524—529年）与陈宣帝时的北伐（573年、577年）。这些北伐都以失败告终，而北伐失败就意味着北朝会乘胜南侵，再加上北朝主动的南伐，惨烈的南北战争不断，双方接界的地方沦为拉锯的战场，被兵火严重蹂躏。对双方而言，每一次南北战争与其胜负，又都会影响到内部政局，连串的南北战争，便以这样的力量塑造着南朝的形貌。

南北战争第一阶段：南朝宋北伐与北魏南侵

南北朝时期南北大规模战争的第一阶段，发生于刘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包括几次由南朝主动挑起的战争，总名“元嘉北伐”。

刘宋在420年篡晋后，于10年后才北伐，原因在于刚建国时内部不稳。刘宋皇室是一个乱世中发迹的军人家族，可想而知，内部必然充满血腥暴力。刘裕死于422年，以后的几年里，经过武力角力后，皇帝家族内部、帝室及大臣间的问题也告解决，才有意愿与能力北伐。继任刘裕的少帝因“失德”，于424年被一批仍想如东晋时代控制皇帝的大臣废杀，他们迎接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继位，即宋文帝，年号元嘉。宋文帝

坐稳皇位后，立刻翻脸，在426年又把这些人一一诛杀，从此大权在握。

430年之战

刘宋建国不久内部就发生纷争，无暇顾及北方边界，北魏乘机蚕食刘裕北伐所得的土地。到430年（元嘉七年）时，鉴于内部的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南方经济繁荣，宋文帝自认国力充沛，决定恢复中原，就发动了北伐。他派大将到彦之[1]率军五万，利用水路进军山东，攻入北魏国境。当时北魏军主力正在北方作战，黄河以南驻守兵力不足，面对来势汹汹的宋军，只得纷纷撤退。宋军顺利取得很多土地，推进到黄河南岸，占有洛阳，前锋直指潼关。

此时宋军主将到彦之希望巩固战果，可是战线已经推进到黄河边，东西绵延极长，全面驻兵守备之下，立刻暴露出兵力不足的弱点。不久进入冬季，黄河冰封，非但不再是险阻，反而变成骑兵的通道。果然北魏自北方调军，大举从冰面越过黄河突袭，冲破宋军薄弱的防线，连克洛阳、虎牢[2]等重要城池。到彦之大惊之下，率领残兵经水路返回南方，刘宋面临全面挫败。

宋文帝并不承认失败，再派遣大将檀道济率兵北进，支援战局。檀道济勇敢善战，有“万里长城”之称，他仍采取从山东进兵的路线，与北魏军接连打了三十几场硬仗，重挫北魏军，但本身也损失惨重，粮草、武器等几乎用尽。檀道济意识到危险，引军南归，北魏军则从宋军降兵处得知对方缺粮，于是进一步切断宋军的运输线，准备全歼宋军。危急时刻，檀道济放出惑敌的烟雾，先于夜间在营中准备大量沙土，再诈作盘点存粮，将沙装进袋子，还大声报出数目，把沙袋堆成小山，在上面放一些仅剩的粮食，制造军粮充足的假象。北魏军的密探将这种情况传报，魏将难辨真假，不敢深入追击。檀道济乘机亲率全军以缓慢速度南行，北魏军更加相信宋军并不缺粮，撤退是诈，必有埋伏，于是杀掉降兵，放弃追击，檀道济才能率军全身而退。这个青史留名的计策被称为“唱筹量沙”，“筹”是中国古代用来计算的小竹板。

刘宋的第一次北伐便如此以失败告终。当时北魏在两面作战中能够抽调南下的兵力应该不会很多，但仍能获胜，可见南北方的军事力量确有差距。

对保全军队回来的檀道济，宋文帝在嘉奖之余却暗生猜疑。当时的形势是，刘宋其他部队溃散，檀道济却威名远播，他拥有的实力得以保

全，在对比之下宋文帝对他的猜疑陡然增加。即使没有檀道济谋反的证据，宋文帝仍深感威胁，竟选择在檀道济返回防区的路上将他逮捕，随即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处死。檀道济被捕时脱下头巾大呼“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成为中国历史上冤死的著名武将之一，实在可以称他为“南朝的岳飞”。

檀道济的死讯传到北方，北魏将领都弹冠相庆，庆祝未来在战场上少了这个难缠的对手。其实宋文帝也应该知道杀掉檀道济将削弱己方军事实力，但仍毫不犹豫地下手，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刘氏皇室起自基层，与檀道济并非世族出身的背景相同，如果檀道济有一天造反，那些“王谢袁萧”“朱张顾陆”等世家大族必然袖手旁观，他这才把心一横，先下手为强。由此可见南朝政权中君臣关系的紧张，也反映出南朝乱世政治的特殊丛林法则。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名将的檀道济，被又一次南北分裂时期的南宋大诗人陆游用来自许，留下这首名诗：

书 愤

南宋 陆游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前线军事指挥官与后方君主间必然存在矛盾，檀道济就牺牲在这种亘古长存的矛盾中。陆游在诗的结尾极力推崇诸葛亮与他的《出师表》，可能是想到《出师表》里“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劝诫，赞扬诸葛亮为此预做防范与尽力化解，千载难及，相形之下，从檀道济想到自己，发出处在南宋初年局势中无奈的感叹。

450—452年之战

第一次南北大战后，刘宋转入休养生息时期，北魏一则忙于统一北方的最后阶段，二则必须面对北方新兴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故近二十年间双方都没有尝试大举进攻。到450年（元嘉二十七年）春，北魏已经统一北方（439年）一段时间，也暂时解决了柔然的问题，就开始动起统一中国的念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十万大军从首都平城[3]南

下，发动南侵，攻击刘宋淮河以北地区，大肆掳掠，刘宋守军坚强抵抗，双方作战极为激烈。在悬瓠[4]包围战中，攻城的北魏军死亡枕藉，尸体在城墙外越堆越高，后来甚至变成一道尸桥，魏兵竟可以踩着同袍的尸体直接到达城头，与宋兵面对面厮杀。战报传来，宋文帝决意采取攻势作为，下诏再度北伐，南北大战再起。

宋文帝此时起用王玄谟统率主力部队，仍走从前的路线进军。起初攻势顺利，深入黄河下游，包围滑台[5]城。宋军侦知城内多是茅屋，部下建议火攻，王玄谟恐怕烧毁城中所藏的粮食及军需，不准，结果错失破城时机，围攻二百多天不下，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的大批救兵已至。王玄谟见势不佳，拒绝部下列成车阵与对方野战的建议，下令南返，沿途部队死伤逃亡将尽，刘宋第二次北伐又以失败告终。滑台包围战中王玄谟始终不愿火攻，只为了城里的存粮与军需品，可见南朝军队深入北方后，粮食与补给为难的问题有多严重。

北魏军在皇帝亲自率领下士气高昂，一路追击，攻占南朝的扬州地区，直抵长江北岸的瓜步[6]，与刘宋的首都建康隔江相望。北魏军摆出一副准备渡江的架势，宋文帝也将水军全部集结在南岸，严密防守，还亲自登山眺望双方形势，最后的渡江决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451年（元嘉二十八年）的阴历正月初二，北魏太武帝忽然退兵。这个决策应属正确，因为北魏虽然取得胜利，但军队已损失过半，难以继续深入，后方也出现埋怨之声，何况春天将至，天气会渐渐转热，北方人将不易适应，不如见好就收，到此为止。北魏退兵沿途依然大肆烧杀劫掠，一来一往，原属刘宋的人民被杀或掳掠至北方的有数十万。北魏军凶暴残忍，甚而用槊尖挑着婴孩戏耍，许多村落被荡平，房屋全毁，鸡犬不闻，原在家屋筑巢的燕子只能将巢筑在树上。经此一战，刘宋元气大伤，转向衰落，更大的影响也落在南方人的心理层面。原来自东晋以来，南北双方虽然常有战争，但始终是在淮河流域与汉水流域争夺，包括关系到南方生死存亡的淝水之战，然而此次北魏南侵直抵长江，前所未有，整个南方大为震动，自信心因此丧失，再也无法恢复刘裕时代的气势。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回到北方不久就被杀身死，北魏内部动荡。452年（元嘉二十八年）不死心的宋文帝决定再次北伐，希望能挽回一些上次的损失，并保留一些颜面。此次北伐仍由王玄谟领军，有人建议应直攻黄河以北，但宋文帝决定只以黄河以南为目标。王玄谟等诸将开始进攻后，发现北魏防守严密，己方实力不足，无法攻破坚城，只得再次退

还。消息一出，有些部队不战自溃，即使宋文帝派了监军督战也毫无办法。这次出兵含有赌气与遮羞性质，结果非但无尺寸之功，反而再度暴露己方弱点，南朝武力弱于北朝的形势至此浮出水面，完全确定。至于两度挂帅的王玄谟，史书说他严苛寡恩，甚至从未在人前笑过，导致军中有耳语说："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这样一位将军能得到宋文帝的宠信与重用，自有其原因。

宋文帝一直有志于北伐，平时常与主张北伐的徐湛之、江湛和王玄谟等人商议，曾深受感动地说："观（王）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是漠北的山名，即今蒙古国肯特山，封狼居胥指西汉大将霍去病大破匈奴，攻抵漠北，登上狼居胥山筑坛祭天，向上天呈报北伐匈奴大功告成之事。宋文帝和三个臣子一阵议论，大家慷慨激昂，互吹大话，就在效法汉武帝的心态下营造出北伐的气氛与决策。宋文帝这句不明实情、自我膨胀的结论由史官记录，七百年后被南宋的豪放派词家辛弃疾评为"草草"。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南宋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7]

"草草"之下，烽火照亮扬州路，南朝的底牌被老狐狸拓跋焘摸清，南弱北强的局势就此底定。

宋文帝北伐失败导致魏军直逼长江，幸好北魏主动撤兵，也未派兵留守一度占领的地方，刘宋才能收复部分失土。此后刘宋以开放互市等政策维持南北和平，可是军事失利，北魏南侵，民怨严重，宋文帝的声望与地位急剧下降，政治斗争随之而起。太子刘劭一向反对北伐，宋文帝主导的两次北伐全盘失败，证明太子有先见之明，其声势日渐高涨。感受到威胁的文帝计划废黜太子，刘劭干脆先下手为强，在453年（元嘉三十年）弑父，刘宋陷入新一波的政治危机。宋文帝在北伐问题上谋

国不慎，非但赔上国家的前途，还贴上自己的性命。一千五百多年后，丘逢甲在台湾于甲午战争前夕读到这段历史，还曾吟出：

读南史杂咏 十首之六

清 丘逢甲

饮马长江虏志雄，佛狸来处燕巢空。
围棋坐夺投鞭气，莫怪苍生念谢公。[8]

南北战争第二阶段：北魏南侵与南梁北伐

刘宋后期政治混乱，北魏乘机南侵，攻下山东半岛等地，从此南朝无力收复，双方的主要战场南移至淮河一线。479年，萧道成篡刘宋，建立南齐。南齐立国只有24年，而且大多数时间采取与北魏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虽然少年昏君东昏侯萧宝卷曾尝试北伐，但一战而败，南齐不久也灭亡了。

502年，萧衍篡齐，建立南梁，是为梁武帝。当时南北之间虽然稍为平静，南方内部却问题不断。原来萧齐后期到萧梁篡位间政争激烈，选边、押宝、开价索求，甚至想自己另闯天下的南朝军人所在多有，反正对他们来说，如果谋事不成，还有投奔北朝一条退路，所以当时不乏叛降北魏的南朝将领。这些人之中最有名的是大字不识、心狠手辣的将军陈伯之。陈伯之在齐、梁更替之际早就两边观望，萧梁初建，根基未稳之际，他有意反叛萧梁自立，反叛不成，当然选择投靠北朝。这位将军最有名的一次杀人，是用融化的蜡灌进一位老太太的口鼻，将她活活闷死，只因他反叛萧梁时有一位效忠萧梁的张先生与他对抗，老太太是张先生的母亲，正好被他抓到。

此时北魏也正逢年轻的宣武帝（499—515年在位）刚即位不久，一见南方改朝换代，将领纷纷归降，便抓住南梁初建的机会，于503年派兵南侵，南北战端再启。

503—507年之战

503—505年间是此波南北战争的初期，挑起战事的北魏军攻势顺利，陆续占领南朝北方边境土地，南朝受到压制，逐渐退至长江一线。然而就在这个阶段，南北双方国力的天平再度倾向南方。原来梁武帝萧衍建国后励精图治，国力上升；北魏则自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

高层日趋奢靡腐化，中央与地方发生文化上的断裂，国内矛盾丛生，国力下降。这种对比为年轻的梁武帝提供了机会与勇气，于是他在506年（梁天监五年）发动北伐，开始反击。

梁武帝对北魏的进攻，是以夺回淮河以南地区，加大战略纵深，确保南梁安全为目标，双方遂在淮南地区展开大战。梁武帝派出弟弟临川王萧宏挂帅，南梁的达官贵人都捐出稻谷、金钱作为军费，南梁军器械精新，军容壮盛，北朝人见了都大吃一惊，认为是南朝数十年间没有过的。北魏闻讯，也派出皇族中山王元英率军迎战。

当时防守北魏第一线阵地寿阳城[9]的是降将陈伯之，双方发生接触战后，萧宏命才子型的秘书丘迟写下一封劝降信，就是千古留名的《与陈伯之书》，致送叛将陈伯之：

与陈伯之书（节录）

南梁 丘迟

>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时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
> ……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
>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
>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方吊人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陈伯之接信后就率八千兵马投向南梁。此事被后代某些人视为“美谈”，反复出现“陈伯之被信感动，回归梁朝”的说法。这种浪漫主义的史观看起来可爱，却未免把军国大事想得太单纯。其实《梁书·陈伯之传》只说他接信后回归，但未提二者之间的关系。试想才子丘迟这篇骈四俪六的大文章 ，不识字的陈伯之根本看不懂，虽然会有幕僚讲给他听，拉长声音高声朗诵也有可能，但与其说他听了之后被感动，还不如说他了解到南梁军锐气正盛，而他的鲜卑新老板又拿他当牺牲打[10]，要让他跟南梁军拼个两败俱伤，以消耗南梁军战力，所以基于保全实力第一的考量，他才决定降梁。

至此南梁北伐初期的障碍已除，进展顺利，接近黄河。部下纷纷建议继续前进，南梁军统帅萧宏却不听，将大军停下，驻扎于洛口[11]。萧宏此人，可说是中国古代皇族纨绔子弟的代表人物，贪财好色，伦理道德沦丧到与侄女通奸，为人则是对内高傲，对外胆怯，毫无将略可言，还不把皇命与国家制度放在眼里。萧宏屯兵不进，给了北魏调兵遣将的时间。北魏援军将到，萧宏才召集诸将会议，准备退军，诸将怒不可遏，军心涣散。当年九月，洛口地区暴风雨骤至，萧宏胆怯，竟抛弃军队，仅率数骑私自逃走，直接渡江，回到建康才停。南梁军随即溃散，武器、军需抛弃满地，伤病士兵无人理会，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彻底失败。如今这场悲剧性的北伐已经埋藏在史书中，让后代人记忆最深的，只剩下丘迟的那篇文章，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十六个字，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江南景色的代表，西湖就有名为“柳浪闻莺”的一处景点。

中山王元英指挥下的北魏军尚未进攻就轻易获胜，当然一路南下，遂包围钟离城[12]。当时钟离城中守军仅三千余人，但由将军昌义之率领，拼死防守，居然使北魏军长期不能攻克，可见此时北魏军的素质也已降低。507年（梁天监六年）南梁的援军到达，里应外合，从城内城外夹击，顿兵城下已久的北魏军崩溃，被逼入淮水而死的就有十余万人，浮尸满河，被杀与被俘者又十余万，留下粮食、武器、资材堆积如山，牛马不计其数，这是南梁北伐的重大胜利，更是南朝在南北战争中空前的大捷。

507年南梁军虽告大胜，但其兵力不足以收复更多土地，大战因此暂停，此后双方仅有一些小接触，大致平静七年。

514—516年之战与浮山堰事件

514年（梁天监十三年）梁武帝为扩展地盘，再度大举出兵北伐，南北双方大军又在长江、淮河之间的战场上展开残酷的争夺战。此时寿阳城属于北魏，于是变成南梁军百般攻城，北魏军顽强守御，南梁军屡攻不下的局面，战事还是陷入僵持。

为打破僵局，梁武帝萧衍竟然不惜代价，推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攻计划。这次匪夷所思的工程战是由一个北魏投降过来的人提出的，预备修筑一条高大宽厚的堤防截断淮河，使堤坝后方不断积水，形成一个大型的人工湖，等到水量够多时，掘开堤坝，放水将寿阳城淹没冲垮。梁武帝闻计大喜，下令大量征发徐州、扬州人民，配合军士共二

十万人修筑水坝。这条拦河水坝称作“浮山堰”，经考证位于今安徽省五河、明光及江苏省泗洪三县交界处的淮河浮山峡内，工程极为浩大，系从河岸两边开始修筑，到中流合龙困难，曾投下数千万斤的铁、石、木材才办到，工程中施工人员与牲畜死亡无数。《梁书》记载浮山堰于516年（梁天监十五年）四月间完成，长9里[13]，高20丈[14]，基部阔140丈[15]，坝顶阔45丈[16]，坝上种植树木，军队也驻营在此，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坝，据估计，坝后方应该会形成面积约6700平方公里的人工湖。若与我国现代的水坝相比，台湾桃园的石门水库大坝长360米，高133.1米，坝顶宽11.2米；超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长2335米，基部宽115米，顶部宽40米，最大浇筑坝高181米，由此可以看出浮山堰工程有多么庞大与艰巨。

当年八月间，就在南梁眼看大坝后方水位不断升高，准备找个时机放水淹城之际，黄淮平原上的夏季季风雨涌到，短时间内天降大雨，淮水暴涨，浮山堰承受不住，突然崩塌。变出俄顷，坝顶的驻军立即沦为波臣，下游河道两旁的居民也被卷走，总计十余万军民迅速被冲走。浮山堰这个给南梁军队与战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大工程，一度也曾震惊北魏，使北魏不得不派兵争夺，结果它在未曾周详考虑气象因素之下，一夕化为乌有。北魏闻讯松了一口气，撤回突袭部队，而南梁经此损失，更无力再战，此轮战事终止。

浮山堰事件是中国军事史与工程史上的大事，也是南北朝战祸惨烈、民不聊生的象征之一，而它恍如一场噩梦般的荒谬，本身就充满着魏晋南北朝的气息。

524—529年之战

523年（梁普通四年），北魏边区爆发大规模动乱，史称“六镇之变”。念念不忘北伐的梁武帝见有机可乘，就在524年（梁普通五年）又一次下令北伐。此时北魏忙于镇压反叛与内部斗争，无力顾及南方边疆，遂使南梁军在524—526年（梁普通五年至七年）间颇有斩获，攻克52座城池，包括多灾多难的寿阳在内。

528年（梁大通二年）北魏孝明帝被母亲胡太后毒死，大将尔朱荣又杀死胡太后与她所立的小皇帝，国内大乱。北魏宗室北海王元颢恐怕祸及己身，率其子元冠投奔南梁。元颢来降，梁武帝大受鼓舞，认为可以利用他成立傀儡政权，使北魏乱上加乱，间接控制北方，于是封元颢为魏王，派出名将陈庆之率兵护送他返回北方。至此南梁直接介入北魏

内部的政争，战事再起，局势也变得更加复杂。

528年十月起，陈庆之率军接连攻克睢阳[17]、荥阳[18]等城，元颢立即在途中称帝。南梁军至大梁[19]，魏守军投降，南梁军直逼洛阳。尔朱荣所立的北魏傀儡皇帝孝庄帝自知不敌，只得撤退，渡过黄河北逃，留在洛阳的一批北魏宗室率领残余的文武百官迎接自称皇帝的元颢进入洛阳。元颢接管北魏宫殿，定年号为建武，封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于是北魏分裂，出现两个皇帝、两个政府，而陈庆之将军也同时拥有南梁与北魏两国的官职，南北朝乱世的怪象至此毕现。

这种不稳定的局面显然不能持久。梁武帝与元颢本来就是互相利用，元颢回国称帝的企图既已达到，必然与梁武帝貌合神离，渐行渐远，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北魏皇帝。他给陈庆之封官，表面上是论功行赏或不得不然，实际上恐怕暗含离间南梁君臣的计谋。陈庆之固然建功立业，但大将领兵在外，还长期以客卿及保护者的身份与一个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北魏皇帝相处，当然不可能不引起梁武帝的猜疑。陈庆之也看出自己孤军深入的处境与元颢想摆脱南梁控制的心理，曾以恐怕敌人反攻、兵力不足为理由，在元颢的朝廷上建议请南梁增兵，希望一举将两个隐忧同时解决。元颢则正想方设法摆脱南梁的控制，唯恐陈庆之另经私下渠道说服梁武帝增兵，就抢先给梁武帝上表，声称新克服的地区应该采取安抚怀柔策略，不宜增兵使百姓恐慌。心有不可告人盘算的梁武帝果然接纳，不再发兵，于是陈庆之和南梁在洛阳的驻军孤悬在黄河边，无人理会，成为典型的孤军，其命运已经注定。

529年（梁中大通元年）六月，尔朱荣结集大军，发动反攻，陈庆之虽仍能抵挡，元颢却很快战败，洛阳危急，元颢再度南逃，被杀死于路途中。陈庆之毕竟将才过人，在此种局面下还能率残军撤退，不料又逢山洪暴发，南梁军损失殆尽，陈庆之削发剃须扮成僧人，总算逃回江南。洛阳以下，此次南梁北伐所得的土地全部丧失，此后南梁再也无力发动对北魏的大规模作战，梁武帝的北伐计划全盘失败。

梁武帝是个十分热衷北伐的南朝皇帝，几次北伐却一一失败，若论其原因，梁武帝本人固然要负最大的责任，但导致他失败的决策其来有自，其实是受到当时政治与军事环境的影响。

梁武帝第一次北伐以弟弟萧宏为将，当然是起用非才，这与他的用人之道与授权政策大有关系——这本是南梁以皇室子孙掌握兵权政策的一部分。南朝皇帝对寒门或低层世族的军人极不放心，因为南朝就是从

这个群体里发迹的，皇帝们深知若军人反叛，高层世族只会袖手旁观。在这种情况下，梁武帝将许多萧氏子弟封王，派往各地担任地方长官，掌握当地兵权，出征时也尽可能以皇族挂帅，目的是希望战功由皇族获得，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他姓将军。

梁武帝北伐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在于战略构想。当时南北对立，一边一国，故南梁出兵攻打北魏，必先确定战略目标：是要收复黄河流域全部地区，将北魏逐出长城，还是只希望推进到黄河一线，长久据守，以此为南北双方分界？若是后者，则只能说是希望扩大国防空间，属于以攻为守的战略。中国历史上，元朝末年朱元璋从南京派兵北伐，就是以攻下北京，驱逐蒙古人至长城之外为目的，也顺利达成；三国时诸葛亮屡次从四川北伐曹魏，则是以攻为守型的北伐，目的在迫使占有人力、物力绝对优势的曹魏一直陷于被动，蜀汉才能安全。若以此检视南梁的北伐，则梁武帝在战略构想上似乎陷入混乱，以上二者都不是。

南梁建国之际，北魏已经迁都洛阳，洛阳迅速成为繁华的城市，散发出政治、经济与心理层面的吸引力。既然一个肥美的敌国首都就在黄河南岸，那么只要攻下它，加以长期占领，就已经满足了南朝政治、经济与心理层面的需求，又何必好高骛远，冒险而进，非攻下北魏的旧都平城[20]，将鲜卑人赶出长城不可？一旦战略如此确定，北伐的兵力就只要足够推进到黄河即可，不需起倾国之兵；何况这样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好处，就是借限制兵力使领兵大将的实力受限，不致因战胜而坐大，岂非一举两得？就以陈庆之为例，从史书的记载看，梁武帝交给陈庆之北伐的兵力应该不会超过一万人，因为在荥阳攻城战中，陈庆之自己说南梁军只有七千人。陈庆之从小就跟在梁武帝身边，毕生只有梁武帝一个老板，与梁武帝的关系长久而紧密，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总之，梁武帝主导的北伐，目标最远只到洛阳，战争范围大部分在淮水地区，必然有他如此选择的原因，值得推敲。然而古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南梁的北伐既不以消灭北魏为目的，则北魏即使暂时失去首都洛阳，情况也并非恶化到生死存亡的地步，尽可以暂时后撤，再从北方调兵反攻。南梁的北伐便在这些背景下师老无功，徒然招致己身的大量损失而已。

南梁北伐最终失败时，北魏的气数也已将尽，双方内部问题都日趋严重，南北战争自然停顿下来。534年，北魏实际已被两个大军阀分别掌控东部与西部，分裂成为东魏、西魏二国，互相征战。南北朝进入后

期，国际局势则成为三国鼎立，展开另一波的风云变幻。

南北朝后期局势的变化

南北朝后期，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南朝在547—557年之间遭遇侯景之乱[21]与其后的混战，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前后延续10年，战火从东海之滨延烧到四川，南方被严重破坏，损失惨重，终南朝不能恢复。到557年南陈建国时，只剩长江流域的东半部，长江成为北方边界，而且国土残破，经济受损严重，南朝国力已无法与北朝相提并论。然而北朝此时却处于分裂状态，东方的北齐与西方的北周争战不休，暂时无力顾及南方，南陈则与两国都有接壤之处，又因与北齐的边疆很长，且接近首都建康，影响较为直接。在这种状态下，等到南陈内部逐渐稳定，元气逐渐恢复，总算有了一定实力后，三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后来居然导致南陈的北伐。

南北战争第三阶段：三国鼎立与南陈北伐

南北朝后期三国鼎立，随着情势的变化，南陈领导者看出可以火中取栗，在其间获利的契机，这导致南朝在最后的阶段仍然出现主动北伐的战争。

573年之战

陈宣帝（569—582年在位）胸怀大志，即位后面对三国鼎立的局面，决定采取自古流传的“远交近攻”策略，对西北边的北周友好，准备攻击正面的敌人北齐。北周当时与北齐的对抗已进入后期，北齐暴君、乱君、昏君连续出现，政治混乱，国内渐渐离心离德，北周则整军经武，有消灭北齐之意。北周也遵循远交近攻的战略，决定联络南陈同时出兵，希望南陈军能牵制住部分北齐军力，使北齐首尾不能相顾，有利于灭齐作战。于是北周派使臣到建康，提出两国共同伐齐、分头并进的建议，还慷慨地表示消灭北齐之后，双方平分天下。

这种建议让陈宣帝看出趁机取利的希望，于是表示同意，开始准备对北齐的战争。到573年（陈太建五年）时，陈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北伐，派大将吴明彻领军十万，渡江北进。这次北伐开始时非常顺利，连续攻克北齐南方的重镇，几乎收复全部淮河以南地区，南陈的北方边界推进到淮河。至于北齐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原因在于当时北齐国势衰落，大部分精兵又都放在西线抵抗北周，南方防务空虚，才会被南陈乘虚而入。

陈军占领淮河地区后并未继续前进，其原因为何？因史无明文，这成为一个有待研讨的问题。当然陈宣帝并非庸才，北伐到何处停止他应该自有规划。假使他认为此次北伐的目的在于拓展领土与加大国防纵深，则取得淮河地区后都已如愿以偿，应该巩固战果，经营新获得的领土，自然没有必要再冒险前进。至于南陈军不再前进的原因是否仅止于此，或许可以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推论。

如果观察吴明彻将军毕生的作战经历，可以发现他擅长水战，指挥舰队作战，往往获胜，而他碰到攻城战时，采取的战法几乎只有一招，就是在敌城附近的河道下游筑堤蓄水，等水位高涨后，乘船逼近城墙顶

部发动进攻，万一进攻不利，还可随时掉转船头撤退，对方无法追及。这种战法吴明彻运用纯熟，又碰上长江、淮河之间河道甚多，所以他能发挥专长，得其所哉。可是一旦进入黄淮平原中部，河流减少，吴明彻无法发挥所长，将被迫进行他与南陈军队都不擅长的大平原陆军会战，他和陈宣帝都没有把握，应属当然，所以才见好就收。这种情况可能是南陈军队北伐自动设限的隐藏性因素，也是一种有趣的解释。

577年之战

573年，北齐在南方受挫，只得抽调部分兵力南下，西线更加危急。北周抓住机会，全力进攻，到577年一举灭亡北齐，北方复归统一，与陈朝约定“共灭齐国，中分天下”的往事，当然不会再提。就在北齐灭亡之际，陈宣帝认为可以趁北周对北齐故土统治尚未稳固的机会，进一步开疆拓土，于是就在577年（太建九年）再度下令北伐，仍以上次战胜的吴明彻率军，目标是徐州至兖州一带。

此次吴明彻率领数万大军，猛攻彭城附近的吕梁[22]，仍然采取驾轻就熟的策略，筑堤蓄水，乘船攻击。然而北周军刚刚灭亡北齐不久，锐气正盛，而且将领显然研究过吴明彻的战法，也想好了破解之道，至此南陈军的气数将尽。北周的援军并不直接攻击南陈军，而是在河道中建构大型障碍物，先堵截住南陈军船队的退路，再找机会决战。南陈军果然大起恐慌，吴明彻也无法可想，只得听从部下建议掘开堤防，希望趁着冲出的水势撤退，结果洪水迅速消失，南陈军船只四散搁浅，部队全面溃散，吴明彻本人及三四万军队皆被俘虏，只有数千人逃回，南朝最后一次北伐就此终结。此后南朝灭亡的命运已经确定，只剩北朝何时征服南朝而已。历史证明，这个时间点落在了12年之后。

陈宣帝的北伐，有人认为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又不自量力的轻率之举，尤其第一次北伐尝到甜头后，第二次还想如法炮制，更是决策的大错。若以结果论，当然如此，然而陈朝先天不足，经济力量与武备从开始就难与北朝相比，陈宣帝以一个有为之君的身份面对此种形势，有可能决定必须先拓展疆土才能充实国力，以便未来能够与北朝长期对抗，刚好又遇上北朝分裂的时机，才两次北伐。至于他起初为何不以夺回长江流域西部为目标，出兵攻打北周，应该是看到北齐衰乱，国力下降，才挑中北朝中较弱的这一方。

中国历史上与此类似的时代出现在宋朝。北宋末年采取联金灭辽政策，南宋后期也联合蒙古灭金，结果辽、金灭亡后，北宋与南宋就直接

面对更凶悍的新锐敌国，最后不免于灭亡。一个政治领袖谋国之难由此可见，身为较弱的一方，更是如此。《孙子兵法·军形篇》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以此分析南陈的北伐，可以发现南陈正是处在长远的败局中，其北伐可称勇敢，却是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了。

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互别苗头的南北关系

南北朝时南北双方在战场上凶狠残暴，但战争并非每天都在进行，战时以外，双方还是有互相来往的需要，有时还必须借助交往以缓和紧张关系，所以互动始终存在。例如在外交上，双方都会不定期派遣代表团出使对方，交涉一些事务，当时称为“交聘”。“交聘”对双方来说都是大事，因为它要处理和谈、结盟、边境官方与民间贸易、交换俘虏等事务，同时具有刺探、讨价还价、社交、宣传以及抬高自己、贬抑对方等功能。每次不论南来或北往，只要一方派团出使对方，就是一场针锋相对，在各个领域互别苗头的大戏。

互别苗头无所不在。首先是出使行为本身。派代表团出使的一方称此为“报使”，即报聘对方的出使；另一方则老实不客气地称对方是“朝贡”。其次是使节团的遴选。使节团代表国家与皇帝，组成必须谨慎，成员的条件甚高，尤其注重仪表气质、文化素养、口才与临机应变的能力，绝不可马虎，万一出使时有辱国体，回国后必将遭受惩处。清代史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对南北朝出使团成员的描述是：“必妙选行人[23]，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瞻者，以充聘使。”

等到双方代表相见，唇枪舌剑之争立刻开始。双方都竭尽所能地逞口舌之利，希望压倒对方，讽刺、争论连绵不绝，绝无冷场。本书将探访两个这样的场景，代表两种不同的场合与主题，但其气氛之紧绷与言词之尖锐并无二致。

第一场

南朝宋北伐导致北魏太武帝亲自率军南侵，直逼彭城，在彭城外驻下军队。北魏决定先礼后兵，要求城里刘宋的守军派代表出城，双方在北魏营地会谈，目的在宣扬国威并一探虚实。刘宋守军同意，派出张畅为特使出城到北魏军营，北魏则命李孝伯主谈，并负责接待。《魏书》里记录下当时双方从见面寒暄开始的对话，下面就直接翻译为白话文，以求生动：

李孝伯（以下称北李）远远就招呼：请问您贵姓？

张畅（以下称南张）：姓张。

北李：原来是张长史。[24]

南张：您怎么知道？

北李：既然到贵地，怎能不知道？

南张：您又姓什么？官居何职？

北李：我是个兵，哪里值得您问？不过足够做您的对手。

北李：皇上颁布诏令："太尉、安北将军[25]可以暂时出营一下，要跟他们见见面。朕也没有攻打彭城，你们为何让将士操劳，在城上严加戒备？现在派人送给你们骆驼跟貂皮大衣等东西。"

南张："颁布诏令"这种话，只可以用在您的国家那边，在这里怎么可以这样说！

北李：您那边的太尉、安北将军是不是臣子呢？

南张：是的。

北李：我们朝廷统辖万国，四海之内没有敢不称臣的，即使是邻国的君主，下个命令为什么不能对邻国的臣子称作诏书？

然后双方谈到主题，经过冗长的辩论后，进入结论。

北李：您靠着这些空洞的话，支离破碎地回答我，可以说是"遁辞知其所穷"[26]。何况皇上应当不会围攻这座城，只会亲自率领各路大军直到瓜步。南方的事如果办成，这座城早就不必围攻了；南方之行如果不能取胜，彭城也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了。我方现在将启程向南，要到长江边让马喝喝水而已。

南张：要去要停这种事，他怎么想都可以。如果魏国皇帝真能让马在长江边喝水，就是没有天理。

北李：从北方能到南方，靠的是人力，让马到长江喝水，难道只有天理？[27]

至此，张畅告辞回城。

南张：河北地方扫荡、平定已经指日可待，我们下次相见之期恐怕不远。您如果能来宋朝，今天就是我们认识的开始。

北李：现在看来我应该会先到建康等着您呢。只怕有一天您与两位王爷将自己绑起来请求恕罪，我会来不及整理仪容迎接。

经此一番没有刀剑的战役，连张畅都对李孝伯的风度娴雅、应答如流大为叹服，北魏太武帝更是大大高兴，立刻封李孝伯为宣城公。

第二场

南梁武帝萧衍有一次向北魏分裂后的东魏建议双方和谈，东魏同意，派使节团到南方谈判。

为此东魏慎重遴选使节团成员，最后决定以李谐担任团长。李谐率团到达建康外的石头城，南梁派主客郎[28]范胥迎接。随着双方见面，唇枪舌剑的厮杀立刻开始：

李谐（以下称北李）：迎宾长担任这职务多久了？

范胥（以下称南范）：我本来在宫门内教导皇家子弟，又刚好担任现在这项职务。

北李：国家学府教授不应该被贬官到“郎”这一级。

南范：为迎接远来的宾客，所以专门出来暂时兼任的。

北李：委屈自己来办事，真是因事制宜。就因为我区区一个使者，令您贬官了。

南范：我看看低微的自己，不足以对应显扬盛大优美[29]，怎敢说委屈自己？

南范：现在还暖和，北方应该比这里稍冷一些？

北李：土地位于阴阳端正的所在，冷暖都在适当的时间，不知道多少[30]。

南范：我所问的邺城，难道是测量日影的地方？[31]

北李：都是皇帝的居所，相距不远，可以统而言之。

南范：洛阳既然以盛大美丽著名，因为什么事搬到邺城？[32]

北李：“不能长久住在一个地方，到现在已经五个国都了。”[33]帝王没有城里城外，所在之处就是首都，有什么奇怪的？

南范：殷朝人遭遇危难，所以迁都到相、耿地方，贵朝为何而迁

徙？[34]

北李：圣人鉴往知来，选定时间就行动，何必等到兴衰？

南范：金陵从前代起就有王者之气的征兆，黄色的旗帜、紫色的华盖本来出于东南，君临万国，应该在这里。

北李：这些只是帝王的符箓，怎能与中国的伟大相比？紫色的华盖、黄色的旗帜，进入洛阳时就结束，难道不是自己害自己吗？辩士的话，开开玩笑罢了，没什么了不起！

这次外交辞令对阵后，梁武帝听说了李谐的口才，特予召见，李谐不卑不亢地回答梁武帝的问题，使南梁上下都十分佩服，他回国后当然得以升官。然而或许因为这趟出使任务从头到尾极为紧张，消耗心血太多，李谐回国不久就脑血管病发作，先是半身不遂，随即死去，年仅49岁，可见南北朝时外交特使之难为。

外交接触既然如此紧张，南北双方就都非常重视接待对方使团，特别修建了专用招待所，称为“客馆”。客馆由地主国管理，有专职官员负责，职称是“馆司”或“监馆”，除表面上接待外，还附有监视与搜集情报的责任，故任何使者的言行都必受监控。有时特使团还在谈，派遣国就出兵攻来，尚未返国的使团就要遭殃，立刻被贴上缓兵之计、障眼法等标签。虽然基于“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古训，不致被逮捕问斩，但也必定全团遭到扣押，客馆就成为拘留所。北魏孝文帝有一次派往南齐的使团就碰上这种遭遇，当时谈判尚在进行，北魏军已发动南征，南齐就以腐米、臭鱼、莝豆[35]供餐，借以虐待北魏使者，双方因此在客馆发生冲突，北魏使节团长卢昶吓得放声大哭，团员张思宁则抗争不屈，竟死于客馆。卢昶回国后被孝文帝当面责骂，立刻罢官。据统计，整个南北朝使团被拘留事件至少发生过七起，可见当时双方的针锋相对与政治局势的千变万化。

使节团到达对方国家后，还会被对方要求“切磋技艺”，举行比赛，项目从赋诗、骑射到围棋都出现过，当然出使的一方也可能准备以己之长攻对方之短，故意带着高手向对方叫战，所以使节团中还需要配属专业人才，以备不时之需。例如北魏孝文帝时曾派官员李彪出使南齐，李彪也是北魏围棋高手，他有心在围棋上压倒南齐，就带上洛阳第一高手范宁儿同去，要求双方以比赛围棋“联谊”。范宁儿是“棋童”，即受国家培养的职业围棋神童。南齐也知道来者不善，便推出南方第一高手江南名家王抗与其对抗。这场被史书记载下来的南北围棋对抗赛，以北朝神

童击败南朝大师结束，为北魏挣足了面子。在场的北朝使团扬眉吐气、南朝人士垂头丧气的模样，一千多年后都可以想见。果然李彪回国后立刻升官，此后北魏的使节团名单中，范宁儿多次赫然入列，有可能是南朝输掉这一场很不甘心，以后每次都要求活动中加入这项比赛，只是北朝神童以后的战绩如何，历史就没有记载了。

总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抗衡是持续的，也是全面的。“索虏”“岛夷”之间真刀真枪的战场上烽火连天，洪水横流，杀人盈野、盈城，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照样竞争激烈，寸步不让。一千多年前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就这样留下一幕幕针锋相对的场景，让我们在探访之余，不禁感觉时间虽如此遥远，场面却如此熟悉。

【注释】

[1] 人名，姓“到”。

[2] 今河南汜水。

[3] 今山西大同。

[4] 今河南汝南。

[5] 今河南滑县。

[6] 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

[7] 孙仲谋，孙权；寄奴，刘裕；佛狸，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本名，鲜卑语原意为野狐。

[8] 投鞭，淝水之战前，前秦皇帝苻坚说出“投鞭断流”的话，意谓前秦部队只要将马鞭都投进长江，长江就会断流。谢公，谢安。

[9] 今安徽寿县。

[10] 棒球术语。棒球比赛中，击球员击球至特定位置，牺牲自己安全上垒的机会，掩护跑垒员推进或得分的战术，称为牺牲打。

[11] 今河南巩义市。

[12] 今安徽凤阳东北。

[13] 约等于4公里。

[14] 20丈约等于49米，依南朝1丈等于10尺、1尺等于今24.5厘米换算，以下同。

[15] 140丈约等于343米。

[16] 45丈约等于110米。

[17] 今河南商丘。

[18] 今河南荥阳市东北。

[19] 今河南开封。

[20] 今山西大同。

[21] 详情于第六章 叙述。

[22] 今江苏铜山境内。

[23] 使节。

[24] 长史，官名。

[25] 当时刘宋领兵的两个皇族的官名。

[26] 语出《孟子·公孙丑上篇》。

[27] 省略“能管”。明末清初的《多尔衮致史可法书》中有“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两句，与此异曲同工。

[28] 迎宾长，相当今外交部礼宾司官员。

[29] 省略“您的”。

[30] 省略“冷”的程度。

[31] 讽刺东魏首都邺城不算正式国都。中国古代在首都矗立标竿，记录日影的变化以确定历法，颁行全国。

[32] 这里在讽刺北魏末年内战导致首都洛阳残破，东魏只得迁都邺城。

[33]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语出《尚书·盘庚上篇》。

[34] 紧咬东魏迁都一事不放。

[35] 喂马的饲料。

第二章 捕鼠达旦狎客宴，步步生莲半面妆——昏君、乱君、暴君与宫廷女性

读史方知世事艰，来龙去脉不能删。
南朝多少兴亡事，尽在宫闱密奥间。

探访过南朝北伐血腥杀戮的军事战场与南北双方针锋相对的外交战场后，我们的南朝第二项探访旅程将进入南朝宫廷深处，一窥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应该会让后代的探访者大大惊讶，印象深刻。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时代，宫廷则是其独特性的重要表征。在中国历代皇室中，应该以南北朝的皇室最为荒唐，而且南北皆然，成为此时代的一大特色。

南朝皇室乱象

只要检阅南北朝时代皇帝、皇族与宫廷女性的传记，将立即发现有很大比例连篇累牍都是这些人荒唐的记录，充满奢侈、浪费、残酷、杀戮、淫荡、任性、偏执与不知所云的荒唐行为。

这些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先将他们认为威胁到自己的人全部杀光，从此胡作非为到匪夷所思的境地，但轮替也极快，经常是前一批人荒唐几年后惨死，换另一批人登场，杀戮依旧，荒唐也依旧，过几年照样走上绝路。宫廷男性如此，部分宫廷与皇族女性的奢侈、浪费、淫荡、任性，其程度也史册难寻。

南朝皇室的这种状况极为普遍，导致南朝皇帝的折损率极高，皇帝在青少年时期即被杀、被废者甚众，尤其以宋、齐两代最为惨烈。

依据《南史》的记载，可以将南朝各代皇帝归纳出以下数字：

•宋（420—479年）：共九帝，平均在位6.5年，其中六帝被杀。

•齐（479—502年）：共七帝，平均在位3.3年，其中四帝被杀。

•梁（502—587年，含后梁）：共九帝，其中一帝饿死，四帝被杀，一帝投降被俘，除武帝在位48年外，其余平均在位4.8年。

•陈（557—589年）：共五帝，平均在位6.3年，其中一帝被废，可能被杀，一帝被俘。

折损率这样高的一批皇帝，就在首都建康的皇宫里发号施令了170年。因此南朝宫廷中的荒唐与动荡，也很类似疟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一次。

南朝皇室的昏、乱、暴实况

南朝的皇帝中有昏君，有乱君，也有暴君，还有昏君兼暴君、昏君兼乱君，更有昏君兼乱君兼暴君的。

昏君指智慧不足、行事昏乱、当政无能的统治者，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智力正常，却酗酒、渔色、敛财、整天玩乐的君主，如果完全不顾皇帝应有的角色特性，行为狂乱到匪夷所思，还可以同时称为“乱君”；另一种是智障君主。前者历史上常见，南朝尤其多；后者最著名的例子有高度智障的东晋安帝、中度智障的西晋惠帝，南宋宁宗可能也属于此类。昏君不愿或无能处理国政，却不见得残暴，智障的君主更是如此，晋朝的两个智障皇帝就都没有暴虐杀人的记录。

暴君则指使用严刑峻法，以残暴、杀戮为手段甚至兴趣的统治者，最著名的是秦始皇。暴君不见得昏庸，很多暴君都智慧过人，精力充沛，工作勤奋，自视极高。

“昏”“乱”与“暴”并不必然同时出现在一个君主身上，但如果在一个君主身上同时出现，带来的祸患一定比单纯的昏君或暴君更大。不幸的是，南北朝的君主却常常既昏且乱且暴，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民生的痛苦可想而知。

南朝昏、乱、暴或既昏且乱且暴的皇帝甚多，他们通常具备四个特征：一是年纪很轻；二是行事趋向极端，可谓匪夷所思；三是昏、乱、暴事迹不断发生，几乎成为常态；四是内斗不绝，骨肉相残极为严重。

想把南朝探访透彻，就必须将建康皇宫里那些皇帝昏、乱、暴的事迹弄清楚。这会让人啧啧称奇，却并不是很愉快的体验，请大家先有心理准备。

南朝历代皇帝的昏、乱、暴事迹

刘宋

少帝刘义符（422—424年在位，被杀，得年19。按，虚岁，以下同）

此人在御花园华林园中修建整列店铺，亲自当售货员，可称角色扮演的祖师级人物。他喜欢乘船出游，沿途又唱又叫，最后被政变的军队在龙船上逮捕，当场被废，随即囚禁。政变团体要杀他时，刘义符竟能凭借力气大甩脱凶手逃走，闯出城门，终于被追兵用门闩当木棍，从脑后打倒在地而死。

孝武帝刘骏（453—464年在位，病死，享年35岁）

此人的特色在于所有皇帝应该被劝谏的行为他通通有：

刘骏性喜奢华，宫殿墙柱、地板皆铺上锦绣，又嫌原宫廷狭窄，另建新殿，地基就在其祖父宋武帝刘裕生前居所上。动工时他率领大臣围观，旧房屋外墙拆掉后，发现床头用泥土做成屏风，墙上挂着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在旁边称赞宋武帝有节俭朴素的品德，作为孙子的宋孝武帝却不屑地说："乡下老头能得到这些东西，已经太过分了！"

刘骏酗酒贪杯，经常宿醉醒来继续喝，最终喝成一个酒糟鼻。

他好色无度，不避本宗，与堂妹通奸，将她改姓殷，接进宫中，封为贵妃，甚至《南史》还爆料说他和生母路太后乱伦通奸，不论此事是否真实，从他的儿子前废帝批评他为"这家伙大大好色，不顾尊卑"，就可以看出刘骏的性放纵。

刘骏贪财好利，规定各州刺史及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卸任回到首都时都需要向他奉献财物，等于皇帝对地方官员贪污所得抽头，也迫使本来清廉的地方官都不得不贪污。

刘骏个性高傲，自以为是，曾杀死屡次犯颜直谏的官员，又性喜戏谑，常戏弄大臣，却不许别人对他开玩笑，敢开他玩笑的立刻翻脸杀掉。

他株连无辜，以杀戮立威。刘骏曾在平定一次反叛后杀掉几千人，将头颅堆积成塔，排列在长江边。

他不知体恤百姓，其在位末年江浙一带发生大饥荒，可能饿死几十万人。

虽然如此，他在南朝皇帝中还不算最荒唐的。

前废帝刘子业（464—465年在位，被杀，得年17）

此人是昏君、乱君兼暴君的典型。

昏乱的一面，其代表作有：

母亲病危，派人找他来看最后一眼，他说：“病人那里有很多鬼，怎么可以去？”因他坚决不去，太后气得说：“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看看怎么会生出这家伙！”

前废帝与姑母新蔡长公主乱伦通奸，难分难舍，竟宣布长公主死去，杀死一名宫女假冒其尸体，送回家中，要其夫大办丧事，却把姑姑封为宫中贵嫔，诈称她姓谢。新蔡长公主的丈夫还想反抗，被他亲自领兵杀掉。

前废帝无子，知道廷尉刘蒙的妾怀孕，将她接入宫中，后来这位大臣之妾果然生下一子，遂立为太子，大赦天下。

为姊姊山阴公主设置面首三十人，山阴公主后来看上一位风仪俊朗的大臣，前废帝就命令他去陪侍姊姊十天[1]。

前废帝喜欢去华林园竹林堂游玩，还要随行的女人们全部脱光衣服互相追逐。有一个女人不服从命令，立刻被下令杀掉。不久，他梦见有一女子骂他：“皇帝你暴虐无道，看不到明年谷子成熟了。”前废帝发怒，在宫中找到一个面貌类似梦中人的宫女杀掉。当天晚上他又梦见被杀的宫女骂他：“你把我冤枉杀死，我已经向上帝告发。”前废帝害怕，找巫师商量，巫师说：“这屋子里有鬼。”前废帝就带着山阴公主及宫女数百人，跟随一大群巫师抓鬼，要侍卫全部避开，巫师说哪里有鬼，前废帝就亲自拉起弓箭射去。

暴的一面有：

前废帝痛恨其父孝武帝，想捣毁父亲孝武帝的坟墓，听说会对他不利才停止，改为用粪便大泼一通。他又捣毁父亲宠妃殷氏（本姓刘）的

墓与父亲为殷氏修建的佛寺，因其中全是女尼，他还想杀尽各地女尼。

前废帝先将主政大臣戴法兴诛杀，又将图谋废掉他的三名顾命大臣杀害，对其中之一——他的叔祖父江夏王刘义恭，更是砍下四肢，刺破心脏，最后把眼球挑出，丢进蜂蜜里，还为它起个名字叫“鬼目粽”。

前废帝残害同族，不遗余力。被他杀死的刘宋皇族包括叔祖父江夏王刘义恭、弟弟晋安王刘子勋、弟弟新安王刘子鸾、妹妹刘子师等，对于剩下的叔父们，前废帝将他们都囚禁于殿内，时常殴打欺凌。

他最忌惮十一叔湘东王刘彧、十二叔建安王刘休仁及十三叔山阳王刘休祐，将三人分别放进竹笼量体重，把最胖最重的刘彧称为“猪王”，刘休仁称为“杀王”，刘休祐称为“贼王”，还把才能低劣的八叔东海王刘祎称为“驴王”。前废帝曾经脱光刘彧的衣冠，把他推进泥水坑里，再将饭菜倒在木槽中，混合泥水，要刘彧像猪一样趴在木槽边进食，作为他的娱乐。

这三王的命朝不保夕，刘彧即曾因抗拒惹恼前废帝，前废帝命人将他衣服剥除，用竹杠绑住四肢，说：“今天杀猪。”刘休仁在旁赔笑说：“猪今天还不该死。”前废帝问何故，刘休仁答道：“等皇太子出生，才当杀猪取出肝肺。”多亏刘休仁口才伶俐，常能说些玩笑话取悦前废帝，三王才没有被杀。

前废帝还屡次逼奸宫中前朝嫔妃，不但自己如此，还与众“同乐”，极尽羞辱之能事。他居然曾命令一批侍从官员当着叔父刘休仁之面，轮奸刘休仁的生母，也就是前废帝自己的叔祖母杨太妃。有一位侍从拒绝，被当场杀掉。他又去逼迫叔父南平王刘铄的王妃江氏就范，江氏坚决拒绝，前废帝就先鞭打她一百下，又杀了她的三个儿子。前废帝也想杀叔父刘昶，迫使刘昶投奔北魏。

最后湘东王刘彧的部下秘密联合前废帝刘子业身边的官员，在他浩浩荡荡领人抓鬼时趁机杀了他。刘子业仅在位一年四个月，却已经做出这样多的荒唐事。

明帝刘彧（465—472年在位，病死，享年34岁）

刘彧在前废帝时期备受凌辱，几乎失去性命，执政前期又遇上众亲王及地方镇将相继叛变，费尽力气才平定，这使他成为一个极度猜忌的皇帝。

为防备宋孝武帝刘骏诸子争夺皇位，刘彧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大杀

诸侄，这样仍不能使他安心，导致他惧怕鬼神，忌讳特别多。他规定言语或文书中有祸、败、凶、丧等意义的都要回避，触犯就是死罪。回避的范围甚广，有些全属捕风捉影，例如他下令改“騧”字为“马”字边加“瓜”，等于自行造字，只因“騧”字类似“祸”字。后来路太后死去，在搬运停尸床时恰巧被他看见，他立刻大怒，用连坐法杀死数十人。在他统治期间，大家都害怕触犯忌讳，人人自危。

明帝心思既不在治国，又经常作战，政府入不敷出，百官俸禄无法发给，只得卖官鬻爵，而且胡乱滥卖，郡太守、县令出一个缺，竟然可以卖十次！这样得来的钱，他命令宦官埋在宫殿地下，当作私房钱。

刘彧被前废帝称为“猪王”，其实其来有自，他的肥胖显然肇因于病态的暴食。他特别喜欢两样食物：一是蜜渍鱼，一吃就是几升；一是腊肉，时常一吃两百片。刘彧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每次需要一件物品，一定要求准备正品三十份，副品三十份，次副品又三十份，也就是说，任何东西都必须备齐同样的九十份。这种心理可称为病态的不安全感。

后废帝刘昱（472—477年在位，被杀，得年15岁）

此人又是昏君、乱君兼暴君的代表。

后废帝刘昱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但对此极为厌恶，兴趣在工艺与音乐上，做起金银器饰或衣帽都很优秀；未曾学过吹篪，拿到手能立刻吹奏；体力也好，五六岁就能爬上一丈多的高杆。但他性格暴虐放纵，当明帝刘彧的皇太子时就常无礼地赤脚蹲坐，任意动手打人；做皇帝以后不再衣冠整齐，时常穿着方便活动的短衣，又制作了几十根大棍子，各取名号，用来打人，身边一定带着钳子、锥子、凿子和锯子等刑具，以供击脑、椓阴、剖心，高兴起来就用来杀人，还常常切割尸体。一次有一个随从看不下去而皱眉，刘昱命令他立正站好，抄起矛就把他的身体刺穿。由于刘昱沉溺于杀人，一天不杀人就闷闷不乐，官员和首都附近的百姓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刘昱显然是个多动儿，不愿待在宫里，经常私下外出，有一段时间还每天外出，有时夜出晨归，有时晨出夜归，他的随从都带着武器，随意伤害经过地方的行人和牲畜，百姓不堪其扰，干脆日夜都关门闭户，街上行人断绝，市面萧条。他的马养在床头，几十头驴养在宫殿上，每次出门若碰上婚礼或丧礼场合，反而不再杀人，会跟拉车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喝酒，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在市井之间如果有人未曾认出他皇帝的身份，指着他大声喝骂，他倒会低头乖乖接受，一声不吭。

对于刘氏家族与朝廷臣子，刘昱存有无穷的惧怕、猜忌与憎恨，他杀起这些人来从未手软。

孝武帝刘骏有二十八个儿子，被他们的叔叔明帝刘彧杀掉了十六个，剩下的全部被这位堂兄弟刘昱杀光，刘骏至此绝后。文武百官被他亲手杀掉的至少有五人，有用矛刺死的，有驾车辗死的。最荒唐的两次，一次是察觉一位叫孙超的先生口中有蒜味，竟将他开膛剖腹，要看看他是否吃了蒜；另一次是得知官员沈勃家中财宝很多，就率领禁卫军去抢。当时后废帝刘昱一马当先，舞刀冲进沈家，和沈勃扭打一番，将他杀死分尸。若论这些被刘昱杀死的官员，多半本身也常是行为不端、欺压百姓、贪污聚敛、结党营私，有可杀之理，但劳动皇帝亲自动手，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后废帝刘昱的大杀宗室，或许也另有原因，这与他母亲的遭遇有关。虽然依照刘宋官方记录，刘昱是明帝刘彧与贵妃陈妙登的长子，但陈妙登独特的经历使刘昱身世不明的传言不断。她出身屠夫之家，原来是孝武帝刘骏时皇太后路惠男宫中的侍女，被送给当时是亲王的刘彧做妾，一年后刘彧不再宠爱，便把她转送给心腹李道儿做妾，一段时间以后刘彧想起她，又从李道儿那里要了回来。有母如此，刘昱的身世因此一直被怀疑，民间传说他是李家的儿子，刘昱外出时也自称李将军，有时还自称姓李名统。南朝宫廷的混乱，由此也可见一斑。

杀人者人恒杀之，后废帝刘昱在位的第五年被杀，此事与南齐的开创者萧道成有关。萧道成本是刘宋武将，曾为刘昱削平几次叛乱，功高震主，引来刘昱的猜忌之心。这个习惯自己动手的少年皇帝选了一天中午，领兵冲入萧道成家。萧道成是个大胖子，正在打赤膊午睡，刘昱一看，惊叹萧道成肥硕的肚子是绝好的箭靶，弯弓搭箭就要射过去，随从劝说，萧道成的肚子这样大，一箭射死太可惜，以后想再射就没有了，刘昱才去掉箭镞，结果一箭射中肚脐，欢呼而去。

本来萧道成的宠妾就被刘昱指名强夺，这次自己又在死亡边缘捡回一命，促使萧道成心意确定，从此结交刘昱身边的人，准备发动政变，刺杀刘昱。

后废帝刘昱被刺于477年的七夕，死前一段时间是他狂乱的高潮。当时他一如往常只带一些心腹出游，先亲自将一匹失蹄掉进池塘的马杀死并分尸，再演唱一阵羌人小调，还去山岗上比赛跳高，又转往青园尼寺一游，然后偷走新安寺的狗，带到出家人昙度道人[2]处，把狗煮了下

酒。当天晚上正好是七夕，刘昱酒足狗肉饱，醉卧之前，要亲信杨玉夫等织女星出现时叫醒他，他还要观测天象。这杨玉夫曾屡次被刘昱责骂，当天刘昱还说明天要杀他，拿肝脏出来看。由于有心人萧道成早就间接与杨玉夫有所联系，杨玉夫有恃无恐，就趁刘昱熟睡之际，用刀刺死了他。

后废帝并非没有政治敏感度，但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完全我行我素，毫无政治手腕与政治谋略，做事全凭一时冲动。他毕竟是个被宠坏的少年，只会用最直接的方式亲自动手，杀掉任何他看不顺眼的人，有时还天真地想多逗弄一下原来要杀的对象，最后当然也因此遭到反噬，被杀身亡。

后废帝刘昱被杀后，国家大权落入萧道成之手，刘宋也走上末路，两年之后，萧道成篡位建立南齐，刘宋灭亡。

南齐

南齐同样盛产昏君、乱君与暴君，完全是刘宋的翻版，也有两个狂乱的废帝被杀，中间夹着一个猜忌嗜杀、病死的明帝。

废帝（鬱林王）萧昭业（493—494年在位，被杀，得年22）

此人为南齐的第三任皇帝，是高帝萧道成之曾孙，武帝之孙，其父本为太子，早死，他才能以太孙的身份继位。废帝萧昭业生性狡诈，是个典型的两面人，阳奉阴违是他生活的常态。他相貌俊美，仪容端庄，工于隶书，口才甚佳，完全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男子的要求，也因此获得父亲与祖父的喜爱。493年时，父亲病重，他在人前悲痛欲绝，见者为之动容，都陪着哭，然而一旦回家，他立刻喜形于色，还特别请一个杨姓巫婆诅咒他的父亲快死。不久太子果然死去，武帝对萧昭业印象很好，就立他为皇太孙。武帝不久也生了病，萧昭业就把对父亲的一套对祖父重演一遍，还写给妻子何婧英一封信，中间是一个大“喜”字，周围由三十六个小“喜”字环绕。何婧英在历史上也大大有名，不逊于她丈夫，详情将后述。

果然不久武帝病死，萧昭业即位，立刻原形毕露。他在宫中经常裸体，有时穿着红裤搭配各种彩色的内衣，可称内衣外穿始祖。

萧昭业居丧期间就奏乐玩乐，又与庶母霍氏通奸，将她改姓徐，派一个宫女剃发出家，声称即霍氏；拆毁宫殿当作马厩，饲养猎鹰、猎犬

与斗鸡；常微服出行，到父亲坟墓的隧道中玩乐。南齐武帝节俭，在位期间累积铜钱八亿、珍宝资材无数，被废帝狂花滥赏，一年就去掉一大半。他甚至打开织品仓库，任凭随从搬取，还搬出珍品宝器互相撞击，碎片满地，于是高兴大笑。萧昭业经常看到钱就说“从前我想要你却一个都得不到，今天能用你了吧？”，这也成为南朝昏君的千古名言。

废帝萧昭业在位时由其叔祖父萧鸾执政，萧鸾见萧昭业狂乱，既怕祸及于己，也起了夺位之心，于是在494年发动政变，杀死废帝，立其弟做傀儡皇帝，后代史家也称为废帝。四个月后萧鸾强迫这个傀儡皇帝让位，取而代之，是为明帝。

南齐废帝萧昭业即位时已成年，比起在位时的胡作非为，他取得帝位前的表演，显然都是经过理性思考后才做的。这种视矫饰奸诈为当然的心态，比起那些未成年的昏君更加可怕。

明帝萧鸾（494—498年在位，病死，享年47岁）

他是南齐开国皇帝高帝萧道成的侄子，因不属嫡系，又连废两个皇帝堂侄才能登基，缺乏安全感，导致他猜忌多虑，嗜杀成性。萧鸾唯恐外面危险，很少出宫，国家祭典也不参加，又深信占卜术数，每次不得已出宫前都要先占卜，而且事先将计划改动后宣布，例如要往南就先宣布将西行，要往东则宣布将向北等，即使身罹重病，也不公开。这样一个时时生活在恐惧中的皇帝，当然会带来严重的杀戮。杀起萧氏皇族来，明帝萧鸾是绝不手软，全面消灭，不留活口。他从夺位起，五年间杀光伯父高帝十九子、堂兄武帝二十三子中二十二子之全家，并抄没各家家产，可谓心狠手辣已极。

明帝萧鸾多疑的性格，使他为政明察秋毫，所以在位时吏治清明。他生活简朴，将御用交通工具上的金银剔下来存库，一颗粽子剖成四片分两次吃，又曾拆除一所以前强征民地盖的宫殿，还地于民。以南北朝的标准来说，称得上一位明主。

废帝（东昏侯）萧宝卷（498—501年在位，被杀，得年19岁）

南齐的第六任皇帝萧宝卷，集昏、乱、暴于一身，南朝君主中无出其右者。他的暴行在即位后立刻开始，先后将父亲明帝选定的六名顾命大臣全部杀死，导致朝臣人人自危，叛乱不断。

萧宝卷在位的前期，几次叛乱都还能平定，叛乱者当然被杀，其中包括他的胞弟，然而萧宝卷因此对平定叛乱最力的尚书令萧懿猜疑起

来，派人将萧懿毒死，迫使萧懿的弟弟萧衍起兵讨伐他。萧衍的军队包围建康后，穷途末路的萧宝卷被内部的反抗者杀死，情况类似王莽末年。

就昏与乱而言，这位废帝可称集其大成，在中国历史上名列前茅。他从小在宠爱骄纵中长大，当太子时就常常"捕鼠达旦"，就是晚上不睡觉，以捕捉老鼠为乐，直到天亮。当皇帝后他更是昼伏夜出，常五更才睡，中午方起，曾让元旦来贺岁的文武百官从巳时[3]苦等到申时[4]。即位后萧宝卷恨不得将父亲明帝的丧事立刻办完，臣下据理力争，才勉强拖过一个月，但每当孝子应该哀哭时，他都说喉咙痛哭不出来，有位大臣羊阐已经秃发，到灵堂号哭拜祭时，一俯一仰之间头巾滑落，露出光头，萧宝卷连假哭都不装了，当场大笑，还对身边的太监说这是秃鹫啼叫。皇帝的轻忽怠惰使奏章经常一两个月得不到批示，甚至完全失踪，政府资料档案被宦官拿去包鱼裹肉，行政几乎停摆。

与刘宋的废帝相同，萧齐的这位废帝也在宫里待不住，多半时间都是出去玩耍。萧宝卷出游时，必定带领数百名随从，随着一阵鼓声从宫门一涌而出。他事先命令军队大规模清道，将人民完全驱赶开来，以供他任意驰骋。他又去向不定，以致清场区域大到方圆数十里，而且经常改变，首都附近的农工商业都无法进行。萧宝卷政府的清场行动是十分彻底而且残酷的，军队推挤打骂，百姓被迫丢下一切离家，不能行动的病人无法抬走，官员就往河里一丢了事。

在无数不幸中，有两个最悲惨的案例：一位老和尚来不及走避，只好躲藏在草丛里，被军人发现抓出来，有个可能是佛教徒的随从说："对老年的修道人该多考虑一下。"萧宝卷反问："你看见獐、鹿也不射箭吗？"皇帝此话一出，百箭齐发，被比作猎物的老和尚当场惨死。还有一位临产的孕妇被单独留在家中，萧宝卷发现后问她："为何单独在这里？"孕妇回答："临产无法离开。"昏君、乱君兼暴君萧宝卷残忍的好奇心发作，竟把孕妇的肚子剖开，要看胎儿是男是女。

由于所到之处变成空城，这个荒唐的统治集团就随心所欲地出入民宅，以致人民留下的财物被掠夺一空，来不及入殓的遗体被老鼠啃食，成为普遍现象。

昏君、乱君兼暴君的另一特色是奢侈浪费、大兴土木，萧宝卷在这方面也遥遥领先。他的马具以锦绣织成，但又怕雨淋，于是再用珍珠串覆盖；他为讨宠妃潘氏欢心，准备了各色华丽的衣服、饰物几百种，宫

内来不及制作就高价搜求，一只琥珀钏用了一百七十万铜钱。萧宝卷又大量兴建宫殿，以麝香涂墙壁，珍珠做门帘，要求迅速完工，实在来不及就下令拆取佛寺的藻井、雕刻来充数。建花园时正逢盛夏，勉强移植的花草树木很快枯死，来不及培育，萧宝卷就命人去民间抢夺，看到民家的大树、鲜花就撞坏门墙挖走。这样造出来的花园，在这位废帝的艺术品味之下，园中的假山奇石都涂上五彩缤纷的颜色，水池上的阁楼墙壁都画满春宫图。萧宝卷高兴起来，就把花园当作市场，搭建店铺，要宫女、宦官装成买卖的样子，他宠爱的潘妃就是这个虚拟实境市场的管理主任，他则自任助理。

这样的皇帝却对潘妃又爱又怕，爱起来可以用黄金凿成许多莲花，贴在宫里的地面上，让潘妃走在上面，说这是“步步生莲花”，“金莲”一词由此而来；怕起来可以让潘妃在认为他有过错时，用棍子打他，还悄悄把宫内用的棍子改小、改轻，以免他的爱妃下手不知轻重。至于萧宝卷怕妾的原因，可能与他偷偷和潘妃的姊妹上床有关。当然潘妃和她的家族也并非善类，其情况将另述。

南齐到了萧宝卷手上彻底崩解，他被杀的次年，萧衍就把最后一个傀儡皇帝废掉，建立了梁朝。

南梁

南梁皇室的家庭教育较好，皇室子弟也都能读书求学，故终其一朝至少没有出现过乱君，但最爱读书、藏书的元帝萧绎仍可称为暴君，只是读书人成为暴君，其表现方式也独树一帜，施暴的对象不但有人，还有书，可说是个奇特的暴君。

元帝萧绎（552—554年在位，投降西魏后于555年被杀，得年48岁）

南梁元帝萧绎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个儿子，少年时天资聪颖，努力求学，但一只眼睛失明，影响到他的心理，曾逼屡次出轨的原配徐妃跳井自杀，详情将后述。他本来不可能继承帝位，只因侯景之乱时正坐镇荆州，没有被乱事波及，实力保存较好，才能派兵攻灭侯景称帝。

当时南方大乱，自行称帝者好几处，萧绎东征西讨，杀掉不少南梁皇族，也因此唯恐别人来谋害他，使他本来就有的察察为明心理变本加厉，成为集苛刻、矫饰、忌妒、猜忌与残杀于一身的皇帝。他不知自我反省，对人一味猜疑，穷途末路时竟然还不许他喜欢的书继续存在。

作为文人，萧绎见不得别人胜过自己，是典型的文人相轻，然而他是皇帝，文人相轻之下，他的权势让他选择将比他文章佳、学问好的文人毒死，还不止一次。萧绎读书成了习惯，但只剩一只眼睛，视力不佳，他就叫人念给他听，晚上睡觉时也不停，要五个随从秘书接力，各念一个更次，相当于两小时。夜深人静，秘书们有的边念边打瞌睡，念起来颠三倒四，有的偷偷省略几段，他居然都听得出来，立刻起身责打后勒令重读。

萧绎是读书人皇帝，性喜文学，搜求书籍不遗余力。他46岁时，居然搜集到书籍十四万卷，藏在他的首都江陵[5]城宫殿内的阁楼中。554年，西魏大军南下，包围江陵，城陷之前，萧绎知道大势已去，竟怪罪起这些书来，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下令在藏书阁放火，于是这批南朝最重要的文物，也是中国中古早期文化的精华全被付诸一炬。

这场文化的浩劫，经历两百年仍无法全面恢复。那种鲜明的场景，使一千多年后的我们读这段历史时，仍能感受到当晚萧绎在宫内高处放眼望去的心情：围城周边是西魏军加紧攻城的战斗喧嚣，围城核心是书籍焚烧发出的熊熊火光，一种读书无用的感觉油然而生，成为“乱世文章不值钱”的最佳注解。

“文武之道，今夜尽矣！”[6]这是儒家知识分子萧绎最后的感叹，竟也充满着魏晋南北朝的风格，哀伤、无奈，还带着几分自暴自弃。

烧光书之后，萧绎出城投降，先是被西魏监禁，不久在西魏默许下，被他的堂侄萧詧用土袋闷死。南梁至此名存实亡，三年后被陈霸先篡位。

南陈

后主陈叔宝（582—589在位，被隋军俘虏，病死，享年52岁）

他是中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后主之一，另一位是五代时期南唐的后主李煜，两个人都是亡国之君，也都有文才，但比起李后主，陈后主昏乱得多，属于昏君兼乱君。

陈后主即位时，其父陈宣帝北伐已经失败，南北双方划江为界。北齐被北周所灭，统一为一国，北周又被隋所篡，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励精图治，军队兵强马壮，南陈则地小国弱，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后主陈叔宝却对此完全不以为意，每天以享乐为事，使他在位期间的南陈宫

廷变成一个充满世纪末气氛的狂欢世界。他在宫内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座高阁，上以空桥连接，窗户栏杆都用沉檀香木制作，以金玉装饰，微风吹来，香闻数里。陈后主自居中间的临春阁，宠妃张丽华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同住望仙阁，艳妆打扮的妃嫔们凭栏临窗，使白居易《长恨歌》中“风吹仙袂飘飘举”的景象提前两百年出现。陈后主经常在后宫举办宴会，十名文学侍从也应邀参加，称为“狎客”，与嫔妃夹坐，仿佛西式餐会。狎客宴中众人一面欣赏歌舞，一面饮酒赋诗，通宵达旦，狎客们莫不挖空心思，以柔靡绮丽的诗句歌颂众嫔妃的美丽，无休无止。

皇帝这种生活造成极大的开支，入不敷出之下，只得巧立各种名目，开征诸多杂税，结果漏税者众，刑罚泛滥，牢狱常常人满为患。陈后主朝廷的政治运作，更达到十分荒谬的地步，他常让贵妃张丽华坐在膝上，听张丽华的意见裁决公事，许多臣下因此投靠张贵妃、孔贵嫔，结党营私，政治风气为之彻底败坏。对于北方隋朝与日俱增的威胁，陈后主根本懒得理会，想起时也只用长江天险来自我麻醉。后来隋军灭陈，在南陈宫廷内搜索，居然发现两个月前他们开始攻打南陈时，南陈边区告急的警报还胡乱放着，连封皮都没有拆。

陈后主的荒唐岁月显然不能持久。果然588年起，隋朝出动几路大军攻来，势如破竹，到589年正月，隋军攻破建康城，进入宫中，陈后主身边仅剩的大臣劝他穿好皇帝的礼服，在大殿坐下，等待隋军，做一个有尊严的亡国之君，陈后主却说：“对方的锋刃不可抵挡，我自有计策。”结果他的计策是与张贵妃、孔贵嫔躲进景阳宫的井里。隋军找到井边，呼叫不应，放话要落井下石，陈后主才大声呼喊回应。隋军放下吊篮拉他上来，吊篮沉重，使他们非常惊讶，以为这位南朝末代皇帝是个大胖子，拉出井才发现是三个人。当捷报抵达长安时，连征服者隋文帝得知此事都大吃一惊。

这段历史太过离奇，以致建康景阳宫的这口井，后来被称为“胭脂井”，而历代诗人也喜欢以此作为写诗的题材，例如：

马嵬坡

唐 郑畋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陈后主的思考方式与所作所为当然昏乱，却也事出有因，可能与他曾遇刺几乎死去有关。原来陈宣帝死后，太子陈叔宝在灵前哭祭，他的弟弟陈叔陵却趁机冲上前去，拔刀砍向陈叔宝颈部，陈叔宝受伤，但并未致命，在左右护卫下逃走。后来陈叔陵被杀，陈叔宝才能安稳做皇帝。这个在变生肘腋中惊险捡回一命的皇帝，大有可能从此认为人生苦短，皇帝又风险极大，才变得自我放弃，得过且过，追求尽情享受皇帝生涯，带动起南朝这一场末日前夕的狂欢。

昏君、乱君、暴君辈出的历史背景与家庭原因

南朝昏君、乱君、暴君与昏乱暴兼具之君出现如此频仍，必有原因。个别的原因已经在探访每个人时分别叙述，但仍然需要研究整体的原因，也就是南朝本身与当时皇家的大环境，才能将环境的因素找出，得以充分解释这种现象。

就南北朝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而言，东汉末年天下开始大乱，接下来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都属于乱世。在此期间，政治局势变幻无常，战争与动乱持续，加上佛教的传入与流行，汉朝数百年来赖以维系政权合理、社会有序与文化平稳的儒家思想没落，导致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的约束力都明显降低。这个时代的人更因为身处朝不保夕的环境，容易产生得过且过、享乐为先的世纪末情绪。皇帝与皇族因拥有政治力量与经济资源，更容易把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永远自以为是，行为当然失控，而且会达到离谱的地步。从南北朝的大环境看，这是显而易见的理由。

然而即使社会大环境如此，如果南朝皇室家族本身具有某些自我控制的机制与能力，则可能偶而出现一些昏君、暴君，还不至于使昏君、乱君、暴君与既昏且乱且暴之君充满这段历史，成为常态。何况当时皇室之中虽然我行我素之辈是主流，却也并非没有守礼崇法、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成员，所以对南朝历代的皇室家族必须另加分析，才能找出各个皇室家族小环境的影响。

这项分析应从南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开始，因为国家的规模由他们创立，皇室家族的养成与教育方式也是由他们决定的。

南朝各代开国之君的资料如下表：

开国之君	出身	建国年龄	死亡年龄	在位年数
宋武帝刘裕	平民或庶族、侨姓 武将	58	60	2
齐高帝萧道成	侨姓世族后代、边区地方长官	53	56	3
梁武帝萧衍	萧齐皇室 早年即出仕	38	86	48
陈武帝陈霸先	平民、吴姓 武将	55	57	2

从此表可以看出宋、齐、陈三朝的开国之君，雷同性极高。他们都是以武将或边郡太守起家，原来的职务就是争战或守边，熟悉军事，又在前朝后期的混乱中打过滚，能深切体会政治斗争的三昧。这些条件使他们在混乱中逐渐累积实力，壮大自己，又经过多年的征战与谋划，才能大权在握，篡位成功。但也因此，他们必须全神贯注，出生入死，身心压力极大，其劳累倍于常人还不止。

这三位开国之君中，刘裕与陈霸先都是平民或低层世族出身，既无家族传承来的地位亦无家学，从小必须以习武从军为奋斗创业之路。萧道成虽然出身侨姓世族的兰陵萧氏，但他的父亲就孔武有力，一直担任边区地方长官，不断与北朝及原住民作战，萧道成十几岁就追随父亲作战，也以武功起家。

这三位开国之君从青少年起，一直忙于争战、夺权与篡位，要长期面对艰苦的拼搏与变幻不定的环境，始终难以顾及家中子弟的教育。等到他们即位为帝，建立新朝时，年纪都已不小，作为开国之君，面对着内部百废待举，叛乱随时爆发，外部北朝虎视眈眈的局面，还必须努力从公。可以想见登基以后，其健康必因长年征战与操劳而迅速恶化，故这三位创业君主在位时间都很短。

古人结婚甚早，南朝宋、齐、陈三代开国之君即位时，不但他们的子辈已经成年，孙辈都可能已经成年，例如萧道成于479年篡宋称帝，当时他的儿子40岁，孙子22岁，曾孙7岁，儿、孙的人格早已定型，连曾孙的人格都在不断塑形中。此时开国之君即使有心加强教育，也为时已晚，纵然他们希望以自己为榜样，变化后代的气质，但因在位时间不够长，难免落空。这样的皇室家庭实在难以培养出像样的皇族后辈，所以南朝的这三朝，即使第二代的君主尚能勉强守成，第三代以后，家族的腐坏立即加速进行，可说无法避免。

南朝昏君、乱君与暴君辈出，不断胡作妄为，充塞历史，实有皇室

家庭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家教太差。所谓家教不止于智育、体育与美育，作为绝对威权政府的储备继承人，德育与群育更为重要，而这二者恰巧是南朝皇室家族最欠缺的。南朝的昏君、乱君、暴君中不乏喜好读书、文笔佳美、体能过人、手艺巧妙者已如前述，但这些能力发挥起来，只是使他们更昏、更乱、更暴。

至于萧梁一朝，皇室出身兰陵萧氏，其开国之君梁武帝自幼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私德颇佳，加以得到皇位时38岁，属于中年，后又笃信佛教，在位时间尤其长久，故梁朝皇室家教在南朝中名列第一。梁武帝长久在位，榜样长久存在，也使其后的梁朝君主家教较为优良，而且多成年即位，性格已告稳定，才不至于出现类似其他三朝的青少年昏暴之君。

萧梁的君主若有问题，不是因为家教太差、不学无术，而是有其他因素。例如梁元帝性格忌刻，行事极端，是因为从小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而影响到其心理，但他好读书，学识、文才甚佳，与宋、齐的青少年君主昏暴得不知所云又有不同。

南北朝宫廷与社会风气的改善，从北周始见端倪，但仍不时有昏君、暴君出现，如北周宣帝、隋炀帝等。直至唐朝，传统儒家的礼法仍然尚未完全恢复，社会的约束力仍颇为宽松，才会出现武则天可以称帝的情况。

昏君、乱君、暴君辈出的社会原因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代，有其特殊的社会结构与运作方式，所以南朝昏君、乱君与暴君辈出，还有一个消极性的社会原因。

在民主政治没有到来之前，政治领袖不必担心定期改选，却仍然得接受臣子的劝谏与社会的风评。古代书写工具、交通、通信都不发达，总人口识字率低，对君主的劝谏与风评，主要来自知识分子阶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认定的使命，然而南朝却显得例外。

自东晋以来，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来源是世家大族，然而魏晋以降，世家大族以九品中正制为靠山，世代高官，东晋时更在南方“封山占泽”，将原属公有的山地与湖泊强占为私有，大面积营造私家庄园，已经在南方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样百年以后，到南朝时，世家大族早已高高在上，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已无人能够动摇。南朝开始于刘裕登基，刘裕篡晋时，世家大族普遍漠不关心，这正表示当时他们的地位已告稳固，只要刘裕承认这种地位，则东晋的死活与他们何干？从此开始的南朝，世家大族仅仅对维系本身世袭的优越地位在意，对于朝代更替，由谁出任皇帝，皇帝的表现如何等，其实并不关心；他们对于皇室家族也不甚看得起，甚至抱有不屑与之为伍的心态。

整个南朝都是世族称霸社会、主导一切的时代，也就是因为世族的地位牢不可破，他们在朝廷没有必要对昏君、乱君、暴君提出谏诤，在地方也没有必要发表风评，在此种状况下，南朝皇室成员遂成为不受政治谏诤与社会风评牵制的一群人。一旦缺少家教，失去自我约束的力量，南朝君主就必然成为不受任何社会与文化规范制约的狂徒，那些少年即位的皇帝，当然成为大权在握的顽童与狂童，也就身兼昏君、乱君与暴君了。

南朝皇室女性

南朝皇家中的女性，尤其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情况。大抵南朝的皇后出身世家大族者，即使在如此放荡狂乱的宫廷中，仍多能谨守礼法，成为中国传统的标准皇后，不愧大家闺秀之名。至于那些出身小户人家的宫廷嫔妃，还有皇家公主，就往往跟皇室的男性成员如出一辙。当然，她们变成如此的原因，也跟她们的父亲、兄弟与丈夫相同。

南朝世族出身的闺秀皇后

南朝出身世族的大家闺秀皇后的表现，可以用以下两位为代表说明。

刘宋明帝王贞风皇后

王皇后名贞风，宋明帝刘彧发妻，出身琅琊临沂王氏，那是侨姓名列第一的世家大族，四大侨姓世族王、谢、袁、萧之首。明帝即位，立其为皇后。明帝刘彧一次在宫内大宴女眷，下令所有女性来宾裸体供他参观，认为如此可以制造欢乐气氛。就在众女宾纷纷脱衣解带之际，王皇后用扇子遮住脸，沉默不语。

刘彧发怒说："你娘家寒酸，今天大家一起玩乐，为什么只有你不看？"王皇后说："娱乐的方法很多，哪里有将姑姊妹集聚起来，要妇女们裸露形体，以此为快乐的？我娘家的娱乐和这个不同。"刘彧闻言大怒，下令皇后离开。

王皇后的哥哥扬州刺史王景文听闻此事，对堂舅陈郡谢绰说："皇后在家是个孱弱的女子，我还不知道她现在竟能这样刚强守正。"

刘彧说岳家寒酸，王贞风听了想必极不是滋味。刘宋时人人皆知琅琊临沂王氏是近两百年的世家大族，刘宋皇室则可称暴发户，换一个人，可能就一句话顶回去，但王贞风忍下来，充分表现她的家教、品德与智慧。皇帝刘彧虽然大怒，也不敢对皇后王贞风当场翻脸，足以显示王皇后的有恃无恐与自知之明。

明帝死后，陈妙登生的后废帝即位，尊王贞风为皇太后。后废帝昏暴狂乱，王太后常加劝诫，开始时后废帝还会听一下，以后就没有用了。王太后曾赐给后废帝玉柄的羽毛扇，后废帝嫌不够漂亮，就想把太后毒死，下令太医煎煮毒药。左右随从说："如果做这件事，皇上就得做孝办丧，就不能随意出入玩耍搞鬼了。"后废帝说："你的话大有道理。"王太后才逃过一劫。

这位琅琊王氏的世家小姐嫁入刘宋皇室，以南北朝的标准看是委屈了她，然而她的家教使她守正不阿，出南朝宫廷的污泥而不染，不愧"贞

风”这个名字，冥冥之中也得到保佑，碰上这位不知姓名却了解状况又口才便给的随从贵人，终于能够在险恶污浊的刘宋宫廷中全身而退。

南陈后主沈婺华皇后

沈皇后名婺华，南陈后主陈叔宝发妻，出身吴兴武康沈氏，是吴姓世族的著名家族。她自小孝顺，嫁给当皇太子的陈叔宝，陈后主即位，立其为皇后。

沈皇后性格端庄沉静，有见识与度量，生活恬淡，聪慧好学，涉猎经史，书法文章都好。这样的妻子显然不讨陈后主欢心，陈后主对她很差。贵妃张丽华得宠后，变成后宫的实际领袖，沈皇后恬淡相处，从未忌妒或抱怨，只以阅读史籍与佛经度日。后主对她越来越看不顺眼，计划废掉她，立张丽华为皇后，还没办成南陈就灭亡了，沈皇后也被俘，跟随后主到长安。后主病死时，沈皇后自己写了哀悼文，甚为悲切。

后来隋文帝崩，自我感觉良好的隋炀帝继位，每次出巡，都命令这位老太太随驾。直到炀帝被杀于扬州，沈皇后才终于回到故乡江南。真正看破红尘的她出家为尼，法名观音，唐太宗贞观初年才过世。

这位吴兴沈氏的世家小姐嫁入南陈皇室，以南北朝的标准看，还是有点委屈了她，然而她的家教使她恬淡清虚，始终严守皇后与妻子的分寸，出南陈宫廷的污泥而不染，冥冥之中似乎也得到保佑，终能在经历这样多的繁华兴亡后，离开这滚滚红尘，找到终极的归宿。在中国历代皇后中，沈婺华的遭遇充满无奈与离奇，但她始终有所持守，以不变应万变，也充分表现出一位吴姓世族闺秀的修养与智慧。

南朝昏乱的皇族女性

在南朝宫廷中，任意妄为、不知好歹、奢侈浮华、放荡淫乱的女性远较洁身自好的女性为多，她们包括皇族的女性后代，即公主[7]、长公主[8]与皇帝的妻妾，即皇后、嫔妃。其中最著名的一些案例如下：

刘宋山阴公主刘楚玉

刘宋的山阴公主刘楚玉是孝武帝刘骏的女儿，从小常和弟弟前废帝刘子业玩在一起。刘子业即位后，一次公主姊姊对皇帝弟弟说："我和陛下虽然男女有别，但身体都来自先帝，陛下后宫几百人，我只有一个驸马，事情的不公平竟然可以到这样！"前废帝一听，认为姊姊的话甚有道理，就为她设置面首三十人，还升她为会稽长公主，对她赏赐有加。这位长公主后来又看上一位风仪俊朗的大臣褚渊，跟弟弟一说，前废帝就下令褚渊去陪侍姊姊十天。褚渊是有妇之夫，妻子还是宋文帝的女儿、孝武帝的妹妹南郡公主，排辈分是会稽长公主刘楚玉的姑母，结果这场公主侄女抢公主姑妈丈夫的荒唐剧，因为褚渊先生在会稽长公主府里始终坚决拒绝公主的色诱威逼，终究没有上演。

刘宋新蔡公主刘英媚

刘宋的新蔡公主刘英媚是文帝刘义隆的女儿，嫁给了何迈。她有一次进宫，竟与侄子前废帝刘子业通奸，姑侄二人难分难舍，刘子业杀掉一个宫女，送去驸马何迈家中，声称刘英媚在宫中暴死，还要何迈办丧事，又将姑妈改姓谢，封为贵嫔。何迈知道死者不是自己的妻子，但仍然举办了盛大的丧礼，等于用曲折的方式公开内情。废帝因此对何迈时常疑神疑鬼，何迈面对如此无道的皇帝，也开始集结同志，打算将刘子业废掉。事迹败露，何迈遭下狱诛杀，前废帝见阻碍已除，想要立姑姑为皇后，刘英媚总算还有一些见识与羞耻心，固辞不肯。然而当时前废帝的皇后已死，这位实为皇帝姑母的"谢贵嫔"就成为后宫的实际主人。

南齐废帝（鬱林王）皇后何婧英

何婧英是上述何迈的姊姊，南齐废帝萧昭业的发妻，在萧昭业是南

郡王时嫁给他。何婧英被《南齐书》直接记为“禀性淫乱”，当南郡王妃时就常找美貌的侍从交欢。其中有一位叫马澄，最受喜爱，常与王妃何婧英扳手腕比力气，南郡王萧昭业还在旁边笑语观看。

何婧英当上皇后以后，更变本加厉，夜间在宫廷后堂找来一批美貌男子“淫宴”，皇宫门户彻夜大开，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观。废帝萧昭业对此不闻不问，成为皇帝、皇后各玩各的状态。

何婧英皇后不仅私德有亏，还贪财，缺钱花用时就秘密派人向富商要钱。中国古代商人地位低下，碰上皇后伸手要钱，当然只得乖乖照付。这位皇后勒索来的钱，或许是用来在众多亲戚面前摆阔，因为历史记载何婧英一人得道，她的家族就鸡犬升天，都被废帝接来宫中长期参访，住在宫里，人数太多，以至废帝还下令特别腾出一处宫殿供他们居住。

废帝萧昭业和何皇后的感情其实很好，他称何婧英为“阿奴”，对皇后有情人并不在乎，这可以从以下的事例看出。何婧英当皇后时宠爱一个姓杨的女巫之子，又把他介绍给丈夫萧昭业作男宠，后来居然让他在朝廷做官。当时执政的萧鸾与几位大臣看不下去，面见废帝要求下令杀掉杨某，何皇后刚好在座，闻言痛哭失声，泪流满面，发言要保护她的“杨郎”，逼得众位大臣只好请废帝下令皇后离席，才把皇后与杨某的奸情抖出。废帝不得已签署了杀杨某的命令，但等这批人走掉以后他就下令赦免，只是为时已晚，何皇后的情人杨郎已被迫不及待的大臣们逮捕杀掉。

南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潘妃

这位以“步步生莲花”著名的南朝妃子姓潘，不知名字，极得废帝萧宝卷宠爱，任性而为，无视礼法，与中国宫廷的传统格格不入。公公明帝萧鸾死去，做皇家媳妇的她一天素也没吃，一天丧服也没穿，自己生的女儿夭折，却身穿斩衰[9]，茹素，十天不听音乐。这种行为的对比应该是潘妃真性情流露的表现，然而如此直接，丝毫不留余地，正可以代表南北朝时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松动。

潘妃放任自我，恣意行事，加上废帝萧宝卷的宠爱，使她颇有威名，远近的人都有些怕她。她父亲靠着女儿的威势，到处作威作福，常诬陷富人入罪，或者说别人的家财是自己寄存的，巧取豪夺，抢走别人的田宅资产，又怕有后患，抢夺之余，还会杀尽被抢者家中的男人，无

疑是历史上外戚中的恶棍。

对于南齐末年的废帝萧宝卷与潘妃，特别喜欢以南朝为题材的唐代大诗人李商隐也有一首诗吟咏：

齐宫词

唐 李商隐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
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10]

南梁元帝萧绎的原配徐昭佩

这位著名的王妃姓徐名昭佩，南梁元帝萧绎当湘东王时与她成婚，徐昭佩因此称为湘东王妃。

徐昭佩容貌欠佳，气质也差，又嗜酒成性，经常喝醉，自诩为读书人的萧绎对她甚不满意，不依礼数对待她，两三年才到她的房间一次。徐昭佩也自有对付丈夫的办法，每次知道丈夫将到，必然只在半边脸上化好妆等着，意思是“你这独眼龙只配看老娘半边脸”；如果喝醉酒，就吐在丈夫衣服里，萧绎每次见到都大怒，转头就走。这种夫妻关系造成徐昭佩的一种特殊的个性，成为怪异而可怕的王府女主人。她见到不受宠的妾，便笑语相迎，拉着妾一起喝酒；发觉有妾怀孕，就亲自动手杀掉。

身为南北朝的女性贵族，得不到丈夫疼爱的徐昭佩自然而然地向外发展。她先和瑶光寺的出家人智远私通，萧绎的侍从暨季江[11]容貌俊美，也变成她的情人。暨季江常常叹着气说：“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此处暨季江是实话实说，只叹息徐昭佩年纪一大把还很多情，并没有称赞她美丽有风韵，后来这句话演变成“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已经失去原意，不过美男子暨先生拿徐昭佩和狗、马相比，恐怕虽然和她上床，但还是很轻视她，从这种角度看，她其实是可怜人。

徐昭佩另有一个情人贺徽，也是美男子。两人挑选普贤尼寺幽会，还在枕头上写诗唱和。照理说这些美男子应该不缺女人喜爱，为何他们还愿意做徐昭佩的入幕之宾？答案可能是徐昭佩在当时是名流女人，虽然貌不惊人，却自有其特殊的吸引力。

徐昭佩的种种行为终于让猜忌苛刻的萧绎爆发。导火线是萧绎的宠妾王氏忽然死亡，萧绎归咎徐昭佩；后来徐昭佩生的儿子死去，萧绎再无牵挂，就逼令徐昭佩自杀。徐昭佩跳井而死。萧绎余怒未消，将尸体送还徐家，声称是休妻，并作一篇赋叙述徐昭佩的淫行。这位徐妃生前随性而动，快意恩仇，死得也轰轰烈烈，与她那深沉猜疑的独眼丈夫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南朝宫廷中放出诡异的光芒，当然也成为大诗人李商隐的题材：

南 朝

唐 李商隐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
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12]

南陈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

陈后主的张贵妃名丽华，出身世兵[13]之家，社会地位本来甚低。她10岁被选入宫，当太子陈叔宝之妾龚氏的侍女，几年后被陈叔宝看上，成为陈叔宝的小妾，生下一个男孩陈深。后主即位，她被封为贵妃，儿子也当上太子，从此进入她的全盛时期。

张丽华容貌美艳，头发长达七尺，色黑如漆，光滑如镜；神采飞扬，妙目直视或秋波一转，都让人觉得光彩夺目，照映左右，勾魂摄魄。每当她在居住的高阁上打扮妥当，凭槛当窗一站，从宫中遥望，衣带飘摇，仿佛神仙。张丽华的头脑也十分精明，口才伶俐，记忆力强，善于察言观色，她并不要求擅宠专房，反而会向陈叔宝推荐后宫其他美女，所以在后宫里声誉极佳，人人称善。这位美女贵妃还有真正的“鬼才”，她通晓巫术，在宫里设立神坛，找来一批女巫唱唱跳跳，用“通灵术”彻底控制丈夫陈后主。

陈后主以勤于享乐、怠于政事著称，不得已要批阅奏章时，就靠着隐囊[14]，让张丽华坐在腿上共同决定。张丽华的聪慧使她借此很快弄明白了朝廷的状况，强大的记忆力又使她可以随时提供资讯，陈叔宝对她言听计从，所以张丽华是真正干政的后宫宠妃。大权在握后，张丽华通过这种身份包揽后宫与朝廷的事务。违法乱纪、欺压人民的外戚只要找她在皇帝面前关说一下，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大臣若不顺从她的意思，就会被她的枕边闲话伤害，于是供她使唤的宦官当道，大臣望风披靡，内外交结，互相援引，贿赂公行，赏罚无常。南陈在陈叔宝的

享乐与张丽华的乱政下几年间就政治败坏，经济凋敝，民心丧失，已难逃灭亡命运。589年，隋军攻入陈朝皇宫，张贵妃跟着陈后主躲进井里，被隋军拉出，隋的远征军司令晋王杨广（以后的隋炀帝）下令将张丽华斩首，这位南陈的贵妃，也是陈朝后宫的压阵美女就此香消玉殒。但她可称罪有应得，难怪唐朝诗人郑畋会写出“景阳宫井又何人”的名句，以她与陈叔宝作为历史反面教材。

南朝宫廷女性的种种事迹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许多人津津乐道，迄今网络上还有不少膻色腥笔法的叙述，阅读之余，谨提供《论语·子张篇》第十九章的话，作为参考：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译：曾参老师说：“在上位的人丧失正道，民心散乱很久了。审判案件时，如果查明实情，就该悲伤、怜悯，不要高兴。”）

毕竟她们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又身处宫廷环境的一群凡人。

南朝宫廷的探访至此告一段落。南朝的这个部分高潮迭起，绝无冷场，人类本性中丑陋的一面在此毕现。对后代读历史的人来说，南朝宫廷史读起来虽让人惊奇连连，却会感觉并不舒服。其实这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必然会遇到的状况，宫廷之外，还有不少。下一章就让我们离开宫廷，进入南朝世族的家中，一探那个充满着地位、传统、财富、家学、高傲、任性、审美与颓废的世界。

【注释】

[1] 详情将后述。

[2] 南北朝时佛教僧侣也称为道人。

[3] 上午9～11时。

[4] 下午3～5时。

[5] 今湖北江陵。

[6] 意即：周文王、周武王的道统，今天晚上完了！

[7] 皇帝的女儿。

[8] 皇帝的姊妹。

[9] 按，粗麻丧服，不缝边，依儒家礼法子及未嫁女为父母之丧、媳为公婆之丧、妻妾为夫丧所穿。

[10] “永寿”指永寿宫，是废帝为潘妃兴建的三座宫殿之一，诗人在许多宫殿中特别挑选此宫，暗藏反讽；“夜不扃”，夜间不关门，指萧衍发动政变当晚，南齐宫中有

人开门内应；“梁台”指政变后不久，南齐灭亡，宫殿属于南梁；“三更”指政变发生在夜间，当时废帝萧宝卷的夜宴才结束，刚刚睡下；“九子铃”则指潘妃所居宫殿四角的风铃，本来属于一所寺庙，被萧宝卷派人抢来装上，隐喻萧宝卷的暴政与潘妃的奢侈。

[11] 人名，姓“暨”。

[12] “瑶光”指北斗七星中最后一颗星，古人认为此星代表江南地区。此诗以徐妃的半面妆代指南朝本身，也有天险不足恃、南朝不过如此的讽刺之意。

[13] 世袭的基层军人。

[14] 软质的靠垫。

第三章 长檐车，高齿屐，熏衣剃面，坐至公卿——高高在上的世族

阀阅高门不识愁，官人九品几曾收。
封山占泽安琼墅，剃面熏衣做贵游。
远客焚床弹嫁娶，登山换齿傲公侯。
清流尽日谈玄鬼，谁料翻天侯景矛。

当南朝的宫廷里忙着享乐与杀戮时，社会上却有一批袖手旁观，或者甚至懒得理会的上层人士。对他们来说，琴棋书画、老庄佛法、山水风光才是生活的重心，宫廷只是一群暴发户的戏台而已，谁兴谁亡，与他们并无关系，因为那群暴发户虽然手握枪杆，却不敢对他们怎样。这批人叫作“世族”，或称“士族”。这一段旅程，且让我们探访只有在如此独特的南朝才会有的这群如此独特的人。

南朝世族阶级的形成：阀阅、郡望与谱牒

中国古代仕宦显贵人家的大门外矗立着两根柱子，左边的称为“阀”，右边的称为“阅”，家户的主人用它们来彰显本户的成就与地位。阀阅是达官贵人之家的标志，因此中国古代世代为官的人家又常被称为阀阅、门阀、门阀士族、阀阅世家等。门阀在当时备受重视，并以此来区分各色人等，产生森严的社会阶级，使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时代。

自东汉起，世家大族逐渐形成。曹魏开始采取九品中正制[1]，世家大族的做官之路得以确保。两晋以来，世家大族为与同姓的一般人有所区分，会强调自己的家族属于哪个郡、哪个县，称为“郡望”。例如王姓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聚居于琅琊郡[2]临沂县[3]，就称为“琅琊临沂王氏”，简称“琅琊王氏”；南方吴姓四大家族朱、张、顾、陆都聚居于吴郡[4]，就称为“吴郡朱氏”等。在诸多世家大族纷纷标榜郡望之下，社会上郡望充斥，于是再逐渐划分阶级，形成以郡望区别门阀高下的“门品”，例如北方的清河崔氏就看不起博陵崔氏，自认门第比他们高等。这种状况在南朝更全面固定化，造成强烈阶级区分的社会。

世族的地位来自血缘，故极为重视家族的“谱牒”[5]，以确定家族范围，避免被同姓的非家族分子冒用，以此维系门品于不坠。撰写、保存与研究谱牒，遂在当时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称为“谱学”，并有人专门研究。例如平阳贾氏祖孙三代皆为谱学名家，开创其家学传承的是祖父贾弼之，他早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就撰写出《十八州士族谱》。以后刘宋的刘湛、南齐的王俭、南梁的王僧孺均撰有《百家谱》，提供给吏部，以为诠选官员时使用，是官方认定的私人著作，由此可见社会阶级这件事，政府既不愿，也不敢过问。但凡经过九品中正制度从各地察举来的人，吏部官员必定先核对官方认定的各家族谱牒，确定出身家籍，考察真伪，才能按照出身的社会阶级授官。所以南朝时，不熟悉谱牒之学就不能在吏部任职，这当然使吏部的职位长期被世族占据，世族子弟的政治地位，以及因此而来的经济与社会等地位，也长久得到保证。

在这种制度下，南朝以门品的高下为标准，确立士庶之别，于是形成了严格的门阀制度。在此制度下，南朝的官僚社会可分为三种阶级：

高门甲族

家族历代经常任官五品以上，且为清官高位的世族归入此类，亦称“华族”“华阅”“右姓”。在九品中正制度下，这些家族的子弟经常被评选为一品、二品，从此出任高官，其出身称为“清流”，这是身份的标志，与品德操守无关。

次门

门第势力较低、次于华族的大家族，历代常任最高为六品官的归入此类。在九品中正制度下，这些家族的子弟经常被评选为三品至九品，可以出任官职，但无法从专属清流的官位起家，其升迁也不如华族。

寒门

平民阶级进入仕宦之途的官员称为“寒人”，其出身称为“庶族”或“寒族”，这也是身份的标志，并非指贫穷。实际上南朝的寒门官员大多数来自中小型地主或富户家庭，属于地方豪强或土豪商人，也有一些是立有军功的武将、擅长行政的政府吏员等。他们在九品中正制中没有被评定品级的资格，其出身称为“浊流”，只能出任浊流官，但因拥有地方势力、财力或特殊技能而被选入政府。

世族的特权

身为世族，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政治特权

世族地位崇高，借由九品中正制而拥有仕宦优先权。以南朝前期而言，世族子弟年届二十即可出仕做官，寒门要年过三十才有机会；出身第一流高门者，更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6]。在此种情况下，世族子弟开始出仕时，当然要选择某些“在中央、工作少、待遇好、名声好听、升迁迅速”的官职，久而久之，这些官职成为门阀世族的禁脔，也是世族子弟升迁高官要职的跳板，称为“清官”或“清流官”。清流官最有名的有秘书郎[7]、著作郎[8]、中书郎[9]、尚书吏部郎[10]等。

世族子弟不论贤愚，皆通过九品中正制进入政府，出任清官。时间既久，代代沿袭，成为固定制度。高高在上的世族子弟既然有清流官的保障，从小也就不必勤学，其素质随着时间推移日益低落，更谈不上政治能力，这样正好让他们端起架子，不碰“俗务”。例如刘宋元嘉初年，琅琊王氏的王敬弘担任尚书仆射[11]，却从来不看公文，有一次参加皇帝亲临的诉讼审理，宋文帝问王敬弘对这案子的看法，王敬弘没有回答。宋文帝脸色都变了，问左右随从：“为什么不给王仆射副本？”王敬弘这才说：“臣得到案件副本并读过，就是不太了解。”大臣如此回话，当然使宋文帝很不高兴，但他也没有再说什么。此后皇帝虽然仍对王敬弘恭恭敬敬，礼数周到，但再也没有把实际政务交给他。

这种状况延续到南梁时，社会上出现这样的谚语：

> 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
> （译：上车不掉下来的就担任了著作郎，会寒暄两句“身体好吗？”的就担任了秘书郎。）

这段南朝顺口溜可能是那些“浊流官”充满酸味的不平之鸣，因为与清官相比，浊官正是“常不在中央、工作多、待遇差、名声不好听、升迁缓慢甚至无望”的职位，而且永远由寒门充任。

一个华族出身的人在南朝官场上的过程与为官状况，可以用刘宋中、后期的王僧达为例。王僧达出身琅琊王氏，是东晋开国宰相王导的玄孙、南朝首屈一指的侨姓世族子弟，他的平生经历如下：

从小聪明好学，有神童之称，也喜欢打猎，还曾亲自屠宰牛只。宋文帝听闻他的名声，特别召见，他面对皇帝态度从容娴雅，宋文帝非常喜欢，指定堂兄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嫁给他。以当时的情况看，皇帝此举是希望结交琅琊王氏，以巩固其统治，有高攀之意。当然宋文帝也不会随便派个刘家的女孩当王僧达的新娘，而是选择刘义庆做他的岳父，显然考虑到刘义庆是刘宋皇族中最有学问与文名的，这位王爷常与文人雅士聚会，著有《世说新语》。

王僧达经过中正官照例品评后开始仕宦生涯，出任太子舍人[12]。他在任时请病假，却去桥边看人斗鸭，被监察机关纠举，上级并未追究。他又诉说家里穷，请求调任郡太守，等于摆明要到当地捞一票。文帝本想答应，但尚书吏部郎庾仲文劝谏道：“僧达没办法管理人民。”宋文帝这才没有将他外派，但为了补偿，将王僧达连跳四品，升做太子洗马[13]，居然成为独当一面的首长。此处刘宋的皇帝以平衡方式处理，既不得罪琅琊王氏，也给了从东晋以来就是世家大族的南阳新野[14]庾氏面子，还照顾到地方人民，正是南朝皇帝对待世家大族的标准模式，可谓煞费苦心。

不久因母亲过世，王僧达休职守丧在家。他担任郡太守的哥哥卸任回家，送他一百多万钱，王僧达与这位兄长素来不睦，竟视这笔钱财如粪土，让家里的奴婢随意拿，一夜之间钱被搬光。守丧期满，王僧达调为宣城郡[15]太守，总算如愿以偿。宣城多山，他到任后喜欢入山游猎，经常三五天都不在办公室，实在紧急的诉讼，就在猎场受理。

其后转调护军将军，掌管全国中级以上武官的选拔考核，王僧达对这个职务毫无兴趣，面见皇帝要求外放做徐州郡[16]太守，皇帝不同意，原因应该在于徐州是刘宋北方边防要地，当地太守责任重大，必须能文，能武，能外交，派王僧达去一定会搞坏国家大事。王僧达固执地不断陈述，皇帝只好派他做吴郡太守。吴郡是富庶之地，寺庙积聚财富尤其多。王僧达太守到任后直接向当地的西台寺要钱，西台寺不给，他竟掳人勒赎，派一个顾姓的部下率众绑架寺内和尚，勒索到几百万钱。这位顾先生应该出身吴郡顾氏，如此就等于侨姓世族、吴姓世族联手欺压佛教僧侣以敛财。当时的地方官普遍操守不良，导致人民反叛，南梁政府授权王僧达招兵一千人防备辖区，他却趁机招来两千四百人，分为

三十队，形成私人武力，又在吴郡建私人住宅，征发人民为他做工，可谓无法无天。

虽然如此，他依然没事。后来刘宋孝武帝召见，王僧达对皇帝丝毫没有礼貌，瞪着双眼直视，孝武帝毫无办法。当时有位出身寒门的何尚之，一度退休后又出任高官，在家中举行“八关斋戒”[17]，邀请许多名人参加。大家谈佛法、论戒律之余，主人何尚之依照寺院规矩起身“行香”[18]，走到王僧达面前时对他说：“希望年轻的先生放下猎鹰和猎狗，不要再游猎。”王僧达回答道：“家里养了一只老狗，放掉它还没地方去，又回来了。”此话一出，已经七十几岁的何尚之脸色大变，却仍然对这位顶着琅琊王氏招牌高傲绝伦、为所欲为、故意讽刺的王僧达无可奈何。

王僧达擅于观望政治风色，凡有重大政治异动，都会领头选边。刘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刘劭杀死后，孝武帝刘骏起兵讨伐刘劭，王僧达望风投奔刘骏阵营。这次的选边对王僧达与刘骏都很重要，因为它又是一次南朝高门世族与皇位竞争者之一合作的典型，代表琅琊王氏支持刘骏，承认他是刘宋的正统。刘骏当上皇帝后，当然会保持王家的特权。故此虽然王僧达的骄傲自大、言行无礼、求官心切、贪污勒索、滥用民力、有亏职守、私蓄武力等行为已经达到罄竹难书的地步，孝武帝刘骏还是封他为宁陵县五等侯，并让他屡次升迁，最后当上中书令[19]。

这种情况在南朝甚为普遍，使一千多年后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九品中正》条中对此严加批评：

> 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
> （译：阶级最高的世家大族，拥有父子兄弟继承来的荣耀，平民百姓向前进一寸的路都没有。选拔任官的弊端，至此到达极点。）

南朝实际政务的处理

世族做官的弊端如此，可以想见那些“浊官”眼看“清官”无所事事却飞黄腾达，不免悲叹自身的命运。悲叹之余，有的可能会另觅晋升之阶。他们还真的有机会，因为另一方面，南朝皇帝面临的问题更大。

无论如何，政府必须运转，公务必须有人去做，南朝政府在世族垄断下，却是高官一大堆，公事无人办，逼得皇帝不得不提拔一些寒人作为心腹，实际推动政令，这成为南朝政府的特色。南朝在皇帝身边典掌机要的官员称为“中书通事舍人”，即机要秘书，大多由寒人出任，工作本是收存档案、传达公文等，却深受皇帝器重，将参与决策、执行政令

的机会与权力交给他们。这些寒人位不高而权重，只有他们了解政府如何运作、政策如何决定与推行，他们才是南朝政府实际掌握行政权的人，因此也时常跋扈自大，只有他们敢对世族的同僚甚至长官不假辞色，世族官员对他们办事无从置喙，有时也只得垂头听命。

南朝皇帝的另一种心腹是称为“典签”的五品官员。典签本是一级地方政府的文书档案官，在南朝却变成皇帝的眼线与监督，用以监视甚至控制那些可能危及皇位的人物，例如散布在各地的亲王或封疆大吏，从饮食到行动都在内。典签与皇帝直接沟通，有事密报，皇帝也会秘密命他们办事，包括杀掉被监视的皇族。刘宋、南齐时期这种情形尤其常见，那些皇帝大杀皇族亲人的事，都是由派往各地的典签动手。

经济特权

南朝世族享有占田、荫户和免除租税徭役等特权，这成为他们建构经济势力的基础。依《晋书·食货志》，所谓“占田”指从西晋初期起，政府规定各种身份的人可以拥有的土地数量，例如一品官可有五十顷，依次递减至九品官可有十顷等；“荫户”，指各种等级的贵族与官员可以庇荫的家户，受庇荫者免除税捐劳役，只对庇荫者承担义务。依照占田制度，官吏可依品级高低庇荫其亲属、门下的食客、佃户等，有一定的人数限制，例如一、二品官可以庇荫佃户五十户，三品官佃户十户，递减至九品一户，六品官以上可庇荫食客三人，递减至九品一人等；亲属部分，最高可以庇荫到九族，包括父族、母族与妻族。

由于官吏自家及被荫庇者皆不需要缴税服役，此种制度必然造成朝廷收入减少，公共工程人力不足，于是普通百姓必须缴交更多赋税，承担更多劳役，大批农民或者破产，或者不堪其扰，便纷纷卖身投靠在大地主辖下，官员的占田与荫户随之大量增加，远远超过政府的限制。世家大族历代出任高官，借此始终掌握大量土地与人口，构成其经济特权，财富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

当时的世族在占有大量田地外，还会“封山占泽”，即强行占据本属地方公有的山地与湖泊，将各种地形地貌连为一片，变成广大的庄园。这种大庄园里有农田生产粮食，山坡可以种植林木与果树，湖泊、河流提供水产与磨坊的动力，源源不绝的卖身投靠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足，于是每个世族都家大业大。这些世族庄园区域的生产成果全部由世族享用，因此世族的经济力量雄厚，请得起超额的谋士与保镖，形成国家内

部许多块独立自主的经济区域，政府无法干预。这种经济体制称为“庄园经济”。

世族控制下的庄园经济长期且普遍存在，势必严重影响国家的财税收入与人力资源，这可以说明为何东晋与南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始终不强；而从东晋到南朝不断有人反叛，也与庄园经济下地方的力量常常超过中央有关。针对这种状况，南朝时朝廷曾通过“检括户籍”[20]的方法抑制世族荫客数，但只能收效一时，不久就故态复萌。

总之，南朝的庄园经济是世族特权的产物，也是阶级不平等的象征之一，它对中国经济的唯一贡献，可能在于长江以南原来的荒山野泽地区因此进一步开发，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

社会地位

经过两百年的累积与巩固，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极为优越，他们以此自傲，轻视甚至蔑视他人。同样在朝廷为官，世族、寒门的身份高下截然不同，世族视寒门如草芥，不屑与之为伍，用对待仆人的态度对待寒门同僚。这两个阶层之间不相往来，寒人即使被皇帝赏识，升为掌权的近臣，仍然会被世族看不起。如果寒门不自量力，想要跟世族拉点关系，世族必然不会以礼接待，甚至当场就摆下脸色，极尽侮辱之能事。以下是几个代表性的事例：

刘宋孝武帝母亲路太后的哥哥名叫路庆之，他的孙子路琼之和前面提到的那位王僧达是邻居。一次，路琼之盛装打扮，坐着华丽的车拜访王僧达。王僧达正要出去打猎，已经换上了猎装。路琼之坐下后，王僧达不跟他寒暄，劈头问道：“从前家里有个车夫叫路庆之的，是你家什么亲戚？”路琼之只得起身告辞，王僧达还叫仆人把路琼之坐过的床[21]烧掉。路琼之自讨没趣，灰头土脸而回，内心想必极为悲愤，但在南朝社会里也无可奈何。

侨姓世族如此，吴姓世族也不落人后。刘宋时世族吴郡张敷出任中书郎，中书舍人[22]中出身寒门的秋当、周赳作为张敷的同僚，商量是否去拜访他。周赳说：“如果不招待我们，我们就难堪了，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有相等的员外郎地位，为何要担心没法跟他坐坐？”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听说他们要来，先将客人与主人的坐床摆得很近，主、客就座后，张敷立刻呼唤仆人：“把我搬得离客人远点！”此举表明他这个吴郡张氏的人不屑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无法再

待下去，只得告退。

南齐时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仪表举止也俨然世族，自认为地位与准备已够，就去面见齐武帝萧赜，“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23]。齐武帝说：“这事凭江敩、谢瀹做主，我不能发表意见，你可以自己去见他们。”纪僧真自认为已经奉旨，就去见江敩，刚刚坐定，江敩便命令随从：“把我的坐床搬开，向客人告辞。”纪僧真垂头丧气地退出，回来报告齐武帝说：“士大夫不是天子能任命的。”此事件几乎是前一事件的翻版，只是当事的寒人找皇帝帮忙，齐武帝可能不好当面拒绝，只有四两拨千斤，让纪僧真自己去碰一鼻子灰。

南朝类似的事情并不止于此，这许多意象鲜明的故事，一再显示了当时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他们排斥寒门的倨傲已到夸张程度，正足以说明他们如何致力于维护世族阶级的既得利益。

世族内婚制

世家大族骄傲横行的基础来自他们的门第，保持自己门第的纯粹，就成为他们念兹在兹、特别在意的事。世族为此设定“士庶天隔”的界限，不许跨越，不容混淆，其主要方法就是不与寒门庶族通婚。凡属世家大族，婚姻都是大事，选择配偶特别注重门第，越是高门华族越严格，一定得和家世相当的高门望族结亲，只有少数男性会被皇帝选来“尚主”[24]，少数女性会嫁入皇家成为皇后，算是例外，但对世族而言，这等于是他们和皇室联盟的交换条件，算不上家族的光荣。此外侨姓、吴姓世族又有各自在本群体内通婚的倾向，这应该与地域观念有关，例如吴姓四大世族吴郡顾、陆、朱、张四姓经常互相通婚，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

补充知识

东晋至南朝萧梁时期的世族联姻概况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身份内婚制，史学界对此已有充分研究。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列举东晋至南朝萧梁时期的世族联姻概况，兹选录如下：

东晋世族

琅琊王羲之妻为高平郗鉴女，见《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王氏谱》。

王羲之子王凝之妻为陈郡谢奕女，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王氏谱》。

王导孙王恺娶陈郡谢万女，珣弟王瑒娶谢安女，见《晋书·谢安传子琰附传》。

陈郡谢安妻为沛国刘耽女，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谢氏谱》。

谢安弟谢万妻为太原王述女，见《世说新语·简傲篇》注引《谢氏谱》。

太原王述子王坦之娶顺阳范汪女，见《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王氏谱》。

王坦之子王国宝妻为陈郡谢安女，见《晋书·王湛传玄孙国宝附传》。

颍川庾亮子庾和娶陈郡谢尚女，见《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谢氏谱》。

河南褚翜娶颍川庾峻女，见《晋书·褚翜传》。

陈郡袁耽大妹适殷浩，小妹适谢玄，见《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袁氏谱》。

陈郡殷顗妻为同郡谢尚女，见《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谢氏谱》。

殷顗从兄殷仲堪娶琅琊王临之女，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殷氏谱》。

谯国桓冲娶琅琊王恬女，见《世说新语·贤媛篇》注引《桓氏谱》。

桓冲复娶颍川庾蔑女，见《世说新语·仇隙篇》注引《庾氏谱》。

桓冲兄子桓玄娶沛国刘耽女，见《晋书·刘耽传》。

宋世世族

琅琊王敬弘女适庐江何述之与鲁郡孔尚，见《宋书·王敬弘传》《孔淳之传》。

王导曾孙王弘妻为陈郡袁淑姑母，见《宋书·袁淑传》。

王弘从弟王僧达妻为陈郡谢景仁（祖据，谢安第二弟）女，见《南史·谢裕传子恂附传》。

陈郡殷景仁妻为琅琊王谧（王导孙）女，见《宋书·殷景仁传》。

陈郡袁质（袁耽子）妻为同郡谢安女，质子湛妻为安兄子谢玄女，见《宋书·袁湛传》。

袁湛弟之子袁洵妻为济阳蔡廓女，见《宋书·蔡廓传子兴宗附传》。

袁洵弟袁淑妻为琅琊王诞女，见《宋书·袁淑传》。

齐世世族

陈郡殷睿妻为琅琊王奂女，见《梁书·殷钧传》。

陈郡谢蔺（谢万五世孙）妻为河南褚渊女，见《南齐书·谢蔺传》。

汝南周颙为东莞臧质外甥，见《南齐书·周颙传》。

梁世世族

南阳乐蔼，同郡宗悫之甥，见《梁书·乐蔼传》。

南阳刘之遴，同郡乐蔼之甥，见《梁书·刘之遴传》。

陈留阮胤之，琅琊王晏之舅，见《梁书·阮孝绪传》。

阮胤之从子阮孝绪，陈郡谢蔺（谢安八世孙）之舅，见《梁书·谢蔺传》。

河南褚向，陈郡谢举（谢朓子）外弟，见《梁书·褚翔传》。

以上诸例，大都是北来的侨姓世族，他们为建立新同盟以加强自己群体的势力，互结姻亲。江东的吴姓世族同样慎择门户相对，然后结姻：

吴郡张融，会稽孔稚圭外兄，见《南齐书·孔稚圭传》。

吴郡陆慧晓妻为同郡张岱女，见《梁书·陆倕传》。

陆慧晓从孙陆绛妻同郡顾昐妹，见《昭明文选》卷二十六陆韩卿《答内兄顾希叔诗》。

吴郡陆睿妻同郡张畅女，见《梁书·陆杲传》。

吴郡张稷女适会稽孔氏，见《梁书·张稷传》。

从以上列举中可以看出，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中大族之间互相通婚者，仅限于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沛国刘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谯国桓氏、庐江何氏、鲁郡孔氏、济阳蔡氏、汝南周氏、东莞臧氏、南阳乐氏、南阳宗氏、陈留阮氏、吴郡张氏、会稽孔氏、吴郡陆氏、吴郡顾氏等大族，可谓典型的族群内婚。

到南朝后期，世族社会已族群内婚二百年以上，遗传基因受限，缺乏新生力量，加上养尊处优多年，南朝世家大族子弟身体日渐衰弱，志气日渐颓唐，终于在侯景之乱时受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婚宦失类”的严重性

世族如果娶公主以外的非世族女子为妻，就称为“婚宦失类”，会受到本阶层的非难和排挤，政治前途立即受到影响，严重的甚至会被逐出本门第。然而南朝有许多寒门出身的高官、将帅，其中不乏位至三公，掌握政治、经济实权或统兵开府，成为方面大员者。对这些人而言，若能凭借其强大的势力与世族结亲，不但立刻翻转阶级，身价百倍，更能形成与世族的联盟关系，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世族原则上对他们不屑一顾，但有时局势纷乱，战火连绵，杀戮不断，武将当道，少数世家大族可能基于安全考虑，会与这样的实力派军人结亲。例如琅琊王锡[25]以女嫁给沈庆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26]“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朓之妻是屠夫起家的大将王敬则之女（《南史·谢裕传从孙朓附传》）等。

世家大族与高阶武将、封疆大吏结亲已经勉强，如果与他们眼中更下层的“寒贱杂门”结婚，必然使其他世族侧目而视，招来严重物议。

最有名的例子是南齐时王源[27]将女儿嫁给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

鸾，满家出聘金五万钱。王源当时丧妻，就用这笔钱办女儿的嫁妆，剩余的自己用来纳妾。

南齐御史中丞沈约听到消息，立刻主动展开调查，然后上奏章向皇帝弹劾王源，这是中国历史上因为结婚而导致御史弹劾的案例，极为罕见，也是南朝特有的怪现象。这篇奏章名为《奏弹王源》，千载知名，还被选入《文选》[28]。

奏弹王源（节录）（《文选》卷四十）

南齐 沈约

> 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王满连姻，实骇物听……源即主也。
>
> 臣谨案……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蔑祖辱亲，于事为甚。此风弗剪，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
>
> 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源官品应黄纸，臣辄奉白简以闻。臣约诚惶诚恐，云云。
>
> （译：听说东海郡的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的满家。王源虽然人物庸俗、品格低劣，却属于高贵的家族。……但他假借结亲，唯利是图，侮辱世族阶级，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王和满家联姻，实在惊世骇俗……主谋就是王源。
>
> 臣下恭敬地说明……怎么可以有名列六卿的家族，把女儿嫁给管理仓库的人？……蔑视祖宗、污辱尊亲，在这种事上是最严重的。这种风气如果不剪断，源头就会打开，将使鳞次栉比的世家大族都蒙尘被辱。应该明正典刑，将他罢黜。
>
> 臣下等共同建议，请以这件事将王源罢免官职，终身不予录用……以王源的官品而言，谈他的事情应该用黄色的纸书写，但臣下却用白色的纸书写来呈报皇上。臣下沈约诚惶诚恐，说出以上的话。）

南北朝时世族的户籍等档案用黄纸书写，庶民的用白纸书写。沈约这篇奏章用白纸书写，代表他和世族社会已经不承认王源的世族身份，将他踢出世族阶级，降级为寒人了。

高门世族的两面性

南朝的世家大族享有崇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优越，又是文化的代表，故其日常生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华丽、庄严，经常宣示他们与政治、学术、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却清高、孤傲，经常表现出他们在社会与心态上的超凡脱俗。这种状况从侨姓世族排名第二的陈郡谢氏家族可以明显看出。

南朝初始时，刘裕篡晋，建立刘宋王朝，名义上要接受东晋最后一个皇帝的“禅让”，实际做法是自知气数已尽的东晋皇帝请来一位大臣，将传国玉玺奉献给新兴王朝的皇帝，仪式才算完成。当时主办典礼的官员预拟由刘裕的孙子刘睿来承担这个传递玉玺的任务，但刘裕认为做这件事的人必须具备崇高的声望，决定请陈郡谢氏的谢澹担任。这个决定象征性的意义极为浓厚，因为陈郡谢氏是取得淝水之战胜利，延续东晋后期命脉的世家大族，让谢氏族人传递传国玉玺，等于明示天下，世家大族已经放弃司马氏的晋朝，改为支持刘裕的宋取代晋，承认刘宋王朝的合法性。难怪以后刘裕举行宴会，都会邀谢澹参加，而这位陈郡谢氏领袖则喝了酒就放言高论，在战场上杀人无数的开国皇帝刘裕也对他无可奈何。

陈郡谢氏另一位人物是谢裕。《南史》描述此人矜持严肃，性喜整洁，居住环境一定要干净优美。所以谢裕家不设痰盂，他每次吐痰，就吐在左右随从的衣服里，然后给这个随从放一天假，让他去洗衣服。每当他要吐痰时，乐于放假的众随从就蜂拥到他面前，争着接受。

对于这样一位陈郡谢氏的领袖，宋武帝刘裕还是特别看重，聘定他的女儿做儿媳妇，结为亲家。

谢家下一代出了一位谢恂，多才多艺，从小精通音乐，善于吹笙。他出来做官后担任庐江郡[29]太守，不久就辞了官。刘宋孝武帝说“谢家少年不可以委屈在小郡”，调他做司徒府主任秘书。

后来谢恂因为家里穷[30]，要求做西阳郡[31]太守，宋孝武帝照例批准。哭穷的世族音乐家谢恂也就得以到湖北比较富庶的地方去做官，借此“调剂”一番了。

将世族这种两面性发挥到极致的是鼎鼎大名的谢灵运（385—433年），他的传记值得细读。

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母亲是王羲之的外孙女，他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文章华美，下笔气势宏伟，纵横自如，但稍欠深刻紧密。宋文帝曾请他编撰晋朝的历史，他写下章节的名称以后就不再理会，史书因此编纂不成。显然编纂史书与他的个性不合，他发现之后，就理所当然地不再做这种既烦琐又不够清高的工作了。谢灵运承袭祖先传下来的公爵，性格豪放，生活奢侈，车辆衣服都鲜明美丽，还会服装设计，往往自行改变服装款式，穿出来立刻变成时尚，大家效法。

这样一个人当然宦途顺利，可是谢灵运却视礼节与法律若无物，喝醉酒就一面裸奔，一面大呼大叫，还屡次因为违法犯案而被革职免官。他最严重的罪名是多次任意杀死部下，这也使他从公爵被降级为侯爵。

谢灵运自视甚高，总认为执掌国家大政非他莫属。宋武帝刘裕死后，少帝即位，权力控制在几位大臣手中，谢灵运乘机党同伐异，诽谤当政大臣，几位大臣忌恨在心又惹不起他，只好来个眼不见为净，将他这枚烫手山芋外放去永嘉郡[32]做太守。至于永嘉郡的百姓会面临怎样的状况，那就只有不管了。

谢灵运到永嘉后成天游山玩水，一出去就是十天到一个月，到处吟诗述怀，公务废弛也不理会。他出游时带着几百人，砍伐森林，开辟山路，县官与百姓受到惊扰，当他们是山贼。

这样过了一年，他称病辞官，大概捞了不少钱，就将会稽[33]的旧宅与别墅整修扩建，优游自在地隐居起来。这些工程堂而皇之地征用当地人民做工。只因他是陈郡谢氏的才子，身边又有几百名清客、随从、家丁，文武兼备，势力庞大，当地官员与人民都只有认命照办。

此后谢灵运变本加厉，看上会稽城墙外的一座湖泊，竟向地方官要求将湖水放干，变成他家的田地。宋文帝本已同意，命地方官执行，会稽太守孟顗却认为这会断绝人民取水与捞捕水产补贴生计之路，予以拒绝。谢灵运改为要求另一座湖，孟太守又拒绝了。然而因为谢灵运的恶势力很大，孟太守感觉自身危险，只好上奏章向皇帝报告，并且动用驻军保护自己。谢灵运则亲自赶回建康，也向宋文帝上奏，状告孟太守。宋文帝处理这种局面的方式又是两边不得罪——把谢灵运派任为临川内史[34]。临川在建康西南，与会稽是不同的方向，免得他又回会稽去与

地方官冲突。

谢灵运在临川仍然嬉游放荡，遭到纠举，这次刘宋朝廷忍无可忍，决定逮捕他。谢灵运干脆起兵反叛，事败被捕，送到首都审讯，依法判处斩刑。宋文帝本来还希望只将他免官而已，因反对力量大，遂将他免死，全家流放广州[35]。谢灵运此时还暗中出钱招募流氓徒众，要这些人采购武器，在广州袭击押送官兵，将他劫走，准备东山再起。他的阴谋被破获，仁至义尽的宋文帝这次终于下令处决，谢灵运就在广州问斩，死后还被曝尸示众。

谢灵运天资聪颖，文才高妙，是南朝知识界的精英。他在不断游山玩水，享受大型庄园富足雅致的生活之余，时常以身边的景物为题材吟诗作赋，抒发闲情逸致与岁月不居的伤感，其作品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他还有设计天才，除服装以外，又曾想出安全省力的登山方法。当时的人常穿下有两个高齿的木屐，谢灵运穿木屐登山，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则去掉后齿，走来如履平地。然而另一方面，诸如高傲自大、恃才傲物、放荡无礼、任性妄为、废弛公务、残杀部下、自私自利、仗势欺人、贪赃枉法、惊扰人民、破坏环境、买凶劫囚、阴谋叛乱等词汇，也可以毫无保留地用来描述他。

只要知晓谢灵运历年在各地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理解虽然他是陈郡谢氏的高门华族，宋文帝最后也不得不把他斩首弃市的原因。毕竟南朝皇帝对世族的优容，是以不危及政权为底线，世族可以对政治斗争、朝代更迭漠不关心，但不能谋反。

南朝高层世族的两面性，在谢灵运身上发挥到极点，他任性到底，美则尽美，恶亦极恶。

补充知识

谢灵运名言

>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36]
>
> 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

南朝世族的腐化

南朝世族子弟可谓衔着金汤匙出生，天生荣华富贵，完全不需要努力奋斗，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世族子弟变得完全不食人间烟火，过着放浪颓废的生活。到南朝后期南梁时，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当时大多数世族子弟生活靡烂腐化，只懂奢侈享受，动辄高来高去地谈论玄学，端起悠闲高雅的架子，不屑也不会处理实务，成为缺乏生活与工作能力的一群人。说他们是外表光鲜华丽的社会寄生虫，也不为过。

南朝世族十分注重衣着用品的奢华、外貌的美丽、态度的从容与行动的娴雅，例如何戢“家世富盛，性又华侈，衣被服饰，极为奢丽”“美容仪”，褚渊“美仪貌，善容止”，王峻“美风姿、善举止”等。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曾语重心长地描述南朝世族子弟的生活：

>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
>
> （译：梁朝全盛的时候，还没当官的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以至于有谚语说：“上车不会掉下来就是著作郎，能寒暄两句身体怎样就是秘书郎。”没有一个不是衣服熏香，脸孔剃光，擦胭脂抹粉，驾起长檐的牛车，脚蹬高齿木屐，坐在方格图案的丝褥子上，倚着杂色丝织成的靠垫，左右两边陈列古玩器物，从容地出出入入，看起来好像神仙。碰到求取功名要考试经书，就雇人作答；三公九卿出席的宴会上，就靠别人代为作诗。在那样的时候，也算是号得意的人物了。）

《颜氏家训·涉务篇》有另外一段对南朝世族精彩的描述：

>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
> （译：梁朝时世族人士，都崇尚宽袍子阔带子，大帽子高底鞋子，出门就乘车，进门有人搀扶，城里郊外，没有骑马的。……甚至尚书郎骑马，就弹劾他。……建康县长王复性格儒雅，从没骑过马，看见马嘶叫喷鼻跳跃，没有不震惊害怕的，就对人说：“这正是老虎，为什么叫作马？”……）

世族在优越的生活中好吃懒做，处事全无能力，人生全无目标，他们自命清高，正是护短的表现。颜之推说世族们品评起古今人物，都了若指掌，真正有事情交给他们去办，就什么都不会。他们生活在承平时

代，不知道有国破家亡、流离失散的祸患；在朝廷做官，不知道战争的危险和紧急；永远有俸禄可领，不知道耕田的劳苦；站在吏员与百姓头上，不知道服劳役的辛勤。这些话可谓旁观者清，语重心长。

这样高高在上的世族官员，常使寒门同僚既羡慕又忌妒，既看不顺眼又无可奈何，比较刻薄的寒门只得找到机会就挖苦他们一下。南齐时寒门刘祥曾与世族王融同乘一辆车，路上看到有人赶着一头驴，刘祥就说："驴！你好自为之，像你这样的人才，都已经做了中书令[37]、尚书仆射[38]。"刘祥此人向来尖酸刻薄，讽刺谩骂，口不择言，后来被南齐高帝萧道成流放广东，但若不以人废言，这几句指驴骂世族，倒也真是他的不平之鸣。

南朝后期世族的式微

南朝后期，世族盛极而衰。

南朝开国皇帝多出身于寒门，他们鉴于门阀政治侵蚀国本，亟须加强君权以求自我巩固，加以世族一向鄙视吏事与武职，不屑烦劳，无法胜任实际政务，故南朝皇帝大多委任寒门庶族出任顾问或助理，担任实际行政工作。如此一来，随着南朝的延续，世族固然依旧高高在上，寒人的政治地位却也逐步上升，掌握了实际政权。高高在上的南朝世族的学识与能力渐渐不堪闻问，生活却更加奢靡腐化，君主对世族也表面尊敬，把他们供养起来，实际上却疏远与压抑。久而久之，世族慢慢远离权力的核心，丧失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步式微。这种情况仍然可以举陈郡谢氏为例。

谢灵运的孙子名叫谢超宗，幼年时随祖父、父亲流放岭南，在宋文帝末年回到建康做官。他好学，文章写得好，名声大，可是性格傲慢，且酗酒成性，经常醉醺醺地值班。宋文帝曾召见他，谈及北方边疆的事，谢超宗回答道："那些（北朝）强盗打过来已经二十年了，就算佛出来也没办法。"文帝听了很不高兴，把他调为南郡[39]王府的中军司马，这是武职，显然是有意让他去当个边疆地区的武官，长点军事知识。谢超宗从皇宫出来后，有人问他，新任命官居何职，在哪个府里？他答道："不知道是司马还是司驴，既然是驴府，应该正是司驴。"

由此可见南朝世族既不懂军事，更对此不屑一顾的实况。应当注意的是，陈郡谢氏在东晋淝水之战（383年）时出过谢安这样的宰相、谢玄与谢石这样的将军，以寡击众，获得大胜，保住东晋的江山。可是70年后，到刘宋文帝末年（约450—453年）时，其后代已经对北魏这个南朝的强敌与宿敌、一心想吞并南朝的强邻，完全不知所措，也不愿去面对，只剩几句仗恃世族身份装疯卖傻的酸话而已。

全国知识界的精英如此不堪，必定迫使皇帝从寒门中培养人才。果然梁武帝时设置五经博士，开馆招生，专收寒门俊才，由政府供给食宿，只要能通一部经书，核实后即可录用。此制度旨在鼓励寒人钻研经学，寒门的文化水准因此得到普遍提升，无形中消除了世族与寒人间文化上的鸿沟，使越来越多的寒门凭借文才、武功取得高位。相比之下，

南朝世族早已丧失对政权的向心力，不以改朝换代为意，导致擅长政事的绝少，懂军事者更完全不可得，只剩下保持家族地位、好好享受人生的念头。当时世族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尚未受到严重的挑战，家中仍有财力让他们招摇，所以会出现《颜氏家训》叙述的那种景象。

梁武帝末年发生侯景之乱，建康几乎成为废墟，梁朝分裂，内战频仍。大动乱中娇生惯养的世族子弟原形毕露，他们身体虚弱，走不了几步路，耐不住寒冷或炎热，遂大量惨遭屠戮、病饿而死，或流落异乡。等到江南寒门武人陈霸先收拾残局，建国称帝时，南朝世族，尤其是侨姓世族已经日薄西山。

南朝二百年的世族门阀，最后随着南朝灭亡而恍如一梦，只留下那些当时不可一世的傲慢身影，隐约浮现在史书中。正如唐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乌衣巷

唐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40]

南朝世族的生活状态我们在此已经触及，但世族只占南朝人口的少数，南朝时各种人究竟怎样过日子，在探访南朝中不可或缺，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了解。

【注释】

[1] 或称九品官人法。

[2] 辖今山东东部、南部，郡治在琅琊，今青岛。

[3] 今山东临沂。

[4] 辖今江苏东南部、浙江东北部、上海市，郡治在吴，今江苏吴县。

[5] 家谱。

[6] 随着时间逐步攀升，袖手高坐就可以成为公卿。

[7] 中央图书馆员，掌管图书经籍。

[8] 史馆编修，掌管历史档案、编辑撰述国史。

[9] 掌管诏令。

[10] 人事机构官员，掌管官员选拔铨叙等资料；尚书各部郎官只有吏部郎是清官，其他都是浊官。

[11] 行政机构副负责人。

[12] 太子侍从秘书，清流七品官。

[13] 太子侍从长，三品官。

[14] 今河南新野。

[15] 辖今安徽东南部，郡治宣城，今安徽宣城。

[16] 辖今江苏北部，郡治徐州，今江苏徐州。

[17] 佛教仪式，本意为离家一日一夜，加入僧团生活，遵守佛教八项戒律。

[18] 佛教用语，指用斋后或静坐前行走，由慢至快。

[19] 中书副长官，皇宫副秘书长。

[20] 调查世族拥有的荫户。

[21] 古代跪坐用的家具。

[22] 掌起草与宣布诏命，南朝时经常握有实权。

[23] 只请求皇上让我做士大夫。

[24] 娶公主。

[25] 王导七世孙。

[26] 谢玄玄孙。

[27] 曹魏司徒王朗七世孙，东海郡世族。

[28]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选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选编。萧统死后谥“昭明”，因此得名。有唐代李善注解。

[29] 辖今安徽巢湖南岸一带。

[30] 按，不如说钱不够花。

[31] 辖今湖北黄冈一带。

[32] 辖今浙江东南部温州一带。

[33] 今浙江绍兴市。

[34] 今江西抚州的地方长官。

[35] 今广东。

[36] 这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曹子建，曹植。

[37] 皇室秘书长。

[38] 行政部门次长。

[39] 今湖北荆州一带。

[40] 乌衣巷，建康城中东晋至南朝高门世族的聚居区，在今南京秦淮河南岸；朱雀桥，秦淮河上的一座桥，是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

第四章 归去来词山居赋，吴声西曲子夜歌——南方生活面面观

鹧鸪天·南朝生活

白藕红莲小桨轻，吴歌西曲诉多情。
苗稀草盛陶潜累，家乱人争任昉评。
崇释道，嗜杯觥，山居闲适赋尊荣。
玉台新咏今犹在，唱尽南朝旧燕莺。

探访一个历史时代，不能不去看当时的生活。可是这在南朝并不容易，主要原因在于资料太少而且零散。

中国传统的二十五史，一般记载帝王将相的事迹多，平民百姓的生活少，其中记述各种专门领域的“志”里可能有一些，例如《食货志》就专讲经济、财政，也涉及部分民生，但仍然不足以呈现全貌。南北朝战乱频仍，对文化的破坏严重，像梁元帝一夜之间就烧掉十四万卷书，许多当时的宝贵资料就此失传。唐朝编修的南陈历史《陈书》，竟然连“志”都没有。所以重现南朝生活面面观是个艰辛而且繁杂的工作，必须另外寻找资料，披沙拣金，才能与正史中的蛛丝马迹合并，拼凑出大致的模样。在比较知名的书如《文选》《颜氏家训》之外，兹介绍可以作为我们这段探访导引的另外几部书。

《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类书，由欧阳询主编，编辑有令狐德棻、陈叔达、裴矩等十余人。武德七年（624年）成书，距南朝终结仅35年，为时不远，有其史料价值。《艺文类聚》的内容分为四十八部，即单元，每单元记述一种专门领域迄至唐朝初年的资料与知识，有《衣冠》《居处》《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等部，颇有助于了解南朝人的生活。

《荆楚岁时记》为南梁宗懔撰，记载当时南朝西部地区一年中的节庆活动状况，是探索南朝人民生活、风俗习惯、民间宗教信仰等的重要

指引。例如在南朝时每年正月初一日的安排有：

> 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

《玉台新咏》作者不详，一般认为编者是南朝徐陵，但也有人认为徐陵其实是“徐媛”的误写，真正的编者是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不论如何，这本十卷的书以“选录艳歌”为宗旨，收录从东周到南梁时的诗七百六十九篇，内容多围绕着男女爱情与婚姻，中国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于此书。历代以来，《玉台新咏》被真道学与假道学批评为靡靡之音甚至亡国之曲，但它现在却是我们探索南朝人爱情与婚姻生活的重要指引。

北宋刘敞撰有《南北朝杂记》，记述南北朝时一些人物的言论与故事，虽然不是第一手史料，但有些颇有意思，也具有参考价值。

南北朝时代固然政治黑暗，动乱不绝，却是一个社会与思想控制力降低，使人类本性得以自由发展的时代。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法家、道家、儒家学说相继被政府采用，造成中央政府以一种学说为主导，为人的行为与思想设立规范。法家或儒家思想笼罩一切，造成了秦、汉时社会均质化、思想一贯化，社会景象单调。这种单一化的体系延续近四百年，到魏晋时终于瓦解，人们得以发挥个性，造成文化的荣景与特色鲜明的社会。从东汉末年开始的社会与文化情况延续到南朝时，已经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南朝人的生活实属多彩多姿。兹就现有资料，从几方面介绍南朝人的生活。

自成天地的世族庄园岁月

自晋室南迁，世族在南方封山占泽后，南方出现许多世族私人拥有的大型庄园。这类庄园占地甚广，涵盖山丘、平野、河流、湖泊等各种地形，其中植物、动物种类齐备，故能自成一个生态体系与经济单位。

这类庄园内建有主人与仆人的住宅，休憩用建筑如亭台楼阁等，灌溉与交通用的水道，动力来源的水车、碾房等。平原上的土地用以生产粮食，也有一部分用来种植花草果树，以增进主人的生活情趣。南方气候较为炎热，故南朝皇室特别重视冬天取冰，以供夏天使用，还设官管理。推想在庄园逍遥度日的世族也应该会如此享受。

南朝位居社会顶尖的世族，便在这样的庄园里过着他们优游的岁月。谢灵运曾以长篇作品《山居赋》描述这种庄园主人的生活。此赋篇幅极长，辞藻华美，可以作为南朝赋的代表作，其中以许多典故与不常用的字，介绍他庄园里的地形、植物、动物，在知识的傲慢中，充分展现他学识的渊博、见识的高超，当然还有生活的舒适与雅致。《山居赋》让我们发现，南朝世族的庄园规模庞大，包山带水，地形地貌复杂，庄园内植物、动物种类繁多，甚至熊与老虎都可以生存于其间。庄园的物产甚为多样，粮食、蔬菜、水果、花卉、水产、山珍、野味等无一不备，作为世族的主人可以随时享受。物质享受之余，这些世族庄园主还要潇洒自如地追求精神生活，谈论哲学，体验美感，所以庄园里还有经台[1]、讲堂、禅室、僧房等建筑，点缀在山明水秀之所，柳暗花明之间。请看谢灵运这篇名作：

山居赋（节录）

南朝 谢灵运

其居也，左湖右汀。往渚还江，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

……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蔚蔚丰秫，苾苾香粳。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候时觇节，递艺递熟。……

……山上则猿 狸獾，犴獌猰 。山下则熊罴豺虎，羱鹿麢麖。掷飞枝于穷崖，踔空绝于深硎。蹲谷底而长啸，攀木杪而哀鸣。……

……翦榛开径，寻石觅崖。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面南岭，建经台；倚北

皋，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涧，森疏崖巘。杏坛，柰园，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椹梅流芬于回峦，椑柿被实于长浦。

畦町所艺，含蕊藉芳，蓼蕺葼荠，葑菲苏姜。绿葵眷节以怀露，白薤感时而负霜。寒葱标倩以陵阴，春藿吐苕以近阳。[2]

汉朝人聚会时常常几杯酒落肚就自行跳起舞来，到了南朝，世族重视装扮，讲究仪容清雅、举止悠闲，出门都驾着牛车，又常拜佛修道，形成文弱的风气。他们聚会时的活动就是喝酒、吟诗、奏乐、清谈等，都是静态的，连传统的自行起舞风俗都已失去，其生活形态不难想见。结果南北朝时，聚会起舞的风俗变成仅流行于北朝，后来被隋、唐继承，并发扬光大。南北的差异，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

南朝世族风雅文弱的生活，在庾信（513—581年）的一首诗中表露无遗：

梅 花

南梁 庾信

常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
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
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
早知觅不见，真悔着衣单。

同样是下雪天，南朝世族手伸出来就觉得冷，急着赏梅花又后悔穿的衣服太单薄；北方那种“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大雪满弓刀”的场景，在南朝世族的生活里确实很难见到。

由于南朝世族不把皇室放在眼里，礼制上皇家才能有的建筑，世族照样拥有，尤其是墓园。当时世族的墓规模甚大，举凡墓道、石室、石兽、碑铭，样样皆备，等同皇室规格。南朝政府也曾屡次下令禁止，但中央力量薄弱，自信不足，始终是禁者自禁、建者自建的状况。这点对世族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墓园正是家族地位与传承的代表，当然绝对马虎不得，至于国家的禁令，那是“刑不上大夫”的，根本不用担心。

知识分子的隐居生活

南朝政权更迭迅速，战乱连绵不绝，面对黑暗危险的政治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选择隐居，称为隐士。这些隐士固然都在隐居，但其生活却千姿百态，差异极大，有的十分富足，拥有大量土地、庄园、佃农与奴婢，有的虽然必须亲自耕种，却也拥有土地、房屋。依照阶级划分标准，前者如谢灵运、王僧达，必然归入“地主”阶级；后者如陶渊明，则可以归入“富农”阶级，至少也是“中农”阶级。总之，东晋与南朝的许多隐士并不符合一般“隐士清贫”的观念，对于这些隐士来说，人生的重点在于“隐”，只要在家度日，符合不出仕的“隐”，就是隐士，与生活富裕、自足或清贫无关。

对于隐士而言，在俗世争名逐利、求官求禄是卑鄙污浊而可耻的，因此才决定远离官场，归乡隐居。然而人总要生活，也会追求生活的安适与充裕，隐士并不例外。既然隐士是可以做官而不做官，他们就必然是读书人，家里通常不至于一穷二白，贫无立锥之地。实际上从现有资料里看到的南朝隐士，有钱有势的大有人在，其他的至少也有足堪温饱的田园土地。南朝时富裕的庄园主型隐士不止谢灵运，像南朝初年的陶淡，祖父是晋朝太尉陶侃，家资丰厚，僮仆门客数百人，他绝不出来做官，喜好道家的导引养生术，十几岁时就开始锻炼“辟谷”，追求长生成仙之道，是名符其实的富裕道教信徒隐士。南梁时的刘峻，字孝标，曾注解《世说新语》，也是一位著名的隐士，写有《东阳金华山栖志》一文，详细记述他的隐居生活，没有谢灵运的宏大，可算是《山居赋》的袖珍版：

> ……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郑白决障，莫之能拟。致红粟流溢，凫雁充厌。春鳖旨膳，碧鸡冬蕈，味珍霜鶂，毂中取于丘岭，短褐出自中园。[3]

作为隐士的刘峻米多到吃不完发红了，都没地方放，还不时来一些烧烤野雁、炖鳖佐冬菇，日子的确过得不错。

隐士中比较贫穷的，可以用陶潜做代表。这位大名鼎鼎的渊明先生有五首《归园田居》诗，是隐士抒发心声的名作，其中第一首就说：

归园田居 五首其一节录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陶渊明自述他隐居的家宅占地十余亩，约是中国古代授田制下标准小农家“五亩之宅”的三倍，可见这个家庭人口较多，应该并不是只有夫妻与未成年子女的“核心家庭”。陶渊明曾出仕为彭泽县令，《南史·陶渊明传》说他就任时，“送一力[4]给其子”，附家书一封，其中两句名言，千古流传：“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见他家里本有仆人，而且可能不止一个。出任知县后分到三顷公田，陶渊明下令全部种秫稻，他的妻子坚持请求种粳稻，他才妥协为二顷五十亩种秫稻，五十亩种粳稻。古代秫稻碾制成糯米，用以酿酒，粳稻碾制的粳米用以煮饭。陶县令以六分之五的公田生产糯米供他酿酒，只用六分之一的田生产煮饭的粳米，应该不够他们全家吃，他家的粮食供应必然另有来源。

陶渊明确实是隐士群体里相当贫困的，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后一直亲自耕田，正如《归园田居》诗的第三首所述：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种在辛苦工作中的洒脱开朗，一般认为是隐士应有的本色，也是陶渊明受到千古敬佩与向往的原因。就人品、道德与格局说，陶渊明都超然于那些坐拥巨型庄园的富贵隐士之上，然而他的《归去来辞》开头就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明白表示他本来就有田有园，拥有相当数额的地产。他这样的隐士本来应该自给自足，只是他太爱喝酒，消费高，才会入不敷出，时常感到贫穷。

自足型的隐士虽然不至于生计窘迫，但也不会宽裕，如果同时笃信佛教或修炼道术，就可能成为素食者。《南北朝杂记》记载：

汝南周禺，隐居钟山，长斋蔬食。王俭谓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啖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5]”

又曰：“菜何者最美？”禺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6]”……

（译：汝南人周禺隐居于钟山，长期素食。王俭问他：“您在山里都吃什么？”他回答说：“红米白盐，绿葵紫蓼。”又问：“哪种菜最美味？”周禺说：“初春时的新韭，暮秋时的白菜。”）

家庭生活：大家族的改变

东汉时代以“兄弟不分产，世代聚族而居”为伦理道德原则，更是察举制度的评判标准。此处所谓“产”主要指土地房产而言，但也包括男女奴隶。

东汉末年以迄三国、两晋，天下大乱，战乱不绝，人民流离各地，家族分散者甚多。无数核心家庭[7]到达新土地后各自谋生，等于东汉原有的家族秩序被战争与流亡的暴力拆散，在思想观念上，人们的家族主义色彩渐淡，个人主义得到发展。

南方经过东晋百余年后，侨姓家族人口众多，早已非聚族而居，吴姓家族受其影响，也分家成风。分家后各房发展不一，差异导致各种利害关系，于是同一家族内部各家庭间的纠纷层出不穷。《宋书·周朗传》说，到刘宋时，世家大族父母尚在而兄弟已经分家的，十家就有七家，严重的生死危亡都不知道，饥寒不互相帮助，还忌妒诽谤，彼此残害，不计其数。《文选》中南梁时任昉写的《奏弹刘整》一篇奏章，详细描述了一段家族内部纷争，可以作为代表性的案例：

奏弹刘整（节录）（《文选》卷四十）

南梁 任昉

……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出适刘氏，二十许年。刘氏丧亡，抚养孤弱，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分前奴教子、当伯，并已入众。……又夺寅息逡婢绿草，私货得钱，并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师利，去岁十月往整田上经十二日，整便责范米六斛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户前，隔箔攘拳大骂，突进房中，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范臂。……

……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整所除官，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

（译：……臣恭敬地说明，已故齐朝西阳内史刘寅的妻子范氏，向官府控诉称：自己嫁到刘家二十多年，刘寅去世后独自抚养小孩。小叔刘整，常常想伤害孤儿寡妇，侵夺财产。从前刘寅分家时分到名为教子、当伯的两个奴隶，都已经交还家族。……刘整又抢走属于刘寅儿子刘逡的名叫绿草的婢女，私下卖掉，所得的钱也不分给刘逡。刘寅的庶子刘师利去年十月帮刘整种田十二天，刘整就要范氏送六斗米抵伙食。米还没送过去，刘整忽然到家门口，隔着门帘挥拳大骂，又冲进房中，从屏风上拿走车帐抵米而去。二月九日晚间，刘整的名叫采音的婢

女偷走车栏、夹杖、龙牵等物，范氏问到丢东西的事，刘整便责打刘逡。刘整和他母亲以及奴婢共六人来到范氏屋中，高声大骂，婢女采音一直伸手抓着范氏的手臂。

……臣等商议，请以这些事罢免刘整已被任命的官职，勒令逮捕，交司法部审判治罪。……）

这篇文章叙述刘氏家族内部的纷争极为精彩，读起来仿佛那些人物与事件活生生地眼前搬演。以刘氏家族的情况论，可谓家产早就分掉，各房亲情全无，只剩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稍有不满便威吓、暴力齐来。依照任昉的调查，刘整一家就是个暴力集团，专门欺负同族的孤儿寡妇，甚至刘整家一个奴隶身份的婢女，还敢出手抓住对方女性家长的手臂。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如果发生在秦始皇、王莽或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后果将会很严重，当事人也应该不敢，但这里是南朝，它就这样发生了。

《颜氏家训》里这类南朝家族内部状况的记载也有不少。通过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南朝家庭生活的各种面向，例如：

南朝民间已经有周岁幼儿“抓周”的风俗，当时称为“试儿”，这天也是家族聚会欢宴的日子。

江南的妇女彼此几乎没有来往，亲家之间有的十几年还不认识，只用信件和礼物互相致意。

男子丧妻后往往不再娶，只以妾主管家事，妾既无继母的地位，生的儿女又是庶出，于是原配的子女比较能获得保障，不致被继母虐待。

梁元帝时有一位中书舍人治家太过严苛，结果他的妻、妾竟然收买刺客，趁丈夫酒醉熟睡时杀了他。

有位女婿冬至后去拜访岳父，老丈人十分吝啬，只准备了一铜瓶酒、几片獐肉招待，女婿不满岳父太过草率，拿起来就吃光喝净。岳父惊愕，女婿则请求再添些，这样来回了好几次。岳父对女儿说：“那个年轻人喜欢喝酒，所以你才很穷。”显然女儿的嫁妆也给得很少。后来这位岳父死了，他的几个儿子争夺遗产，哥哥把弟弟杀掉了。

毕竟即使是杏花烟雨的环境，人性仍然不变，南朝家庭里的一幕幕悲喜剧，便这样在170年里不断上演。

南朝民歌中的南朝生活

南朝在中国历史上以民歌著称，现在还留存近五百首。南朝民歌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前者产生于都城建康及周围地区，这一带习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长江、汉水流域的荆[8]、郢[9]、樊[10]、邓[11]等几个主要城市，这些地方是南朝西部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出兵南侵，俘获这两种歌曲的乐谱、乐器及乐工，带回北方，从此将两种南方的歌曲总称“清商”，成为南朝民歌的另一名称。南朝民歌的资料，主要保存于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一书的“清商曲辞”类中。

南朝民歌若从歌词看，大部分是女子唱的情歌，或是回忆年轻时的情事，歌中女子则几乎都属于南朝社会的中下层，身份则大多为农家女、商家妇、船户女、妓女等，而且往往很年轻，因此这些民歌成为我们了解南朝基层社会与男女交往状况的重要指引。以下分别叙述吴歌、西曲。

吴歌

依照《宋书·乐志一》，吴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曲调，今列举曲目及歌词数例，并加以说明：

子夜歌

相传这是一个名叫“子夜”的女子所作，歌词悲哀，传说还被女鬼唱过。

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

子夜四时歌

这是《子夜歌》的变曲，以四时景物为衬托，四段并陈，每段四句，比《子夜歌》更为精致，有几篇还引用典故与前人诗句，应该是出于文士之手或经他们修饰过。

光风流月初，新林锦花舒。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裾。（春歌）

青荷盖渌水，芙蓉葩红鲜。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夏歌）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秋歌）

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谁知相思苦，玄鬓白发生。（冬歌）

读曲歌

“读”或作“独”，是不配乐的清唱歌。此曲民间风格浓厚，歌词质朴，感情直接而强烈，像这首就把男女夜间幽会的情景毫不保留地说出，直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篇的“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一夕就郎宿，通夜语不息。黄檗万里路，道苦真无极。

懊侬歌

“懊侬”即吴语“懊恼”之意，几乎都是失恋的悲歌，以质朴风格表现，例如被甩了就直接说“情郎如今果然在骗我”。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

月落天欲曙，能得几时眠。凄凄下床去，侬病不能言。

华山畿

此为《懊侬歌》的变曲。相传华山[12]有一女子殉情而死，死前作此歌。此歌与梁山伯、祝英台传说中的“英台哭山伯墓，墓为之开”情节类似，二者或许有关。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

神弦歌

这是江南民间的祭神歌，歌词描述的神灵往往具有人类的姿容和情感，颇类似《楚辞》中的《九歌》。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白石郎曲》）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青溪小姑曲》）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他有一首无题诗中就赫然出现“小姑居处本无郎”这个句子，其受南朝民歌影响之深，由此可见。

其他如《阿子歌》，缘起于东晋穆帝时，儿童相聚唱歌，一曲唱毕，往往大呼：“阿子！汝闻不？”[13]因而得名，南朝时仍流行。《督护

歌》属于哀歌，缘起于刘宋武帝的大女婿彭城内史徐逵之被鲁轨所杀，武帝派督护丁旿收殓埋葬。武帝的长女特别叫丁旿到阁楼下，亲自问办理丧葬的事。这位公主每次发问，都要叹息一声，叫道："丁督护！"声音哀切，后来有人受到感动，作曲作词，这种歌因此得名。

西曲

今存一百三十余首，大部分是舞曲，多由文人在民歌的基础上制作；小部分是"倚歌"，这是一种用铃鼓与吹奏乐器伴奏的歌，不用弦乐器伴奏。西曲的歌词多数出于民间，也甚为浅近直白，有的内容还极为激烈，自杀的情节都出现过，例如：

日从东方出，团团鸡子黄。夫归恩情重，怜欢故在傍。

暂请半日给，徙倚娘店前。目作宴瑱饱，腹作宛恼饥。

我昨忆欢时，揽刀持自刺。自刺分应死，刀作离楼僻。

阳春二三月，诸花尽芳盛。持底唤欢来，花笑莺歌咏。

有些西曲还有本身的名字，例如：

感郎崎区情，不复自顾虑。臂绳双入结，遂成同心去。（《西乌夜飞》）

送欢板桥弯，相待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三洲歌》）

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夜度娘》）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远望千里烟，隐当在欢家。欲飞无两翅，当奈独思何。（《乌夜啼》）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襄阳乐》）

女主角在江边送别、守候、思念情人是西曲常见的题材。南朝领域中，长江、汉水在荆州交会，长江是南朝东西方向最重要的交通与贸易通道，联系江南与荆州，汉水则是前往南朝西北方边区的要路，这两条大江也承载着无数南朝情侣、夫妇的情感，化为一首首西曲。

汉水交通繁忙，江边餐饮、娱乐事业随之兴起，南朝时距离襄阳（今湖北襄阳）以南大约一天行程的汉水边，有一处名为"大堤"的地方，是行旅往来必经之地，遂形成娱乐业与色情业中心，"粉味"十足。上述的《襄阳乐》正是这地方的写照，南齐时刘孝绰有一首诗，名字就叫作《遥见邻舟主人投一物，众姬争之，有客请余为咏》，可能就是此地的实际场景。

南梁简文帝萧纲居然也曾以此地为题材写过一首诗，收录在《玉台新咏》中：

大 堤

南梁 简文帝萧纲

宜城断中道，行旅亟流连。
出妻工织素，妖姬惯数钱。
炊雕留上客，贳酒逐神仙。

依照萧纲的描述，大堤容纳了不同形态的女性，从靠纺织手艺自食其力的离婚妇人，到收惯巨额缠头之资的妖娇名妓都有，买醉的男客人们也快乐似神仙，真是一派繁华热闹、纸醉金迷的景象。

从南朝诗歌看南朝生活

从南朝民歌与《玉台新咏》所列诗歌的内容看，南朝时许多人注重生活的快乐、追求情感的满足，不再理会传统礼教与社会规范，男女都如此。此因东汉末年以来，传统道德规范失去约束力，于是魏晋南北朝的人表现出思想开放、行为随性等特色，充满浪漫气氛。干宝在《晋纪·总论》里说晋代的女子：

> 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

南朝民歌不论出自基层民众或由文人润饰，都充满对男女之情的咏叹，其中表现的男女交往与爱情，又常不是夫妻之间的鹣鲽情深，而出现许多私下爱慕、露水姻缘、偷情幽会、不伦之恋、妓家风情等内容，足以显示在自晋代开始的人性解放背景下，社会风气一直未曾改变，传承到南朝时，更已经蔓延至从上到下的各个社会阶层，成为南朝人生活的普遍现象，也才会有《玉台新咏》这样的士大夫诗歌集出现。

南朝民歌以情歌为多，甚至包括同性恋。例如《玉台新咏》里萧纲的这一首：

娈童（节录）

南梁 简文帝萧纲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

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
袖裁连璧锦，笺织细橦花。
揽裤轻红出，回头双鬓斜。
懒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
怀猜非后钓，密爱似前车。
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

此诗中的“董”指董贤，“瑕”指弥子瑕，分别是“断袖”与“余桃”这两个中国古代著名男同性恋典故中的一方。

即使歌咏的内容是婚姻关系，南朝也有不少对“怨妇”的描述，如：

江南曲

南齐 柳恽

汀州采白苹，日落江南春。
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
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
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

此诗歌替一位丈夫远行到湖南却很久未曾归来的妻子发言。叙述她遇到一位从洞庭湖回到江南的人，这个人在湖南认识她丈夫。做妻子的就问丈夫为何还不回来，春天的花季都快过去了——这当然是双关语，也代表她自己的青春。在不愿伤她心或“男男相护”之下，这位男士隐瞒了她丈夫在那“湘女多情”之地另结新欢的实情，只是说路太远了。全诗短短八句四十个字，道尽南朝人的爱怨情仇、悲欢离合。

怨妇在南朝有可能变成荡妇，请看这首诗：

荡妇高楼月

南梁 王台卿

空度高楼月，非复五三年。
何须照床里，终是一人眠。

二十个字后戛然而止，意在言外，留下许多想象空间。

这种社会风气的持续与普遍，与南朝帝王将相的娱乐休闲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南梁时裴子野撰《宋略》，其中说刘宋时皇帝往往奢侈浮华，导致群臣竞相仿效，“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

群”。而且他们互相比赛，唯恐不及，以致社会基层也有样学样，充满得过且过、及时行乐的气氛。南朝刘宋文帝是围棋高手，曾跟羊元保下棋，开玩笑以宣城太守的官位作为赌注。南朝官员中具有音乐、艺术或游戏才华的不少，以清高为尚的世家大族多擅长书法、绘画、弹琴、围棋等，寒门或武将家族出身的，也有像沈文季这样既擅长弹琵琶，又是弹棋[14]高手的人物。这种情况在南朝后期达到高峰，使当时出现以歌咏宫中豪华生活与男女感情为题材的“宫体诗”，极尽艳丽绮靡之能事。

南朝人说话、吟诗、唱歌时用的语言，也因身份而有差别。东晋南渡以来，侨姓世族保持着西晋时首都洛阳语言的发音，称为“雅言”，后来渐渐掺杂了一些江南语言的发音，南朝时首都建康的官场上都说这种话，称为“金陵之音”。吴姓人士当然有他们的母语，称为“吴语”或“吴音”。后来随着出仕做官，吴姓世族使用“雅言”的人渐渐增多，但民间仍通行吴语，吴歌自然也用吴语唱出。

看过这许多南朝人的生活后，如果就说南朝从上到下每个人都在吃喝玩乐，那当然不尽然。在那样一个外族武力虎视眈眈，外来宗教大举传播的时代，自然有一批忧国忧民忧文化之士，在各种领域孜孜矻矻地研究、思辨与撰述。他们的成果，构成南朝思想面与技术面的文化，这就是我们下一章探访的目标。

【注释】

[1] 存放与阅读儒家经书的台阁。

[2] 此篇赋难以用同样充满音律感的白话文翻译，只得保留原貌，幸好节录的部分都不算太艰深，请自行体会其意。

[3] 此文难以用同样充满音律感的白话文翻译，只得保留原貌，节录的部分不算太艰深，请自行体会其意。

[4] 仆役。

[5] 蓼，指多种蓼科蓼属的植物，叶披针形，花淡紫色、淡红色或绿色，果实卵形或扁形，茎叶有辣味，细嫩部分可食。

[6] 菘，十字花科植物，即白菜。

[7] 夫妻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

[8] 今湖北江陵。

[9] 今湖北武昌城区蛇山。

[10] 今湖北襄阳。

[11] 今河南邓县。

[12] 在今江苏境内，非陕西华山。

[13] 孩子！你听见没有？

[14] 中国古代游戏，使用围棋子在棋盘上互弹，类似弹珠。

第五章 算圆周，辩神灭，儒玄文史释道医——精致优美的南朝文化

忆江南

神灭否，著论辩滔滔。

星历机工出缀术，儒玄释道蔚思潮。

本草验丹膏。

南朝当然不是只有世族享乐、亲戚夺产、娈童回眸、妖姬数钱，否则它应该持续不了那样久。南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从它文化的成就与特色上才可以真正看出。

南朝文化

东汉末年中国原有的秩序大崩解，在政治、社会之外，也包括思想、文化各方面。经过魏晋二百年的演变，加上长久偏安南方的地缘影响，南朝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精致而优美，总体而言胜于北朝。南朝文化在经学、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科学等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对后代影响深远。

学术

南朝初年，刘宋文帝开始建立国家学府，到宋明帝时扩大规模，称为“聪明观”，下设四个学馆，分别教授儒学、玄学[1]、史学与文学，当时还想延聘师资，开设阴阳学课程，却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只得作罢。这种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说明，经过魏晋200年后，南朝的学术范围与文化氛围都已经与汉朝时大不相同。南朝的国家最高学府居然教授玄学，而且与儒学并列，地位平等，比起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演变最为剧烈；文学与史学也成为国家正式的课程，可见当时政府同样重视这两个学术领域。相反地，阴阳学竟找不到人教，正反映这个领域“人才”的缺乏。汉朝动不动就诉诸谶纬的那一套，到此时已趋向没落，虽然南朝历代皇帝篡位时仍免不了出现劝进的符瑞，但已经没有王莽篡汉、刘秀称帝时的那种威力。

在此种学术文化环境下，南朝读书人在学术上研究的，不外乎儒、玄、文、史四门学问。兹选择数题分论。

经学

南北朝时儒家经学虽然已经不是唯一的学问，但仍在持续发展，并因南北的对立与隔绝，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隋书·儒林传序》说南北朝时的经学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显示出北方经学墨守东汉经师的家法，对训诂章句讲解明细，却不敢提出新解释，学风保守，南方经学则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阐发经义，大家提出自己的心得，勇于讨论问题。北方经学也严守汉代独尊儒术的传统，排斥道家玄学；南方经学则兼采玄学与佛教理

论，学风较为开放。

玄学家崇尚清谈，佛教高僧则聚徒讲经，南朝时清谈和佛教的讨论方式影响到儒生。南梁时盛行邀请大儒登座讲经，听讲人数有时多达千余人。这种学术演讲都有专人负责记录，记录的稿子称为“讲疏”或“讲义”。梁武帝就曾亲自讲过《周易》《中庸》，还留下《周易讲义》《中庸讲疏》等。

儒佛之争

南朝时思想界与宗教界的背景是，佛教在中国大举传播，道教也建立发展，玄学、清谈仍然在士大夫中流行。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即此种思想背景与社会风气下的产物。儒、佛、道教间的竞争既然无法避免，这些争斗在知识界遂常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进行。

魏晋以来，社会上出现儒家、玄学、佛教、道教并存的状态。这四派在竞争时可分为两个壁垒，一边以儒学为主，道教往往追随儒学；另一边则以佛教为主，玄学往往追随佛教，故南朝的思想竞争，主要表现为儒佛之争。有趣的是，当时佛教徒几乎都主张调和儒佛；道教徒则因反对佛教，几乎都依附儒家。例如佛教徒学者沈约撰《均圣论》，提倡“内圣（佛）外圣（周公、孔子），义均理一”的说法，亦即内心的修养靠佛教，完成外在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则靠儒家，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对此，道教学者陶弘景提出《难沈约均圣论》，站在儒家立场坚决反对，正代表南朝佛教极盛时，道教徒选择依附儒家以对抗佛教的状况。此文收录于《全梁文》。

儒佛之争涉及“华夷之分”与礼制等问题。当时佛教僧侣不愿对皇帝与父母下拜，儒家认为，僧侣不拜父母和皇帝，就是否定儒家伦理，想用外来蛮夷的思想控制中国，而且此例一开，难保没有其他人援引比附，则朝廷将不成其为朝廷，国家也不成其为国家。然而从佛教的观点看，身为僧侣，就已经辞别俗世出家，再去对皇帝下拜，等同于又回到俗世，有悖出家原则，而且一旦僧侣开始拜皇帝，其他的改变势必随之不断到来，最后僧尼将不成其为僧尼，佛教也不成其为佛教。佛教僧侣拜或不拜皇帝因此成为南朝基本且尖锐的问题，这种争端称为“沙门不敬王之争”。儒、佛两派从东晋起就此不断争执拉扯，迫使南朝的皇帝也必须做出抉择。南朝时刘宋孝武帝下令佛教僧侣见皇帝要跪拜，他的儿子前废帝则将父亲的命令废除，后来梁武帝大举崇佛，佛教僧侣不拜皇帝的原则也大致确立，可称为佛教在中国的一次胜利。

“沙门不敬王之争”属于实务层面，南朝最根本的儒佛争端则发生在“神灭论”与“神不灭论”之间，属于理论层面。

东晋以来，儒家正统派思想家眼看在实务面无法遏止佛教，遂将战场提高到哲学层次，与佛教就基本理论进行论战，用“神灭”之说挑战佛教的“神不灭”理论。南朝刘宋时，此种理论的斗争渐趋尖锐，到南梁时范缜作《神灭论》，引起广泛讨论与注意，成为儒佛之争的高潮。

传统儒家在平时对鬼神持“不可知论”，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是其代表，“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显示出儒家重生轻死的精神。因为这种尚实的学风，造成传统儒家缺乏形而上的宇宙论与对精神现象方面的研究，更谈不上理论。佛教传来中国，恰好弥补上这个思想的空缺，遂在知识界得到重大发展，“神不灭论”则是佛教此方面的根本依据。

对南朝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而言，佛教的理论、组织与传播，已经使儒家在知识界与平民社会间都遭受到严重威胁，于是他们采取釜底抽薪之策，主张无鬼、无灵魂论，以瓦解佛教轮回说的基础。南朝刘宋时何承天反对轮回说，作《达性论》，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到南齐时竟陵王萧子良是虔诚的佛教徒，提倡佛教不遗余力，儒家思想家受到更大的刺激，不久就出现了范缜的《神灭论》。萧子良曾召集名士萧衍（后来的梁武帝）、沈约、范缜等来竟陵王府做客清谈，萧子良早知范缜的立场，就要求不信因果的范缜说明为什么人有富贵贫贱。范缜回答，世人无数，可比树上开的许多花，风来花飘落，有的掉在茵席上，有的掉到粪坑里。萧子良无法反驳，但很不满意范缜的回答。范缜即因此写出《神灭论》。

在《神灭论》中，作为一个南朝儒家思想家与南梁政府官员，范缜一方面主要在哲学理论上与佛教辩论，希望在哲理上压倒佛教，取得基本理论的胜利，另一方面也不忘以儒家传统的实务观点，就政治、经济、社会等实务面，对佛教提出质疑。《神灭论》采取正反双方互相辩论的方式行文，言辞尖锐而析理精细，双方反复深入提问、辩驳与解答，多至七八次，但双方始终保持严肃的态度，不动意气、不谩骂，不做人身攻击，堪称思想家辩论时的良好模范，可以比拟古希腊哲学家的对话录。南朝思想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补充知识

神灭论（选译）

南梁 范缜

或问予曰：“子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明。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问曰：“刀之于利，或如来说；形之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之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又异木之知哉？”

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答曰：“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

……

问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问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答曰：“手等亦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问曰：“知之与虑，为一为异？”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问曰：“若尔，应有二虑。虑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体惟一，神何得二？”

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复有是非之虑？”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

（译：有人问我：“你说神会消灭，怎么知道它会消灭的？”我回答：“神就是形，形就是神。所以形存在则神存在，形凋谢则神消失。”按，此文中“神”有“精神”“意识”“灵魂”等含义，“形”有“形体”“身体”等含义。

对方发问：“‘形’是没有知觉的东西的名称，‘神’是有知觉的灵明表现。有知觉与无知觉，两件事是有差异的；神与形，按道理不能容许成为一个。形和神合为一体，没听说过。”我回答：“形是神的实质，神则是形的功用，因此形是说它的实质，神是说它的功用，形与神，是不能够分开的。”

对方发问：“神不是实质，形不是功用，说二者不能够分开，道理在哪里？”我回答：“名字不一样而本体一样。”

对方发问：“名字既然不同，本体怎能一样？”我回答：“神对于实质形体，就

像刀刃的锋利与刀刃的关系；形对于精神功用，就像刀刃与它本身的锋利的关系。锋利这个名字不是就指刀刃，刀刃这个名字也不是指它就是锋利的。然而撇开锋利说刀刃没有意义，撇开刀刃说锋利也没有意义。没听过刀刃没有了而锋利还在的，所以怎能有形消失而神存在的事？”

对方发问：“刀刃与锋利的关系，或许像你刚才说的；形与神的关系，道理却不是如此。为什么这样说？木头的实体是没有知觉的，人的实体是有知觉的。人既然有像木头的实体，而还有异于木头的知觉，难道不是木头有一种东西，人有两种东西吗？”我回答：“这话奇怪呀！人如果有像木头的实体作为形，又有异于木头的知觉作为神，那就可以如同你刚才说的。现在人的实体是有知觉的，木头的实体是没有知觉的。人的实体不同于木头的实体，木头的实体不同于人的实体。哪能说人有像木头一样的实体而又有不同于木头的知觉呢？”

对方发问：“人的实体之所以和木头的实体不同，是因为有知觉罢了。人如果没有知觉，与木头有什么差异？”我回答：“人没有不具知觉的实体，就像木头没有具有知觉的形。”

……

对方发问：“形就是神的话，手这类的也是神吗？”我回答：“都是神的部分。”

对方发问：“如果都是神的部分，神既然能思虑，手这类器官也能思虑啦？”我回答：“手这类器官能有痛、痒的知觉，而没有是非的思虑。”

对方发问：“知觉与思虑，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我回答：“知觉就是思虑。粗浅的就是知觉，深刻的就是思虑。”

对方发问：“如果这样，应该有两种思虑。思虑既然有两种，神也有两种吗？”我回答：“人体只有一个，神怎能有两个？”

对方发问：“如果不能是两个，怎么能有痛痒的知觉，还有是非的思虑？”我回答：“像手、脚虽然不同，总合起来构成一个人。是非、痛痒虽然还有差异，也总合为一个神了。”）

此文一出，大为轰动，导致南梁在几年后发生一场神灭大论战。当时梁武帝笃信佛法，大力支持佛教，看到这篇文章后，起草一篇论文，以御笔名义发出，称为《敕答臣下神灭论》。这篇文章收录于《弘明集》，其中说：

沦蒙怠而争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干，岂知天地之长久，溟海之壮阔？孟轲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

（译：沦落到蒙昧怠惰去争一口气，抱持孤陋寡闻守着井边的木栏杆，怎么会知道天地的长久、沧海的壮阔？孟轲曾说，人所知道的，不如人所不知道的。真是这样啊！）

此文讽刺范缜是坐井观天，又引用早期儒家学者的话“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孟轲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然而这几句话不见于《孟子》一书，在《庄子·秋水篇》中倒是有“计人之所知，不若

其所不知”的句子。这里是梁武帝引用错误，臣下知道也不敢指出，还是南朝时《孟子》另有版本，就不得而知了。

不论如何，梁武帝以此驳斥神灭说，并将敕论致送臣下六十二人，众臣接读后纷纷复书，极口赞同武帝的见解，围攻范缜，梁武帝即以此作为这场争议的结论。消息一出，南梁的吴兴县令王琰也决定“以范缜之道还治范缜之身”，撰文斥责范缜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祖先灵魂尚在，讽刺他不孝，违背儒家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范缜则并不放弃他的神灭观点，继续答辩，还针对王琰反击说，王先生既然知道祖先灵魂所在，何不自杀追随祖先的灵魂？这场大辩论最后就在各说各话，谁也无法说服谁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梁武帝毕竟是有涵养的佛教徒皇帝，虽然范缜公然顶撞，但梁武帝并未杀掉他，也没有禁毁《神灭论》一文，当然这也可能有不愿招致儒家学者与官员普遍不满甚至反抗的考量。然而范缜仍然以“违经背亲”[2]的罪名被判流放广州，并不许再谈神灭，这可说是南朝一次轻微的宗教文字狱。虽然如此，但范缜以此为儒家开辟出对宗教问题的思辨之路，此后以维护儒家正统自命的儒者遇到灵魂等领域多持此说，儒家因此始终未曾宗教化，中国也始终没有国教出现。

另一方面，经过儒佛大论战后，双方都渐渐认识到，实际无法也没有必要全面压倒对方，于是儒家与佛教开始慢慢走上融合之路。《历代名画记》卷七记载，梁武帝时，大画家张僧繇专画寺庙的壁画，曾在江陵天王寺墙壁上画毗卢舍那佛，却在旁边配画仲尼十哲像。梁武帝闻讯后问张僧繇，为何佛寺中要画孔门圣贤？张僧繇回答，将来还得靠他。这正是儒佛融合开端的表征。从此以后，从印度传来的佛教逐渐中国化，发展成为汉传佛教；儒家也吸收佛教思想，建构自身的哲学体系，后来发展成为宋代的理学。

玄学

玄学是魏晋南朝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以研究、解释与阐扬《老子》《庄子》和《周易》三部书为中心。“玄”作为名字，来自《老子》第一章《众妙之门》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两句话。玄学崇尚老子、庄子，但加入位列儒家《五经》之一的《易经》，表示它是原属儒家学派的人对道家思想的新体认，也是春秋战国时代道家思想在魏晋南朝时出现的一种新解释与新表现方式。

玄学可称“玄远之学”，它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

对其内容进行形而上的探讨。对魏晋天下大乱时的儒家学者来说，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可行性与价值，已经被冷酷的现实完全否定，只得在思想层面从儒家跳脱出来，重新寻找精神的寄托与思考的园地——换句话说，“入世”的人生观变得不可行而且危险，“出世”的人生观乃取而代之。于是他们将注意力转到儒家以外的学说，当然他们不可能去钻研墨家或法家学说，因为那是更积极的“入世”，结果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家学说自然入选，玄学乃告成立。

玄学的探索以“天（自然）人关系”为中心命题，用形而上的方式思考，摆脱汉代经学偏重章句训诂的支离破碎与烦琐重复，也扬弃了深深渗透到汉代经学的阴阳家“天人感应”思想。玄学常常讨论一些看来具有对立性质的主题，如“有—无”“本—末”“体—用”“动—静”“名—实”“言—意”“梦—觉”“一—多”“本—迹”“自然—名教”等，这样才能使思想得到充分的活动，为玄学家所乐意进行。然而魏晋南朝的玄学家虽然“祖述老庄”，却并未弃儒家如敝屣，他们认为儒家与道家思想可以而且应该互相容纳调和，汉朝儒家排斥道家是一大错误。

从魏晋到南朝，许多皇帝、贵族、高官、名士都通达甚至热爱玄学，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包括梁武帝这样虔诚的佛教徒在内。南齐正式将玄学纳入国学，玄学自此更盛，并在南梁时达到高峰。南齐的国家学府教授《周易》，采用三国时青年玄学家王弼（226—249年）做的注解，成为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儒学以外唯一被国家认定为官学的学问。从王弼对《周易》的注解中，可以看出他对这部玄学经典的玄学式体认，例如他的乾卦注解说：

> 九，阳也。阳，刚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刚直，放远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
>
> （译：九是阳。阳是刚直的东西。如果全部采用刚直，放下柔和不管，则并非天下至高的真理，也不可能做到。）

这种体认显然适用于乱世，难怪到南朝会被官方采用，成为国学的课本。

南朝的玄学比起魏晋时代，已经有所不同。曹魏到西晋是玄学发展初期，充满破坏精神，当时的玄学家往往用《老子》《庄子》的理论检讨儒家、蔑视经学，提倡人应该让感情自然流露，追求个性的自由，不理会礼节仪式与僵直的道德教化，深具叛逆色彩。然而两百年以后，玄学到南朝时棱角几乎已经磨平，只剩下当年的外在特征，进入玄学成熟后的停滞期。南朝的玄学家仍然动不动就挥动麈尾，清谈玄理，但同时

行为端庄，尽可能不逾礼教，收敛起曹魏、西晋时那种放浪形骸、不受羁绊的激烈行为。由于他们大致只剩下对“竹林七贤”等当年玄学领军人物的追忆与感叹，也就没有留下什么传诸后世的深刻作品。

科技

南朝虽然人文风气浓厚，却并非每个读书人都在“袖手谈心性”，当时研究科学、创造技术者大有人在，科技也颇有成就，遍及天文、历法、数学、医学、药学、机械工程等领域。

天文、历法与数学

就天文与历法言，南朝著名的研究者先有宋何承天，后有祖冲之。何承天出身天文世家，母舅徐广观测天象四十余年，留有大量记录，他继承后自己又观测四十年，终于创制出新的历法。宋文帝下令采用他的新历法，称为“元嘉历”。元嘉历对于中国传统阴阳合历导致的闰月问题，采取以每十九年设置七个闰月的方法进行调整、研究。为寻求精确数据，何承天首创“调日法”用以计算。中国古代数学家所谓“日”，就是分数的分母，“调日法”则是数学计算中的一种“内插法”，用以有系统地寻找精确分数，来表示天文数据或数学常数。兹以中国传统上常说的“十一年四闰（月），十九年七闰”为例，用现代数学符号表示其基本概念与计算方法：

已知$a/b < c/d$，例如$4/11 < 7/19$，其中4/11称为“弱率”，7/19称为“强率”。

则$a/b <（a+c）/（b+d）< c/d$，例如$4+7=11$、$11+19=30$，故$4/11 < 11/30 < 7/19$。

再将内插所得的中间数11/30作为新强率，重新运算得$4/11 < 15/41 < 11/30$。

如此不断计算下去，得到的误差在计算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时，计算即告完成。

何承天运用此法制出较以前更精确的历法，得到宋文帝的承认与采用。这种历法在南朝从445年使用到510年，南梁政府才改用祖冲之提出的“大明历”取代。

南朝的科技基础颇为雄厚，呈现“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状态，从刘宋后期起，南朝科技第一大师祖冲之登场，创造出南朝灿烂的科技文化。

祖冲之出身建筑工程家族，科技素养深厚，得到宋孝武帝的重视。他擅长数学，曾挑战圆周率精确数字的难题。圆周与圆直径的比率，一

向是世界各地古代数学家追寻的目标。《周髀算经》推定圆周率为3，西汉刘歆推算到3.1547，东汉张衡推算成3.16，曹魏刘徽得到3.1416，南朝刘宋时何承天求得3.1428，可见魏晋南北朝时这项计算已详尽到小数点后四位，然而中国古代数学家在此领域的最高成就，则是南朝时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

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方法，依《隋书·律历志》记载，是假设圆直径1丈，将此长度等分为1亿“忽”，作为求圆周率的基本计算单位，依此求得“盈数”[3]为3.1415927与“朒数”[4]为3.1415926，从而确定圆周率的真值介于盈、朒两数之间。《隋书》并未说明祖冲之的计算方法，一般认为，祖冲之应是采取三国时刘徽（约225？—295？年）发明的“割圆术”，即用内接正多边形将圆分割，分割越细，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就和圆面积越接近。经现代数学家用此方法计算，发现要分割到正24576边形，才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祖冲之的成果是当时的世界纪录，直到15世纪，才被伊朗数学家阿尔·卡西（Jamshīd al-Kāshī）以十七位有效数字打破。

祖冲之曾注解汉代留下来的古书《九章算经》，还和儿子祖暅之一起研究，巧妙地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问题。他的著作《缀术》，后成为唐朝国家学校体系中“算学”（类似数学系）的数学课本之一，这部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可惜已经失传。

机械工程

祖冲之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对于齿轮的运转与作用有独到的领悟。古代传说黄帝大战蚩尤时造指南车以确定方向，故历代都有人想要重制。历史记载东汉张衡、曹魏马钧、十六国时后赵魏猛与解飞、后秦令狐生都曾制作成功。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到关中，掳获后秦皇帝姚兴拥有的指南车，但仅具外形而没有机械构造。刘宋末年萧道成当政，命祖冲之修复。祖冲之用铜做成差速齿轮，果然把指南车复原。当时有个北朝人索驭来到南方，说他也会造指南车，萧道成好奇心大起，下令二人各做一部，拿到乐游苑比赛，结果祖冲之的车准确无误，索驭 的车误差甚大，被萧道成一把火烧掉。《南史》说祖冲之还能造“千里船”，一天可以航行百余里，又把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复原，不用风力、水力、人力，只靠机械就能自行运动，如今这两种交通工具的原理与构造，就不得而知了。

为纪念祖冲之，现代科学界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

环形山”，并将第1888号小行星命名为“祖冲之小行星”，中国也有一条“祖冲之路”，位于上海市浦东区张江高科技园区。

医学与药学

从东晋到南朝，士大夫精于医学、药学者不少。东晋名医葛洪搜集医书五百余卷、验方数百个，作《肘后救卒方》三卷，以供请不起医生的贫苦基层社会大众随时照方抓药，自行治病。在此种基础上，南朝的医学与药学持续发展，还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南北朝杂记》记载刘宋时精通医理的徐文伯曾陪宋少帝旅行，路上碰到一位孕妇。少帝也懂诊断，就上去诊视孕妇，下结论说：“是女孩。”少帝又问徐文伯意见如何，徐文伯说：“是一男一女的双胞胎，男胎在左边，呈青黑色，比女胎小。”暴君兼乱君的少帝性情急躁，竟然下令剖开孕妇的肚子验证。存着恻隐之心的徐文伯说：“臣下请求对她针灸，下针后胎儿必然会掉落。”少帝同意，徐文伯用针刺足太阴脾经的穴道，又用“补”[5]的手法刺手阳明大肠经的穴道，两个胎儿应针而落，果然如他所说。此事为刘宋少帝的昏、暴、乱再加上一笔，伴君如伴虎的徐文伯，也只得尽可能以高明的针灸术，至少保住那位不幸孕妇的性命。

南朝医学与药学以陶弘景（456—536年）为其代表人物。他学问渊博，技术精妙，身兼道士、哲学家、文学家、医学家、药学家、道教茅山宗的开创者，还通晓历算、地理风水，也是围棋高手、琴艺家、书法家。他长期隐居山中，南朝皇帝、官员却经常自行或派使者找上门来，请教从修身养性到国家大事的诸多问题，使他赢得“山中宰相”的美誉。

陶弘景生于道教已经稳定立足且大量传播的南朝，10岁时得到葛洪所著的《神仙传》，读完后便深受感动，立定出世修行养生的念头。他手不释卷，努力研究，精通老庄哲学与儒家思想，故能将道家、儒家与佛教思想融合，提倡儒、释、道合流。在医药方面，他曾整理古代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添增魏晋以来名医所用的新药，写成《本草经集注》七卷。此书记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中药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7项为标准，确定分类，历代本草书籍都加以收载。《本草经集注》的另一项重要分类法是以病为纲，在每一病证下都列出可用的药物或治法，这种分类法也被后世本草学者普遍采用。陶弘景又将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增补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加上他另外的《陶氏效验方》《药总诀》等书，集南朝医药学

的大成。若用现代的比喻，可以说陶弘景大夫用一生建构了一个“陶氏医药养生网络”，服务世人，不拘贫富贵贱，而且不以赚钱为目的。

补充知识

《本草经集注》选录

此书现已残缺，仅剩原在敦煌地方手写的残本《序录》一卷。原卷长17米，正反两面均书写文字。1908年被日本人得到，携往日本。兹选录部分内容，其中粗体字为古书《神农本草经》原文，其余为陶弘景注。

《本草经》卷上 序药性之本源，诠病名之形诊，题记品录，详览施用之。

《本草经》卷中 玉石、草、木三品，合三百五十六种。

《本草经》卷下 虫兽、果、菜、米食三品，合一百九十五种，有名无实三条，合一百七十九种。合三百七十四种。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药合七百卅种，各别有目录，并朱、墨杂书并子注。大书分为七卷。

上药一百廿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

中药一百廿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

下药一百廿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倍其数，合七百卅名。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阴干、曝干，采治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

本说如此。又有分剂秤两，轻重多少，皆须甄别。若用得其宜，与病相会，入口必愈，身安寿延。若冷热乖衷，真假非类，分两违舛，汤丸失度，当瘥反剧，以至殆命。……

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注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瘤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

本说如此。案今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复应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褚澄治寡妇、尼僧，异乎妻外家，此是达其性怀之所致也。

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后食。病在四

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

本说如此。案其非但药性之多方，节适早晚，复须修理。今方家所云：先食、后食，盖此义也。……又有须酒服、饮服、温服、冷服、暖服。汤有疏、有数，煮汤有生、有熟，皆各有法，用者并应详宜之。

……

消渴：白石英 石膏 茯神 麦门冬 黄连 栝楼 知 母 枸杞根 小麦 芹竹叶 土瓜根 生葛根 李根 芦根 菰根 茅根 冬瓜 马乳 牛乳 羊乳

癫痫：龙齿角 牛黄 防葵 牡丹 白蔹 莨菪子 雷丸 铅丹 钩藤 僵蚕 蛇床 蛇蜕 蜣螂 蚱蝉 白马目 白狗血 豚卵 牛猪 犬齿

声音哑：菖蒲 钟乳 孔公孽 皂荚 苦竹叶 麻油

面皯疱：菟丝子 麝香 熊脂 萎蕤 本 木兰 栀 子 紫草 冬瓜子

发秃落：桑上寄生 秦椒 荆子 桑根白皮 桐叶 麻 子仁 枣根 松叶 雁肪 马鬐膏 猪脂膏 鸡肪

《隋书·经籍志》记载了许多魏晋南北朝时的医药书，内容包括脉理、病理、药性、针灸、穴道、制丸药、制散药、制膏药、制丹药、单方、验方、家传秘方等。当时医学已经有专业的分科，包括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兽医科等，也有专治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等的方剂，还有饮食法、养生术、房中术[6]、印度医方、人体生理构造图等，可见当时医学的发展。然而陶弘景也批评说：

谚言："世无良医，枉死者半。"拙医治病，不若不治……故仲景[7]

每云：如此死者，医杀之也。

可见在医药长足进步的南朝，照样有庸医滥竽充数。

南朝文化的历史定位

从东晋到南朝，长江流域不断开发，使南方经济日益发达，文化随之发展。从中国文化史的观点看，东晋、南朝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贡献，不可轻忽。

隋唐文化光辉灿烂，众所周知。这样高度发展的文化，必有其根本与来源。隋唐之前是南北朝，故南北朝文化，就是隋唐文化的基础。

南北朝时代南北双方基本隔绝，又都有内部特殊的环境与条件，其文化并不相同，到隋唐时才将二者融合。隋唐融合南北文化的过程中，因为北方作为长期分裂后的胜利方与对南方的征服者，所以隋唐的帝国规模、政府制度等方面，大致源出北方，然而在实质文化内容上，则是南朝文化的地位更加重要。

南朝长期抗拒北方南侵，保持住传统的汉族文化一百七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又丰富了其内容，发展出比秦汉更多样化、更有深度且更精致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南方的天地里持续酝酿发展，直到合并入北方。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南朝文化的重要部分在进入隋唐时期后，遇到比原来更广阔的天地与更适合发扬光大的土壤，遂在隋唐一脉相承自北朝的帝国领域与规模中，开放出真正美丽灿烂的文化花朵。难怪唐朝的文化人那样喜欢南朝。

可是，有光必有暗，有生必有死，有起必有落，南朝当然也不能永远存在。一百多年以来，南朝达成诸多成就，也累积下诸多问题，到梁武帝统治末期全面爆发，南朝受伤严重，再也无法恢复。此后南朝挣扎图存四十年，却仍不敌历史的洪流，王谢堂前的燕子，从589年起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悲剧性的最后阶段，将是我们探访的终章。

【注释】

[1] 包括《易经》《老子》与《庄子》。

[2] 违反儒家经典、背弃祖宗双亲。

[3] 大于真数的最接近近似值。

[4] 小于真数的最接近近似值。

[5] 针灸用语，进针“得气”后，持针进行不同角度左右旋转的一种针刺手法。一般来说，右手持针时，“补”法为顺时针方向稍用力地旋转。

[6] 男女交合术。

[7] 张仲景，东汉末年名医。

第六章 四二年间花落尽，南朝青史岂成灰——南朝终局

金陵遥望锦云堆，法会经声绕几回。
跨水惊闻飞虏骑，焚书忍见付残灰。
后庭歌韵飘香粉，前殿诗风醉酒杯。
一曲南朝王气尽，魂销烟雨锁楼台。

我们已经接近探访南朝的终点，南朝最后的时光，将在此展现。这段42年的历史让人目不暇给。南朝的终结开始于繁华、富裕、充满宗教气息的太平岁月，那是梁武帝崇奉佛教的高潮；霹雳一声，阴谋与反叛突然出现，接着就是惨烈的战争、大规模的屠杀与破坏，那是北齐叛将侯景带来的大风暴；尘埃终于落定后，南陈建立，在这个南朝最后一代的时期，南朝悲剧性的结局也从定调到了完成。

茹素留宝忏，舍身论功德：梁武崇佛

南朝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落在梁武帝萧衍在位（502—549年）的中期。这段时期如何实现繁荣，后来又如何衰落，导致盛极一时的南梁突然瓦解，南朝从此难逃消亡的历史命运？南朝最后的42年可称一幕悲剧，这悲剧来临的端倪，是在梁武帝的中后期开始显露的，所以当时景况究竟如何，就成为探访南朝历史必须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讨论梁武帝本人。

一般论及梁武帝，大都是以他崇信佛教、推广佛教为重点。梁武帝当然是一个最虔诚的佛教信徒，除自己信仰外，还努力推广佛教，不遗余力，不惜动用国家资源，这是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导致不少后代史家就此对他进行批评，认为他过分崇佛而败坏了国家政治，掏空了国家经济，使南梁由盛而衰，终至不可收拾。然而，作为一个在位48年之久的君主，在崇佛之外，梁武帝显然有其他各方面的考量与作为，这些共同构成他的统治，例如：

继承人如何决定？有何问题？尤其是在位如此之久的皇帝——情况类似的案例有汉武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清圣祖康熙皇帝等，大家耳熟能详，那梁武帝呢？

身处大分裂时代，如何面对敌方北朝政权？尤其是当时恰逢北朝政权发生分裂与内哄，这自然是南北长久对立时期难得的机会，梁武帝如何面对？

凡此种种，都有待充分说明与分析，方可得到较为深入的解释与较为接近真实的答案。

及身成败：梁武帝萧衍

成功

历史上集努力奋斗、成功建国、繁荣盛世、自毁家邦、身死国灭于一身的君主十分罕见，梁武帝萧衍是其中代表。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502—549年在位）是侨姓世族兰陵萧

氏的子弟，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在南齐做官。他从小努力求学，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长大后多才多艺，学识广博，可称南朝世族子弟翘楚。史书称他：“六艺备娴，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南齐末年，东昏侯暴虐无道，各地皆起兵造反，东昏侯派数路大军平乱。平叛诸将中以萧衍的兄长，时任雍州[1]刺史的萧懿最有功绩。萧懿功高震主，被东昏侯毒杀，萧衍承继兄长，接任雍州刺史，寻找机会推翻东昏侯。501年，萧衍举兵，顺利攻抵首都建康，并在江陵改立一个傀儡皇帝。不久东昏侯在政变中被杀，502年萧衍受齐“禅让”登基，建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在位初期政绩卓著。他勤于政务，重视官吏的操守，经常亲自召见、选拔任用地方官，耳提面命他们必须操守清廉。他又广纳谏言，下令在宫门前设立两个函[2]，一称“谤木函”，一称“肺石函”。肺石函和谤木函分别供官员和平民百姓投书批评或建议。南梁政府据此推动各种改革，南齐时的弊政皆获得改正。梁武帝也以节俭知名。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衣服洗过再穿，御膳以蔬菜和豆类为主，每天只吃一餐，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他的统治使南梁政治风气改善，行政效率提高，国力大幅上升。

对于文化建设，梁武帝也十分注意。他即位后宣扬儒家思想，常与大臣们讨论经学，又参与乐府诗的创作及编修，搜集各地民谣。东晋以来，南方文化的发展在南梁时达到高峰，荣获唐代《南史》作者李延寿的评价：“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问题

作为一个历经阴谋与战争才夺得政权的皇帝，梁武帝性格的缺点仍是猜疑心重，忌惮功臣。他虽然没有杀戮功臣，却对他们尊而不亲，吝于分享权力，对皇家子弟却格外照顾，将政治、军事大权交给皇家子弟，于是南梁的盛衰，就变得紧紧与萧氏皇族的表现绑在一起。

然而权力造成腐败，南梁皇族很快就充斥着违法犯纪的成员，梁武帝对此却徇私护短，他的六弟萧宏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萧宏北伐时临阵脱逃、丧师辱国已如前述，做兄长的梁武帝不加惩罚，反而加封官职，萧宏因此更加肆无忌惮，大肆贪污外，竟与亲侄女，也就是萧衍的大女儿通奸，两人还铤而走险，派人刺杀萧衍，想取而代之。事情败露，刺客被捕处死，公主自尽，梁武帝居然没有惩办萧宏。

梁武帝原立长子萧统（501—531年，谥“昭明”）为太子。萧统家学渊源，文采高妙，他搜集历代著名文章，编纂出中国最早的一部文章总集，命名《文选》，许多南梁以前的文学作品赖以保存，故其成为中国古代的著名典籍，后人称为《昭明文选》。萧统也精通佛学，创造《金刚经》的“三十二分则”编辑法，将全篇经文分为三十二段，各加入副标题。

这样一位皇太子却英年早逝，梁武帝受到的打击甚大，不得已改立萧纲为太子。萧纲也以诗赋著称，他的诗已如前述，果然诗如其人，但其他方面并不出色，无法与昭明太子相比。这可能是梁武帝晚年以高龄仍然直接掌控各项政务的原因，也造成南梁与他自己最后的悲剧。

崇佛

520年，梁武帝57岁，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事在他身上重现，就在这一年他思想上从儒家转向佛家，变成虔诚的佛教徒。后来又经过上述萧氏家族的一连串不幸事件，梁武帝可能遭受打击过重，终于全面倒向佛教，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崇佛皇帝。这一年也被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展的分水岭，此后南梁在皇帝带领下，成为极度尊崇佛教的国家。

527年，萧衍崇佛之心益加坚定。他亲自到同泰寺[3]舍身，三天后返回，随即大赦天下，改年号，代表南梁从此进入新时代。此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食，还规定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三牲，要用蔬菜代替。这个命令下达后，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人期期以为不可，后来梁武帝略做让步，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如今民间仍有用面团烤成五花肉、鸡、鱼形状的祭品出售，应为其流风余韵，而中国佛教与素食的关系，在梁武帝时也告确定。529年，梁武帝第二次至同泰寺舍身，并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还亲自讲解《涅槃经》，后由群臣捐钱一亿，才赎回“皇帝菩萨”。546年，梁武帝第三度舍身，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547年第四次舍身，后以一亿钱赎回。此时梁武帝已决定接纳东魏大将侯景投降，大灾祸不久将随之到来。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有“梁武尊者”之称，许多佛教典故与他有关，下面介绍数则。

补充知识

与梁武帝有关的佛教名词

舍身

本指佛教徒牺牲自己的肉体，以显示佛法大慈大悲的精神，例如为报恩而烧臂烧身、为布施而割肉弃身等。后推广为佛教徒为宣扬佛法，以自身布施寺院，为佛教、寺院、僧侣辛苦劳作，也称为“舍身”。

《梁皇宝忏》

忏，梵语“忏摩”之简称，意为悔过。佛教僧侣为人悔过所修的法事称为“忏法”，忏法中诵读的经文也称为“忏”。

《梁皇宝忏》是梁武帝为超度其夫人郗氏所作的忏法。《南史》与《释氏稽古略》都记载，郗夫人性格残酷妒忌，去世后化为龙或巨蟒，在南梁后宫出入，有时会现形，光彩闪烁，又托梦梁武帝，后宫不安。于是梁武帝制作《慈悲道场忏法》十卷，延请高僧举行忏礼，郗夫人遂转化为天人，在空中向梁武帝拜谢而去。此忏法后来通行于世，称为《梁皇宝忏》。

无遮法会

“无遮”指“无有遮障”，就是不分贵贱、宗教信仰、僧俗、男女、十方法界、六道群灵，凡有情众生皆一律平等。“无遮法会”即为一切众生举办的法会，希望借由法会的因缘，达到冤亲平等，皆获普渡，冥世与阳间两得其利。

试论“梁武崇佛”

梁武帝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叛变，首都建康被攻破，梁武帝在忧愤饥饿中死去，梁朝不久也就迅速瓦解。这是南朝历史上的第一大悲剧。对这场悲剧的背景与成因，许多史家认为与梁武帝过分崇信佛教有关。对于此种说法，吾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

梁武帝花费极大的时间、精力与金钱崇佛，大举建佛寺，造佛像，大幅增加剃度僧侣的名额，举行许多法会，等等，史书记载明确，都是历史事实。这种作为必然导致南梁的国家开支大增，免税、免役的出家人与寺庙日渐增多，税收与兵源相对日渐减少，政府经费因此不足，行政效率减退，更会造成国防力量虚弱等潜在的危机。然而历史上其他在位长久的皇帝晚年，也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出现类似现象，例如汉武帝、唐玄宗、清高宗乾隆皇帝等，唐玄宗甚至还招来安史之乱。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清三朝却并未因此毁灭，都还各自延续甚久。所以梁武帝崇佛，应该只会侵蚀南梁国家根基，使国家虚弱化，可能引起动乱，却还不至于仅因如此就迅速全面崩溃。既然南梁崩溃得如此迅速且全面，那么，梁武帝的后期是否还有崇佛以外的问题？

答案可能在于，崇佛只是梁武帝生活与工作的面向之一，并非全

部。其实梁武帝在崇佛的同时，并未放弃皇帝的身份与工作，照常上朝听政，亲自处理外交与军事问题。这种情况说得好听是始终如一，尽忠职守；说得难听则是老而好事，刚愎自用，抓权不放，野心不断，自不量力。试想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又要崇佛，又要上朝主持国政，还要汲汲于北伐，更得摆平家族与朝廷内部的暗潮与争斗。事事要顾、面面俱到之下，老年人自身的时间与精神不能兼顾，无从详细研究状况，思考问题，最后做出轻率的判断与错误的决策，终于造成国家与自身的大灾难。

侯景之乱爆发后，南梁分布各地、握有兵权的大员们却推托观望，几乎没有人真正全力“勤王”，反而彼此猜忌争斗，离心离德，找不出像唐朝安史之乱时的郭子仪、张巡这样的人。这种悲剧的原因，应该在于梁武帝“萧家至上、萧家唯一”的用人政策。梁武帝猜忌异姓大臣，将国家大政与地方军权都交给萧氏家族，但大乱一来，这些皇家子弟真正考虑的重点，就变成眼看八十几岁的老皇帝气数已尽，即将空出来的政权属于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名义上宣称出兵平乱，其实都是虚应故事，趁机把兵权抓牢，准备夺取大位。这样当然导致侯景之乱短期无法平定，南梁皇族间的心病也就持续发作，直到拖垮这个国家才会停止。

梁武帝的四次舍身，说明他对佛教极为虔诚，由此不难引出另一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研究课题：他既然如此倾心于佛教，为何不干脆宣布退位，专心向佛，甚至出家为僧？实际上立国于云南，与宋朝几乎同时的大理国（937—1253年），曾有许多位君主走上这条路，包括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男主角之一的段誉（1108—1147年在位），日本古代也有皇帝退位出家的事例。

然而梁武帝毕竟没有出家为僧，原因何在？这问题的答案，可从思想与实务两个层面来回答。思想层面的原因可能在于梁武帝的博学。他出身儒家学者，有儒学著述，又通晓佛教教义，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作品，对道教学说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为”和佛教的“因果报应”糅合在一起创立的“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或许因为如此，梁武帝的思想中，儒家的治国平天下观念一直有其地位，遂使他无法真正看破红尘，退位出家。在实际政治层面，则可能因昭明太子过世太早，第二任太子无法使梁武帝放心，故虽然年老体衰，又被崇佛占去不少时间与精力，他仍不愿也不敢在政治上放手，遂造成各方面不能兼顾，终于被侯景趁虚而入，身死国灭。

国运急转直下，文化兵火凋零：侯景风暴

决定南朝国运的关键

侯景之乱（548—552年）是南朝后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可谓一阵强烈风暴席卷南朝，所到之处，花果飘零，万物变色。南朝的国运，在侯景之乱中急转直下；南方世族的家运，也在侯景之乱中急转直下。侯景之乱后，南朝实际上已无法与北方抗衡，南朝最后的命运，可说在侯景之乱中就已决定。

当时的天下情势是：南方由梁武帝统治，但已盛极而衰。原来统一北方的北魏于534年分裂，黄河流域东部成为东魏（534—550年），西部成为西魏（535—557年），二者后来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篡。北方由统一变成两个彼此敌对的政权，它们和南朝又是长久的对手，国际局势顿时复杂，各国之间与各国内部的矛盾日益增长，随时可能出现动乱。果然，牵动南北大势的侯景之乱就在北魏分裂14年后发生。

侯景是羯族后裔，东魏大将，镇守南方边疆。东魏权臣高欢死后，继任者对侯景不放心，想要削夺他的兵权，侯景遂反叛北朝。侯景反叛后，自知并非东魏中央大军敌手，乃向南梁提出投降请求。消息传来，南梁的朝臣怕北朝以接纳侯景为借口南侵，大多认为应不予理会，但年老却仍然好大喜功的梁武帝宣称“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决定接纳，派人联系，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

东魏闻讯，当然派出大军讨伐侯景。梁武帝以侄子萧渊明为主将，率军救援侯景，结果被东魏大败于寒山堰，几乎全军覆没，萧渊明被俘。东魏乘胜进击侯景，侯景迎战大败，只剩下八百多人南逃，骗取属于南梁的寿阳城暂驻。但东魏因对抗西魏的军情更为紧急，不愿两面作战，战胜后反而与南梁讲和，侯景大起恐慌，只怕被南梁当作和谈的礼物送给东魏。于是侯景使出“投石问路”之计，伪造东魏皇帝的信函致送梁武帝，建议以萧渊明换侯景。

梁武帝被爱惜侄子之心蒙蔽，不查其诈，轻率复信“贞阳（即萧渊明）旦至，侯景夕返”，同意双方交换。侯景略施小计就摸清了梁武帝的心思，知道不得不反，遂暗中勾结梁武帝的另一个侄子萧正德做内应，

准备叛梁。

548年秋，侯景发动叛乱，领兵南下，直抵长江。梁武帝完全没有防范，情报也完全不灵通，仓促之间竟命萧正德指挥保卫京师。萧正德求之不得，趁此机会派船接应侯景叛军过江，开建康城门迎接，叛军遂轻易占领外城，包围台城（宫城）。此时侯景兵力只有八千人，台城中则有十余万人口，两万多军队，南梁还有各地的勤王军号称三十余万，但彼此不相统属，又大多顿兵不前，保持观望，领兵的南梁宗室诸王无非想保存实力以夺取皇位，甚至不排除有些人还可能幸灾乐祸，只等老皇帝一死，就自行称帝。梁武帝的命运，便在这种“观望时机”“借刀杀人”的微妙暗黑心态中注定。

台城的攻防战漫长而惨烈，双方伤亡惨重，尸体无法掩埋，引起传染病的大流行，病死了更多人。拖到549年三月，侯景终于攻陷台城。城破时，城内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为攫取资源，同时大规模抢掠江南各地，手段残酷，杀人如麻，尤其针对家大业大的世族下手，几个月之间就使富庶二百多年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炊烟断绝，人迹罕见，白骨到处堆积，像一座座小山。

侯景占据建康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不久梁武帝忧愤饥饿而死，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即南梁简文帝，不久又废杀萧纲，改立萧栋。551年，侯景终于废萧栋称帝，国号汉。次年，起自基层的南梁将领王僧辩、陈霸先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叛乱才告平定。

南梁丧失西部地区以致灭亡

侯景反叛时，其势力仅到达江南，从此以西的荆州到益州[4]一带依旧由南梁掌控，只是各地方首长心怀鬼胎，互相牵制，对长江下游的大乱坐视不理，反而是广州刺史部下的番禺[5]太守陈霸先与湘东王萧绎派遣的大将王僧辩联合攻灭侯景。552年，湘东王萧绎随即于江陵即位，是为梁元帝。此时据守益州的武陵王萧纪也宣布称帝，并攻打江陵。梁元帝向西魏求救，西魏派兵攻灭萧纪，从此占领益州要地不走。554年，昭明太子之子萧詧引西魏军攻陷江陵，梁元帝投降前将南朝政府与他私人的藏书全部焚毁，西魏立萧詧为傀儡皇帝，继续用梁的国号，但只给他江陵附近一隅之地，史称西梁或后梁。

梁元帝被杀后，陈霸先与王僧辩立萧方智为帝，即梁敬帝。此时东

魏已遭北齐篡位灭亡，北齐起兵，带着以前战败被俘的萧渊明南下攻梁，梁军被击败。王僧辩屈服，迎立萧渊明为梁帝。陈霸先反对，杀王僧辩。此后陈霸先继续奋战，击溃北齐南侵军及王僧辩余党，最后自己于557年篡位，建立南陈，南梁灭亡，距离侯景之乱不过9年。

南朝的“不归点”：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使南朝世族遭到沉重打击，南方社会受到极大破坏，在六朝古都建康居住数百年的世家大族损失尤其惨重。叛变之前，侯景曾向梁武帝表示，希望求婚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两家，梁武帝知道王、谢门第太高，他也无法答应，只得回复：

> 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
> （译：王、谢门第太高，不是适合你的配偶，可以在朱氏、张氏家族以下寻求。）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等于婉转拒绝。其实既然皇帝认为王、谢家族的事自己都无法管，那么侨姓世族紧随在后的就是袁、萧两家，梁武帝萧衍身为当时兰陵萧氏的族长，只要下个命令，不难派一个萧氏宗族的女儿出嫁，还不必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唐太宗以皇族女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国王就是这种案例。所以对侯景来说，这种答复只是推托敷衍，根本是对他十分轻视，因此深刻记恨，说：

> 会将吴儿女以配奴！
>
> （译：应当把吴小子的女儿配给奴隶！）

果然攻入建康后，侯景立即对南方世族展开大屠杀，王、谢两家尤其凄惨，几乎被灭族。此时侯景与他的部下从自卑变成自大，南梁以前对他们的轻视转化成他们对南朝与南朝人的仇恨，在报复心理下，恨不得将从前轻视他们的一切砸烂抹平，江南各地遂遭到空前浩劫。建康原有二十八万户居民，动乱后幸存者百无一二，几乎完全成为废墟，江南经过侯景的烧杀抢掠，普遍呈现残破荒凉的景象。大乱中南朝的另一个重心荆州，也被西魏乘机攻占，荆州失陷后，位于长江上游的巴、蜀与汉中残余部分和南梁中央失去联系，孤悬在外，难逃被西魏占领的命运。江南、荆州与巴蜀是东晋以来南方的三大经济、文化中心，此时两个失陷，一个遭严重破坏，南朝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在这场战乱中，东魏取得淮南，直抵广陵[6]，西魏取得四川、汉水流域，直抵湖南、贵州，北朝势力大增，南朝版图大为缩小，不但税收

与兵源大减，防御纵深被压缩，也失去三大地区彼此互相支援、照顾的机会，此后江南地区被迫单独对抗北方，北强南弱的局面更加严重。

与南朝相比，汉、唐、清都是大型帝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国家精华地区不止一处，可以彼此支援。即使情况恶劣到像唐朝的安史之乱，也只波及一部分国土，朝廷还有其他地区的资源可用，终能平定叛乱，延续王朝生命。南梁则不然，国土本已仅限于南方，最精华的江南、荆州二处，也都是驻有重兵的国防要地。侯景之乱摧毁了江南地区，又导致荆州地区丧失于北朝之手，南朝元气大失，又无法从他处获得足够补充，江南更失去荆州在军事上掩护上游、牵制敌人与支援首都的协助，从此处境艰困而别无解决方法，难免沦亡。

侯景之乱对南朝的意义，类似航空名词“不归点”（point of no return），指飞机航线中的某一点，一旦飞越此点，机上携带的燃料就无法使它返回原出发地，若不能及时降落或获得补充，只有坠毁一途。侯景之乱给南朝带来的物资大破坏、人口大损失与领土大缩减，使南朝从此越过不归点，正像一架油料将尽又无法补充的飞机，只能怀着对南梁盛世的回忆，蹒跚坠落。

在大清盛世早过，就连“同治中兴”都已远去的甲午战争前夕，丘逢甲在台湾读《南史》，对侯景之乱的感触是：

读南史杂咏 十首之七

清 丘逢甲

三舍皇身赎已回，仓皇下殿避星灾。
安知白马青丝客，专向金瓯缺处来。[7]

读南史杂咏 十首之八

清 丘逢甲

百官戎服听元虚，又拨秦灰到石渠。
父误涅槃儿道德，反将遗劫怨图书。[8]

中国第二次三国鼎立（534—589年）

侯景之乱更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改变了历史应有的走向。若从国际战略的宏观角度思考，不难看出侯景之乱实为影响南北朝结局的关键

因素，这又必须先论南北朝后期中国的第二次三国时代。

534年北魏分裂，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三国鼎立的格局。这次三国时期长达55年，仅略少于第一次三国时期的61年[9]，而且其发展演变奇特，不合常理。然而中国第二次三国时期受到的关注极为稀少，与那大名鼎鼎的第一次三国鼎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实为中国历史叙述与研究的怪现象，也是一大遗憾。对于如此特殊的历史历程，我们理应深入探讨。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三国时期的结局是曹魏先灭蜀汉，晋篡曹魏后再灭东吴，统一天下。这甚为合理，因为不论从经济规模、人口数目、武装力量等方面看，吴、蜀两国加起来还不到魏的一半，而“强凌弱、众暴寡”本来就是国际政治的常态。然而南北朝后期的第二次三国鼎立，却不依照常理发展，结果成为原来最弱小的西魏转化成北周，消灭原来强大的北齐，不久隋篡北周，再消灭南陈，统一天下。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何在？

本来北魏分裂，北方东西对抗，势不两立，对南朝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何况南梁相对实力不弱，形势颇佳，应有能力掌握。当时南梁拥有从四川到东海的长江流域，北方的大部分属于东魏，包括富庶的黄河下游与险要的山西地区，西魏只有关中与西北边区的陕北、宁夏一带。如果将当时的形势与第一次三国时代比较，则北齐类似曹魏，北周类似蜀汉，而南梁则比当年的东吴势力更大——南梁拥有四川，东吴没有。就国际政略论，南梁理应利用这种时机，在分裂的北方二国之间纵横自如，谋求本国最大的利益，然而梁武帝在北魏分裂到侯景反叛之间（534—548年），几乎只关注两件事：崇佛与联东魏反西魏。

梁武帝这时投注大量时间、精力与财富崇佛，《南史·梁武帝本纪下》在这期间不断出现这样的记载：

> 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并设无碍会。（535年，梁大同元年）
>
> 帝幸同泰寺，设平等法会。……幸同泰寺，设四部无碍法会。……幸同泰寺，设无碍大会。（536年，梁大同二年）
>
> ……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设无碍法会。……幸阿育王寺，设无碍法喜食，大赦。（537年，梁大同三年）
>
> ……于皇基寺设法会。（544年，梁大同十年）
>
> ……幸阿育王寺，设无碍法喜食……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皇太子以下奉赎，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546年，梁

中大同元年）

……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服法衣，行清净大舍，名曰“羯磨”。……帝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慧经》，舍身。……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547年，梁太清元年）

梁武帝很快又决定与东魏通和，在外交上采取亲近东魏、敌视西魏的政策。536年南梁就与东魏确立和好，也曾出兵攻西魏。这是个注定失败的外交与军事作为，因为西魏—北周这个政治系统，在南北朝后期是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表现为胡、汉融合，团结一致，朝气蓬勃；东魏皇帝则只是傀儡，完全被建立北齐的高氏家族控制，而北齐则昏君、乱君、暴君辈出，充满暮气沉沉的腐朽之象。北方分裂后，西半部一直在努力发展，后来居上，渐渐超越东半部。梁武帝显然无法看清两个北方政权的本质，也忘记“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贸然决定与起初比较强大的东魏合作，结果随着东魏—北齐的江河日下，原来的规划成为泡影，还使西魏—北周有充分的理由与借口南侵，最后处理侯景问题失误，终于轻率越过“不归点”，使南朝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间形势的消长属于北朝历史，将在《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北朝的遗产》中另行叙述，但西魏—北周兴起的实务面原因，在于它的领土一直不断扩大，实力才能不断增加。西魏—北周增加的领土，又几乎都夺取自南梁，这就与侯景之乱有关。侯景之乱一起，南梁陷入分崩离析，萧氏皇族各怀鬼胎，表面摆出姿态讨伐侯景，却铆足全力争取下一任南梁皇帝的位置，内斗不已。历史的规律是，内斗激烈时，有人会引进外来势力助阵，西周末年申侯引进犬戎攻打周幽王时早已如此，南梁的皇室子弟果然也照办，西魏遂有机可乘，应邀助战，结果当然是得胜后鸠占鹊巢，将荆州、巴蜀纳入版图，还俘虏了大批南梁人口与颜之推这样的才智之士充实本国，从此成为地广人众的大国，三国原有关系受到根本性的破坏，进入新阶段。如果将这段历史与战国时秦国夺取四川、湖北后，终于有能力消灭南方霸主楚国比对，二者相似之处也甚为惊人。

侯景之乱后，南梁的残余力量退缩到荆州一隅，南朝西部其他地盘都被西魏吞噬，南陈则在长江下游建立，不久北齐篡东魏，北周篡西魏，于是形成南北朝末期四个政权并立的状态，也是第二次三国时期的后半段：

北齐（550—577年）：占有黄河流域东部，国力仍最强。

北周（557—581年）：占有黄河流域西部关中地区及前身西魏取得

的荆州、巴蜀，足以与北齐抗衡。

南陈（557—589年）：占有长江下游。

后梁（554—587年）：仅有江陵城附近之地，为西魏、北周的附庸，不具影响力。

在北方，577年北周灭北齐，代表北朝政权由分裂而再度统一；汉人杨坚建立的隋朝随即在581年篡北周建国，代表北方的胡汉民族经过将近三百年的冲突斗争后，至此终于融合，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再度出任北方的皇帝，一个新时代正式来临。南陈这个悲剧性王朝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与中国历史大势。

花开花落不长久，景阳宫井又何人：后庭花里送南朝

南朝尾声：南陈

南陈（557—589年）由陈霸先建立，是南朝第四个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王朝。其独特之处有：

1.陈朝是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的灭亡就是南朝的终点，南方终于并入北方。

2.陈朝是南朝唯一由南方本地人建立的政权。

3.陈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皇帝姓氏为国号的政权。

4.陈朝建国于侯景之乱的大破坏后，先天环境最差。

5.陈朝在南朝中疆域最小，失去荆州、四川，仅保有长江下游。

陈朝建国于南朝侯景之乱的大破坏、大失地之后，领土有限，先天不足，所以南陈的历史充满着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奋斗。南陈在北方分裂局势中的权衡轻重与在敌强我弱之下绝望的狂欢，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带着悲剧的色彩。这个悲剧性的国家在北方分裂时，尚可在北齐、北周的对立中存活，等到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后，南北双方实力悬殊的现实立即暴露，南朝的终局也在我们眼前清楚展开。

南陈并非没有努力过。创业君主陈霸先一生征战，从偏远地区广州兴起，极为不易。他的继承人陈文帝励精图治，国家才告稳定，江南也才能逐渐得到部分恢复；其后陈宣帝在北周、北齐的战争中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与北周结盟，举兵北伐，战败北齐，将国境线推进到淮河南岸，成为陈朝的鼎盛时期。可是本为弱小一方，火中取栗的冒险毕竟可一而不可再，不久北周灭北齐，当南陈想乘北齐灭亡的空隙继续推进时，已经统一北方而且锐气正盛的北周岂能允许？果然南陈轻易被北周击败，淮南再度丧失，注定壮志难酬的陈宣帝不久死去，留下一个陈后主，面对日薄西山的南朝终局。

南陈虽居于南朝末叶，但皇室与世族仍然赞助宗教活动与艺术创作不辍，当时的绘画、书法、音乐、诗作、佛法都极为兴盛，达到南朝的

高峰。南陈保存的南朝文化，成为隋唐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即使是征服者隋炀帝，一见之下都被深深吸引，甚至无法自拔，开凿大运河即与此有关。南梁时菩提达摩与梁武帝的故事世所周知，然而就在侯景之乱前夕，另一位印度高僧真谛（499—569年）也来到南朝，辗转南方各地，并以二十年的时间，译出佛教的经、论、纪传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尤以《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的翻译影响最大，开启南朝佛教的“摄论学派”，也是南陈时佛教发达、佛教哲学发扬光大的代表。

后庭花里送南朝

从唐朝开始，南朝的末路成为诗人墨客吟咏的题材，如：

泊秦淮

唐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陈后宫

唐 李商隐

茂苑城如画，阊门瓦欲流。
还依水光殿，更起月华楼。
侵夜鸾开镜，迎冬雉献裘。
从臣皆半醉，天子正无愁。[10]

玉树后庭花

宋 曾极

结绮临春成草莽，繁华都入暮烟中。
后庭玉树迎秋色，犹带张妃脸上红。

读南史杂咏 十首之九

清 丘逢甲

琼花璧月唱群僚，天堑长江王气消。
谁信官奴桃叶曲，早留遗谶送南朝。[11]

这些著名的诗词都导源于：

玉树后庭花

陈 后主陈叔宝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一般认为，这首诗是南朝宫体诗的压卷之作，达到宫体诗的最高水准。此诗一出，注定成为南朝的亡国之音，却也是后人创作灵感的来源。

“后庭花”本是花名，因江南多栽培于庭院而得名。后庭花有红、白两色，白花盛开时满树如玉，故又有“玉树后庭花”之称。南朝乐府民歌中有《后庭花》曲，又名《玉树后庭花》，是乐府民歌中的一种情歌。陈后主陈叔宝为此曲填上新词，在宫中演唱，成为当时陈朝的宫词。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诗以宫廷的景色起头，转过一圈后，带到主角的艳丽嫔妃身上停住，电影拍摄手法也不过如此。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这一句描写美艳嫔妃们应召见驾时的情态，如何仪态万千、风情万种。显然无论是应召时的“乍不进”欲拒，还是接驾时的“笑相迎”还迎，都讨得后主的无比欢欣。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第三句与起首呼应，以美人比花，又以花拟美人，描绘宫中美人的倾国倾城之貌，也成为陈后主流连后宫、贪恋美人的最好注脚。“妖姬”二字更说明陈后主的后宫是绝对的“重色不重德”。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末句笔锋一转，作者陈后主蓦然点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哀愁意味，时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却充满时不我与、及时行乐的无奈与颓废美感。

在历史的长河中，陈后主是个不及格的皇帝，却是一个具有艺术修养的诗人。陈后主只图享乐，不问政事，使国家衰败、人民困苦，已经放弃“善”；面对新兴隋朝的雷霆万钧之势，不理不睬，继续一味享乐，甚至也忽略了“真”；于是，在《玉树后庭花》里，仅余下畸形的“美”得到绝顶的展现。

在南朝即将落幕之际，《玉树后庭花》绽放出六朝岁月的最后一抹余晖，美丽又绝望地没入隋唐天际。

对南朝的探访至此结束，本书愿以唐代诗人许浑的一首诗作为南朝美丽与哀愁的终曲：

金陵怀古

唐 许浑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

我们北朝再见。

【注释】

[1] 今湖北襄阳一带。

[2] 盒子。

[3] 已毁，原址在今南京鸡鸣寺。

[4] 今四川。

[5] 今广东广州。

[6] 今江苏扬州。

[7] “白马青丝客”指侯景。

[8] 元虚，即玄虚。石渠，西汉未央宫的藏书阁。

[9] 从220年曹丕篡汉到280年西晋灭东吴。

[10] 茂苑、阊门都在苏州，借用以代指陈后主宫殿庭园的华丽。无愁，北齐后主高纬昏庸荒淫，曾作《无愁曲》自弹自唱，称为“无愁天子”。此处用北齐后主代指陈后主。

[11] 官奴，王献之小名。桃叶曲，原名《桃叶歌》，王献之为爱妾桃叶而作，歌词：“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后记

1973年初夏，我是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二年级的学生，我很彷徨，所以去见林瑞翰老师、逯耀东老师。

在史书里我读到，东晋偏安江南时，曾几次尝试北伐，但皆未成功。我也读到当时从北方逃到南方的家族称为“侨姓”，南方本地家族称为“吴姓”；控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是世家大族，包括侨姓与吴姓，较低阶层的人被称为“寒门”“寒素”或“小姓”；政府官员里还有文官、武将之分。既然以上各种人依晋朝政府流亡到南方的时间，都可以区分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等，那么，不同身份与世代的东晋人士，对北伐的看法与做法，究竟有什么差别？例如第二代以后的侨姓世族还会坚持北伐吗？身为吴姓寒门的武将也会自愿到北方作战吗？

我知道本来想命名为《东晋的北伐之议》的这篇毕业论文可能惹来麻烦，却实在喜爱这个构想，舍不得放弃，只得抱着困惑，去请教那时曾在台大历史系开过魏晋南北朝史课程的两位老师：林瑞翰先生与逯耀东先生。

林老师首先答应指导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但他随即指出，我的程度太差，基本功不足，要我把整部《晋书》与相关年代的《资治通鉴》点读过，才能谈到研究。接着他又表示，为使论文的内容充实，写作顺利，并避免可能遭遇到的政治风险，应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晋朝的世族政治，从西晋写到东晋，还要带到一部分南朝。治学严谨、为人方正、不苟言笑的林老师那天的话有点严厉。但我告辞出来时如释重负，因为我知道，林老师已经以他的学术与人生经验，为我的构想指点出一条实际可行之路。

第二天我去找逯老师。听完我的叙述后，逯老师深深点头，他告诉我：“林老师训你训得对，你要做完基本功。这个题目可以写，可是要很小心。”接着逯老师起身，打开一座书柜，搬出一排书，从后面拿出两本书，郑重递给我，对我说：“这是大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晋朝的书，我从

香港回来的时候，藏在衬衫底下带进来的。你要好好看，虽然不见得同意，也要注意他们的看法。”那是我第一次看简体字的书，果然被逯老师料中，书中的看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却使我眼界大开，发现也可以用这种角度看历史，了解到研究任何问题，必须先认识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

经过林、逯两位老师共同指导，我的论文终于写成，也顺利毕业。我的论文题目叫作《两晋世族政治发展演变》，是个充满学术气氛、绝不起眼的名字，果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服完兵役后我投入新闻界工作，因缘际会担任过多种职务，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后，才体会到当年的肤浅与莽撞，也才更深深感念我的两位指导老师。第一天林老师严格要求我，使我了解原始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绝对重要的地位，还以四两拨千斤的高明远见，化解可能的政治风险于无形；第二天逯老师毫不犹豫地把当时犯忌的简体字书，借给第一次请他指导论文，还并不熟悉的一个学生，正显出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他坚持客观学术研究，尽力指导史学后进的努力，与他对我这样一个学生的人格的完全信任。

林老师、逯老师皆已仙逝，他们当年教导我史法，更以身作则显示我世法，他们是经师，更是人师，历史学的研究精神与风格，就如此传承下来。如今我居然也在台北市长官邸艺文沙龙、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敏隆讲堂等处讲授过魏晋南北朝史，距离最早修习林老师的魏晋南北朝课程，竟已整整50年。50年间我踏过的歧路众多，终于未曾亡失魏晋南北朝历史之羊，如今这部南北朝史书在我古稀之年出版，或许终于可以告慰二位恩师教诲我、保护我的苦心于万一。

叶言都于台北

附录一 参考资料

[南梁] 沈约 《宋书》

[清] 彭定求 等 《全唐诗》

[唐] 李延寿 《南史》

[唐] 姚思廉 《梁书》

[唐] 姚思廉 《陈书》

[北齐] 魏收 《魏书》

[唐] 李延寿 《北史》

[南宋] 辛弃疾 《稼轩长短句》

[南宋] 陆游 《陆放翁全集》

丘秀芷 《柏庄诗草、药帖：邱先甲、丘逢甲、丘念台遗墨汇集》

[南梁] 萧子显 《南齐书》

[唐] 李商隐 《李义山诗集》

[唐] 房玄龄 《晋书》

[南梁] 萧统 《文选》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

[唐] 欧阳询 等 《艺文类聚》

[南梁] 宗懔 《荆楚岁时记》

[南陈] 徐陵 《玉台新咏》

[北宋] 刘敞 《南北朝杂记》

[北宋] 郭茂倩 《乐府诗集》

［清］严可均《全梁文》

［南梁］裴子野《宋略》

［唐］魏徵《隋书》

［三国魏］王弼《周易注》

［南梁］僧祐《弘明集》

［战国］庄子《庄子·秋水篇》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南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残本［南陈］真谛《摄大乘论世亲释》

附录二 南北朝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420	东晋元熙二年 刘宋永初元年	北魏泰常五年	宋武帝刘裕篡晋建南朝宋，东晋亡，南朝开始。
422	刘宋永初三年	北魏泰常七年	宋武帝死，少帝继位。
423	刘宋景平元年	北魏泰常八年	北魏明元帝死，太武帝继位。
424	刘宋景平二年 元嘉元年	北魏始光元年	宋少帝被大臣所杀，文帝继位。寇谦之建北天师道。
426	刘宋元嘉三年	北魏始光三年	宋文帝杀徐羡之等大臣，亲政，整顿吏治。
427	刘宋元嘉四年	北魏始光四年	北魏攻陷胡夏首都统万城。
430	刘宋元嘉七年	北魏神䴥三年	刘宋北伐失败。
433	刘宋元嘉十年	北魏延和二年	宋文帝杀谢灵运。
436	刘宋元嘉十三年	北魏太延二年	北魏灭北燕。
437	刘宋元嘉十四年	北魏太延三年	北魏通西域。
438	刘宋元嘉十五年	北魏太延四年	刘宋开办儒、玄、史、文四学。
439	刘宋元嘉十六年	北魏太延五年	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朝开始。
440	刘宋元嘉十七年	北魏太平真君元年	北魏太武帝皈依道教。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443	刘宋元嘉二十年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	北魏派员至大兴安岭嘎仙洞祭祀祖先，铭刻祝文。
446	刘宋元嘉二十三年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	北魏太武帝禁佛教。
450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北魏南征，攻至长江边。 北魏杀崔浩及汉人世族。
452	刘宋元嘉二十九年	北魏正平二年 承平元年 兴安元年	北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宗爱立拓跋余为帝，后又杀之，大臣杀宗爱，立文成帝。
453	刘宋元嘉三十年	北魏兴安二年	宋太子刘劭弑文帝自立，孝武帝击灭刘劭继位。
460	刘宋大明四年	北魏和平元年	云冈石窟开凿。
462	刘宋大明六年	北魏和平三年	祖冲之制定《大明历》。
464	刘宋大明八年	北魏和平五年	宋孝武帝死，前废帝继位。
465	刘宋永光元年 景和元年 泰始元年	北魏和平六年	北魏文成帝死，献文帝继位。 刘宋刘彧弑前废帝，即位为明帝。
466	刘宋泰始二年	北魏天安元年	北魏冯太后开始当政。
471	刘宋泰始七年	北魏皇兴五年 延兴元年	宋明帝大杀皇室亲属。 北魏献文帝传位孝文帝。
472	刘宋泰豫元年	北魏延兴二年	宋明帝死，后废帝继位。
476	刘宋元徽四年	北魏延兴六年 承明元年	北魏冯太后毒死太上皇献文帝。
477	刘宋元徽五年 升明元年	北魏太和元年	宋后废帝被杀，萧道成立顺帝继位。
479	刘宋升明三年 南齐建元元年	北魏太和三年	齐高帝萧道成篡刘宋，建南齐，刘宋亡。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482	南齐建元四年	北魏太和六年	齐高帝死，武帝继位。
484 485	南齐永明二年 南齐永明三年	北魏太和八年 北魏太和九年	北魏推行班禄制。 北魏推行均田制。
486	南齐永明四年	北魏太和十年	北魏推行三长制、租庸调制。
487	南齐永明五年	北魏太和十一年	北魏破柔然。
490	南齐永明八年	北魏太和十四年	北魏冯太后死，孝文帝亲政。
493	南齐永明十一年	北魏太和十七年	齐武帝死，废帝郁林王继位。 北魏孝文帝推动迁都计划。
494	南齐隆昌元年 延兴元年 建武元年	北魏太和十八年	南齐萧鸾连废郁林王、海陵王二帝，即位为明帝。 北魏迁都洛阳，改革衣冠。
495	南齐建武二年	北魏太和十九年	北魏以汉语为国语，南征。
496	南齐建武三年	北魏太和二十年	北魏皇室改姓元，太子私逃被废杀。
498	南齐永泰元年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	齐明帝死，东昏侯继位。 北魏孝文帝南伐，败南齐。
499	南齐永元元年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	北魏孝文帝死，宣武帝继位。
501	南齐永元三年 中兴元年	北魏景明二年	萧衍起兵，立齐和帝，东昏侯被杀。
502	南齐中兴二年 南梁天监元年	北魏景明三年	梁武帝萧衍篡齐，建南梁，南齐亡。
504	南梁天监三年	北魏正始元年	梁以佛教为国教。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06	南梁天监五年	北魏正始三年	梁北伐失败。《与陈伯之书》写作。
507	南梁天监六年	北魏正始四年	梁范缜著《神灭论》。 梁大破北魏军。
510	南梁天监九年	北魏永平三年	北魏铸五铢钱。
512	南梁天监十一年	北魏永平五年 延昌元年	北魏废除“母死子贵”制度。
515	南梁天监十四年	北魏延昌四年	北魏宣武帝死，孝明帝继位，胡太后掌权。
516	南梁天监十五年	北魏熙平元年	梁所建浮山堰崩溃。
523	南梁普通四年	北魏正光四年	六镇之变，破六韩拔陵起事。
525	南梁普通六年	北魏孝昌元年	柔然出兵助北魏，六镇之变结束，河北民变开始。
527	南梁普通八年 大通元年	北魏孝昌三年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 郦道元完成《水经注》。 达摩见梁武帝。
528	南梁大通二年	北魏武泰元年 建义元年 永安元年	北魏胡太后杀孝明帝，立幼主，尔朱荣起兵，攻入洛阳。 河阴之变，尔朱荣杀胡太后、幼主、大批官员，立孝庄帝。 南梁派陈庆之北伐，克洛阳。
529	南梁大通三年 中大通元年	北魏永安二年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 尔朱氏反攻，南梁北伐失败。
530	南梁中大通二年	北魏永安三年 建明元年	北魏孝庄帝杀尔朱荣等，尔朱兆杀孝庄帝，立长广王。
531	南梁中大通三年	北魏建明二年 普泰元年 中兴元年	尔朱兆杀长广王，立节闵帝，高欢立安定王为帝对抗。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32	南梁中大通四年	北魏中兴二年 太昌元年 永兴元年 永熙元年	高欢平定尔朱氏，杀节闵帝、安定王，立孝武帝。
534	南梁中大通六年	北魏永熙三年 东魏天平元年	北魏孝武帝被高欢击败，逃往关中投奔宇文泰，被杀。高欢立孝静帝，东魏开始，北魏因分裂而结束。
535	南梁大同元年	东魏天平年 西魏大统元年	宇文泰立西魏文帝，西魏开始，与东魏开始长期作战。 西魏苏绰制定户籍法、记账法。
537	南梁大同三年	东魏天平四年 西魏大统三年	东、西魏沙苑大战，宇文泰击败高欢。
538	南梁大同四年	东魏元象元年 西魏大统四年	西魏与柔然和亲。
543	南梁大同九年	东魏武定元年 西魏大统九年	邙山之战，东魏大败西魏。
544	南梁大同十年	东魏武定二年 西魏大统十年	西魏苏绰制定六条诏书。 东魏检括户口。
545	南梁大同十一年	东魏武定三年 西魏大统十一年	东魏高欢娶柔然公主。 西魏苏绰仿《尚书》文体作《大诰》。
546	南梁大同十二年 中大同元年	东魏武定四年 西魏大统十二年	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赎金2亿钱。
547	南梁中大同二年 太清元年	东魏武定五年 西魏大统十三年	高欢死，高澄继承，幽禁东魏孝静帝。 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同泰寺。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48	南梁太清二年	东魏武定六年 西魏大统十四年	侯景叛梁，攻入建康，围台城。 真谛至建康。
549	南梁太清三年	东魏武定七年 西魏大统十五年	侯景攻破台城，梁武帝死，侯景立梁简文帝。 东魏高澄遇刺死，高洋继承。
550	南梁太清四年 大宝元年	东魏武定八年 北齐天保元年 西魏大统十六年	北齐文宣帝高洋篡东魏，建北齐，东魏亡。 西魏行府兵制。
551	南梁大宝二年 天正元年	西魏大统十七年 北齐天保二年	侯景废杀简文帝，立豫章王，后篡位称帝，国号汉。萧绎自立为元帝。 西魏文帝死，废帝继位。
552	南梁承圣元年	西魏废帝元年 北齐天保三年	陈霸先等击侯景，侯景败死。
554	南梁承圣三年	西魏废帝三年 恭帝元年 北齐天保五年	西魏宇文泰废杀废帝，立恭帝。 西魏攻破江陵，俘梁元帝，占领荆州。梁元帝城破前大举焚书。颜之推被俘北去。 西魏皇帝复姓拓跋。
555	南梁承圣四年 绍泰元年	西魏恭帝二年 北齐天保六年	陈霸先立梁敬帝。 西魏立萧詧为帝于江陵，后梁开始。 北齐灭道教。
556	南梁绍泰二年 太平元年	西魏恭帝三年 北齐天保七年	西魏仿《周礼》设六官。 宇文泰死，宇文觉继承，宇文护掌权。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57	南梁太平二年 南陈永定元年	北齐天保八年 北周孝闵帝元年 明帝元年	北周孝闵帝宇文觉篡西魏，建北周，西魏亡，北魏相关政权全部终结。 北周宇文护废杀孝闵帝，立明帝。 陈武帝陈霸先篡梁，建陈朝，南梁亡。
559	南陈永定三年	北齐天保十年 北周武成元年	陈武帝死，文帝继位。 北齐文宣帝死，废帝继位。
560	南陈天嘉元年	北齐乾明元年 皇建元年 北周武成二年	北周宇文护弑明帝，立武帝。 北齐孝昭帝废杀废帝称帝。
561	南陈天嘉二年	北齐皇建二年 太宁元年 北周保定元年	北齐孝昭帝死，武成帝继位。
565	南陈天嘉六年	北齐河清四年 天统元年 北周保定五年	北齐武成帝传位后主。
566	南陈天康元年	北齐天统二年 北周天和元年	陈文帝死，废帝继位。
568	南陈光大二年	北齐天统四年 北周天和三年	陈宣帝废杀废帝继位。 北齐太上皇武成帝死。
572	南陈太建四年	北齐武平三年 北周天和七年 建德元年	北周武帝杀宇文护等，开始亲政。
573	南陈太建五年	北齐武平四年 北周建德二年	北齐后主杀兰陵王。 陈派吴明彻北伐，败北齐，取淮南地区。
574	南陈太建六年	北齐武平五年 北周建德三年	北周武帝灭佛教，兼及道教。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75	南陈太建七年	北齐武平六年 北周建德四年	北周大举攻北齐。
577	南陈太建九年	北齐承光元年 北周建德六年	北齐后主传位幼主，北周灭北齐，俘后主、幼主、冯左皇后等，北方统一。 南陈北伐，败于北周，丧失淮南地区。
578	南陈太建十年	北周建德七年 宣政元年	北周武帝死，宣帝继位。 庾信作《哀江南赋》。
579	南陈太建十一年	北周大成元年 大象元年	北周宣帝传位静帝。
580	南陈太建十二年	北周大象二年	杨坚为北周摄政，封隋王。 北周太上皇宣帝死。
581	南陈太建十三年	大定元年 隋开皇元年	隋文帝杨坚篡北周，建隋朝，北周亡。 北朝结束。
582	南陈太建十四年	隋开皇二年	陈宣帝死，后主继位。
587	南陈祯明元年	隋开皇七年	隋灭后梁。
588	南陈祯明二年	隋开皇八年	隋以杨广统军大举攻陈。
589	南陈祯明三年	隋开皇九年	隋攻入建康，俘陈后主，陈亡。 南朝结束，南北朝结束，中国复归统一。

北朝的遗产

中国从此走向大唐

叶言都 著

领略历史上哪个
政治大分裂、
文化大碰撞与民族大融合的
时代的魅力

[illegible]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北朝的遗产

作者：叶言都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3-01

ISBN：978754556236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导读 看北朝天下如何起风云
　　始与终
　　拓跋崛起
　　孝文汉化
　　东西之争
　　现代启示
自序
楔子
北朝风貌概述
　　北朝（439—581年）
第一章 今朝跃马中原者，当日嘎仙洞里人——北魏前期
　　来自中国东北的力量
　　鲜卑拓跋氏之崛起
　　北魏皇室特色
　　北魏前期的胡汉关系
　　汉人世族与北魏政权的恩怨情仇
　　北魏前期的宗教激荡：太武帝灭佛
　　北魏与其他胡族
第二章 一场用国家民族下注的豪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
　　北魏前期的汉化
　　深入北魏孝文帝的内心
　　迁都洛阳
　　孝文帝的南征与逝世
　　孝文帝汉化的意义与影响
第三章 绮丽对质朴，文野起冲突——北魏的分裂与内乱
　　凉风起天末：孝文帝的家务问题
　　南迁、汉化与北魏衰落
　　孝文帝的遗泽与遗祸
　　北魏后期诸帝
　　六镇之变
　　河北民变
　　河阴之变与尔朱氏专权
　　高欢崛起与北魏结束
第四章 种麦炙猪存要术，搴裙纵马饮酪浆——北朝生活面面观
　　理解北朝生活的几个角度与脉络
　　洛阳市的社区分化与分工
　　南朝投降高层人士的洛阳生活
　　北魏官员的待遇与福利
　　北朝基层人民生活
第五章 净土禅宗石窟寺，水经家训木兰辞——粗犷平实的北朝文化

北朝学术
北朝宗教
北朝文学
北朝书法与魏碑
石窟寺艺术
北朝历史文献
第六章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北朝终篇
晋阳已陷休回顾，疯狂残暴几君王：狂乱皇朝北齐
终于等到胡汉融合：西魏、北周关陇集团的形成与兴起
西风压倒东风，北风压倒南风：南北朝终局
后记
附录一 参考资料
附录二 南北朝历史大事年表

导读 看北朝天下如何起风云

陈识仁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分裂时代，人们对其印象多半与战乱、落后、黑暗、“野蛮胡族”等负面评价有关。也因为如此，一般人对它的了解，除了三国那一段之外，往往不如汉唐盛世或明清帝国深刻，并且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这是一个价值重整与制度重建的时代。当时的人们，不论帝王或世族，总在步履蹒跚中摸索着未来可行的道路。魏晋，历经的是儒家道德失序后社会核心价值重整的时代，随后的南北朝，则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强大动力与活力，为瓦解后的汉帝国重构了各种制度以因应局势的需求。由此可见，在这乱世之中，处处充满着引爆各种可能性的巨大力量。

现在，摆在读者眼前，由叶言都老师畅谈南北朝的这两册普及读物里，他要说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后半段。他将带领读者，当个穿越时空的旅人，俯瞰那个令人惊心、惊异又惊艳的时代。我相信在叶老师渊博的知识与说书人般的生动口吻下，一定能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的南北朝飨宴。只是，在启程之前，且容我权充领队，先以这篇导读向读者们介绍北朝的重要大势。

始与终

公元420年，出身北府军团将领的刘裕，结束南方的东晋国祚，创立国号为“宋”的新王朝。大约二十年后（439年），鲜卑拓跋族人所建立的“魏”国，在拓跋焘的领导下，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乱局，统一北方。南北双方在相当接近的时间里，各自终结旧时代，成立新王朝，并揭开对峙竞争的局面，此即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天下再度统一为止。

拓跋崛起

鲜卑，是一个很广泛的民族称呼，它主要在今日的辽东以北到大兴安岭一带活动。若依照活动的地域区分，最先出现在汉人文献记载里的是东部鲜卑，他们与一支被称为乌桓的民族都曾被强大的匈奴役使，称为“东胡”。后来历史上常见的段部、宇文部、慕容部，即属东胡后裔。

匈奴势衰之后，草原上的民族发生过大规模的移动，据说慕容部有兄弟争吵，哥哥忿而率众离开旧居地，远徙到今日青海东部一带，即吐谷浑。另外，十六国当中，建立西秦的乞弗部以及南凉的秃发部，分别在今天的甘肃榆中、青海西宁附近活动，这是西部鲜卑。

至于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一带，历经数代人迁徙，最后活跃于今日内蒙古与山西交界一带，先后建立代国与北魏王朝的拓跋部，可称为北部鲜卑。拓跋人在史籍中出现的时间最晚，但成就最大，甚至奠定了日后隋唐帝国的制度基础。有日本学者从中亚、北亚的角度出发，将北魏、北齐、北周、隋、唐这一系列王朝称为“拓跋国家”。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说明拓跋部确实是后起之秀。

孝文汉化

北魏的汉化并不始于孝文帝，但孝文帝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以推动全盘汉化而知名。如果要形容北魏一个半世纪（386—534年）以来的文化选择——究竟要保持本族文化，还是学习汉文化——这一路走来，真可说是跌跌撞撞，不怎么顺利。

好不容易，孝文帝以过人的意志力推动全面汉化，不仅当时就遇上像元丕父子这样的公开反对者，甚至还牵扯到太子元恂的谋反事件。也有人认为，孝文帝全面汉化后不到半个世纪即分裂的历史事实，说明对拓跋人而言，抛弃本族文化是一段煎熬的历程，其汉化也就不能简单地定调为一场成功的改革。

其实，早在拓跋珪的时代实施“离散诸部”时，就反映出拓跋族人必须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要继续当松散的草原部落联盟领袖，还是要建立一个皇权集中、能号令天下的国家？此间的取舍，恐怕是历史上所有非汉民族进驻中原地区后都要面临的问题。

东西之争

孝文帝汉化与迁都洛阳的行动，导致南方以洛阳为中心的汉化（文）集团与北方以六镇为代表的胡化（武）集团的对立，形成“一个北魏，两个世界”。六镇之乱最终还是在内部的矛盾激化下揭开了，日后尔朱荣集团虽然暂时平定了动乱，但他显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权力分别落在已经胡化的高欢与汉化的宇文泰手中，帝国从此一分为二。

东、西魏分裂之初，不论国土、军事、经济或人才，东魏的高欢所掌握的资源，都远远超过西魏的宇文泰。如果摊开当时的国际形势图，你会发现国力寡弱的西魏，被东魏、突厥、吐谷浑、南梁等几大政治势力包夹，当时的人说“齐（指东魏）谓兼并有余，周（指西魏）则自守不足”，西魏真可谓在风雨飘摇之中。

然则，历史的结局，却是不被看好的北周并灭了北齐，仿佛今日观赏球赛时所说的“大逆转”。乍看之下，似乎比小说更加富有戏剧性，但若静心探究，则不难体察出其中的发展轨迹。

高欢从尔朱集团手中接收了绝大部分的北镇军人，这群仇视汉人的武人，同时也是一股反汉化的势力。高欢并非不知道国内存在严重的胡汉矛盾问题，他曾请人分别向鲜卑人及汉人说明双方互补的必要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试图缓解彼此矛盾，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显然成效不彰。

现代启示

周一良先生用“大鲜卑主义”形容弥漫在东魏朝野的时代气氛，代魏建齐的高洋及其继任者，不但无法化解矛盾，皇室的动荡与政治的黑暗，甚至使局势更加恶化。

反观西魏，最初只靠三股势力支撑：随宇文泰进入关中的北镇军人、关陇河东地区的土著豪族、随孝武帝西奔入关的魏帝残余势力。但人数都不多，力量寡少，加上前述极为险峻的国际形势，领导人宇文泰势必得设法壮大自己。

他不像高欢用上浪费唇舌的温情攻势，而是采取建立制度的方法，弭平彼此间的差异性，进而强化认同感。例如，以府兵制度为中心，外层裹以政治号召与文化政策，后续通过几次改良修正，把三股势力不分胡汉地结合成一个关系紧密、认同关陇本地的军事指挥与政治统治集团。陈寅恪称此为“关中本位政策”，形成的政治集团势力即为“关陇集团”，其影响直到隋唐时代。

随着南北朝走入历史的尾声，北方有西魏、北周通过制度抟聚认同，不断壮大自我力量；南方则可看到平流进取的门阀子弟，欠缺磨炼而快速腐化。这两者之间可有共通之处？竞争压力的有无与改革动力的强弱，可否作为我们神游南北朝历史归来后的现代启示呢？

北朝的大势既如上述，其间的细节与故事又是怎样的呢？这就要请叶老师用其生动的笔法，带领各位来一趟深度的北朝历史之旅了。

自序

这部书的内容是对中国南北朝历史的普及性叙述，著作目的是提供普及性的南北朝历史给社会大众，并推广历史书写的普及化，构想是效法观光事业，将了解南北朝历史视为一次专题旅游。我愿借这部书将自己过去接触这段历史的经验与感想提供出来，尝试以导游的身份，陪同诸位读者回到将近一千六百年以前，走一趟南北朝的历史之旅。

我们生活在四度空间中，时间是第四度空间。有了时间这个维度，我们可以从现在向前方眺望，想象以后的状况，想出的就是科幻；我们也可以从现在向后方眺望，观察从前的状况，看到的就是历史。

人在实质的旅游中，身体会移动到不同的地理位置，亦即在三度空间中向他方转移，去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人的心智也可以在第四度空间中向后方转移，移动到以往的某个时间位置，去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历史。这种心智的活动，其探访的意义等同实质的旅游，可以称为“历史旅游”。这部书就是以历史旅游观点写出的南北朝历史书，若称为“南北朝历史旅游导览”亦无不可。

写这部书以来，我一直努力把握它的内容与风格，希望采用较为宽广的角度，放大对南北朝历史的视野，在“宏观历史”的概念下，不汲汲于对一人、一物细节的描述，而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对那段时期的整体概念性理解。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缺乏的，其他中文地区也类似。南北朝史事纷纭，这部书并不追求全面性的涵盖，仅愿先提供必要的记载原文，作为资料来源的见证，然后从宏观视角考察，以普及历史的笔法发挥，就事论事，对当时影响重大的关键深入分析，为有志进一步探索南北朝史的人提供一条入门途径。

任何后代人写的历史书，必然受到作者背景与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然而也就因为如此，历史才能一再被重新诠释，重新发现。太史公司马迁因此以“成一家之言”为职志，著作《史记》；意大利史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也因此有“一切真历史皆当代史”的

名言。我热爱历史，也热爱文学，曾习作中国古典诗词，写作这部书时，为追求历史的厚度，会引用古代诗家词人的相关作品，都注明作者；然而如此一段时间深深浸沉于南北朝历史的情境下，写作之际，有时竟会有某些符合古典诗词章法的只句片语突然在我脑海中浮现，当即记下，再加以连缀完整，就是各章最前面的诗词。于是这部书的各个段落，成为以我习作的诗词开篇，居然有些古典说书的风格，也算历代史家先贤著述的各种南北朝史书之外的另一种叙述方式吧。

时间是延续的，历史是延续的，面对这种不断延续的特性，接触历史时不妨先进行宏观的历史探访，再深入研究符合自己志趣的各个历史单元。然而值此网络文化涵盖一切的时代，普及历史的叙述呈现碎片化，以致社会大众视接触历史为猎奇，得到的碎片知识就以为谈资，还不见得是真实的，这是历史教育与历史传播的危机，也是历史的危机，应该得到重视，史学界也有义务提供解决的方法。

中国南北朝的历史特色鲜明，意义重大，值得进行普及式的历史旅游，更不应被碎片化、猎奇化、谈资化，我因此敢于不揣简陋，抱着提供南北朝历史旅游基本资讯的心愿，将这部兼具宏观性与重点性的南北朝历史书以现有的面貌，呈现于诸位读者面前。

叶言都

2019年7月

楔子

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持续170年的时间，中国分裂为两半，一南一北，各据一方，互相对立。它们各自统一了传统中国一半的领域，却都无法征服对方，将全部中华江山置于版图之中，这段时期就称为“南北朝”。两方水土养成两方人，时间久了，住惯南方或北方环境的两批人，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在中国的大地上并存。那个时代，曾出现过这样的情景：

> 这边，北魏孝文帝发布命令，规定以后大家在朝堂上都要说汉语；杨白花将军从北魏的南方前线向南眺望，他有一个不得已的决定，已经下定决心执行；颜之推将家里的子弟聚集一堂，教导这些年轻人怎样在胡人政权下做官；贾思勰满脑子都是和面、揉面，他的《齐民要术》已经写到第八十二章《饼法》，就快写完了；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上，一位长裙曳地、雍容华贵的大周三品官夫人正带着一群侍女，走进一座满墙佛画的石窟还愿……
>
> 那边，梁武帝不理会群臣劝阻，动身前往同泰寺舍身，这是第三次了；吴明彻将军正在一艘战船上指挥攻击属于北齐的寿阳城，乘船攻城是他的独门战法；谢灵运则得意地带着几百个随从，用他发明的特殊技巧登山，还不时吟上几句诗；陶弘景仍在油灯下挥笔疾书，为快要完成的《本草经集注》再添加一些自己发现的药；而江南水乡泽国的弯曲河汊中，一位裤褶被春水溅湿的年轻采菱姑娘展开娇美的歌喉，曼声轻唱《子夜歌》……

南方气候温和湿润，草木茂盛，物产丰富，鱼羹稻饭足以温饱，又有长江天险，得以长期立国，也相对较为安定。南朝在这种条件下立国江南，发展出以精致优美著称的文化，充满浪漫乃至颓废的气息。

实际控制这优美之地的是世族。南朝是世族发展的高峰，南朝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被世家大族全面控制，成为中国自周朝以后极少数近似贵族社会的时代。相对地，南朝的皇室则常因出身门第不高，显得欠缺教养。既然政治格局已定，少有发展空间，很多年轻的皇帝便成为带着世纪末色彩的放纵者，在颓废中狂乱享乐。

宗教与思想发达是南朝的另一特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唐代大诗人杜牧的名句，其实南朝香烟纷纷，钟鼓处处，何止四

百八十寺？南朝曾有过举国家之力以崇佛的皇帝，所以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南朝具有关键地位。面对佛教大举传播，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已不足以应付，南朝的儒家学者遂不得不起而应变，于是出现了儒家对“神”的看法与解释，独步中国。

这样一个时代与它在烟雨楼台中精致优美的景色、深刻思辨还带着一些浪漫颓废的社会情绪，值得一趟历史旅程，且让我们开始一次历史的探访之旅，进入《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南朝的遗产》，亲近它纤柔绮靡的芳容。

华北连接塞外，地理上以小麦为主的农业地区紧邻草原上肉食为主的游牧地区，胡人与汉人频繁接触，影响所及，此地的文化长期受到胡风感染。北朝文化因此开阔宏大，朴素粗犷，表现在石碑上，就是字字方正，笔画分明。在此种文化下孕育出的三长制、均田制、府兵制等，都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影响深远。

北朝的统治者或出自塞北的鲜卑族，或与鲜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北朝时期始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鲜卑文化，当然也存在着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矛盾与融合问题。鲜卑族文化传统对北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典章制度都有深刻的影响。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交会的结果，使北朝文化独具特色。北朝的汉人世家大族面对异族政权，特别恪守家风，强调家学的传承；反而是北朝的女性受到游牧民族社会风气的影响，担责任事，大胆热情。

北朝对中原地区的长久统治，带来了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在中国历史上从无前例。汉族虽被统治，北方诸族却逐渐被汉族同化，最终融合成为同一民族。南北朝长期分裂与北方长期被外族统治，为中国注入新血液，增添新气质，奠定下一轮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这样一个时代，与它在铁马金戈中粗犷宏大又带着质朴直爽的景色值得一趟历史的旅行，且让我们开始另一次历史探访之旅，进入《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北朝的遗产》，亲睹它实事求是、未脱草原风的样貌。

正是：

铁马金戈跨猎雕，杏花烟雨步虹桥。

二分天下兴亡事，看了南朝看北朝。

北朝风貌概述

人们对北朝的印象似乎不若南朝那样鲜明，即使在唐朝诗人笔下，以北朝为题材的诗作也难得一见，少数作品如李商隐的《北齐二首》是咏特定史事，尚不足以显示北朝的整体风貌。然而我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北朝面目模糊，少有值得探访之处，那就会失去许多独特的历史风光。北朝，值得探访，既然唐诗里留下的不多，那就让北朝人自己来说吧。请读读这几首北朝的诗，暂时不去理会诗中的典故，只是嗅一嗅北朝的丝丝气息，先隐约感受北朝是怎样的时代：

咏宝剑诗

北魏 崔鸿

宝剑出昆吾，龟龙夹采珠。

五精初献术，千户竟论都。

匣气冲牛斗，山形转鹿卢，

欲知天下贵，持此问风胡。

白鼻□

北魏 温子升

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

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

高平牧马诗

北魏、西魏 董绍

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

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

悲平城诗

悲平城，驱马入云中。

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带着从这些北朝诗染上的雄壮与苍凉，现在，让我们开始回到北朝的世界，在六个不同的领域里探访北朝。我们将沿着北魏的兴起、变化、衰乱、分裂……一路探访下去，再进入北朝生活与文化的领域，最后比较北朝末年东西双方明显的差异，说明北朝与南北朝终告结束，中国复归统一的原因。

北朝的历史探访之旅即将展开，现在做一些行前预备性的整体说明。

北朝（439—581年）

中国历史上南北朝分裂时期北方王朝的总称，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王朝，与南朝对峙并存。北朝一般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439年）算起，至杨坚篡北周建立隋朝（581年）为止，历时143年。北朝与南方几乎同时存在的宋、齐、梁、陈四朝合称“南北朝”。

北魏（386—534年）

北朝的第一个政权，由鲜卑族的拓跋珪所建，国号为“魏”。为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以魏为国号的政权有所区分，史称“北魏”。初年定都平城[1]，439年统一北方，493年在孝文帝拓跋宏的决策下迁都洛阳，皇帝也改姓“元”。

534年北魏分裂，在国家的东部与西部各出现一个政权，争战不休。分裂的双方都自命正统，也都仍使用“魏”为国号，史称“东魏”与“西魏”。东魏于550年被汉族权臣高洋篡位，高洋建立齐帝国，史称“北齐”，以与南齐有所区分；西魏于557年被鲜卑族权臣宇文护、宇文觉篡位，宇文氏建立周帝国，史称“北周”，北魏至此全面结束。

东魏（534—550年）

北魏分裂产生的政权之一，据有北魏原来领土的东部，与据有北魏原来领土西部的西魏政权对立。东魏唯一的皇帝系由鲜卑化的汉人权臣高欢拥立，建都邺城[2]，高欢“大丞相府”所在地的晋阳[3]为其别都。

西魏（535—557年）

北魏分裂产生的政权之一，据有北魏原来领土的西部，与据有北魏原来领土东部的东魏政权对立。西魏系由鲜卑人宇文泰拥立另一位北魏皇族称帝所建，定都长安[4]。

北齐（550—577年）

北朝后期分裂时代位于北方东部的政权。550年由高洋篡东魏建立，都于邺城，以晋阳为别都。因皇室姓高，又称“高齐”。577年被北周灭亡。

北周（557—581年）

北朝后期分裂时代位于北方西部的政权。557年由鲜卑人宇文护、宇文觉篡西魏建立，都于长安。577年攻灭北齐，581年被汉人权臣杨坚篡位而灭亡，杨坚建立隋朝，至此北朝结束。

北朝的基本领土来自北魏原有的地盘，加上北魏消灭“五胡十六国”中最后几个国家所取得的土地，辖有中国北方，大约即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淮河与长江之间则是北朝与南朝拉锯争夺的区域。北朝的领土随着势力的扩大而逐渐增加，西魏时取得今四川、湖北等地，造成南北朝后期北朝领土大于南朝不少的状况。由于创建北魏的鲜卑族最早居住于今西伯利亚东部、大兴安岭一带，故北魏对中国东北地区也颇具影响力。

北朝是由五胡之一的鲜卑族，或与鲜卑族有密切关系的汉族在北方建立的一系列政权，鲜卑族的影响力始终存在，故北朝各代实为汉族与鲜卑族共同建立的国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北方的血统、社会与文化注入以鲜卑为主的胡人新血，展现出与南朝迥然不同的风貌，共同存在于当时的中国大地上。

东汉帝国崩溃后，中国动乱分裂四百年，最后收拾数百年乱局，再造中华帝国的力量来自北朝。北朝创立新制度，产生新力量，到它的直接继承者隋唐时代发扬光大，终于能重现中国盛世。北朝是隋唐的先驱者，孕育出中国的新生命，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地位显著，形象鲜明。

五胡十六国与北朝人口变化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中国进入南北分立与对抗的时期，将近三百年。这段时间如此之长，表示双方长期势均力敌，也都有内部的问题与局限，力量起伏不定，才导致双方皆无法在短期内消灭对方。由于古代人口是最重要的国力指标，此种状况可由人口的变动看出。就北方而言，中国黄河以北地区自从东汉中期以来就住有胡人，呈现汉、胡杂居状态，故论及北朝人口，必须胡人、汉人兼顾，还要注意其消长变化，因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双方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杀人无数，导致双方

都有人口的大量损失。依照邹纪万在《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归纳的历代史书资料，可得出当时北方人口的变动大致如表格所述：

年　代	西晋、五胡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北方人口概数变化
265年（西晋建国）	汉族537万（不含吴，官方数字推算，有缺漏）
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中国）	汉族1131万（全国，官方数字推算，有缺漏）
300年（八王之乱转趋严重前）	汉族2365万（全国，官方数字推算）
316年（西晋灭亡）	汉族935万、胡族870万（西晋后期大动乱）
349年（后赵屠杀汉人后）	汉族500万、胡族600万（五胡十六国前期）
376年（冉闵屠杀胡人25年后）	汉族1900万、胡族500万（胡族人口增长速度被冉闵屠胡减缓，胡人不敢全征汉人作战，汉族死亡减少，人口恢复）
520年（北魏孝文帝改革后）	汉族3000万、汉胡混血640万、鲜卑等胡族600万
581年（隋文帝篡北周建国）	汉族3500万、汉胡混血500万、鲜卑等胡族120万（北方长期东西大战，胡族人口大减）

从人口的角度观察，当时北方人口数字的变化甚大，原因在于北方的战争与动乱远较南方剧烈且普遍，又持续甚久。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开始时，北方汉族人口由于在八王之乱中损失惨重，还有部分南迁，竟变成仅略多于胡族！五胡十六国前期民族仇杀严重，先是后赵皇帝石勒等胡人对汉人大肆虐杀，其后汉人在冉闵号召下，对胡人展开了报复性的大屠杀；除此之外，胡人各族间也会彼此残杀，导致各族人口都大量损失。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北朝开始后，北方渐渐安定下来，人口才能稳定增长。北魏孝文帝大力推动汉化以后，胡汉通婚增多，也使北朝出现混血人口，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到北朝后期，北魏陷入内乱，接着北方东西分裂，战争不断，由于胡人从军服役者多，造成北朝末期胡族与胡汉混血人口下降，这未尝不是汉人杨坚终于能够在北方建立隋朝，当上皇帝的原因之一。

北朝历史的性格从人口的变动可以窥见。当南朝山明水秀中的烟雨楼台边杏花绽放、酒旗飘摇之际，北朝开阔平野中的铁马金戈正以勇武

质朴的精神冲锋陷阵，喋血作战。鲜卑歌谣中有一种《企喻歌》，素以质朴、刚猛、激烈著称，正足以代表北朝的面貌，今选录两首：

企喻歌 四曲选二

北朝 佚名

其一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

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译：男儿要做壮士，结伴不必多。鹞鹰冲天飞，大群小鸟波浪般散向两旁。）

其四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此诗意简，不译）

这首一千五百年前的北朝鲜卑民歌，直白到不需要翻译。

历史长河的流动必然有其或浮或潜的原因，北朝非但不例外，还有其特殊之处。当北朝朦胧的轮廓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接下来就有几条线索，诸如“北朝的开创者是谁？”“为什么北朝会由他在这个时间点开创？”等，我们必须先行掌握，才能将北朝看得更清楚。至于北朝历史进程的大致状况，已在前述介绍北朝各代时说明。

中国北方到西晋末年时一片大乱，形成最为纷扰不安的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五胡”即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民族，用以代表汉族以外当时在中国北方居住与活动的各种民族。实际上，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人口中还包含汉人、丁零人、卢水胡与匈奴人铁弗部[5]等民族，可谓民族大熔炉，而其杂与乱也可以想见。

在这许多种胡人中，鲜卑族最后能脱颖而出，统一北方，建立北朝，自然有其原因，这就应该从鲜卑族早期的历史开始说起。

鲜卑族的崛起

鲜卑族列属“五胡”之一，是古代“东胡”的一支，世居鲜卑山[6]。秦时役属于匈奴，西汉时期向西南迁移至今天内蒙古东部的达赉诺尔、西拉木伦河[7]流域以及大泽（呼伦贝尔高原的呼伦池）一带。东汉初年，

继续南迁。

此时鲜卑族仍然依附于匈奴之下，逐渐徙居到长城以北，又有一批转而向西，到达青海柴达木盆地等地区，可见其分布之广与适应力之强。汉代匈奴因为与汉朝连年作战，损失惨重，势力渐渐衰落，鲜卑乘机取而代之，据有匈奴旧日的土地。东汉时匈奴灭亡，更给了鲜卑族非常好的发展机会。中国进入魏晋时期以后，内部动乱，鲜卑族则已逐渐发展成中国北方最强大的胡人民族。不久中原发生八王之乱，随即进入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长期的乱局成为鲜卑族的机会，他们得以崭露头角，在历史舞台更上一层楼。

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族混战，杀戮残酷又持续不绝，故胡族中越早加入战局的损失越大。“五胡”中的四族匈奴、羯、氐、羌因加入战局较早，都损失惨重，大批士兵战死沙场，一般人民惨遭敌人屠城、灭族，最后几乎都告灭绝，残余人口也或被广大的汉族同化，或融入附近的其他民族。唯有鲜卑族因居住地偏远，进入长城以南也最晚，又未曾深入中原，故在大混战中损失最轻，受到的影响最小。

338年鲜卑族部落领袖拓跋什翼犍在今河套地区建立国家，国号为“代”，统治今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鲜卑族才由部落形态转变为国家形式。到376年，前秦强盛，皇帝苻坚出兵攻击代国，拓跋什翼犍兵败，奔逃时被杀，代国灭亡。虽然如此，但剩余的鲜卑人得地利之便，迅速逃回东蒙古草原老家，并未被全部歼灭。此后苻坚的注意力转向南方，前秦于383年对东晋发动淝水之战，却在失败后迅速瓦解。386年，鲜卑新领袖拓跋珪回到山西北部，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拓跋珪刚建立北魏时势力甚为微弱，但作为拓跋家族在代国灭亡时的幸存者，生于忧患使他作战勇敢，也善于权谋，终于立定脚跟，打下北魏的基础。北魏建国时正值五胡十六国后期，这个鲜卑族的国家乘其他各族力量大量耗损之际异军突起，以五十余年的时间东征西讨，扩展地盘，从小国变大国，从弱国变强国，三十多年以后成为北方乱局中的独强，随即灭亡剩下的胡夏（431年）、北燕（436年）、北凉（439年）、后仇池（443年）各国，顺利统一中国北方的大地，中国也从此进入南北朝时期。当时鲜卑族的领袖不见得了解“卞庄刺虎”的典故，但历史机运赋予他们“后发”的优势，符合等待“二虎相斗，弱者死，壮者伤，一举而杀二虎”的战略原则，他们也能善加利用，终于成功。于是，北朝开始。

以上是北朝历史的大致轮廓。如此的北朝，这个粗莽朴素、刚健宏大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异类，绝对值得我们的一次探访之旅。

【注释】

[1] 今山西大同。

[2] 今河北临漳。

[3] 今山西太原。

[4] 今陕西西安。

[5] 鲜卑、乌桓与匈奴混血后代。

[6] 今大兴安岭山脉。

[7] 辽河上游支流。

第一章 今朝跃马中原者，当日嘎仙洞里人——北魏前期

少年游

鲜卑岭下几年春，牧马竞扬尘。

嘎仙洞里，呼伦池畔，拓跋自为尊。

中原逐鹿开新纪，建国扫群伦。

瓜步临江，云冈造像，大魏起风云。

北朝由传统中国领域以外的一个民族所建，还持续统治半个中国一百多年，毋宁是件奇怪的事。古代中国疆域沿边的各个民族，若论人口，比汉族少很多；若论经济力，无法与汉族的大片农业地区出产相比；若论文化，有很多连文字都没有的部落，更不及高度发展的汉族国家；何况这些民族间，甚至同族内各部落间也在对立相争，力量往往互相抵消。然而北魏居然能从五胡十六国中脱颖而出，完成了这个几近不可能的任务，不禁使人深感兴趣。我们探访北朝，就从这里开始。

来自中国东北的力量

中国古代沿边的民族虽多，但真正能够征服全国，或至少长期领有部分传统地区的却很少。这样的民族显然必须具备强悍的武力，而农业地区也必须对他们具有致命的吸引力，才会让他们不顾性命地拼搏入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种能力与企图心的民族来自三个地区：正北的蒙古高原、东北的东蒙草原与山岳森林大河区，以及西方的青藏高原。三者之中，早期以来自正北方的力量最强，对中原的威胁也最大，从战国到秦、汉时的匈奴是其代表。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渐渐发生变化，来自东北的民族力量增强，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角色日趋重要，甚至最后超越来自正北的蒙古高原部族。二者变化的分水岭，就是鲜卑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

北魏长期统治黄河流域，形成北朝，代表从此以后，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为中国历史带来重要影响。于是，一连串的问题浮现：鲜卑族为何能完成这种任务？北魏的建立对汉族与鲜卑族双方造成何种冲击？带来何种影响？北魏深刻影响中国后，其本身又发生何种变化？这些都有待我们在这趟历史的旅程中探索答案。

要回答这些问题，应从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说起。

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占有半个中国，并建立王朝持续统治的北方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经历从大森林开始，走过大草原，再进到大片农业地区，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其奋斗历程的艰辛与悲壮，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发展，风俗习惯的演进与改观，统治国家的魄力与局限，决定了它的兴起、强盛与衰落，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回响不绝。

鲜卑族刚与中原地区接触时，仍然保留了许多传统风俗习惯。在仪容上，鲜卑人从成年结婚起都要剃去周围的头发，只保留头顶的小部分，编成辫子，这就是南朝称北朝为“索虏”的由来。鲜卑传统的婚姻制度有抢婚的习俗，即“掠女为妻”，结婚时以牛羊为聘礼，婚后夫须为妻家服役。家庭中父死则妻妾由子继承，兄死则妻妾由弟继承；女子婚嫁前有一定程度的性生活自由，凡此都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风俗。丧

葬习俗也如此，一般为土葬，尸体装入棺材，可能用狗、马、衣物等殉葬；但埋葬处所秘而不宣，死者的衣服、用具、车马等要一把火烧掉。

鲜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上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属于泛灵崇拜，经由“萨满”[1]与神鬼精灵沟通。进入中原或西迁关中、陇山至河西走廊一带后，一些鲜卑人逐渐信仰佛教，有的人兼奉道教，与汉人相同。

鲜卑语属于蒙古语族，与蒙古语相去无几。进入中原后，鲜卑语逐渐加入汉语的字词，直到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后，汉语成为通行的语言。至于鲜卑族是否曾如同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这些族群创制本身的文字，则迄今不明。《隋书·经籍志》中记录有以鲜卑语翻译的中国传统汉文书籍，但鲜卑语的书写符号为何，因战乱中典籍散失，已不得而知。

由于原乡的地缘关系，与其他胡族比较起来，鲜卑族的眼界较广，心胸较宽，所以始终有胸怀大志、想要统一天下的领袖出现。这也造成鲜卑族的另一特色：努力学习较为先进的文明。鲜卑族历代皆有领袖主动提倡学习汉人文化，在五胡中属于汉化甚深的一族。当然在汉化过程中也产生过抗拒的力量，曾屡次出现回归鲜卑本位文化的对抗行为，但终归失败，代表汉化是其文化发展的主流。

总之，从中国东北地区出身的民族，因原始居住地位于草原、森林与农耕地区之间，累积了在三种地理环境中生活的经验，故能分别取其所长，得以向此三方面开拓，格局最大。这样的民族具有弹性与潜力，发展性强，其活动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自从鲜卑族建立北魏，启动北朝，以后陆续有同样来自东北的契丹族建立辽朝、女真族建立金朝与满族建立清朝，都纷纷循此轨迹运转，统治中国部分乃至全部地区，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段落。鲜卑族与北魏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于此充分显现。

鲜卑拓跋氏之崛起

鲜卑族有许多部落，建立北魏的拓跋部是其中位置最靠东北的，早期居住于今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与北段大兴安岭之间。这个部落最早的事迹与大兴安岭群山中的一座石洞有关。《魏书》记载，拓跋鲜卑有一座“先祖石室”，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派人去该处祭祀祖先。

这座“先祖石室”究竟在何处一直是个谜，直到1980年，内蒙古的考古学家来到大兴安岭山中一处称为“嘎仙洞”的洞窟，偶然在石壁上发现一片汉字刻石，清除泥土苔藓一看，居然是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魏太武帝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来此祭祖的祝文。从此北魏祖先的发祥地得到确认，实为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的重大收获。

嘎仙洞遗址的重要性不止于此。这个洞里确实有人类聚居的遗迹，出土了不少石器、骨器、牙角器和陶器碎片，尤以石镞、骨镞为多，制工精细，但并未发现金属器具。嘎仙洞遗址的文物说明，鲜卑族拓跋部早年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而且与文化先进的民族接触甚晚，符合“后发优势”的理论。

随着人口增加，鲜卑族离开大兴安岭，进入呼伦贝尔草原，此地有呼伦池、贝尔湖两座大湖，水源充足，草场茂盛，适宜放牧，鲜卑族从此更加繁衍壮大，这段经历被《魏书》称为“南迁大泽”。

以后，鲜卑族把握匈奴灭亡的机会，再度南迁至匈奴原有的地盘，跨越阴山山脉，势力更大，也开始成为中原东北方的邻居，从此涉足长城以南的中原之地。这段发展壮大的游牧生涯，可以从一首北朝著名的民歌中想见一二：

敕勒歌

北朝 佚名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处于不稳定状态，动乱频仍。乱世往往造成人类的迁徙与散布，鲜卑族就在此时分为东、西、北三大

支，各自移动，遂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各地。最早进入中原的鲜卑族称为“东鲜卑”，包括段部、慕容部、宇文部等；另一支鲜卑族沿长城线向西方迁徙，称为“西鲜卑”，包括吐谷浑、秃发部[2]等；较晚到达中原附近地域的称为“北鲜卑”，包括拓跋部及更晚南下的柔然等。

不少鲜卑部落进入中原后都曾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建国，如慕容氏建立的几个燕国、秃发氏建立的南凉与拓跋氏第一次尝试建立的代国等，但国祚都不长，直到拓跋氏卷土重来，建立北魏后才一举成功，其中的关键，值得研究。

北魏是世袭的君主专制国家，其皇帝与皇族主导国政，国家性质与发展方向由他们决定，故探访北魏，应该从它的皇室开始。

北魏皇室特色

北魏皇室与皇族的发展演变，可以看作是一个草原游牧部落进入中原，落地生根，其首领家族发展成中原帝国皇室的过程，这从北魏前期皇帝们的身上可以看出。

北魏前期[3]共有六个皇帝，其特色为：

短命：年龄有记录的五人平均得年33岁。

死于非命：六人中四人被杀。

由此可见北魏的帝位继承很不稳定。实际上草原游牧部落领袖的继承，本来就不如农业民族有固定的制度可以依循。中原早已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度，鲜卑族却是在接纳中原文化过程中才逐渐确立的，所以北魏前期的宫廷中内斗不断，充满血腥，正代表鲜卑族从传统习俗向汉人制度过渡的一种面向。

注重汉文化：北魏前期的各位皇帝对汉文化都持肯定态度，此时期的文化政策也倾向于引进与学习汉文化。虽然“鲜卑基本教义派”始终存在，但并未成为主导文化方向的力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上。

母死子贵：游牧民族的女性地位一向较农业民族高，所以鲜卑族汉化的过程中，也会遇上如何将皇室女性纳入“男尊女卑”的汉文化系统的问题。对此，鲜卑族的做法一如较低文化学习较高文化时常见的反应，矫枉过正。他们引用汉武帝晚年杀死年轻妃子钩弋夫人，而立其子为太子的典故，各代持续推行残酷的“母死子贵制度”：

如果后宫女性生下皇子，该皇子后来被立为皇太子时其母若还健在，她就得被赐死，以避免将来太后或外戚干政。此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孝文帝时，此前无一例外。孝文帝乃汉人女子李夫人所生，李夫人在孝文帝被立为太子时即被其父献文帝赐死。孝文帝醉心于汉化，在立其子拓跋恂为太子时，本不想将他的母亲林氏处死，但将他一手带大的祖母冯太皇太后坚决反对，孝文帝只得谨遵祖母之命照办，结果林氏成为北魏宫廷最后一位“母死子贵”的女性。到下一代皇帝宣武帝（499—515年在位）时，这种习俗就废除了，此时宣武帝的名字已经是元恪而非拓跋

恪了。

孝文帝想废除“母死子贵”制度，代表他已经得到汉文化的精髓，应该了解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身为汉人的冯太皇太后却坚持传统，则应该是考虑到鲜卑族保守力量可能的反扑，才坚持保留这种矫枉过正的早期汉化经验，以杜悠悠之口。

北魏有三种皇太后：第一种是未曾替前任皇帝生下皇太子因此存活的皇后升格而成；第二种是皇帝的生母被追封升格而来，北魏前期皇帝即位时母亲早已死去，但各皇帝即位后都会追封原是嫔妃的母亲为皇太后；第三种则是皇帝当太子时的乳母，皇帝即位后感念其养育之恩而加封，如太武帝拓跋焘的乳母窦氏、文成帝拓跋浚的乳母常氏都是。那位冯太皇太后即同时具有第一种与第三种的双重身份。

虽然如此防范，北魏太后掌权的事例仍屡见不鲜，正表示在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游牧部族的传统力量仍然存在。

北魏前期的皇帝与皇室，在历史课程中一向受到的关注比较少，导致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识也比较少，为此在探访北朝的过程中先行略述，毕竟他们曾长期主导北朝的发展演变。

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年，得年39岁，386—409年在位，被杀。[4]）

北魏开国皇帝是道武帝拓跋珪，他是代国王子，却生于忧患，6岁时代国被前秦灭亡，他被迫流亡，13岁时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也很快瓦解，北方陷入混乱，这成为鲜卑拓跋氏复国的机会。16岁的拓跋珪掌握时机，在386年回到旧都盛乐[5]重兴代国，不久改国号为魏，北魏开始。398年，他自称皇帝，将国都从盛乐迁到平城[6]。拓跋珪在位时积极征战，扩张疆土，建立制度，统一塞外，并向南发展，抵达邺城。

拓跋珪是个汉化程度很深的皇帝，像魏晋南北朝的名士一样，喜欢服食寒食散。这是由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赤石脂五味石药辗为细末，混合而成的一种散剂，据说有美白、壮阳等作用，当然副作用极为剧烈。《北史》记载拓跋珪服食一段时间后，“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有时整夜自言自语不止，还产生妄想，唯恐别人对他不利，动不动就亲手杀人，于是人人自危，不敢多事，导致公务废弛，盗贼横行，国家陷入危险局面。结果409年发生宫廷政变，他也遇刺身亡。这位北魏的开国皇帝英年被杀，可说是

追求魏晋以来汉人社会高层的时髦所致，也是鲜卑人追求汉化的另类牺牲者。

明元帝拓跋嗣（392—423年，得年32岁，409—423年在位）

明元帝拓跋嗣是北魏第二位皇帝，道武帝拓跋珪之子，生母刘贵人，按代、魏“母死子贵”制度，被道武帝赐死。拓跋嗣长大后，做父亲的拓跋珪特地把儿子找来，当面向儿子说明杀死他母亲是采用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典故的道理。还没有被政治沾染的拓跋嗣震惊之下“哀不自胜”，拓跋珪非但没有赞许儿子的孝心与仁爱，反而对这个纯洁的年轻人大发脾气。

拓跋嗣回到东宫后仍然悲伤不已，拓跋珪闻讯再度召见太子，仍然纯洁的拓跋嗣想遵父命进宫，却被随从劝止。当时已到道武帝拓跋珪晚年，在父皇性情怪异而暴虐，随时会动手杀人的情况下，太子拓跋嗣这才面对现实，听从劝谏，先寻求父子和解之道，没有贸然进宫，也避免掉可能发生的父杀子悲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魏帝室的成年礼是怎样举行，第一堂政治课是怎样上的。409年，道武帝为其子拓跋绍所杀，拓跋嗣由军队拥戴，杀死拓跋绍即位。

拓跋嗣汉化甚深，喜欢读历史书，对儒生亲切有礼貌，还著有《新集》三十篇，阐发儒家思想。他简贤任能，矫正道武帝晚年的乱局，几次放出宫女以匹配鳏夫，可称明君；又北伐柔然，南攻刘宋，都取得胜利，不愧史书对他“兼资文武”的描述。为抑制柔然南下，明元帝下令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墙，绵延两千余里，派兵戍守，这种情况尤其可以说明，北魏传承至此，已经变成中原、汉族与农业性质绝不下于甚至开始超过夷狄、胡族与游牧性质的国家了。

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被杀，得年45岁，423—452年在位）

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第三位皇帝，明元帝长子，小字佛狸，即位时只有16岁，却已经有一国之君的风范。拓跋焘仍然采取文武并重的政策，设立太学，祭祀孔子、颜回；又修筑一座“马射台”，亲率部下在台上跑马射箭，射中者立即赏赐。他注重吏治，巡视时发现地方官贪污，立刻免职；提倡节俭，饮食简单，后妃不穿双色以上的华服；发现婚礼、丧葬过分奢靡，下令设定限度；用国库积蓄赏赐，只限有功人员，不及于亲戚。国家有战争，拓跋焘常亲自领兵，与士卒同冒矢石作战，战事激烈时左右死伤相继，他仍神色自若。他治国严明果断，刑赏分明，执行迅速，官场与军中都风纪整肃，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有时会刑

罚残酷，杀戮过多。

在拓跋焘的励精图治下，北魏国力进入鼎盛期，随即开疆扩土，先后消灭胡夏、北燕、北凉，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时期，统一北方；又击溃高句丽、柔然，北魏北方的领土因此大增，在占有中国之半的同时，也成为真正的塞外强国。

北魏强大时，恰逢南朝处于刘宋初年，国力也甚为强盛，形成二虎相争之势，双方都希望统一天下，结果爆发连年战争，已如《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南朝的遗产》中所述。连串战争中北魏虽然最后大胜，直抵长江边，但也证实以当时北魏的国力与刘宋对比，仍然无法消灭对方。机敏的太武帝不失时机地主动撤军，代表他了解真实状况，知所进退，仍然可称英明。

这样一位皇帝，最后却死于身边宦官之手。原来太武帝南征时，命太子留守监国，宦官领袖宗爱趁机胡作妄为，与太子属下官员发生冲突，他就恶人先告状，诬告太子属下官员。

刚远征回来的太武帝不察，将这几名官员杀死，太子也因此忧愁恐惧而亡。宗爱怕事情穿帮，决定先下手为强，竟于452年将太武帝拓跋焘暗杀，拥立皇子拓跋余继位为帝，宗爱则封王，出任宰相，独揽大权。

宗爱专权跋扈，朝野忌惮，拓跋余渐渐怀疑宗爱另有更大的企图，谋划削夺他的权力。宗爱再度先下手为强，又杀死拓跋余，居然创造历史纪录，成为中国历史上暗杀两个皇帝，还受封王爵的唯一宦官。

南安王拓跋余（452年在位，被杀，年龄不详）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子。北魏第四任皇帝，在位仅8个月，无所作为。

452年，中常侍宗爱弑太武帝，假传皇太后命令，迎立拓跋余继位。宗爱掌握大权，渐与拓跋余发生矛盾，于是宗爱杀拓跋余。

宦官宗爱竟然可以如此为所欲为，连杀二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北魏政权仍然未能将中央集权高度制度化，人治的色彩浓厚，这一切都有待将来。

文成帝拓跋浚（430—465年，得年26岁，452—465年在位）

文成帝拓跋浚是太武帝之孙，父为太武帝之太子拓跋晃，早卒。宗

爱杀死拓跋余之后朝政大乱，一群大臣诛杀宗爱，拥立已故太子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为帝，是为文成帝。文成帝才智平庸，又因被大臣拥立，处处受牵制，在位14年，并无多大作为，而他的皇后冯氏，精明干练，后来以太后身份掌握北魏大政25年，建树甚多。

献文帝拓跋弘（454—476年，被杀，得年23岁，465—471年在位）

献文帝拓跋弘是文成帝拓跋浚长子，12岁即位，史书说他“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可见颇有抱负，然而政权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他郁郁不得志，母子关系紧张。拓跋弘对强势的名义上的嫡母冯太后无可如何，时间久了，产生了干脆让位的念头。471年，拓跋弘宣布传位于年仅5岁的太子拓跋宏，自为太上皇。拓跋弘退位后内心显然依旧无法平静，476年以太上皇身份诛杀冯太后的情夫李奕。这种报复兼赌气的行为真正触怒了太后，应该也使太后感觉到未来可能的危险，于是敢作敢为的冯太后当机立断，对名义上的儿子下毒，拓跋弘遂被嫡母兼养母毒死，年仅23岁。

献文帝的太子拓跋宏就是赫赫有名的孝文帝，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访。孝文帝能成为一代名君，对北魏、北朝甚至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与他的祖母冯太皇太后有关，故在此先介绍这位北魏这25年间的实际统治者。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或称文明太后、冯太后（442—490年，得年49岁）

这位当时北魏实际的女性统治者娘家姓冯，长乐信都[7]汉人，出身北燕国王室。436年北魏灭北燕，但对北燕的王室并未赶尽杀绝，反而任用了许多这个汉人世家大族的成员做官，故拓跋氏与冯氏的关系可称融洽，双方合作愉快，也不断通婚，冯太后的姑母就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文成帝即位后，实际上高了一辈的冯氏成为他的嫔妃，封为贵人，时年14岁，后由贵人升至皇后。

文成帝的妃子李贵人生了皇子拓跋弘（献文帝），却在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时，依“母死子贵”制度死去，太子拓跋弘则由无子的冯皇后代为抚养。465年，文成帝死，太子献文帝拓跋弘继位，冯皇后被尊为皇太后。469年，献文帝之子拓跋宏被立为太子，其母李夫人照例处死，拓跋宏也由冯太后抚养。471年，献文帝退位，拓跋宏登基为孝文帝，冯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476年，献文帝因处死冯太后的情夫被冯太后毒死，北魏仍由她掌权，直到她490年死去为止，总计主导北魏25年。

465年文成帝死后，本由丞相太原王乙浑执政，但他骄纵不法，屡

次矫诏擅权，于是冯太后在466年发动政变，杀乙浑，取得大权，自行摄政。冯太后在摄政期间推行“三长法”“均田法”“班禄法”等制度，革除旧日陋习与弊端，抑制贵族圈地，努力将北魏这个以游牧为主的帝国改造成农业帝国。这些政策在她死后由孙子孝武帝继续执行，并发扬光大，主导了此后的北魏与北朝，其影响力扩及中国以后的各朝代，例如计口授田的小型自耕农经济体系，甚至直到今日余风犹存，1949年以后在中国台湾地区推行成功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即属此类。

北魏前期的胡汉关系

“后发优势”是北魏建国后能够发展壮大的第一个原因，多少来自幸运。除此之外，北魏能够站稳脚跟，打下中国的半壁江山，又与拓跋氏当政者对汉族的态度有关。毕竟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经济与文化力量最强，对进入中原的胡族而言，当时可谓“得汉人者得天下”，而北魏的统治者显然明白这个道理，并努力实行。

十六国时期，五胡君主对于汉文化多半采取友善的态度，在国家制度上学习汉人，也大量任用汉人作为谋士；但也有少数君主敌视汉人，压迫汉人。对汉人而言，武力既不如胡人，则投奔可以容纳并尊重自己的胡人政权，就成为乱世避祸与迂回发展的道路。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几个倾心汉化的胡人政权因为国内政治稳定，君主尊重汉人，就成为中原士庶的避难场所。拓跋氏在建立代国时就有这种经验，卷土重来建立北魏后，仍然采取此一策略。

一方面，由于当时正值世家大族兴盛的时代，拓跋氏既然志在逐鹿中原，就一直实行与中原世族合作的政策，成效显著。北魏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对登门求见的汉人世族皆亲自接见，量才录用；太武帝拓跋焘也曾亲发明诏，礼请各地著名世族入仕北魏。另一方面，北方汉人世家大族面对外来的鲜卑统治者，为保持家族势力与地位，势必也要跟这个北魏统治集团合作，何况拓跋家族对汉人礼贤下士，于是双方伸出友谊之手，水到渠成，合作愉快。这样的合作关系主要以两种方式表现：一为双方通婚，二为汉人出仕。

北魏皇室与汉人大族的通婚

北魏后宫的女性来自多方，各族皆有，汉族女子入宫者颇多，故北魏许多皇帝为汉女所生，有汉人血统，如明元帝杜皇后生太武帝、文成帝李贵人生献文帝、献文帝李夫人生孝文帝等。这样几代下来，其实北魏后期皇帝的鲜卑血统并不浓厚。北朝的建立者、北魏第三任皇帝太武帝拓跋焘（423—452年在位）为第二任皇帝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在位）与杜贵嫔所生。杜贵嫔是汉人，死后追封皇后，籍贯魏郡邺城，故太武帝拓跋焘有一半汉人血统。第五任文成帝拓跋浚（452—465

年在位）有史料可考的两位妻妾都是汉人，冯皇后籍贯长乐信都，李贵人籍贯梁国蒙县，生第六任献文帝拓跋弘（465—471年在位），故献文帝拓跋弘只有四分之一鲜卑血统。献文帝与李夫人生的儿子就是鼎鼎大名的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年在位），李夫人是汉人，籍贯中山安喜，所以这位大力推动汉化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实际上只有八分之一鲜卑血统。

北方汉人大族中，原为北燕国君主的河北长乐郡信都县世族冯氏，因为地缘关系与其政治地位，更成为与拓跋氏几代通婚的汉人家族，其关系如下：

第一代通婚：太武帝拓跋焘—左昭仪冯氏（辽西郡公冯朗之妹、文成帝文明皇后之姑母）。

第三代通婚：文成帝拓跋浚—文明皇后冯氏（辽西郡公冯朗之女）；文成帝之妹博陵公主—冯熙（明皇后之兄）。

第四代通婚：献文帝拓跋弘之女乐安公主—司徒冯诞（冯熙之子）。

第五代通婚：孝文帝拓跋宏—第一任冯皇后（冯熙与博陵公主之女）；孝文帝拓跋宏—左昭仪、第二任冯皇后（幽皇后，冯熙之女，第一任冯皇后同父异母姊）。

北魏公主也常出嫁到汉人家族。除上述的两位公主嫁入冯家之外，为时更早的有太武帝拓跋焘之女南安公主嫁给阳平公杜超，杜超之妹即明元帝杜皇后。

由此看来，拓跋氏与冯氏、杜氏等汉人家族经过几代通婚，已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二位一体关系，这正是北方民族融合现象的代表。

这些婚姻关系也充满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对辈分并不讲求。就拓跋氏与冯氏而言，这种现象应该是由拓跋皇室主导，而冯氏等汉族世家也没有反对。有名的例子如孝文帝的两位冯皇后，实际上在两个家族的关系中都比他大一辈；又如杜超本是明元帝妻兄、太武帝舅父，竟被外甥皇帝招为驸马，娶了自己的甥外孙女，可称极端的例子。

汉人出仕北魏政权

对北方的汉人世族来说，在异族统治下，维持世家大族的阶级地位仍有风险，故以政治地位巩固社会地位成为必须，意即他们必须出仕。幸好北魏统治者为鲜卑皇室，他们并不仇视汉人，还对汉文化颇为向往，双方因此能够长期合作。

431年，北魏太武帝下令招今山西省以东各地的名士任官，共聘来数百人。此举之意，在于把黄河流域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渤海高氏等汉人世家大族收归旗下，使他们与北魏政权结合，为北魏政权出力，北魏则以承认他们的世族地位，并开放统治权作为回报。当时这些北方汉人世族的领袖是出身清河崔氏的崔浩，他以太武帝国师、军师的姿态出现，加入北魏朝廷，出谋划策，对北魏统一北方贡献良多，从此奠定汉人世族在北魏朝廷的地位，此后其他汉人世家大族也都遵循这种模式，进入北魏的执政团队。由于崔浩的贡献，清河崔氏得到最尊贵的地位，使北方汉人世族的排序成为以崔、卢、李、郑为前四名。

总之，鲜卑族的汉化是由上而下的，其动力来自北魏皇帝。北魏皇帝对汉人世族采取接纳的态度与政策，难免造成鲜卑族内部始终有反汉化与反汉人的保守势力存在，又往往与高层政治斗争中的反对派有关。从鲜卑人的立场看，开放汉人参政可以迅速提升国力；但也可能存在大权旁落的危险，尤其当时汉人由世家大族主导，世族的地位与威权世代继承，引进汉人世族参政，就等于长期与他们分享政权。因此鲜卑族内部对应该进用汉人、开放汉化，还是应该不用汉人、保守本族传统经常发生争执，双方长期的拉锯，也是主导北魏历史的一种力量。

汉人世族与北魏政权的恩怨情仇

北魏兴起时，北方早有汉人世家大族存在，并已延续甚久，经济实力雄厚，社会、文化地位崇高。当北魏在鲜卑拓跋氏的领导下政治力量越来越大，最后统一北方时，这股新兴的胡人政治与军事势力要如何与汉人的世族势力互动，就成为北朝初年的重要大事。拓跋皇室对汉人并不苛刻，早期打天下时更是倚重汉人，但结束五胡十六国的分裂状态后，北魏鲜卑政权与拓跋皇室立刻面临一个新问题：黄河流域的汉人族群极为庞大，统治者作为人口悬殊的少数一方，要如何看待汉人？怎样处理与汉人的关系？

任何专制极权的统治者都希望能直接控制全国民众，故在北朝初期，北魏鲜卑拓跋氏的统治集团很快遇到二选一的抉择：这个国家可以沿用魏晋以来的旧贯，保留世家大族的地位与权利，与世族充分合作，以通过世族间接统治，这样阻力小，容易达成，但将长期无法充分掌控全国。当然也可以效法秦朝与西汉，设法建立中央政府直接掌控大量小型自耕农的国家体系，这样皇帝与中央政府不受世族掣肘，享有直接而且真正的最高权力，但如此一来，势必与世家大族发生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北魏政权与北方汉人世族之间，当然充满恩怨情仇。大体而言，在统一北方以前，北魏政权尊崇汉人世族，进用汉人世族领袖，汉人世族也乐于为鲜卑拓跋氏效命，双方合作愉快。然而统一北方以后，鲜卑族与拓跋皇室开始倾向于直接掌控全国，而相反地，汉人世族则致力于确定门阀系统，以保证他们传承多年的地位。这两股力量由合作到冲突的过程，可以从当时北方首屈一指的汉人世族领袖崔浩身上清楚看出。

崔浩（381—450年）的喜剧与悲剧

崔浩字伯渊，清河郡东武城[8]人，出身清河崔氏，母亲出身范阳卢氏。崔家联姻皆为世族，门第高贵已极，是北方第一，范阳卢氏则排名第二。崔浩长相秀丽如美貌妇人，学问渊博精深，文学、经学、史学、玄学、阴阳卜算、百家之言无不通晓，当时的人都无法企及，他也胸怀大志，自比张良。北魏建国后，崔浩接受道武帝的礼聘出山，为北魏朝

廷服务，历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北魏统一北方有重大贡献。在北魏对各国用兵的过程中，崔浩屡次力排众议，根据星象和人事判断时机，太武帝也都言听计从，北魏得以依次消灭胡夏、北凉，并出击柔然成功。

这些军事行动使北魏解除了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威胁，北凉灭亡后，北魏打开通往西域的商道，得以从丝路的贸易中获取大量利益。北朝开始之际，也是北魏全盛时期的开端，鲜卑拓跋氏能够获得如此丰功伟业，崔浩贡献甚大；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以崔浩为代表的北方汉人世族与鲜卑拓跋氏合作的成果。

鉴于崔浩的学问与文名，早在429年，太武帝拓跋焘就任命崔浩率领一众文人编辑国家纪录，写成《国书》三十卷。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国家规模完全确立，太武帝拓跋焘又命崔浩主持修纂正式的北魏国史。崔浩率领史官、文士，将当年完成的《国书》加入续篇，写成一套北魏国史。此书对于鲜卑早期的情况秉笔直书，并不避讳，书成后有两个僚属建议将全书刻石，公开陈列，崔浩同意，于是花费三百万钱后，一大堆刻着北魏历史的石碑在平城竖立起来。

这部北魏国史全面公开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鲜卑人知道书的内容后，认为崔浩等汉族文人在故意出鲜卑族的丑，而且公开为之，于是群起而攻，纷纷到皇帝面前告状。太武帝拓跋焘大怒，下令将崔浩捉拿，囚于木笼内，送出城南，又派几十个卫士对着崔浩身上小便，极尽侮辱之能事，崔浩嗷嗷呼叫，沿路都听得到。450年，崔浩被诛九族，牵连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及太原郭氏，世族被杀的甚多，尤其崔浩以宰相之尊，即使有过错被杀，死前还被皇帝如此公开侮辱的，尚属空前。

由于这件事太过戏剧化，历代都有人研讨它的原因。对此一般曾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华夏、夷狄之辨”的民族问题，另一种认为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然而历史学家陈寅恪则明确指出，其主要原因应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一直希望“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在北方确立门阀制度，遂与鲜卑族发生冲突，北魏国史事件只是最后的导火线。

从社会阶级去解释崔浩及其计划与行为，会发现他是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北方世族的思想，即注重儒家伦理道德，历代传承，以此作为家族特色。《魏书·崔浩传》提到崔浩对于儒家礼制如家祭等特别注意，但不喜好《老子》《庄子》这些玄学的书，正是东汉以来北方儒家大族的典型传统。崔浩为北魏政府选士，也是家世与人伦并

重。在他心目中，能具备高官及儒学二条件的姓族，才是他理想的一等门第，实际上他也在通过选士向这个目标前进。

然而北朝的基本状态与南朝不同，南朝世族自从东晋以来，其地位已牢不可破，何况历代皇室都是汉人，没有民族差异问题。北朝则不然，其统治阶级是鲜卑贵族，而且刚进入中原不久，他们凭军功起家，认为土地由他们打下，国家因为他们才能存在与发展，当然难以忍受汉人世族来分享权力，尤其是永久分享权力，对于汉人世族希望建立门阀制度深感不满。崔浩虽然历事三朝，居功甚伟，却因为屡次力排众议——虽然都经皇帝采纳，也获得成功，但早就使鲜卑贵族因忌妒而产生了反感。等到他坚决主张实施门阀政治时，鲜卑贵族对他的厌恶与痛恨终于浮出水面。果然到撰修国史时，崔浩就因秉笔直书北魏早年隐私，被指为蓄意“暴扬国恶”，导致全族诛灭，姻亲家族也连带遭殃。

崔浩被杀是北方汉人世族遭受的重大打击，从此造成汉人世族的保守与退缩心态，北魏皇帝与中央政府的威权则大增，超过南朝。这次事件也使北朝学术发展产生转变，从此汉人知识分子面对北魏政权变得极为谨慎，不愿在理论层面放言高论，北魏的学风也因此以实用为原则，一直传承了整个北朝。

北魏汉人世族再度大展鸿图，要等到孝文帝改革的时期，因为这位鲜卑血统八分之一、汉族血统八分之七的皇帝改弦更张，全力促使各鲜卑家族变成汉人世族，于是北方汉人世族门阀与鲜卑政权矛盾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北魏前期的宗教激荡：太武帝灭佛

北魏前期的另一项文化对决发生在宗教领域，此时佛教与道教间曾发生冲突，其中以太武帝灭佛为代表。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与道教争夺中国宗教市场的时期，双方都希望得到政治领袖的信奉与支持，以利弘扬本教，压抑他教。鲜卑族进入中原建国后，逐渐舍弃原有的泛灵崇拜，改信中原地区的宗教，于是这批握有政治大权的新统治者，就成为佛、道二教争取的对象与传教的重点。北魏太武帝在位初期崇奉佛教，后来因为重用汉人世族，而他信任的谋士崔浩等恰好都是道教信徒，崔浩等人介绍寇谦之等道士给太武帝，太武帝很快受其影响，转奉道教，亲受符箓。440年，太武帝改年号为充满道教意味的“太平真君”，等于公开宣布这个国家要走道教路线，从此他认为佛教是“西戎虚诞”“为世费害”，准备用政治力量镇压。

444年（太平真君五年），太武帝下诏，禁止上自王公、下至庶人的全体国民私自供养佛教僧侣；同年九月，杀政变未遂的僧人领袖玄高、慧崇等。446年（太平真君七年），陕西地区有人反叛，太武帝西征，到达长安后，见佛寺内藏有兵器，又查出寺内酿酒、聚积财宝，还发现僧侣与在室女私通，为之大怒，立即下令禁止佛教。司徒崔浩随即上疏，请求诛杀天下沙门，毁灭各寺院及佛经、佛像。于是太武帝下诏，立刻诛杀长安全体沙门，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拓跋晃从中央政府发出命令，比照长安办理，废除全国佛教。太子一向尊崇佛教，上表劝谏，还在发布父亲的诏书时故意拖延时间，使全国僧侣都能预先知道，许多沙门因此得以藏匿或逃脱，许多金银佛像及经书也都被秘密收藏，故仅有部分僧人被杀，只是北魏境内的寺庙无法迁移，因此大多被毁。这段灭佛时间总共8年（444—452年），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灭佛”的第一次，佛教将此次事件与北周武帝、唐武宗的灭佛统称为“三武之祸”，视为重大的法难。

450年崔浩死后，太武帝拓跋焘失去崔浩的影响，对全面灭佛渐生悔意，佛教生机出现。452年太武帝被杀，北魏政局几经动荡，最后由文成帝拓跋浚继位。这位皇帝下令停止灭佛，恢复佛教地位，佛教才得以复原。虽然如此，佛、道二教在北朝时仍持续对抗，后经唐朝到五代

期间，道教更屡次借政治力量冲击佛教，成为中国宗教史上的第一次宗教大对抗时期。若问为何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会由奉佛变为崇道，主要答案应该在于他皇帝的身份，毕竟对于一个大权在握、享尽荣华的统治者而言，比起超脱轮回以求涅槃，炼丹修仙以求长生才是更实际的事。

北魏与其他胡族

北魏由鲜卑族建立，并统一北方，故随着北朝的序幕慢慢展开，鲜卑族与汉族的关系固然必须重视，鲜卑族与其他胡族的关系也不应忽视。由于《魏书》《北史》的作者都是汉人，这两部北魏正史中注重鲜卑人与汉人的关系，着墨甚多，北魏与其他胡族之间则较少提及，幸好近年已有历史学家注意到这点，并提出研究成果。现在就以侯旭东的论文为主，对此加以说明。

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382年，前秦皇帝氐族的苻坚就曾经统一过北方。苻坚处理各胡族的方法有二：一是包容为主，宽大为怀，让各族保持原有的部落组织；二是将各胡族人马纳入前秦军队，率领他们一起攻打东晋。在此种状况下，各胡族虽然被氐族击败投降，其力量与组织却未被消灭，等到苻坚在淝水战败，各族乃趁机纷纷复国，导致苻坚身死，前秦也迅速瓦解。

这段历史使北魏鲜卑族学到教训，故从道武帝拓跋珪建国起，就对被征服的其他胡族采取“离散部落”的政策，不断将新征服的胡族部落或国家组织拆散，将这些胡人以小家庭为单位，编入地方政府的户籍系统中，称为“编户”。这种措施当然会引起其他胡族的反抗，也会因各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些较为偏远的部落甚至从未被解散，如尔朱氏；但总体而言，在北魏发展中央集权政治的趋势下，各胡族原有的组织逐渐淡化，反抗力量也弱化，北魏才得以避免成为“五胡第十七国”的命运，顺利统一北方，并控制这片广大的土地百年。

如果说前秦只做到了各胡族的不稳定联盟，那么北魏就是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国家。

探访北魏前期至此告一段落。此刻鲜卑拓跋氏苦心奋力建立的国家已经成形，奄有广大的塞外草原及绿洲地区，加上长城以南的半个中国，成为典型的“二元帝国”。这个名叫“魏”的国家与创建它的鲜卑族面对此种形势要如何经营，如何发展？重点要摆在二元中的哪一元？这将是我们下一章探访的重点。

【注释】

[1] 通灵巫师。

[2] “秃发”为鲜卑语“拓跋”的另一音译。

[3] 386年道武帝建国至471年献文帝死为止。

[4] 按，虚岁，以下同。

[5]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6] 今山西大同。

[7] 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

[8] 今山东武城。

第二章 一场用国家民族下注的豪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

策马南来不再回，孝文出令迅如雷。

北邙山下鲜卑冢，长伴汉家卢与崔。

对一个人群而言，文化的选择、引进与学习是头等大事，也必然出现支持者与反对者，其过程往往曲折回旋，充满变数。如果选择与引进出于最高权力拥有者的意志，由上层发动，就是以政治力量推动文化变革，可能成为激烈的案例。在激烈的文化变革中，激烈之尤者，是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勇猛前进，追求在短时间内达成全面变革，不留余地，属于极端做法，甚至可称为以整个群体命运为赌注的文化赌博，在历史上难得一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极端激烈的事，就曾在北朝历史中发生，其大胆的推动者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北魏在孝文帝（467—499年，471—499年在位）在位后期出现极为激烈的汉化运动，推动者为皇帝本人，推行时采取极端做法，完全不留余地，在人类文化学习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案例。由于这次汉化运动十分彻底，对于此事，抱持传统汉族中心思想的史家不免沾沾自喜，为之大书特书，造成以后国人提到北魏的历史，最常见甚至唯一的印象就是此事。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过去传统汉族中心史观对此事的叙述，可以发现这些叙述多注重其内容，却忽略其原因与方法，尤其是它的特殊之处。在传统的汉族中心思想下，实际上这个运动的真面目并未被清晰描述，仍有待今日进一步研究，并采用不同的角度分析，才有可能还其真相。

鲜卑拓跋部在进入长城以南后，开始统治大量汉人、接触大量汉文化，如何面对并因应这种新形势，就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建都平城期间，游牧部落原有的制度与习俗仍在深刻影响与制约这个新兴政权。对北魏的最高统治者而言，若希望转化部落体制，建立中央集权帝国，进

而平定南方，成为全中国的主人，将是一段漫长险阻的道路，需要以极大的魄力历尽艰辛才能走完。此种过程在北魏建国后已经开始，直到孝文帝汉化运动时告一段落；虽然未能统一中国，北魏却已是中原式的国家。此过程固然依靠前代诸帝后努力打下的基础，但最后阶段的临门一脚，直接关乎成败，这就要看孝文帝自己的表现了。孝文帝以年轻人的魄力给出的答案是，采取激进与极端手段，以迁都为起点，追求在短期内达成全面汉化。

欲深入理解此事，须从孝文帝490年亲政以前北魏的汉化说起。

北魏前期的汉化

北魏建国以来，历代君主都重视学习汉文化。在探访这块领域时，我们必须注意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伴随这种学习的，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就不断与南朝作战，不论出于主动或被动；即使是被动应战，只要取胜，也会化被动为主动，乘胜向南追击。汉化与向南发展其实互为表里，彼此影响。由此看来，北魏对汉文化的学习，是历代皇帝基于“必须先了解汉文化、利用汉文化，才能征服全部汉人地区，统一中国”的理解而来。在多次南北战争中，北魏连连取胜，从南朝手中夺得黄河、淮河之间与山东半岛等地的领土。此期间太武帝在430、446、450年三次击退刘宋的北伐，最后一次还乘势直攻到长江北岸。献文帝（465—471年在位）时，北魏已经将南北分界推展到淮河一线，确定占领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地区，并将此地命名为“河南新邦”。至此，北魏面临国家的新形势。

到孝文帝初年，北魏领域中汉人的区域已经扩大，总人口中汉人的比例大幅上升，遂使其中央政府不得不考虑此种新形势，拟定因应对策。恰好当时孝文帝年幼，由冯太后当政，冯太后出身汉人政治世家，倾向于以汉文化的观点思考政治问题，于是订定“建立以农业为主体的大帝国”的政策，与主要助手朝臣李冲施行向农业国家过渡的改革，重点为建立班禄制、均田制与三长制。

北魏初年，户籍制度沿用“宗主督护制”，即承认鲜卑首领与汉人世族（宗主）可以拥有大量人口，当时平民百姓大多因谋求生计而依附部落领袖或世家大族，成为宗主的私人财产。在此种民政制度下，中央政府能直接掌控的人民不多，导致税收很少，中央政府预算大为受限，必须仰赖各宗主支持，仍然不脱部落联盟的格局。由于汉文化自战国年间至秦始皇以来，当政者一直以中央集权制为理想，故北魏汉化开始后，其皇室自然产生打破部族势力、取消地方豪强割据，迈向中央集权之动机；何况平民百姓在宗主统治下，常遭受虐待与压迫，只要中央政府提出照顾平民的政策，就很容易得到基层的民心，减低改革阻力。冯太后显然了解此种情势，遂针对当时状况，陆续推出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启动有一贯脉络可循的改革。

班禄制

北魏的官吏原来没有俸禄，由他们自已随意摊派或掠夺民间财物充当薪津，所以贪污、抢劫、勒索盛行，并且被政府承认为合法，百姓不堪其苦。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北魏在冯太后主持下实行依品级与职务发给官员俸禄的制度，称为“班禄制”，其内容为：

1.确定百官品秩，作为官员俸禄多少的标准。

2.各民户每年增加征收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充“禄钱”，作为官员俸禄来源。

3.施行当年向各民户预征帛二匹，作为“官商之本”，兴办官营商业，以官营商业盈利补充禄钱的不足。

4.制定惩治贪污的法律，甚为严格，贪污帛一匹以上者处死。

此制度施行时雷厉风行，平民税务负担虽有增加，但官员贪污、勒索等随之大幅降低，中央政府也从此增加了收入，掌控百官，赢得民心。冯太后的改革以班禄制开始，故此制度可视为北魏通过一连串改革，由部族联合体变为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里程碑。

均田制

班禄制确立后，北魏中央政府的威权大增，乃进一步推出配套的土地改革，称为“均田制”。班禄制使中央政府必须掌握足够财源，方有可能持续发给百官俸禄，中央政府的财源来自税收，而税收又主要来自直接掌控的农民，于是争取直辖农民就成为必须。北朝原来的农民大多是宗主的农奴或佃户，中央政府争取农民的有效方法，就是提供私有土地与合理赋税，使农民自愿投奔中央政府，此即均田制的基本概念。此种想法原由宰相李冲的族人李安世提出，冯太后与孝文帝采纳后，定出施行办法，于485年颁布实行，自首都开始逐步向外推展。

均田制的具体内容为：

1.清查户口，建立户籍资料，确定各地方行政区的人口数。

2.按照人数授给田地，分为“露田”和“桑田”。

露田（又名“口分田”）：男15岁以上成丁，由国家授给露田四十亩，女二十亩，家中奴婢比照受有露田，人民拥有的耕牛一头也受露田

三十亩。露田不许买卖，不可继承，并只能种植谷物或桑、麻，不许栽种树木。人民年满66岁或身死后，须将露田归还官府。

桑田（又名“永业田”）：男丁由国家授给桑田二十亩，作为私人产业，不用还给政府，可以继承，也可以买卖。

受田的农民一夫一妇每年必须向政府缴纳二石的粟[1]，称为“田租”，简称“租”，与丝帛或麻布一匹长四丈，称为“户调”，简称“调”，丁男还必须服徭役[2]和兵役。

受田以后，百姓不得随意迁徙。

家中若有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或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或耕牛二十头，其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地方官员按品级授给公田。州刺史十五顷，郡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各六顷，不准买卖，离职时交予继任者。

3.授田的土地来源是国有地与收归国有的无主荒地。人口较少，土地广大的地区称为“宽乡”，依上述标准办理授田；人口密集，土地不足的地区称为“狭乡”，各项授田数量减半。

北魏均田制相关的度量衡单位，可以推估换算为今日的公制：

土地面积

中国古代计量土地长度的基本单位是“步”，一步约当0.83米，240步（例如长16步、宽15步的面积，16×15＝240）为1亩，则0.83米×16×0.83米×15＝约当167平方米；夫妻二人共授田60亩，即167平方米×60＝约当10 000平方米；官员的公田，1顷等于50亩，则167平方米×50＝约当8 350平方米。

重量

北魏时1石等于120斤，1斤约当0.44公斤，故：2石＝0.44公斤×120×2＝约当105.6公斤。

长度

北魏时1丈等于10尺，1尺约当29.6厘米，故：4丈＝40尺，29.6厘米×40＝约当1 184厘米＝11.84米。

均田制内容详尽合理，其精神有三：一是政府免费授田给人民，争

取直辖的小型自耕农；二是对人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三是用各种授田标准动员农村的全部生产力，以增强国力。在执行层面，也考虑周详，定出因人、因地制宜的各种标准，具有弹性，因此阻力减小，才能有效施行。

北魏的均田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土地制度。此制度创立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至隋、唐都沿袭采用，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三长制

“三长制”是北魏为控制直辖户口，取代宗主督护制，建立基层政权组织而推行的地方制度。均田制实行后，北魏政府直辖的农民大量增加，如何将这些农民纳入组织，以便管理，就成为下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建立地方基层组织时必须考量其可行性，例如这些基层组织的领袖若由官派，不但将大量增加政府人事支出，而且可能导致人民与政府官员的矛盾与对立，故以有限度的地方自治为宜。三长制就在此种背景下出现。

486年，李冲提出三长制的计划，经冯太后、孝文帝批准施行。内容为在地方上将每五户人家划为一邻，立一邻长，五邻划为一里，立一里长，五里划为一党，立一党长，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三长选择乡里德高望重、办事能力强又谨守法令的人担任，受地方官督导，职责为掌握当地的田地、户口数量，征收赋税，调发徭役，维持治安。

三长制是均田制的配套措施，实行后政府通过三长控制地方，地方由政府选派的民间领袖实行半自治管理，于是绕过宗主，人民直接隶属于政府，至此北魏的改革大致完成。

这样的改革严重打击到鲜卑贵族与汉人世家大族，当然遭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且不分鲜卑首领或汉人世族、豪强。但在冯太后、孝文帝和李冲等执政大臣的坚持推行下，这些制度得以继续实施。均田制彻底实行后，清查出的大量隐匿户口全部纳入赋税名单，数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几倍。政府无偿授田后，原有的农奴与佃农大量成为自耕农，农业生产力被激励出来，使经济发展，民富国强。史书记载这些政策“天下称便”，代表此时北魏中央政府跳过中间的既得利益阶层，直接取得了基层百姓支持，成为其立国基础，也是中央集权的保证。至此，北魏国境内的汉人地区，已经基本上成为传统的中原式国家。

然后，就是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经济与文化策略问题了。这个策

略问题到孝文帝时一举确定答案：迁都、汉化、南征，并义无反顾地全力推动。

深入北魏孝文帝的内心

研究历史、了解历史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收集到足够的背景资料后，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基于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从他、她或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自问：“如果是我（我们），会怎样想？怎样做？”北魏孝文帝490年亲政以后的所作所为，如果用这种方法理解，将不难体会他决策时的思考方式，找出他在仅仅9年之间施展出如此大动作，又迁都又汉化又南征的原因。

490年冯太皇太后去世，孝文帝拓跋宏亲政，那年他24岁。对于这个年纪还轻，但已在祖母身边实习了19年的皇帝而言，自己终于能实际掌控政治权力，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当时他所面对的环境是：

第一，北魏的南方国境在淮河一线，长城以南约占全国疆域的一半，而且农业发达，人口密集，成为帝国的重要部分。从山西北部的首都平城发号施令，统治这片以汉人为主的土地，虽然并非不可能，但终究有其不便。过去建都平城在战略上的理由，是因为此地接近蒙古草原，以此为基地，随时可以抵御新兴草原民族的侵扰。拓跋部南下时，原居住地空虚，后起的柔然部趁机填补其空缺，转趋强大。同属鲜卑族的柔然在北魏建国时强盛，屡次威胁北魏的北方边疆，北魏不得不将军事与政治中心放在平城，随时出兵对付。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北魏屡次击败柔然，到孝文帝时，柔然已经不构成严重威胁。北方边疆大致平定后，北魏对外战争的焦点改为南方边疆，国家的重心也变成长城以南地区，平城的战略地位大不如前，其不便之处则渐渐显著。这种状况必须因应。

第二，北魏南方的国界已经拓展到淮河岸边，深入南方后，战场的地理环境是江河纵横，城池林立。北魏面对南朝的战争形态，变成不再是大草原上两军以骑兵对决，而是攻城与守城之争。这种战争形态旷日持久，攻方必须不断投入粮食、武器与补充兵源，守方则城内坚守待援，后方另派军队解围，以求内外夹击制胜，故不论攻守，都是后勤基地与战场间的距离越短越有利。又因战场情势随时可能改变，指挥官与第一线之间、前线指挥官与中央领袖之间的联系沟通甚为重要，在当时讯息传递仍然很原始的状况下，中央与前线沟通所需的时间越短越有

利。北魏的主要粮食产地与人口密集区在今日的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到河南北部一带，可以就近向南支援淮河战场；然而北魏的首都在山西北部的平城，距离淮河前线遥远，交通不便，讯息传递需时甚长，皇帝如果希望迅速掌握战争状况，随时适切调动后勤支援，只有御驾亲征，太武帝拓跋焘就是如此。所以北魏假使只想与南朝隔着淮河并立，则建都平城尚可，要是想消灭南朝，统一天下，则应该将后勤基地与决策中心合而为一，作战效率必然大增。这点必须考虑。

第三，孝文帝时首都平城仍是政治中心，有大量非生产人口聚集，如皇家成员、宫女、宦官、贵族、官员及其家属、驻防军队等，平城附近气候寒冷，平地不多，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还常发生自然灾害，无法充分供应首都粮食与日用品的需求，只有从山东至河南的产地向北输送，其运输成本很高。尤其在与南朝作战时，军情紧急之下，首都的供应也不能停止，变成必须同时向南、向北两线输送，会造成运输成本大增，运输工具与人力调度困难。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第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势如破竹，却在长江边自动北返，表示单凭鲜卑族的骑兵，并不足以消灭南朝，一统天下。那么，联合其他胡族共同出征如何？前秦苻坚曾尝试组成五胡联军攻打东晋，结果非但失败，其他四胡的军队还趁机调转枪口，成为他的掘墓人。由此看来，欲做整个中国的主人，只有使用汉人的方法，才能征服汉人的土地，更深远、更全面的汉化遂成为必须。然而平城接近塞外，作为北魏这个鲜卑国家的首都，城内及周遭住有大批鲜卑贵族，对于过去北魏政府提拔汉官、推展汉化的政策，许多鲜卑人早就不以为然，深恐因此失掉权势地位，常伺机反扑，崔浩之死就是他们反扑的结果。全面汉化的做法必然损及鲜卑贵族的自尊心与既得利益，在平城那个鲜卑保守气氛浓厚的地方进行，不但反对者众，事倍功半，困难无比，甚至保守派还可能谋划出弑君的阴谋。北魏历史中不乏弑君的先例，有心人再干一次，也不是不可思议。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

分析至此，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迁都。

迁都洛阳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启动迁都洛阳计划，这并非明白发布诏书，公开办理，而是在精心布置下，运用政治权谋的秘密运作。孝文帝先下令建造黄河浮桥、立太子、戒严，做足亲征南方的姿态，然后在平城召集群臣，义正词严地宣布讨伐南齐，亲自率领三十多万大军南下。出发时有臣下建议皇上携带一些宫女同行，孝文帝下诏说战争期间不近女色，公开严词拒绝，这等于宣布皇帝本人把所有女眷留在首都，全体将士当然要比照办理，间接表示大家仍然在平城安家落户，用以隐藏迁都的企图。

大军南下，渡过黄河，抵达洛阳。此时恰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孝文帝仍然披甲戴盔，骑马出营，摆出继续亲征的架式。群臣拦住马，叩头请求不要再进兵，孝文帝才停止南征。这是不是另一场安排好的政治秀不得而知，但如此一来，这次浩浩荡荡的“南征”一场仗也没打，孝文帝宣布解严，筑坛禀告祖宗决定迁都，这才将此行真正的目的曝光。此后孝文帝巡视黄河以南地区，转到邺城，在此地新建的行宫中举行太和十八年（494年）元旦大典，显然在评估究竟选择洛阳还是邺城做新首都，闰二月才回到平城。在旧都，他先召见留守群臣，说明迁都的计划，又到西北边区巡视一圈，抚慰守边将士，安定边区人心，再回到平城后，于十月份正式下令迁都洛阳。迁都的部署与实行费时将近一年半，从孝文帝如此苦心孤诣地规划与按部就班地执行，可见这是多么重大的事。

迁都洛阳的确意义重大，它是一场政治赌博。

一场用国家、民族下注的豪赌

对于孝文帝、鲜卑族与北魏政权来说，定都洛阳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举动。由于在当时的北魏帝国中，鲜卑族仅占人口的少数，拓跋氏更是鲜卑族中的少数，这样少数的统治者在深入汉人地区的洛阳建都，距离塞外草原非常遥远，一旦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集体造反，在洛阳的鲜卑人将被层层包围，绝无逃出的可能。五胡十六国时期，350年发生的“冉闵屠胡”事件使邺城的胡人遭集体屠灭，距离当时并不遥远，胡人

都该记忆犹存。

中国历史上北魏以后的金、元、清三个外来民族朝代有两项共同的特色：一是至少统治黄河流域，即半个传统中国领域，这与北魏相同；二是只要没有来自更北方的威胁，就始终都建都于北京，只有金朝末年在蒙古威胁下才迁都汴梁。但建都北京却与北魏孝文帝的做法背道而驰。

北魏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外来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时竟有不约而同的考虑，实际上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相对于汉人，本族人口在中原地区处于绝对少数，因此统治中原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北京距离长城很近，万一汉人全面反叛，实在无法抵挡时，皇帝、皇家与重要族人可以迅速撤退到塞外，徐图再起，不至于淹没在汉人的大海里，全体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沿用几百年的政策在元代末年曾实际发生作用。当1368年朱元璋派遣的两路北伐大军势如破竹，即将冲抵元的首都大都（今北京）时，元朝在中国的最后一任皇帝顺帝率领亲属与蒙古贵族打开大都的北门，及时逃到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至此明朝虽然推翻了蒙古统治，但并未消灭蒙古人，随后双方以长城为界，塞外的蒙古人仍然能够与明朝持续对抗两百年以上，1449年还有能力在土木堡一战中大败明军，俘虏明朝的皇帝英宗。

北魏建国之初，在长城以南只拥有山西北部，地盘不大，没有上述的顾虑，建都平城是自然之举。到孝文帝时北魏已经拥有黄河流域数十年，但仍未迁都，也未始没有上述的考量。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深入汉人地区，可说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押上的赌注是北魏的国运、鲜卑的族运和他自己的性命，赌的是这样做能迅速将北魏转变成中原国家，取得中国的正统地位，进而消灭南朝，统一天下。

这场自断退路的豪赌等于自废压箱底的武功，显然只可以赢，不可以输。迁都洛阳后，北魏中央政府已深入汉人地区。在这种前提下，必须追求在最短时间内取信于汉人，让中原地区的汉人很快认同这批南迁的鲜卑人，以求从此泯灭族群界线，双方水乳交融，合作建立新魏国。其做法就是汉化，而且必然是激烈的极端汉化、迅速汉化。总之，孝文帝既然必须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鲜卑旧风俗、旧习惯，将鲜卑人改造成汉人，以求尽快融入汉族，则汉化势必走向极端，采取无条件、无退路、孤注一掷的全盘汉化政策。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条件引进文化并全面采用的事例十分罕见，

通常一个政府决定引进外来文化，大多不会抛弃本身的文化。19世纪后期全世界非西方地区都面临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势力，许多国家、民族被迫采取学习西方的政策，但大都不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于是产生文化妥协现象。这种文化妥协的表现，在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思想，旧道德”等，在日本是“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在奥斯曼土耳其、印度、泰国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状况。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做法，是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案例。

孝文帝决定将北魏置之死地而后生，迁都南方后，还必须选择新首都地点。以当时的情况看，从历史声望、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及组成、经济条件、军事条件等因素考量，候选地不出邺城、洛阳二处。邺城[3]位居河北省南部，黄河北岸的支流漳水边，附近是大平原，农产丰富，漳水可通航，交通便利，自三国时期起就是华北的重要城市，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冉魏、前燕都曾建都于此，在南北朝时期，许多北方汉人世家大族也聚居于此。洛阳则位居黄河南岸的支流洛水穿过的洛阳盆地中，腹地较小，经济条件逊于邺城，但历史声望超高，是西周陪都，东周、东汉、西晋首都，作为中国政治中心之一已有千年。

也就因为如此，洛阳地区战争频繁，屡次遭受兵火的破坏，当时人口反而不多，世家大族也少。依此分析，邺城在经济、人口等方面领先，面对南北战争也比较安全；洛阳则在历史声望上是不二之选，却因位居黄河南岸，暴露在南朝攻击范围内，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却不可以守的位置，兵法上真正的“死地”。北魏孝文帝以前，洛阳曾在356年东晋桓温北伐、416年刘裕北伐、430年南朝宋文帝北伐时三次被南方攻下；孝文帝以后，528至529年也曾被南梁的北伐军占领过。孝文帝应该不会不明白洛阳军事地理位置的特性，但仍然选择在洛阳建都，代表他确实胸怀大志，要做全中国的领袖，在处理国家大政上凡事敢作敢当，充满积极主动精神，在制定国家战略上放弃防御思考，选择背水建都，自居死地，采取全面攻势政策。

自从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世家大族不分南北，大致倾向以保持本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为考量重点，并不乐见南北双方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北魏孝文帝追求统一必定导致积极南伐，这从他不选择比较安全，也是世族根据地的邺城建都可以看出，这样一来，其实并不符合北方世族的家族利益。所以《魏书》记载孝文帝巡视邺城时，当地汉人世族对迁都洛阳都不赞成，迫使孝文帝在493—494年间四度前往邺城与他们沟通，他们的态度仍未改变。这应该也是孝文帝

最后舍弃邺城，选择洛阳的原因之一，毕竟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希望首都的地方精英处处跟自己过不去。

不留退路的极端汉化

孝文帝立志做全中国的主人，因而决心汉化，迁都洛阳。迁都洛阳后鲜卑族与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后路可退，汉化就成为必须，而且必须全面进行，彻底推动，尽快实现。这种无路可退的处境来自迁都，是孝文帝自己一手造成的，更是他主动选择的，所以全面汉化与迁都洛阳其实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有其一就不可缺其二。

由此可知，北魏孝文帝迁都与汉化，是为达成远大目标的两阶段做法，而且采取极端路线，完全不留退路，种种规划出于他的个人意志。注重意志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如果有机会读史至此，应当会感叹“吾道不孤”“这个拓跋宏果然深获我心”。在意志推动下，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勇猛前进，迅速推出各种政策，实属必然。这些汉化政策包括：

改服装

494年最早推出。汉化首先就是改变衣着，规定人民改穿汉服，不得再穿胡服。衣服是人身份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义，胡服一禁，所有国民看上去全部成为汉人的样子，为汉化首要之举。

改籍贯、禁归葬

495年推出。规定迁居洛阳的鲜卑人，提到籍贯不得再称“代人”，必须改称“河南洛阳人”，且死后葬于洛阳，不得归葬北方。在此政策下，洛阳北郊的北邙山不久就充满洛阳鲜卑人的墓园。这种以落地生根取代落叶归根的政策，断绝了鲜卑人对故土的留恋，是使他们彻底汉化的重要手段。若不如此，鲜卑贵族生前住在洛阳，死后葬在平城或更远，家族墓地不在洛阳，难以对中原产生全面认同，终将无法成为中原世族。

禁胡语

孝文帝推动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495年将北魏帝国的官方语言改变，规定此后不准说鲜卑语或其他胡语，必须全面改说汉语，从朝廷命官开始做起。孝文帝的语言政策也考虑到了实际状况，规定：30岁以上的朝廷官吏，语言习惯难改，可以采取渐进方式办理；30岁以下的

朝廷官吏，则强制不准再说旧日语言，若故意违反，会遭贬官甚至开除。

禁止胡语政策是否有配套措施不得而知，但以孝文帝的聪明，应该有所准备。不论如何，这道命令一下，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洛阳鸡飞狗跳的样子，大群鲜卑官员忙着请老师，学汉语，心里揣摩着明天早朝如果皇帝点到自己问话，要怎样操着汉语答复。由于鲜卑语属于阿尔泰语系（Altaic languages）或蒙古语系（Mongolic languages），与属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s）的古汉语发音、语法等相差甚远，尤其缺少汉语声调的差异。古代汉语原有“八音”（八个声调），以鲜卑语为母语的人即使努力学习，仍无法完全发出这八个声调，很难将汉语学得道地。因此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开始，中国北方地区的外来民族不断学习汉语，却又发音不全的现象持续发生，遂使黄河流域通行的汉语逐渐发生变化，丧失部分声调，又经过金、元、清的统治，最后成为今日的普通话，只剩四声。

禁胡语也涉及政府公文。孝文帝规定北魏公文书中本来以鲜卑语发音的名词停止音译，改为意译，例如“可汗”改为“皇帝”、“可孙”改为“皇后”、“莫贺”改为“父”、“么敦”改为“母”、“阿干”改为“兄”等。由于鲜卑人可能没有本族文字，即使有也未能流传下来，因此这些记录的史料价值相当宝贵，等于是古鲜卑语-古汉语辞典。

改汉姓

鲜卑人的姓氏用汉语发音通常要用到二至三个字，过去写出来都是复姓。496年，孝文帝下令这些姓依照发音相近的原则，全部改为汉人的单姓。孝文帝先行示范，将拓跋氏改为元氏，从此他的名字成为元宏，不再是拓跋宏。当时众多的鲜卑姓氏改变，不少改成相当普遍的汉姓，例如下方表格所示。

鲜卑姓氏	拓跋	纥骨	独孤	丘敦	步六孤	叱罗	贺赖	侯莫陈	丘林	拔列	是楼	出大汗
汉　姓	元	胡	刘	丘	陆	罗	赖	陈	林	梁	高	韩

所以现代许多汉姓的人士，实际上一千五百年以前的祖先可能是鲜卑人，而中华民族也就这样不断加入外来血统，不断演化，不断扩大。

通婚

婚姻是孝文帝汉化政策中的要点。孝文帝下令禁止同姓的鲜卑人结婚，并且积极宣导推动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的冯皇后的家族长久与拓跋氏通婚，已经属于汉胡混血，此时他又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入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这些才是纯粹的汉人女子。上行下效，北魏皇室和许多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子为妻妾，例如孝文帝的弟弟元勰就娶陇西李氏世族高官李冲之女为妻，北魏皇室公主和鲜卑贵族的女儿则有许多嫁给中原世族。迁至洛阳的鲜卑人的原有姓氏既不复存在，其鲜卑血统又与汉人血统大融合，很快，彼此间的差距缩小，鸿沟弥平，达到孝文帝汉化的目的。

北魏宫廷的这种政策与清朝皇室的婚姻及宫女制度恰好成为两个极端。清朝选择皇后多在满洲八大贵族中，又规定非八旗女子不得入宫，为的是保持皇室的旗人血统，同时减少汉人民怨。

同样是从东北入主中国的皇朝，北魏和清朝在皇室婚姻与后宫制度上竟截然相反，正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在面对统治绝大多数汉人时的不同考量。

尊孔崇儒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立即下令修建孔庙，并以皇帝的身份到孔庙祭拜孔子，又给予孔子后人土地和财产，让他们继续孔庙的香火。此举等于宣告北魏以儒家为立国思想，在儒、释、道三家思想激烈竞争的南北朝，自有其借由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宣示正统地位的意义。

改官制

孝文帝采取曹魏与西晋的制度改革官制。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将军（征东将军、镇南将军等共八名余类推）和九卿等中央文武官员；地方上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使北魏成为采用汉式官制的国家。

修订法律

孝文帝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斩刑之前男女皆除衣裸体等旧法。他参与制定律令，咨询汉人世族意见，最后亲自下笔定稿，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亦属罕见。

注重汉式教育与艺文

孝文帝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能讲解“五经”、讨论儒家的丧服制度，对史书传记、诸子百家也涉猎颇多，还能以汉文写诗。迁都洛阳后积极创办学校，搜集、整理天下书籍，鼓励鲜卑人学习汉文化，经过他的努力，五胡十六国战乱以来衰落的北方汉文化开始复兴。

恢复佛教

北魏太武帝灭佛使北方佛教大受打击，其孙文成帝为虔诚的佛教徒，即位后停止灭佛，佛教开始复兴，献文帝时继续。孝文帝是献文帝之子，受父亲影响，仍然采取提倡佛教、优礼僧人的政策。在平城时，孝文帝就礼敬来自印度的高僧跋陀，为他在云冈石窟中凿龛；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又将跋陀请来，于太和十九年（495年）为他在嵩山建造少林寺，从此少林寺一直延续到今天，跋陀则成为这座举世闻名的佛寺的开山祖师。

洛阳作为北魏首都后，人力与财力都不成问题，佛教信众遂开始在洛阳郊外的龙门开凿石窟拜佛，此后持续进行，使龙门石窟成为中国佛教三大石窟之一，是佛教石刻艺术重镇。孝文帝时期，山西北部五台山的佛教也转趋兴盛。凡此种种，都使佛教在中国北方根深蒂固，也带动起佛教艺术的发展。

总之，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若从文化交会与文化学习的角度看，实为一场全面、大胆而不留余地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变动实验，可称“全盘汉化”。民国初年西方思想在中国流行并大受崇拜，中国思想界产生“西化派”，主张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其主张若真能实现，那时的景象大约可以用此案例做一些推测。

孝文帝的南征与逝世

孝文帝的确有志于南征，南征并非他为迁都编出来的借口，这从他完成迁都后的所作所为可以明白看出：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月正式迁都，十二月即行南征。

太和十九年（495年）正月渡过淮水，二月登淝水之战时著名的八公山，路逢大雨，还与军队共同淋雨，以示同甘共苦，又赦免被俘的三千名南齐士兵，将他们遣返南齐，以进行政治作战。此后巡行淮河流域各地，五月才回洛阳，九月将后宫及随同迁都将士的家眷全部接到洛阳。

太和二十年（496年）处理几次叛乱事件，暂停南征。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八月再度南征，此次主攻西线，亲自率军出击河南、湖北交界地区，包围新野城。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正月攻克新野，二月大破南齐援军，杀死两万多人；十月转往东线，病重，经征召名医徐謇治疗后好转，返回洛阳。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正月至邺城，三月南征，连续获胜，却再度发病；四月病重逝世，得年三十三岁。

总计孝文帝从迁都到死亡之间的四年半中南征三次，都是亲自领兵，共投入约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加上平定后方叛乱与巡视邺城，他留在洛阳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半，还要颁布并推行如此多的法令、解决后宫的家务事（按，极为精彩，详情后述），实在是忙到团团转。从这个观点看，孝文帝的最后六年，就是一场意志与时间的赛跑，急于求成之下，身体健康不在他的考虑之列，终于促成他英年早逝，统一天下的宏图随之付诸流水。

至于孝文帝的死因，有人认为是肺结核，此因历史记载他的病情拖延，而且逐渐加剧，发病时曾自己形容“心容顿竭，气体羸瘠”，他的弟弟元勰也说他“气力危惙”。他的病在498年冬天就已经非常严重，经过名医徐謇诊治后曾见好转，却在次年三月南征途中复发，终告不起，这

些都比较符合肺结核的病况。他定计迁都后不停地紧张操劳，健康必定大受损伤，一旦染上任何慢性消耗性疾病，必将导致身心衰竭而死。由此看来，北魏孝文帝是一个以身殉事业的皇帝，殉身的原因在于他所图谋的事业太大，而且根本不是他的有生之年所能完成的。

孝文帝汉化的意义与影响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出现在493—499年间，也就是他在位的最后六年。这段时间的北魏，可说是全看皇帝一个人指挥，众位鲜卑与汉族臣子只是配合演出而已。如此激烈的汉化政策，必然有反对者，少数不愿配合皇帝演出的，就立刻与皇权发生冲突，惨遭消灭，至少也被投闲置散，从中央权力结构中退出。反对汉化最戏剧性的一个人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太子拓跋恂，身为太子的他随父定居洛阳，却因身体肥胖，不喜欢洛阳对他而言太热的天气，鲜卑贵公子的个性发作，居然趁父皇出巡，企图骑着好马溜回平城，还亲手杀掉了进谏的汉人臣下，快要出城时才被城门守将挡下。孝文帝闻讯大怒，赶回洛阳后召集几个弟弟，共同以家法惩治这个不肖子，轮流用棍棒揍了他一百多下，将他废掉后杀死。对于公然抗拒迁都与汉化两大政策的人，从拓跋宏变成元宏的孝文帝绝不手软，即使是对自己的接班人，也绝不手软。

迁都洛阳以后，孝文帝风尘仆仆，奔走各地，在洛阳的时间并不多，但他随时注意汉化政策推行的成果，不放过任何微小的征兆。一次他远征回来进洛阳城时，注意到有马车上的妇女头戴帽子，身穿窄袖短衣，依旧胡人装扮。这位皇帝当场并未发作，第二天找来辅佐太子留守洛阳的堂叔任城王元澄问话，史书中留下一段精彩的问答：

孝文帝元宏：经营国家的根本，以礼教为先。自从朕离开京城以来，礼教有没有日新又新？

任城王元澄：臣认为是日新又新。

孝文帝元宏：朕昨天进城，看见马车上的妇女有头戴冠帽，身着短衣的。这些人如此做，尚书为何没有察觉？

任城王元澄：这样穿的比不这样穿的还少些。

孝文帝元宏：这真奇怪！任城王想要大家都这样穿吗？古人说“一言可以丧邦”的，就是这个吧？应该要史官记录下来。

迁都洛阳以来，孝文帝对儿子、堂叔都如此不讲情面，显示国家权力已经集中于皇帝本人，北魏至此才彻底摆脱游牧部落联盟的残迹，不再受到传统鲜卑贵族的牵制，成为道地的君主专制帝国。

通过这次汉化运动，北魏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皇帝得到最大部分，其余由皇室元氏家族与北方的世族共享。此时的北方世族当然包括迅速汉化的旧日鲜卑贵族，于是北魏成为皇帝—皇族—世族—百姓的标准魏晋南北朝式国家。当年崔浩希望通过“分明姓族”“整齐人伦”“复五等之爵”[4]，使北方世族纳入北魏政府体制，却遭到鲜卑贵族反扑，以致惨死，固然是汉人的大失败，也使北魏皇帝与拓跋皇族真正掌控国家的时间延后。所以孝文帝拓跋宏究竟是想掌握大权，做个真正的皇帝才迁都、汉化、南征？还是因为胸怀统一天下的大志，才以迁都、汉化来掌握大权，以便施展抱负？又或这两种想法曾在孝文帝脑中反复纠缠，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势必因个人立场与思考方式的不同而见仁见智，有所差异。诚如克罗齐的话“一切真历史皆当代史”，在此只有请诸位读者自行判断了。

总之，北魏这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应该从鲜卑人，尤其是最高层鲜卑统治者的角度观察与思索，才能得其真相。转折之后，北魏已非旧日在平城的北魏，诚如孝文帝最有才华的弟弟元勰于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奉皇兄之命，在十步内吟成的诗：

问松林

北魏 元勰

问松林，松林经几冬？

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

经过如此激烈的变革，正如元勰的感触，北魏的山川已不如昔日之貌。此诗吟出两年后，孝文帝去世，北魏的新问题不久就随之扑面而来，那将是我们在下一章中探访的目标。

【注释】

[1] 即粮食。

[2] 无偿义务劳动。

[3] 今河北临漳。

[4] 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第三章 绮丽对质朴，文野起冲突——北魏的分裂与内乱

南望金辉照碧萝，洛宫风送白花歌。

一城声色追权势，六镇烽烟起盾戈。

汉化但知骄部曲，胡氛不改崇马驼。

河阴沉水三千贵，地下元宏泣逝波。

1974年12月中旬，我服役期间在政治作战学校受训，一天晚上轮到站12时至2时的卫兵岗，从被窝里被前班卫兵推醒，匆忙着装、背口令，接哨后手端步枪，腰挂刺刀在营房外巡逻。时值深冬，月色凄清，一阵冷风吹来，不觉连打几个寒颤。转头一望，新北投方向的天空仍然霓虹灯闪烁，呈现诡异的红红绿绿颜色，那卡西的歌声随风隐约可闻。

是的，北魏后期驻守西北边区的军人也面对类似的状况，只是他们的反应是抄起枪杆，杀向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首都洛阳。

凉风起天末：孝文帝的家务问题

迁都、汉化政策实行后，北魏很快遇到新一波的问题。最早的问题竟然出现在孝文帝的家庭中，这恐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490年，孝文帝在祖母冯太皇太后去世后亲政，立冯氏为皇后。这位冯皇后出身长乐信都冯氏，家族与拓跋氏几代通婚，她是高官冯熙与博陵公主的女儿、文成帝冯皇后的侄女，可谓亲上加亲，尊荣已极。然而冯家一如古代将女儿嫁入后宫的家族的传统，出嫁的不只一个。在冯皇后以前，冯家已经有一对姊妹入宫，都成为孝文帝的嫔妃，其中一位早死，另一位冯氏美丽娇媚，甚得孝文帝宠爱，但因生病，被太皇太后遣送回家。祖母既然不在，孝文帝难忍对她的思念，遂将她再度迎接入宫，封为昭仪。冯昭仪是冯皇后同父异母的姊姊，又早经入宫，却因母亲出身婢女，不及妹妹高贵，只能身为嫔妃，对此耿耿于怀，遂千方百计攻讦皇后妹妹，终于说动孝文帝，废冯皇后，以冯昭仪取代。第一位冯皇后“贞谨有德操”，并不争斗或抱怨，被废后出家为尼，得以善终。北魏版的宫斗至此告一段落，但更大的问题接着开始了。

此时北魏已经迁都，孝文帝屡次南征，长年在外，美丽娇媚的第二位冯皇后居然在洛阳公然与人私通，情夫名叫高菩萨。恰巧孝文帝之妹彭城公主丧夫，冯皇后向孝文帝为她的同母弟冯夙求婚，孝文帝同意将妹妹嫁给冯夙，公主不愿，冯皇后定下日子要强迫公主再嫁，公主就带领十几个侍从溜出洛阳，乘坐轻便的马车在雨中奔驰，直到南方前线面见皇兄，当面诉说不肯嫁冯夙，还把皇嫂养情夫的事和盘托出。当时已经病重的孝文帝闻讯大为惊愕，还不敢完全相信，只得赶回洛阳亲自处理，于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皇帝夜审皇后事件登场。

孝文帝回到洛阳就逮捕了高菩萨与皇后身边的宦官、侍从等，审讯明白，晚上命令高菩萨一干人等站在室外，再召来皇后。冯皇后到达时，皇帝下令搜查皇后，只要找出一寸长的小刀，就立刻斩首。皇后进屋后哭着叩头赔罪，孝文帝命皇后坐在离自己两丈远的地方，然后叫高菩萨等人招供，责备皇后说：“你有什么妖术，都说出来。”皇后要求左右人员离开，皇帝下令其他人离开，只留下一名官阶三品的太监白整在侧，拔出卫士的一把刀指向皇后，皇后还不肯讲。皇帝就用丝絮牢牢塞

住白整的耳孔，小声呼叫，白整毫无回应，这才命令皇后说。皇后说了些什么，史书说事情隐秘，无人得知。皇后说完后孝文帝喊两个亲王弟弟进来，说："从前是你们的嫂子，今天就是别人，进来不用回避。"然后对两个弟弟说："这个老女人想把白刀子插在我肋上，你们仔细问明白来龙去脉，不要顾忌。"又说："冯家的女子不能再次被废，姑且让她闲坐在宫里，要是有心就自杀好了，你们不要说我对她还有情分。"夜审之后孝文帝赶回前线，继续南征，冯皇后留在宫中，仍然有皇后的待遇。不久在前线的孝文帝病情恶化，自知不起，遗命要冯皇后自杀，但以皇后的礼节埋葬。孝文帝死后，白整等人执行遗命，冯皇后还不肯接受，被强迫灌下毒药而死，谥号为"幽皇后"。

这是一则精彩的八卦，在中国历史上的宫廷八卦中特别突出，被后代许多好事者津津乐道。对我们探访北朝历史而言，八卦之余，应该思考的则是它在文化变迁上的意义。北魏孝文帝是个汉化唯恐不及的皇帝，若以中国传统典籍《大学》所立的人生标准而论，他在"诚意、正心、修身"三项都表现优良，但到"齐家"一项就不及格，虽然在"治国"上努力以赴，也获有一些成绩，但并未克竟全功，当然就无法"平天下"。孝文帝为何不能齐家？可能的答案是他既然全盘汉化，则他的家若要齐，就必须让家人都符合传统儒家的标准，全都跟着汉化。可是他的第二位皇后冯氏显然完全违反"嫡庶有序""姊友妹恭""贞节""温良恭俭让"等中国传统家庭的基本伦理与妇女品德，充满我行我素的北朝豪放女性格，身上存在着游牧社会女性的烙印，当然无法成为一个汉文化帝国的六宫之主；他的太子根本拒绝汉化，一心只想回平城旧都，甚至他妹妹彭城公主不满哥哥、嫂嫂安排的婚姻，就溜出首都到前线告状，也是一个游牧民族女子的行径。这一切可以说明拓跋皇室家族本身汉化的困难。

孝文帝全盘激烈汉化面对的阻力太大，迫使他必须施展全力对付鲜卑贵族、朝中大臣、汉人世族、南征军队、西北边区……却可能因此忽略自己身边的家人。结果汉化的皇帝与仍未汉化的皇后、太子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导致孝文帝家庭的这一连串悲剧。就文化而言，元恂太子与第二位冯皇后的悲剧，早早说明了孝文帝全盘激烈汉化政策中，鲜卑族传统的疏离与对抗。孝文帝汉化带来的隐忧若是一座冰山，太子、皇后的事件就是冰山露出的那一角。

南迁、汉化与北魏衰落

孝文帝拓跋宏为求在中原生根，进而兼并天下，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迁都洛阳，继之以激烈的全盘汉化政策，完全不留退路，希望短期内将鲜卑族融入中原，甚至因此逼死了不愿汉化的亲生儿子。结果随同他南下的鲜卑人果然迅速汉化，形成一个汉化鲜卑的世族集团，但也迅速腐化，并且从鲜卑的传统中疏离出来，变成与汉人皇族或世族无何差别，结果几十年后就不得不面对悲惨的命运。到北朝末期，这个集团有些成员被消灭，存留下来的则融入北方的世族社会，延续到隋唐时期。

北魏南迁洛阳后，中央政府位于这个帝国的南端，深入农业地区。帝国的重心在此，导致经济上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占国家经济的比重增加，加上丝路贸易带来的财富流入首都，形成一片繁华景象。与此同时，以洛阳为中心的鲜卑贵族汉化日渐加深，在“饱暖思淫欲”之下，北魏统治者日趋腐化，追求享受的风气大起，贪污聚敛，吏治随之逐步败坏。例如当时的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其住宅、园囿像皇宫一样豪华，家中僮仆多达六千，侍女五百，一餐花费数万钱。河间王元琛常想和元雍“斗富”，他以拥有西域珍宝著称，家中畜养骏马十余匹，马槽用银制，窗户装饰着玉凤、金龙，饮宴时用水晶、玛瑙、红玉酒杯，都是异域产品，旁边陈列各种珍宝，喝到差不多就带领宾客参观仓库，只见金钱、绸缎堆积如山，无法估算。这两人斗起富来，奢侈豪华程度甚至超过斗富开山祖师——西晋的石崇、王恺。主管政府人事的吏部尚书元晖被称为“饿虎将军”，只因他卖官鬻职都有定价，当时的吏部成为卖官市场，花钱买官的人自然是将本求利，无一不贪，这些官吏被民间称为“白昼劫贼”。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也聚敛无已，征收租调税收时，将官方度量衡器具放大，采用长尺、大斗、重秤收税，公开加码，剥削人民。

就在这时候，南朝梁建立，在梁武帝萧衍统治下日趋强盛，屡次主动北伐，南北战争激烈。为支持战争，北魏的兵役和徭役大量增加，大批农民本来就已经被赋税加码与官吏贪渎逼得透不过气，此时加上兵役和徭役，许多小农因此破产，甚至家毁人亡。破产的农民纷纷投靠豪强，重新沦为世族的依附人口，有的则出家为僧尼，以逃避赋役。当年

冯太后苦心孤诣推动的均田制迅速损毁大半，北魏政府控制的编户人民日益减少，政府收入随之减少。北魏统治者面对此种状况，反而官官相护，保护贵族利益，加重剥削剩余的编户农民，曾多次实施“检括逃户”，搜捕逃亡的农民，于是激起农民的反抗。515年，孝文帝死后不过16年，冀州僧人法庆领导大乘佛教徒众起事革命，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为口号，一时声势浩大，北魏政府动员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

农业地区的反抗还比较容易对付，但北魏后期面临更深刻的问题：南迁后，国家实际上很快分裂成两半，一半为南迁后汉化的社会，另一半为留守北方维持鲜卑传统的社会。前者高高在上，繁华炫丽却奢侈腐败；后者地位低落，质朴保守却强悍尚武，在文化上尤其格格不入。北魏既然已经在社会与文化上分裂，则中央政府若不能维持二者间的平衡，社会与文化的分裂势将演变成军事与政治的冲突。在洛阳的北魏中央政府显然忽视了这个问题，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越发不能协调，最后双方决裂，全盘汉化的苦果终于浮出水面。524年平地一声雷，留守北方维持鲜卑传统的社会在备受鄙视状况下发生动乱，称为“六镇之变”。这种来自边远地区的鲜卑强悍传统的冲击，终将摧毁这个内部已经腐朽的国家。

孝文帝的遗泽与遗祸

北魏孝文帝可称一代英主、一代贤君，但他于南迁四年后死去，北魏从此走向衰败与分裂之路。对于这样一位君主究竟如何评价？他的一连串政策遗留给北魏的，究竟是遗泽还是遗祸？这是探访北朝历史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早有人讨论。曾纪鑫曾归纳过去对北魏孝文帝的评价，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

一是赞扬肯定。认为他推动民族融合，使北魏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进步。此说也认为，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是褒贬兼有。肯定孝文帝汉化改革，但认为他不该不加选择，将汉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一概吸收。例如汉化确立门阀制度，使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原有军人地位下降，士气低落，鲜卑族失去尚武精神。

三是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消极的，只学到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贪渎腐败，丧失鲜卑人原有的勇武质朴特色。他的改革导致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不论肯定或否定，仔细分析，这些看法都有“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嫌疑。要想得到较为中肯的答案，只有以当时的环境作为大前提，加上当事人孝文帝的目标与意志作为小前提，才能推导出合理的结论。

孝文帝有必须迁都的理由，也以皇帝之尊做出了全盘汉化的选择，但他并没有忘记迁都、汉化后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也曾设法预作防范，这从他宣布迁都后就回到旧都平城，然后立刻出巡西北边区，对这两个地方加以说明及安抚即可看出。这次巡视对西北边区的效果如何，史书并未记载，唯以当时孝文帝的威望，应该至少能暂时消除当地的疑惧，安抚住这些地区。“修补西北围篱”的工作完成后，孝文帝回到新都洛阳，展开他一边汉化、一边南征的伟大事业。不幸的是，他的健康随着到处奔波与过度工作而迅速恶化，遂不再有能力与时间照顾西北边区，不久就去世了。

孝文帝死于南征军中，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南征在外，军务倥偬之际，还要处理皇妹告嫂、皇后偷情这样的家务事，很可能忽略或来不及向497年新立的太子元恪（宣武帝）耳提面命，要儿子特别注意西北边区的潜在危险，妥善因应，预为防范。不过，即使孝文帝曾经这样做过，从史书所记载的宣武帝元恪看来，恐怕他也不会认真执行，因为他在位的17个年头中，一反父亲与祖先们巡行帝国各地的常态，居然没有离开过洛阳一步！性格温和、懦弱的继任皇帝带头遗忘半个帝国，上行下效，孝文帝迁都、汉化的副作用遂迅速浮现。

从此在这种状况下，西北边区与洛阳中央很快越行越远。洛阳中央不但并未发现或重视国家实际已经分裂的问题，反而越发贪图享受，贪渎腐败。统治者堕落，中央政府必然迅速衰落，此时却还要作威作福，终于导致国家内部被忽视与被歧视的一半以武力反抗，衰落的中央无法招架随之而来的动乱，北魏也走到终点。

北魏的历史如此，对于同样处境的后代王朝而言，就成为一个负面的先例。以后的北方民族征服王朝如辽、金、清，似乎都曾以此为鉴，在全国一部分属于汉文化区，一部分不属汉文化区的局面下，建都于二者交界的北京，对二者采取不同的方式统治，并以同等重视的做法维持双方平衡，故能避免二者决裂，国家也能存在较长的时间。例如辽以燕京[1]为南都，皇帝每年依季节游走于各都之间，使全国各种不同的地区都得到照顾，全国官署还分为管理汉人的“南面官”和管理非汉人的“北面官”二系统；清代前期皇帝常常举行“木兰秋狝”，每逢秋季率领大队人马赴关外狩猎练兵，同时接见草原民族领袖，处理大清帝国非农业地区的事务。道光以后，木兰秋狝不再举行，清朝也进入衰败期。

孝文帝的作为，使北魏成为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确立北魏对淮河以北地区的长久统治，洛阳也迅速繁华起来；他的汉化政策，使北方民族融合的速度增加，民族冲突的苦难减少，种种成果，都是他带给北魏与中华民族的遗泽。然而他的计划过于庞大，意志过于刚强，生命过于短暂，结果事业未能完成，继承人也未曾调教妥当，又输掉了事业与健康的赛跑，赍志而殁。他死后留下北魏帝国内部两个地区间巨大的差异，渐渐从互相轻视变成敌视，累积到临界点后一举爆发，不可收拾。北魏后期的历史，其实可以视为孝文帝一面倒文化政策的后果。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激进政策，北魏在汉化的大方向不变之下，汉化的速度应该会减缓，带来的冲击也随之变小、变慢，全国比较容易协调。孝文帝激进的汉化政策加上配套措施不足，使潜在的问题扩大并提早显现，因此

也可以说是他给北魏的遗祸。

北魏后期诸帝

北魏从孝文帝之子宣武帝在位时起，迅速步入后期的衰运。北魏后期的皇帝与皇室在历史课程中受到的关注一向比较少，导致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识也比较少，为此在探访北朝的过程中先行略述，毕竟他们主导着北朝后段的发展与演变。这又是一段读起来让人不很舒服的历史，请先有心理准备。

宣武帝元恪（483—515年，得年33岁，499—515年在位）

孝文帝元宏第二子，母高昭容，17岁即位，最初由六大臣辅政一年多。

宣武帝是父亲迁都与汉化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也是个彻底汉化的皇帝。501年开始亲政后，他下令大举扩建京城洛阳，拒绝旧鲜卑贵族迁回故里的要求，继续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在他的统治下，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完全巩固，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帝国南部，民族差异缩小到几乎消失，政治、社会与文化则趋向门阀化，汉人与汉化鲜卑人的世族兴起，渐渐向南朝看齐。

然而这种状况也使元氏皇族趋向逸乐，力量减弱，缺乏皇族的能臣、名将辅佐皇帝，果然在507年对南梁的战争中大败，折损兵马十余万，武器、资材、牲畜、粮食丧失无数，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大幅削弱，更不利于统治整个帝国。至此宣武帝仍然不知警惕，不改得过且过、好逸恶劳的习性，不出洛阳一步。到这个时候，北魏中央等于已经耳目不灵、手足无力，皇帝与政府高官不再了解自己的国家，也不再有能力控制国家的另一半，于是不可避免地，这个国家也离他们远去。再从民族的角度看，北魏皇帝的另一身份是鲜卑民族的领袖，今日鲜卑民族已经是一个消失的民族，几乎没有痕迹留存，也正是在宣武帝作为民族领袖时开始消亡的。

孝明帝元诩（510—528年，515—528年在位，被杀，得年19岁）

宣武帝元恪之子，母胡充华[2]。528年，元诩被其母毒死，只得年19岁。北魏的政治在这段时期迅速恶化，母子亲情、君臣道义、同僚情谊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人性的贪欲与权谋算计，最后赤裸裸的暴力出现，将北魏政权粉碎。

515年，北魏宣武帝病逝，太子元诩继位，年仅6岁，其母胡充华因宣武帝废止“母死子贵”制而存活，成为太后。胡太后当政，小皇帝叔父太傅兼侍中元怿辅政。太后将元怿纳为情人。520年，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火并，胡太后的妹夫元乂与太监刘腾等人密谋，将元怿杀害，又把胡太后幽禁，二人专制朝政。

525年，胡太后发动反政变，重新掌政，孝明帝仍是傀儡。此后胡太后的新情人郑俨、徐纥把持内外，政治每下愈况。528年，因受胡太后掌控，在公众场合只能吟出“恭己无为赖慈英”这样诗句的孝明帝，终于设法向亲生母亲夺权，密召镇守山西的大将尔朱荣率兵入京，以对抗胡太后。恰好此时潘妃生下一女，胡太后遂先下手为强，宣称生的是男孩，大赦天下，同时将亲生儿子孝明帝毒死。

幼主元钊（526—528年，被杀，得年3岁，528年在位）

北魏皇族。528年，胡太后毒死孝明帝元诩，并对外宣称皇帝暴崩。胡太后先是将孝明帝之女伪称为皇子，立为皇帝，后发觉真相难以隐藏，乃改为拥立年仅3岁的元钊为帝。消息传出，天下震惊，都认定太后害死孝明帝。将领尔朱荣以此为借口，另立元子攸为帝，带兵攻向首都，大败中央军，只用了15天就占领了洛阳，元钊及胡太后被俘。尔朱荣将幼主元钊和胡太后沉入黄河，并杀死两千多名大臣。此事发生在黄河南岸，河北岸为阳，南岸为阴，故史称“河阴之变”。

孝庄帝元子攸（507—530年，被杀，得年24岁，528—530年在位）

彭城王元勰（孝文帝拓跋宏之弟）的嫡子，他姿貌俊美，通诗书，有勇力，自幼在宫为孝明帝伴读，与孝明帝颇为友爱。528年，元子攸被率兵南下的军阀尔朱荣拥立为皇帝，实际上是傀儡，还被迫娶尔朱荣之女为皇后。

530年，孝庄帝不堪尔朱家族的压迫，谋杀尔朱荣，尔朱族人尔朱兆立即率领大兵攻入洛阳，将孝庄帝俘虏到晋阳[3]绞死。孝庄帝是个命运多舛的末世君主，528年南梁军兵临洛阳，只得弃城而逃，一年多后，他临死前感触深沉，向佛祖礼拜，发愿生生世世不做皇帝，留下一首绝命诗，道尽他凄凉的末路：

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

长广王元晔（508—532年，被杀，得年25岁，530—531年在位）

尔朱兆立的傀儡皇帝，在位4个月被废，被杀。

节闵帝元恭（498—532年，被杀，得年35岁，531—532年在位）

尔朱家族再一次立的傀儡皇帝。此时尔朱氏被另一军阀高欢击败，节闵帝也于532年被高欢所废并毒死。

安定王元朗（513—532年，被杀，得年20岁，531—532年在位）

被高欢拥立的傀儡皇帝，在位6个月被杀。

孝武帝（出帝）元修（510—534年，被杀，得年25岁，532—534年在位）

北魏最后一位皇帝，为高欢所立的傀儡。534年，他因不堪高欢压迫起而反抗，战败后，逃出洛阳，投奔关中军阀宇文泰，却被其所杀，北魏结束。元修死后西魏定谥号为孝武皇帝，东魏不予承认，称元修为出帝。此后高欢、宇文泰各自拥立一个傀儡皇帝，都自称魏国，史称东魏、西魏，北朝历史进入后期。

北魏宣武帝以后，24年间出现七个皇帝，而且全部被杀，可见其政治动乱的程度。这种悲剧可说在孝文帝、宣武帝时已经形成趋势，但使大局加速恶化，则与胡太后的统治有关。

胡太后当政（515—520年、525—528年）

胡太后是北魏宣武帝妃嫔、孝明帝生母。这位女士是以太后、母亲的身份杀死皇帝（也是亲生儿子）的极少数案例主角。

她容貌美丽，文才颇高，也擅武艺，名字却不得而知。她有位姑母出家为尼，经常出入宫内，就引荐她入宫，她很快受到宣武帝的宠爱。当时北魏后宫实行“母死子贵”制度，后宫女性皆不愿生下皇子，胡氏却感叹国君不可无子，宁可不顾自己的生命。510年，胡氏生下皇子元诩，是为宣武帝的长子，宣武帝已经28岁，在习惯早婚的古代，可谓得子极晚。史书记载当时北魏宫中“频丧皇子”，其中必有非自然死亡者，可见“母死子贵”制度的影响，这也使元诩生下后就被抱走，并非由胡氏哺乳养大，母子感情应该也因此受到影响。

完全汉化的宣武帝废除了“母死子贵”制度，胡氏得以存活。 515年，6岁的元诩登基为孝明帝，胡氏成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以北朝的标准看，胡太后无疑是女性的佼佼者。她美丽非凡，善读书做诗，通晓佛理，箭术高明，吟得出“化光造物含气贞”这样的七言诗句，拉弓射箭可以正中针孔，亲览政务，自批公文，还常接纳人民有冤屈的陈情，亲自考试政府官吏。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她骄傲自大、自我感觉良好的个性与对实际情况的无知与漠视。这位太后曾巡视国家绸缎仓库，后面

跟着一百多人，包括王公大臣、宫廷女性，等等。太后居然下令所有随从人员可以任意搬取绢帛回家，只见众人一拥而上，拼命拿走国家的绸缎，拿走一百多匹还算少的。一位亲王和一位尚书令搬得太多，不堪负荷，摔倒在地，太后叫他们空手而回，成为当时的笑柄。

这件事或许是胡太后操控臣下的权谋，但即使如此，其做法也太不可取，只暴露出太后本人目光短浅、任性妄为、奢侈浪费与对人民血汗、国家资产的轻忽。这种大规模的赏赐时常发生，受惠者都是围绕在太后身边的一群人，永远不及普通百姓。同样的心态也可以解释胡太后对佛教的做法：永无止境地修建佛寺，大规模斋僧，动辄几万人，下令全国各州都必须兴建五层佛塔，于是皇族、高官、宦官、军官等在洛阳竞相建造佛寺，互相比赛高大壮丽。这种种做法在十几年间就使国家府库枯竭，民力疲弊，等到北方军阀的铁骑一来，洛阳全面毁坏，一切的宏伟壮丽都变成昙花一现，只留下《洛阳伽蓝记》这本书中的文字，述说着北魏后期那段短暂而畸形的繁华。

胡太后北朝豪放女的性格也表现在她的感情与性生活上。作为太后，她不乏情夫，这本是北朝宫廷的常态——例如她看上年轻英俊的将军杨白花，便加以“逼幸”，将他纳入情人之林，然而杨白花在不得已出入宫闱后，却嗅出危险的气息，等到父亲一去世，便找个机会投奔南朝去了，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胡太后作为一个有文采的多情女子，当她发现以太后的地位与威权也无法保住中意的情郎杨白花时，便作出歌曲，命几百个宫女列成长排，手臂相扣，以足踏地为节拍，唱出太后的无尽思念：

杨白花歌

北魏 胡太后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这个故事太过鲜明，以至成为诗人吟咏的题材，例如一千多年以后，晚清诗人丘逢甲有诗：

杨花 六首之一

蒙蒙飞送魏宫春，揉雪团云逐塞尘。

燕子不衔窠里去，渡江愁煞踏歌人。

大地震将到时，敏感的动物可能会预先设法逃跑。当北魏宫中响起这首情歌时，曾被胡太后逼上床的杨白花将军已经看清形势，改名杨华，跳下北魏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了。

在北朝与以后的北方民族王朝，太后是否有情人，以及太后是否用情人管理国政，其实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太后是怎样的太后，以及太后的情人是怎样的人。辽朝太后萧燕燕就有汉人情人韩德让，萧燕燕是英明的太后，韩德让是忠心又有才干的大臣，在他们的合作下，稳定辽朝政局，又率军南侵，迫使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辽进入强盛时期。胡太后第一个情人清河王元怿风评不差，却在北魏高层内部夺权斗争中被杀，可是胡太后再度夺权成功，志得意满之下找的几个情人都是谄佞之辈，借着太后的宠幸胡作非为。胡太后用他们当政，只是扩大皇家母子冲突，加速大动乱的到来而已。

孝文帝激烈的汉化政策带来的后遗症在524年正式出现，北魏随即陷入大乱。这场要了北魏帝国性命的大乱，最早的星星之火来自西北边区的基层军民，称为“六镇之变”。

六镇之变

524年（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北魏北方边疆地区爆发大规模动乱。动乱起自六镇地区，故称为“六镇之变”。

所谓“六镇”是六个边防军屯驻处，即御夷镇[4]、柔玄镇[5]、怀荒镇[6]、抚冥镇[7]、武川镇[8]、怀朔镇[9]，都位于阴山山脉南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破柔然后，为保卫首都平城，沿阴山设立六镇，派兵驻防，历代沿袭，成为北魏西北边区的国防要地。又因军队长久驻屯，军眷聚集，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六镇渐渐具有相当的人口与经济力，成为一连串军事市镇，六镇地区也成为北魏国内的边防特别区。

驻防六镇的都是职业军人，本来在北魏的社会阶级中属于贵族，种族则包括鲜卑、汉人与其他胡人，文化为传统鲜卑文化，当地汉人已经胡化，风俗习惯更倾向于鲜卑。孝文帝迁都洛阳、激进汉化后，六镇一带忽然变成国家偏远军事地区，与洛阳的中央差异越来越大。六镇地区鲜卑传统文化深厚，迁都后北魏中央政府忙于推动汉化与对南朝作战，贵族高官则贪污腐败，贪图个人享受，从此根本无暇也没有意愿管理此一地区，导致六镇地区始终无法汉化，在心理上、文化上与中央的差异与隔阂日深。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军事重心变为南方前线，北方防务逐渐不被重视，六镇将领的地位迅速低落。何况自从北魏汉化，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以来，仕宦途径被南迁的世族把持，六镇人以前出仕做官、免除税役的特权都被取消，遂由“国之肺腑”逐步沦落为“镇户”，等于魏晋以来的世袭兵户。当迁到洛阳的鲜卑大族子弟受到汉化的洗礼，通过九品中正制人人荣显、富贵安适的同时，六镇驻军的社会地位却沦落到低层。驻镇军官被排斥在“清流”之外，升迁困难，镇兵的地位更是低贱，与谪配的罪犯和俘虏为伍，受到镇将、豪强残酷的奴役和剥削。北魏南迁后，塞外的柔然部死灰复燃，又转趋强盛，不时进扰掠夺，士卒生活更加危险与困难。北魏政府对此视若无睹，不加理会，反而在眼不见为净的心理下，常将贪赃有据的不良官吏与重刑犯人调入此处，当地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因此更加严重，矛盾更加激化。六镇军民的不满累积超过临界点，终于酿成武装起事，又因基层军民受压迫最重，故叛乱起自基层。

正光四年（523年）底，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因与指挥官失和，杀掉官员造反。后自称“真王”，攻克沃野镇，又北进包围武川、怀朔二镇。不久柔玄镇镇民发动叛变，民变领袖莫折大提攻占高平，关陇响应。至此，六镇尽为反叛镇民所占据。

正光六年（525年）二月，胡太后和孝明帝发动政变，夺回政权，随即派使节出使柔然，要求柔然协助平叛。柔然出兵十万向西进逼沃野镇，连战连捷，大败六镇军，北魏也派元琛率军自平城出发，并分化招降六镇军。525年破六韩拔陵渡河逃亡，六镇之变平定，六镇兵、民二十万被俘，北魏政府将他们迁离家乡，分配在今河北的瀛、冀、定三州就食，至此六镇总算安定下来，然而河北又立即发生问题。

河北民变

六镇二十万被俘兵、民安置在河北三州之时，河北正遭遇水旱之灾，本身粮食已经甚为窘迫，根本不愿也无法分给这些外来人，于是移民大批逃亡，聚集成群，自行觅食，河北到处动荡。525年八月，原柔玄镇士兵杜洛周聚众于上谷[10]起事，北魏出兵镇压，双方屡经缠斗。527年，民变领袖葛荣击败政府军，进逼邺城。528年初，民变领袖杜洛周也攻克河北南部各地。不久，民变军发生内哄，葛荣杀死杜洛周，统领其军。

此时河北的民变军有几十万众，民变的效能扩散，山东、关陇接着爆发民变，其他各地也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民变，北魏中央军疲于奔命，备多力分，已经无法镇压，于是手握重兵、镇守太原的胡人大将尔朱荣变得举足轻重。

尔朱荣早有图谋中央的野心。528年，胡太后、孝明帝母子反目，孝明帝密召尔朱荣为援，尔朱荣求之不得，进军中央，北魏朝廷迅速被尔朱荣控制。尔朱荣随即调动四路大军三十六万人进逼民变军。葛荣战败被俘，押至洛阳斩首，河北民变平定，但北魏政权已落入尔朱荣之手。

六镇之变与河北民变是王朝末年因政治不良与民生困难引爆的基层革命，类似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事、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事、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事、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事、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起事等。这种革命起自基层，一时声势庞大，中央政府本身的力量无法镇压时，往往求助于地方军阀、官员、豪强、世家大族等，给予他们特殊资源，或允许他们有自行招兵作战、自行取得粮饷等特权，结果基层的革命被这些人镇压后，这些人却变得尾大不掉，中央政府空虚化，不久灭亡，全中国也陷于分裂与动乱。

河阴之变与尔朱氏专权

528年，尔朱荣拥立孝庄帝，把胡太后和幼主元钊带到河阴[11]，投入黄河淹死，然后又以新主皇帝祭天，召见百官为名，诱使两千多名官员齐集陶渚[12]，在众多骑兵包围下，尔朱荣历数百官罪状，将他们全部杀死，史称“河阴之变”。事变使北魏朝廷官员为之一空，这对尔朱荣集团而言是好事，因为绝大部分的职务空缺都由尔朱荣的部下补上，人人升官发财。

尔朱荣的女儿原为孝明帝嫔妃。尔朱荣执政后，迫使孝庄帝将她娶为皇后。孝庄帝外逼于尔朱荣，内迫于尔朱后，处处受制，怏怏不乐。530年八月，孝庄帝不甘心做傀儡，利用朝见的机会，伏兵杀死尔朱荣与其长子等三十余人，尔朱荣这一支死亡殆尽。尔朱家族立刻发动复仇，由尔朱兆、尔朱世隆立长广王元晔为傀儡皇帝，出兵俘虏孝庄帝，送到晋阳缢死，北魏中央仍由尔朱集团控制。

尔朱家族可能是五胡中羯族的孑遗，被鲜卑族征服后鲜卑化，世居山西的太行山区，在较为孤立隔绝的环境中始终未曾汉化。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与激进汉化过程中，他们因保持传统，部族特色得以逐渐充分显露，成为既与洛阳中央截然不同，又不属于六镇系统的胡人地方军阀。六镇之变以后，北魏中央军与六镇变民军的力量互相抵消，尔朱氏胡人军阀的力量相对大增，故得以掌控北魏政权。

作为当时胡人势力的代表，尔朱家族对于汉化不屑一顾，成为北魏末年胡人文化正统派或胡人基本教义派的象征。尔朱荣掌握北魏政权后的表现，足以说明此种心态。史书记载尔朱荣“举止轻脱”，每次到洛阳见皇帝都只是表演他的马术技艺、举行射箭比赛，皇帝也要下场，王公、嫔妃、公主等当然得参加。大家聚集一堂，比赛开始，皇帝如果射中目标，尔朱荣就自己起来大呼大叫地跳舞，所有在场的人也要跟着跳。众人酒酣耳热后就唱起鲜卑小调，闹到傍晚尔朱荣告辞时，还高唱着鲜卑歌，和部下手臂相扣，举足踏地而去。有一次他看见两个佛教僧侣共骑一匹马，大为动怒，拦下这两个人，要他们彼此用头不停地互撞，撞到两个出家人头昏脑涨不能动，就叫卫士提起他们继续互撞，到死为止。

这些行为从汉文化的角度看是不学无术、举动轻浮、欠缺教养、残暴不仁……然而若从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则高兴起来当然要大碗喝酒、表演骑术箭术、唱歌跳舞，人人参加，人生本来就该如此，至于要两个出家人撞头到死，那就是对他们不爱惜马匹的惩罚了。由此看来，六镇之变、河北等地的民变与尔朱氏专权，其实都有社会与文化层面的背景与意义，那是鲜卑等游牧文化对孝文帝激进汉化政策的大反扑。史学家陈寅恪就认为河阴之祸是“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当时归入汉人地区的西北边区，鲜卑人经常欺侮汉人，就连已经汉化的胡人也一并遭殃，可见在种族问题之外，文化问题是更重要的因素。北朝后期这种反汉化的风气一直延续到东魏、北齐，这两个政权内部不同族群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颇为紧张。

高欢崛起与北魏结束

收拾北魏末年乱局，也将北魏送至终点的是胡化的汉人军阀高欢（496—547年）。

高欢出身于六镇中的怀朔镇，参加六镇之变，后来投靠尔朱荣，担任晋州[13]刺史。531年，他统率六镇流民进入河北，得到当地大族的协助，开始占有自己的地盘。此时河北民变刚被平定不久，高欢本是民变领袖葛荣部下，很快将葛荣失败后原六镇以鲜卑为主的流民整合起来。高欢严整流民纪律，规定他们“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亦即一要与本地汉人和睦相处，二要听从自己的命令，遂成为鲜卑流民和汉族大姓联合势力的领袖。此时高欢名义上是尔朱荣部将，实则已决定自立争天下，不久就与尔朱氏集团决裂。

高欢本为贫民，少年时代家徒四壁，娶妻时从女方的嫁妆中得到一匹马，才有资格在北魏边镇军队中当个小队长。“六镇之变”将高欢卷入铁血杀戮的生涯，也造成他发展事业的机会。作为政治领袖，高欢节俭自持，更明察形势，善于掌握时机，借力使力。例如，他为避免与北方游牧民族柔然（蠕蠕）正面对抗，并借用其力量，娶了柔然公主。为讨伐尔朱氏集团，高欢也“挟天子以令诸侯”，立安定王元朗为帝，与尔朱氏所立的节闵帝对抗。此时尔朱荣已死，继任的尔朱兆闻讯，率二十万大军攻打高欢。高欢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沉着应战，又施反间计，使尔朱家族内部互相猜忌，终于击败尔朱氏，占领邺城。532年，高欢攻入洛阳，先后杀死两个傀儡皇帝，改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北魏政权落入高欢之手。534年孝武帝与高欢决裂，出兵攻打高欢失败，自洛阳脱逃，投奔镇守关中的大将宇文泰，后被宇文泰杀死，北魏结束。

北魏自孝文帝南迁到国不成国，仅仅41年，北方的分裂与动乱重演，只有待将来团结融合的一批人才有办法解决。

探索北朝至此，先将政治与要闻暂时搁下，下一章让我们来关注北朝的生活。

【注释】

[1] 今北京。

[2] 充华，女官名，北魏后宫九嫔之末。

[3] 今山西太原。

[4] 今河北赤城北。

[5] 今河北天镇县境。

[6] 今河北张北。

[7] 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

[8] 今内蒙古武川西南。

[9] 今内蒙古固阳西南。

[10] 今河北怀来。

[11] 今河南孟津东北。

[12] 今河南孟津西北。

[13] 今山西中部。

第四章 种麦炙猪存要术，搴裙纵马饮酪浆——北朝生活面面观

忆秦娥

接大漠，黄土坡高黄河落。

黄河落，麦田草场，马蹄车轹。

汉儿胡女波斯乐，洛阳寺塔金芒灼。

金芒灼，酪浆饮罢，蹋歌连膊。

以文化的冲击性与多样性而论，北朝统治地区远较南朝为甚。中国北方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期间，胡汉文化经由相遇到相克，再由不得不相处而相互学习到相生，文化变动激烈。北朝是大分裂时期的后半段，胡汉文化已经渐渐融合，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北朝人的生活甚为多彩多姿。

探索北朝生活在历史之旅中可称幸运，原因在于资料较多。北朝有几部独特的著作流传下来，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包括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郦道元《水经注》、贾思勰《齐民要术》、颜之推《颜氏家训》等。今日探访北朝，仍然可以依据这些书中的资料，配合《魏书·食货志》等记载，重建当时生活的各种面貌。

理解北朝生活的几个角度与脉络

以这些书做导览资料，北朝人各式各样的生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脉络探访。

从地理的角度看：洛阳的生活充满大都市的繁华，光鲜亮丽与奢侈腐败并存；西北沿边六镇的生活则辛苦质朴，充满尚武精神；农村中的生活仍是传统形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远，有事“三长”管。

从社会的角度看，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生活豪奢浪费，醉生梦死；边区军人的生活则不论物质或心理上都一天不如一天；农民的生活终年劳苦，被地方豪强与“三长”控制。

从宗教的角度看，当时的人面对的宗教环境是高度甚至过度发展的佛教，加上与之努力抗衡的道教，宗教生活是北朝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从文化的角度看，北朝生活是汉人文化与胡人文化融合的结果，所有外来人等都必须适应，包括主动投奔或被掳掠来的南朝人、前来经商或发展宗教的西域人等；又因北朝政治状况与文化取向变动剧烈，人们的生活往往因为政治环境与领导者的意志而变迁。

兹以当时书籍的内容为经，上述的分类为纬，设法说明北朝生活的方方面面。

洛阳城生活百态——《洛阳伽蓝记》

作为北魏后期的首都，洛阳是当时北朝最大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国家首善之区，贸易会通之处，当然也是奢靡之都，甚至罪恶之窟。对当时这个城市的描写，首推生活在北魏末年的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此书完成于东魏孝静帝时，北魏已经分裂，实质上灭亡，为追忆性质的作品。作者在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于洛阳任官，得以见到洛阳作为北魏帝都的状况。此后他因职务调动，离开首都。将近20年后的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他因公务再至洛阳，却只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

罗荆棘”，一片破败景象，甚至连钟声都罕闻。繁华壮丽消失殆尽，二十年岁月恍如一梦。悲伤哀叹之余，追思往昔情景，杨衒之先生感觉有必要将他曾经目睹的洛阳景况记录下来，这本书因此出现。

“伽蓝”是佛教名词，为“僧伽蓝摩”的简称，由古印度语音译而来。“僧伽”意为僧团；“阿兰摩”意为“园”，伽蓝指僧众共住的园区，即佛教寺院。《洛阳伽蓝记》顾名思义，是介绍北魏首都洛阳的佛寺，介绍方式是将洛阳分为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区，采分区叙述；除基本资料外，书中对各寺院的缘起、变迁、规模，以及附近相关的风景名胜、名人往事、奇谈异闻等都有记载。从书中看来，北魏时洛阳的佛寺在供人参拜、做法事以外，也成为洛阳人观赏、休闲、游览、社交等活动的场所。以今天的眼光看，《洛阳伽蓝记》就是北魏首都洛阳的导览书，它以佛寺为索引，介绍这座城市的建筑规模、文物典章、历史掌故等，甚至包括传闻八卦。一书在手，不难深入洛阳，到处探访，仿佛当时城里的人和事，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

洛阳的佛寺与生活

北魏佛教盛行，自文成帝停止灭佛以来，皇室信奉虔诚，投入大量资源，佛教发展迅速。迁都洛阳以后，天子、后妃、皇子、公主等往往花费巨款建筑佛寺、布施僧众。上行下效，王公士庶也都竞相效法，洛阳遂在短短不到四十年里，成为佛寺与僧尼密度极高的城市。洛阳在此阶段总计修建寺院一千三百余所，在互相比较、超越从前的心理影响下，这些佛寺建筑壮丽，装饰华美，举行活动时排场豪奢，在在都给初到洛阳的杨衒之留下深刻的印象。兹介绍最著名的数座，和围绕着这些佛寺的洛阳生活，请大家以初到北魏故都参访的心情探索：

永宁寺

胡太后于516年下令建造，费时三年完成，位于洛阳中心，皇宫大门以南约一里的皇家大道[1]边，附近都是政府机关。寺开四道门，正门向南，代表皇家，门楼三座，高二十丈[2]，以空桥相通，四门外都是笔直大道，路旁种植槐树，引进流水，往来行人得以遮蔽烈日。

《洛阳伽蓝记》记载寺内有木造九层佛塔一座，加上金属顶部，全高100丈，约当296米，达到台北101大楼高度508米的58.27%！《水经注》则说塔高49丈，约当145米，加上塔顶，总高约为147米。不论如何，它都是中国古代最高的佛塔，高到距离洛阳约50公里的地方就可以

远远看见。塔身为四方形，九层的四面都开有门窗，柱子围裹锦绣，门窗涂饰红漆，门扉上有五排金钉，旁有金环。塔顶矗立一个金宝瓶，下方环绕十一层金盘，称为“承露盘”，由塔顶垂下四根大铁链，引向四角，每层角落都挂有大型铜制风铃，全塔共一百三十个，风起时发出铿锵之声，几公里外都可以听到。

寺内主佛殿仿北魏皇宫太极殿建造，供奉一丈八尺[3]金佛像一尊，次长的金佛像十尊，绣珠佛像三尊，金织佛像五尊，玉佛像二尊，都做工奇巧。僧房楼观等一千余间，雕梁粉壁，装饰精美。庭院内花木扶疏，石阶边都是丛竹香草。外国所献佛经、佛像都存放在此寺。

如果用现代语言形容永宁寺，那是洛阳第一佛寺，北魏佛寺的重中之重，永宁寺内的佛塔建筑，是北魏帝国的国家第一重点工程；又因是胡太后在516年下令修建，正当其夫宣武帝死后儿子孝明帝刚即位的次年，胡太后也刚由嫔妃升格为太后，所以永宁寺还是这位掌权太后的形象工程。然而这座平地而起的佛寺花费三年落成，却只风光了大约十五年，到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二月，永宁寺塔被雷电击中，引起大火，永宁寺受到严重破坏。同年七月，孝武帝西迁长安，永宁寺随之荒废。

永宁寺塔遭雷击事件若从气象学角度考察，以黄河流域的气候看，春雷开始发动的惊蛰节气约当每年阳历3月6日前后，534年的惊蛰正落在阴历二月。永宁寺塔既然是当时洛阳附近最高的建筑，顶部又是金属结构，被春雷击中，属于正常天气现象。

然而在古人眼中，这场雷击天火应该具有深刻的道德惩罚意义。可能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永宁寺遭雷击、大火毁坏，是“天象示警”，果然不久之后皇帝出奔，北魏也分裂消亡，简直就是天意的全面展现，是上天对胡太后乱政的惩罚。

永宁寺塔是已知的最高木制佛塔，现存的世界最高木塔为中国山西应县木塔，建于1056年，高度约67米，还不到它的一半。永宁寺塔堪称中国古代的工程奇迹，1500年以后仍有夯土地基留在今天的洛阳，占地约10 000平方米，深达6米。这座形象鲜明、寓意深远却昙花一现的佛塔，以充满戏剧性的短暂一生，换来当时与后代无数人的感叹，它本身就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象征。

瑶光寺

宣武帝下令修建，位于洛阳城正西门御道北侧。寺内有五层佛塔一座，高五十丈，全寺规模不及永宁寺，但精巧则超过永宁寺。设有尼房五百余间，门户相通，又种满树木香草，种类繁多。

这座佛寺是专供后宫女性、贵族妇女修道礼佛的场所，故寺内全部为尼僧，其中还有看破红尘出家的贵族女性。可以想见这里也是当时贵族女性的社交场地、联谊中心，衣香鬓影飘荡在香烟缭绕中的盛况，应该是洛阳人不分男女皆欣羡的地方。然而可能也就是它充满美女贵妇的名声太响，530年大军阀尔朱荣率兵攻陷洛阳时，有数十个胡人骑兵闯入瑶光寺“淫秽”。当这些胡人军汉亮出刀枪威迫时，寺内的女人不敢不从，可是从此之后，洛阳出现一句顺口溜：

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

“髻”为妇女的盘头发型。年轻男人也要梳个女妆头，意在讽刺瑶光寺淫风太盛，男人要装扮成女子，才能避免被瑶光寺的尼僧抢去。这段顺口溜是典型的夸大之词与酸文酸语，却也可以由此看出瑶光寺在当时的地位与其象征意义。

景乐寺

太后、皇帝都修建佛寺，亲王当然跟进。孝文帝之子、宣武帝之弟、胡太后的情人清河王元怿就建造了这座佛寺，位于皇宫南门御道东侧，正好与永宁寺东西相望。

这也是一座尼寺，寺内以雕刻巧妙著称，名列全国第一。大殿四周环绕着厅堂尼房，遍植杨柳鲜花，风景秀丽。每到各月的“六斋日”，即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日，寺中女子乐队都会演奏，配以歌舞，丝竹嘹亮，歌声绕梁，舞袖婉转，由于禁止男性进入，有幸看到的都以为到了天堂。不过依照佛教的教义，“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调查人类善恶的日子，也是恶鬼窥伺人的时候，故诸事必须谨慎，要遵行“过午不食”，潜心修行。景乐寺当时在六斋日时的场面，似乎与佛教的原意有所出入，应该也是《洛阳伽蓝记》作者一种含蓄的讽刺笔法。

景乐寺在短短数十年中的变化也甚为有趣。元怿死后，景乐寺的门禁放宽，百姓得以随意出入，但也逐渐荒废。后来元怿的弟弟汝南王元悦将它修复，此人性好神奇，以王爷的财力与势力，竟将景乐寺变成演艺娱乐中心。他常在寺内召来各种乐队表演、竞赛；又弄来奇禽异兽，在殿庭之间飞舞跳跃；进一步就是举办魔术表演，举凡飞空入天、剥驴

投井、植枣种瓜这些魔术，无不具备，变出来的瓜果还当场分给观众吃，观众看得目瞪口呆，头脑迷乱。这种魔术表演一直举办到北魏末年战火波及洛阳才告停止，对当时的人来说，更是万事虚幻、繁华成空的表征。

《洛阳伽蓝记》也记载了景乐寺北边连接的义井里。此里之得名，是因为它的北门外有桑树数株，枝条繁茂，树下有井一眼，井水甘甜，旁边设有石槽、铁罐，免费将井水提供给往来行人，有如过去乡间路旁的奉茶之举，许多奔波在道路上的人在此饮水休憩。这种社会义举正代表北朝民间风气纯朴的那一面，出现在灯红酒绿的洛阳，尤为难得。

白马寺

该寺位于洛阳城西郊，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寺，东汉明帝时建立。它的建立，代表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在北魏时，当年“白马驮经”用的箱函还在寺中保存，僧人经常烧香供养。《洛阳伽蓝记》说这“白马驮经”用的箱子“时放光明，耀于堂宇”，广受信徒顶礼膜拜。

白马寺因在城外，附近有许多园林果树，出产高级水果，尤以苹果、葡萄、石榴最著名。当地的苹果可以重达7斤[4]，葡萄比枣子还大，都非常美味，品质为洛阳第一，入贡皇宫。有时皇帝会赏赐给宫女，宫女往往转赠亲戚，得到的人对这种皇家奇味珍果都不敢随意吃掉，又转送别人，一枚水果因此常常转手几次。至于石榴，竟珍贵到使洛阳出现这样夸张的顺口溜：

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译：白马寺甜石榴，一颗抵上一头牛。）

宝光寺

此寺位于洛阳西郊皇家大道北侧。宝光寺也因在城外，占地广阔，拥有大片平地园圃，出产许多水果蔬菜。

这座佛寺最著名的是庭园景色。寺中园区内有一座大湖，湖旁青松翠竹环绕，湖岸芦苇罗生，湖面菱荷遍布，是洛阳的水岸休闲胜地。每到良辰美日，马车连接，冠盖如云，许多政府官员忙里偷闲，呼朋唤友，来此访寺游湖。这些洛阳高层人士有的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有的在水边大啖莲藕、甜瓜以消暑，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

景明寺

宣武帝在景明年间（500—503年）修建，因而得名。此寺呈方形，东西南北四边各五百步。寺前可远望嵩山，寺后就是洛阳城，有僧房一千余间，配以水池三处，以河流相连，青林绿水，游鱼落雁，竹影兰芳，环境清幽，在寺内冬可避寒，夏可避暑。胡太后又在寺里建造七层佛塔一座，妆饰华丽，比美永宁寺塔。寺内利用水力推动水车，推磨碾米不需人力，亦为北朝定点式小型水利设施的代表。

每年四月七日是洛阳万佛聚会的日子，各寺的佛像纷纷出巡，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景明寺，依北魏政府统计，达一千余尊。这些佛像在寺内停留一晚，至八日从宣阳门进城，在皇宫前接受皇帝散花。那是非常盛大热闹的庆典，《洛阳伽蓝记》形容为：“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还有种种表演，来自各方的队伍互相竞赛，各地来的僧侣聚集成群，信徒都手持鲜花顶礼参拜，交通为之堵塞。曾有西域胡人僧侣看到这种情况，高呼“这就是佛国”。

洛阳市的社区分化与分工

随着都市持续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产业日益发达，都市的地理景观会发生改变，逐渐趋向区域的分工化，专业的社区因此出现。洛阳作为北魏的首都，自然会有这种现象，影响洛阳居民的生活至为深刻。《洛阳伽蓝记》对这方面的情形记载甚为清楚详尽，兹举数例说明。

市场、商业区与富商

洛阳西阳门外四里处御道南边，就是洛阳大市场，周围八里[5]。大型市场设在西门外，代表从丝路来的货物与客商必然为数众多，所以这里是一座大型的国际性商场。

大市场东边的“通商里”“达货里”是典型的商业社区，里内的人全部从事手工业、屠宰业、贸易业等，富人云集。当时首屈一指的富翁名叫刘宝，他是垄断民生日用品如粮食、食盐等通路与卖场的大商人，经商地区遍及所有水陆交通网络，在每个州郡置有住宅，各别馆都备马一匹。他贩售的物品种类繁多，赚到的钱可称“铜山金穴”，因此住宅逾越制度，车马服饰也等同亲王。

音乐、娱乐专业社区

大市场南边就是调音里、乐律里。这是音乐工作者与演艺人员聚集的地方，里内的人都从事丝竹乐器演奏、唱歌跳舞等行业，天下技艺绝妙的音乐家与演艺人员都出在此处。

酿酒专业

北魏洛阳曾出现一位来自山西的酿酒达人刘白堕。他酿出来的酒以罂贮藏，酷暑六月时在阳光下曝晒，经过十天酒味也不变，入口香美，号称喝醉后一个月不醒。北魏的高官权贵用他的酒来馈赠远方亲友，这酒往往在路上跋涉千里，因此人称“鹤觞”，或者通俗一点就直呼“骑驴酒”。这种酒有一次在运输途中被抢去，强盗们开怀畅饮，不料全部醉倒，被官府派人轻易擒获，因此又赢得一个外号叫“擒奸酒”。当时江湖

道上的顺口溜就说：

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

殡葬专业社区

洛阳大市场北边有慈孝里、奉终里，顾名思义就是殡葬专业社区，里内的人都从事贩卖棺椁、出租灵车等工作。

富而不贵社区

当时洛阳的富豪多住在阜财里、金肆里，可称富而不贵的社区。里内楼宇华丽，内外几重门，各楼间以阁道交通，居民家中堆积金银锦绣，奴婢都穿丝衣，仆隶都吃名菜。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20年），因工商业者衣食住行效法贵族高官，超越国家规范，北魏政府下令他们不准穿金戴银，不可身披锦绣。结果这个法令成为一纸具文，完全无法施行。

南朝投降高层人士的洛阳生活

洛阳还有一里称为“延贤里”，专门容纳从各方投奔而来的人士，里内有座正觉寺，由尚书令王肃建立。

王肃（464—501年）在当时的南北双方都大大有名。他原是南方人，出身琅琊王氏，是王导的后裔，属于南方首屈一指的侨姓世族。父亲王奂被齐武帝萧赜所杀后，王肃于493年归降北魏，北魏孝文帝命他率兵南征，王肃击败齐军，也奠定了他在北魏政府中的地位。孝文帝的迁都、汉化等政策，都曾经征询王肃的意见。孝文帝死后，王肃出任尚书令，参与朝政，曾率领十万大军接应南齐大将裴叔业投降北魏，大胜南齐追兵，官拜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成为北魏的南方军区司令，身系南方国防重任。

王肃在江南娶妻谢氏，投奔北魏后，孝文帝将寡居的妹妹陈留长公主嫁给他，这位南朝世族遂成为北朝驸马。此时他在南方的妻子，出身陈郡的谢氏夫人已经拖儿带女跑到北魏，面对丈夫再娶，便作了一首五言诗送去给王肃：

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

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

（译：本来是竹席上的蚕丝，现在成了纺织机上的线。顺着线爬上去，是否还很想念从前的缠绵时候？）

这首诗送到驸马府，陈留长公主看见，提起笔来代替王肃回答说：

针是贯线物，目中恒纴丝。

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

（译：针是用来穿线的东西，眼里永远容纳丝。线遇到帛就缝新衣去了，哪能容纳旧日子？）

一南一北谢氏、元氏两位王夫人都是才女，两位才女以笔代剑，高来高去地交锋一招，在文学造诣上真是难分胜负。此番比划双方都采用南朝民歌惯用的谐音手法，“取瑟而歌”，婉转表达自己的意思。谢才女用“丝”谐音“思”，用“络”谐音“洛”，意思是问王肃，夫君你到洛阳顺着竿子爬到高处，还想念我们往日的缠绵吗？元才女则用“纴”谐音“任”，用“丝”谐音“思”，意思是任凭你怎么思念，旧日子是没有容纳的地方

了。这位公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回复的诗采用谢夫人原诗的韵脚“丝”“时”二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首“和原韵诗”，非常不容易，由此也可见北魏皇家汉文化教育的成果。

元氏是大魏公主，身份尊贵，随扈如云，既然替丈夫出手，亲笔拒绝，谢氏夫人当然没办法再和王肃复合，然而北魏政府对这样一位南朝顶级世族女性照样甚为优待，欢迎她在洛阳住下去。后来她与王肃生的大女儿王普贤入宫，成为宣武帝的嫔妃，封贵华夫人，小女儿也嫁给广阳王元渊，可见南北朝时虽然南北对立，但双方的高层其实是对等的，充分显现出贵族式的政治与社会形态。至于夹在中间的王肃，其尴尬可想而知。为安抚公主，这位南朝来的驸马欲向第二任妻子表明心迹，方法就是建造正觉寺，送给公主作为休闲之所。王肃用“正觉”二字为寺名，应该有他意在言外表明心迹的特殊用意；用建造佛寺来宠妻，则是当时洛阳达官显贵的风气了。

北朝生活在饮食上与南方有显著差异。北方以羊肉为珍贵食物，宴会必备，搭配的饮料除酒以外就是酪浆。酪浆，一说就是马、牛、羊的奶，另一说是将奶油搅打，取出油脂后剩下的液体，不论如何，酪浆来自动物的乳汁，有时还会经过发酵，带有酸味。对于吃惯米饭配鱼汤，喝惯茶的南方人而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王肃就亲身体验过。

王肃刚到北魏时，不吃羊肉、酪浆这些东西，常吃鲫鱼羹，渴了就喝茶。洛阳的上层人士疯传王肃喝起茶来就是一斗[6]，给他起个外号叫“漏卮”[7]。几年以后，一次孝文帝大宴百官，王肃吃下许多羊肉，喝掉不少酪浆。孝文帝觉得奇怪，对王肃说：“你觉得中原的味道，羊肉比起鱼羹怎样？茶水比起酪浆怎样？”王肃对答说：“羊是陆地产品中最好的，鱼是水族中最佳的。人喜好不同，因此各自都可称珍品。如果说味道，优劣就很清楚。羊好比齐、鲁这样的大邦，鱼好比邾、莒这样的小国，唯有茶没得比，只配给酪作奴隶。”孝文帝大笑。旁边彭城王元勰对王肃说：“您不看重齐、鲁大邦，反而爱邾、莒小国。”王肃对答说：“家乡所喜欢的，我也不得不喜欢。”彭城王又说：“您明天光临我家吧，我会为您准备邾、莒的食物，也有酪奴。”从此茶在北魏高层圈子里又叫“酪奴”。

这样一阵笑谑后，孝文帝举起黄金酒杯出了个谜语：

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

御史中尉李彪立刻回答道：

沽酒老妪瓮注瓨，屠儿割肉与秤同。

尚书右丞甄琛接着说：

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

至此，皇弟彭城王元勰说："臣这才晓得这个字是'習（习）'字。"孝文帝就将金杯赐予李彪，满朝大臣也都很佩服李彪聪明有智与甄琛应和的迅速。

李彪的话翻译成白话文是"卖酒的老婆婆把酒从坛子倒进长颈酒瓶，屠夫切下一块肉来要几斤几两就几斤几两"，甄琛的话则是"吴地的人游泳时就自夸游得好，杂技演员抛出绳子直上天空。"

二人举出四个例子，都暗示一般人看来高难度的事，专业人员能够轻易做到，只因从事多年，身经百练，已经"习"惯了，用以形容王肃已经习惯北方食物。而"习"这个字，正好由三组三横与两组两纵构成，当然就是答案。有趣的是，直到元勰发话前，问答的三个人压根儿没有提到一个"习"字。

这又是一场高来高去的文字游戏，类似中国古代文人玩的"射覆"，程度够的人听了就懂，根本不必多加解释，程度不够的人只能有如鸭子听雷。这场猜谜如果发生在南朝的"王谢风流"场合，应属平常，但出现在北魏孝文帝的朝廷，就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孝文帝汉化运动的彻底，也清楚显示汉化运动是如何影响到北魏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的。

北魏官员的待遇与福利

北魏官员的待遇与福利不差。依照均田制的规定，地方官员按品级授给公田，已如前述，中央官员则发给俸禄，多用实物发放，包括米、肉等。《魏书·食货志》记载北魏末年府库空虚，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只得厉行撙节政策，把发给官员的米、肉减半，一年“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依此计算，正常情况北魏政府每年要发出米107 864石、肉3 199 712斤作为官员薪俸，折合现代度量衡制，米约5 695 219公斤，即每月约474 602公斤[8]；肉每年要发出约1 407 873公斤，即每月约117 323公斤[9]。

在此之前，北魏政府早已入不敷出，就停发了给官员的配给酒。这是官员的一种福利，停止后每年节省的用来酿酒的米有53 054斛零9升，折合现代度量衡制，约当1 591 623公斤[10]；杂谷6 960斛，约当208 800公斤，208.8吨；面300 599斤，约当132 264公斤，132.64吨；三者相加，每年酿造官员福利酒就需要1 932 687公斤，1932.687吨的粮食，即每月约161 057公斤，161.057吨，可见其规模的庞大。

北魏官员的数目史无明文，依《魏书·官氏志》记载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皇帝下令确定一些武职官员的名额：“五校可各二十人，奉车都尉二十人，骑都尉六十人，殿中司马二百人，员外司马三百人。”由此来看，其中“五校”为正五品武官即射声校尉、越骑校尉、屯骑校尉、步军校尉、长水校尉，共有一百人；奉车都尉为从五品武官，二十人；骑都尉为从六品武官，六十人，殿中司马、员外司马是宫廷侍卫，更达五百人，可见北魏官员的名额不少，待遇也不错，只要在太平盛世，这一大群人的生活堪称愉快。

北朝基层人民生活

对于北朝基层人民的生活，因现存资料零散，全面详细描绘并不容易，幸好北魏末年有一位留心农业的官员贾思勰，毕生都在研究北朝时期的生产活动，写出一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业专书《齐民要术》，留下许多当时的农业技术，将此书配合《魏书·食货志》研究，使我们得以一窥北朝的基层生活与农村状况。

《齐民要术》

北魏官员贾思勰所著，成书于北魏末年到东魏之间，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农业专书。“齐民要术”可解释作“平民谋生的重要方法”，亦可解释为“治理农民的重要方法”。

全书分为十卷，九十二篇，内容涵盖北朝时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存以及因应灾荒的方法。

全书抱持“食为政首”的精神，研究记载北朝时期的各种生产活动，举凡五谷、瓜果、蔬菜、树木的栽培，牲畜、家禽、鱼类的养殖，酒、酱、醋、豉、羹、臛（肉羹）、菹[11]、饼[12]、饭、饴[13]、糖等的制作，无不具备，还包括煮胶、造墨等，均极为仔细，并加入大量作者亲身的经验，成为探索北朝实况与研究中国农业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从《齐民要术》看北朝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

北方的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当时农民种植小麦的方法是：麦田里每隔两寸种一行麦子，每行种52株，每亩种93 550株。这表示北朝农民种麦，并非将麦种在田里随意撒播，而是一粒一粒、一行一行，有规则地埋进土里。不仅如此，而且麦种上的土要厚约两寸，这是甚为精细的耕作方式，代表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单位土地产量的提高。北朝一寸约当现代2.96厘米，故每行麦子相隔约5.92厘米，如此才可以使每株小麦均匀地得到阳光和雨水。如此一来，在每亩麦田间，农民必须埋下93 550粒麦种。北魏均田制下男丁授田四十亩，成年妇女授田二十亩，则北魏一对农民夫妻耕种六十亩田地，若全部种小麦，就要埋进93

550×60＝5 613 000粒麦种！其工作量的庞大与弯腰、挖土、放麦种、覆土的重复次数之多，正反映出北朝农民的辛劳。这种辛劳的成果，是每收成每一斗谷物，可得五万一千余粒，贾思勰先生连这个数目都点算清楚，可见他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

如果种大豆，则每行相隔一尺二寸，每行9株，1亩共6 480株。大豆体积较大，故每收成一斗，可得一万五千余粒。

小麦提供淀粉，产生热能，也有部分蛋白质；大豆提供优良蛋白质与油脂，这就构成了北朝农民的基本食物，也是他们营养的主要来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风调雨顺的日子不会年年过，黄河流域的降雨并不稳定，天灾频繁，因此北朝农村都有应付荒年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利用桑葚。《齐民要术》记载每年夏季桑葚成熟时要尽可能采集，采下后晒干，储存起来，就成为荒年时的补充食物。

北朝食谱

《齐民要术》里搜集了许多北朝的食谱，有些甚至流传到现代，例如：

烤乳猪

用还没断奶的仔猪，选极肥的，宰杀后去除五脏，刮光猪毛，洗干净，肚子里塞满香茅，猪体用柞木[14]棍穿过，放在小火上一定距离处，慢慢烧烤。烤时要不停转动，使各部分受热均匀，避免一部分烤焦，一部分不熟；还要用清酒刷涂几次，使猪皮发出色泽，并不断用新鲜纯白猪油涂抹，如果没有新鲜猪油，用纯净的麻油也可以。烤成后猪体呈现琥珀、黄金一般的颜色，入口即化，肥肉洁白似雪，肉汁润泽，乃北朝名菜。

羊肉香肠

用羊的盘肠，洗干净，羊肉剁细，加细切的葱白、盐、豉汁、姜、胡椒末调和，调到咸淡适口，用来灌肠。这种羊肉香肠取两条夹起来烤，切片供食，甚为香美。

北朝的甜点，《齐民要术》也有介绍，例如：

髓饼

“胡饼”的一种，北朝的胡食甜品之一。制法是用牛骨髓的油脂加蜂蜜和面，做成面饼，厚约四五分[15]，宽约六七寸[16]，放进炉中烤熟，烤时不必翻面。髓饼吃起来味道肥美，还可以经久储存。

当然这些都是贵族富户才吃得起，一般农民或许年节时可以吃点肉，平常就只有下面这样的菜肴：

北朝泡菜、腌菜

北朝以芜菁、白菜、冬葵、白芥等蔬菜制作泡菜、腌菜。

收获蔬菜时，选择品质较好的，用草绑成束备用。调配极咸的盐水，在盐水中洗菜，然后放进瓮中。如果先用淡水洗，菜就会烂掉。洗过菜的盐水放置澄清，将上层澄清的部分倒进瓮里，到埋没菜束为止，不再调味。在泡菜仍是绿色时捞出，以水洗去咸汁，下锅煮一下，跟生菜的味道没有差别。

芜菁、白芥这两种菜，泡三天捞出。将黍米[17]捣成粉末，熬成粥，取稀薄部分；捣整粒小麦做成的酒曲为粉末，以绢布筛过；将菜一行行放进瓮中，相邻行茎、叶的方向相反，行间放酒曲粉，倒入热的汤状薄粥，放满整个瓮，再把原来的盐汁倒进里面，摆一段时间即成腌菜。这种腌菜是黄颜色，味美。

北朝化妆品

北朝时的化妆品有胭脂、面霜、唇膏、香粉等。对北朝的妇女而言，胭脂是必备的化妆品，在此介绍当时的制法。胭脂的材料有二：一是基质，南北朝时采用研磨成极细粉末的白米粉；一是颜料，从红色的花中取得。

将藜、藋、蒿等草烧成灰，倒热水淋，取第三次淋下的灰汁澄清备用。采大量“红蓝花”[18]的花瓣，晾干后加灰汁揉搓，搓十多遍，到花瓣稀烂为止。用布袋装花汁大力绞，让红色汁液流进小瓷盆中。再用酸石榴两三个，取出籽捣破，加一些小米饭发酵后的酸浆调和，也用布袋绞过取汁，用酸汁调和花汁。若无石榴，用高品质的醋调和稀饭汤亦可。在花汁、酸汁混合物中放入白米粉，不可太多，只要一颗酸枣大小即可，否则颜色会不够鲜艳。将米粉与汁液混合，用未曾沾过油的干净竹筷大力搅动，然后放上盖子静置到晚间，倒去上面的清汁，剩下的膏状物倒进丝质小袋子挂起来，第二天半干时，捏成小瓣，像半个大麻仁，

即约直径不到一毫米的小球，阴干后完成。使用时加一点水，在手心揉开，涂在腮部。

农民以外的基层行业

北朝畜牧业远较南朝发达，民间也非常重视，因此从业人员众多，为国家重要产业。

北魏的河西走廊是畜牧地区，养有马两百多万匹、骆驼一百万匹以上，牛、羊无数，其中包含十万匹军马，供首都洛阳的军务使用，每年还要转移一部分至山西北部，以使军马逐渐熟悉中原地区的气候水土，提高存活率与妥善率。可想而知，北魏以畜牧为业的人一定不少，其分布地从河西走廊到山西、河南，甚为广阔。《齐民要术》里也记下这些职业牧人的工作经验，例如希望雄性种马彼此不互斗，平常就必须将它们分开来养，每匹种马都要有自己的厩房和饲料槽；对于即将出征的军马，草料应舍弃草叶，只用草茎，但要切到很细，配合谷类、豆类来喂食，饲养期间每天都需要跑步锻炼，这样才能使军马强壮结实，能耐劳苦。

当时在汉水中、上游的汉中地区，还有一批人专门在汉水中淘取金沙，这样的淘金人达到一千多家，缴税就用金沙，可算北魏境内的特殊景观。

北朝民歌

民歌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人民生活的反映，也是研究历史应该探访的领域。北朝民歌特色鲜明，其原型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马上演奏的乐曲，包括许多军乐，歌词作者多来自北方民族，尤以鲜卑人为主。鲜卑族的民歌，本来以母语咏唱，鲜卑入主中原后，汉人因语言不同，听而不知其意，于是有一部分被译成汉语歌词演唱。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运动后，以洛阳为中心的帝国南部地区鲜卑语逐渐失传，当地人改用汉语创作，从此发展出北朝民歌的后期形态，逐渐失去草原游牧民族的特色，已经趋近于汉人民歌了。

北朝民歌纯朴写实，口语化到几乎不需要白话翻译，前期民歌尤其如此。其内容又常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有关，典型的句子如：

>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放马大泽中，草好马着膘……

鲜卑民族表达爱情也十分直白，就像这首民歌中鲜卑姑娘的口吻，恨不得情郎赶快飞来：

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郎非黄鹞子，哪得云中雀？

还有这个更加干脆：

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

骑马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当然有不少骑在马上唱的歌，歌词都毫不做作：

幽州马客吟歌 五曲之四

北朝 佚名

其一

憎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

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

其二

荧荧帐中烛，烛灭不久停。

盛时不作乐，春花不重生。

其三

南山自言高，只与北山齐。

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

其四

郎着紫袴褶，女着彩夹裙。

男女共燕游，黄花生后园。

“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这两句坦白得可爱，用现代的语言说出来，就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这两句，则展现北国女儿的自信、天真与主动。北朝男女相聚喝酒，往往喝到有几分酒意后，就排成一行，手臂相扣，一边唱歌一边出脚踏地打拍子，胡太后要宫女们唱《杨白花歌》，就是用这种唱法。

这样的社会，当然会出现这样的民歌：

李波小妹歌

北朝 佚名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叠双。

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当年李波小妹拉起裙子，跳上马背，风驰电掣而去，左手拉弓射出一箭，右手拉弓又射出一箭，箭箭命中，那种英姿飒爽的风貌，构成北朝民歌最具代表性的内容。

北朝流行的民歌曲调，有一首称为“折杨柳枝”，常被配出各种歌词，前四句都几乎完全相同，以后则自由发挥，首首不同，如：

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请注意这首歌里有一段和《木兰辞》的开头几乎相同，以后的发展则是《木兰辞》中的木兰一心想代父从军，而这首《折杨柳枝》中的女主人一心想出嫁。我们探访至此，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是北朝女子心中的两个愿望。

北魏迁都洛阳、大力汉化后，北朝民歌改以汉文写作。像这首描述河西走廊地区繁荣的歌，已经趋近于南朝的作品：

凉州乐歌

北魏 温子升

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19]

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至于那些习于逸乐的北魏后期贵族，则沉迷在以下这类靡靡之音中，其生活与心态，竟和南朝末年的陈后主君臣没有两样了：

安定侯曲

北魏 温子升

封疆在上地，钟鼓自相和。

美人当窗舞，妖姬掩扇歌。

北朝的生活诚然多彩多姿，然而太平岁月毕竟有限，北朝建立大约一百年后，诸种因素发展演化的结果，内部发生变动与分化，使北朝最后的四十余年陷入分裂与战争，从政治到文化都发生剧烈变迁，加速向隋唐帝国奔驰前进。且让我们用下一章一探北朝文化的特性与发展演变的过程，更深入了解北朝。

【注释】

[1] 即御道。

[2] 约59.2米，北朝1丈等于296厘米。

[3] 约5.33米。

[4] 北魏的1斤约当0.44公斤，7斤约为3.08公斤。

[5] 约4公里，每边1公里。

[6] 南北朝一斗相当今日三升。

[7] 底下有漏洞，装不满的杯子。

[8] 北 魏1石 等 于120斤，1斤 等 于0.44公 斤，0.44公 斤×107 864×120＝5 695 219.2公斤，5 695219.2公斤÷12＝474601.6公斤。

[9] 0.44公斤×3 199 712≈1 407 873公斤，1 407.873吨÷12＝117.323吨。

[10] 北魏1斛＝10斗＝100升，1升等于0.3公斤，0.3公斤×5 305 409≈1 591 623公斤。

[11] 泡菜。

[12] 面食。

[13] 麦芽糖。

[14] 大风子科，属小乔木，又名蒙古栎；木质耐火。

[15] 约1.2～1.4厘米。

[16] 约18～21厘米。

[17] 黄米。

[18] 即红花，菊科，红花属植物，拉丁学名Carthamus tinctorius。

[19] 北朝姑臧城在今甘肃武威郊外。

第五章 净土禅宗石窟寺，水经家训木兰辞——粗犷平实的北朝文化

铁骨棱棱看魏碑，几山佛像凿崖危。

木兰传唱黄河北，多少鲜卑血性姿。

北朝学术

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因政治长期分隔，导致文化差异现象甚为明显。北方的中原大地被草原游牧民族入主，塞外游牧文化的新血液带来草原的气息，赋予北朝文化阳刚阔大的特色，充满粗犷平实的风格。

北朝石碑上的文字方方正正，一笔一画棱角分明；北朝民歌的歌词直来直往，爱恨强烈；北朝人不尚坐而谈，倾向起而行，凡事以务实为本；北朝学者并没有把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多少位，却能把中华大地上的各条河流描述清楚。总体而言，北朝文化不如南朝深刻细腻，但更容易深入遍布社会，被各阶层接受，其特色经过普及后，对后代影响深远。

儒家经学

北朝学术着重儒家经学，经学的传授则完全继承东汉学风，以遵守传统“经师”的解说为准，不可自行揣度，任意发挥。这种学术与教育制度下必然产生“标准本”，北朝历代教授儒家经典，《易经》、《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都采用郑玄的注解，《左传》采用服虔的注解，《公羊传》采用何休的注解。北朝后期，经学还与政治结合。西魏、北周的统治者从宇文泰开始，特别推崇《周礼》，亦步亦趋地仿效《周礼》，建立政府，治理国家，更导致学风的保守。如此保守的学风造成北朝少见名儒，也少有经学撰述，经学谈不上有何发展，比不上南朝经学。

虽然如此，儒家经学在北朝是唯一的官方正统学术，很受重视，玄学被排斥在学校之外。北魏进入中原初期，道武帝便在平城设立太学，聘请五经博士讲授经学，此后各郡都置博士，中央的太学生达到一千人，地方上各郡也都有四十至一百名学生。迁都洛阳后，私人讲学盛行，一所私校学生可以多达几百甚至千余人。修习经学的学生，可以通过中正官被认可资格，取得官职，这也是北朝经学盛行的原因。

北朝宗教

北朝宗教的政治背景

欲了解北朝宗教，必须先认识北朝宗教特殊的政治背景。

南北朝时道教与佛教竞争激烈，佛、道双方传教都重视高层路线，争取皇帝、高官与世族领袖的信奉与支持，希望通过他们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的势力顺利传播宗教。在北朝这个胡汉杂居的地方，双方的竞争更多了一项民族差异的因素，形成北朝宗教文化的特色。

大抵汉人世家大族以儒学传家，宗教信仰则倾向道教，原因在于民族主义使汉人认为佛教是胡人所创、胡僧所传的胡人宗教，道教则是汉人自创的本土宗教，崇奉的神仙得道成仙前原也都是汉人，“汉人信汉教”的观念下，道教是自然的选择。相对于此，鲜卑及其他胡人多崇奉佛教，自然也有“胡人信胡教”观念的影子。

南北朝时代道教与佛教时常相互争辩攻击，儒家则通常攻击佛教，倾向与道教联合。北朝胡汉杂居，儒、道攻击佛的重要理由是所谓华夷之辨，宗教斗争又蒙上种族与政治意义，因此比南朝激烈。

一方面，北魏皇帝本身非属汉族，但既然高高在上，既统治胡人，又统治汉人，对于治下胡、汉的宗教差异，就必须小心因应，对华夷之辨也需要表示态度。446年，北魏太武帝灭佛，崔浩与寇谦之的劝说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太武帝的灭佛诏书里说：“朕承天绪，欲除伪[1]定真[2]，获羲农[3]之治。”看来，他要借此证明自己遵循中国儒家的正统，做稳中国皇帝。

另一方面，从太武帝起，历代北魏皇帝即使本身是虔诚的佛教徒，即位时也都要举行道教的仪式，到道教坛场亲自接受道教符箓，代表这位鲜卑皇帝也已经被汉人的神仙接受，得到认可与祝福，有资格统治汉人。

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由胡化汉人高氏家族掌握大权，他们的武力主要来自“六镇之变”“河北民变”的六镇流民集团，这是反对北魏汉化的胡文化武装团体，高氏家族要领导他们，就必须表现得比胡人还像胡

人。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北朝后期北方东半部的道教大受打击，只因道教被看成是汉人的宗教。高欢之子高澄在548年撤销东魏的道坛，开始打击道教，等于间接撇清与汉人的关系。551年，高洋篡东魏建北齐，555年就着手消灭境内的道教，强迫道士都要剃发改当和尚，完全不管他们懂不懂佛教教义、经典、仪轨，够不够资格当，此事成为政治干预宗教的典型事例。佛教因此在北齐大为兴盛，造像甚多，有些一直保存到今日。

北朝后期的另外一边，西魏—北周境内的宗教状况则迥然相异。统治者宇文家族实际上是西北地区胡、汉融合后，建立起的全新统治集团的代表，面对佛、道二种宗教背后的胡、汉文化取向，不便表态，儒学便成为必然的思想出路，于是北朝后期北方西半部在思想与制度上一切唯《周礼》是尚，影响到政府的宗教政策。既然是以儒家思想与制度治国，就要排斥佛教，但儒家不尚杀戮，于是北周武帝的灭佛，就采取名义上的以辩论定高下的方式。

北周武帝为禁灭佛教，曾于568年、569年、570年三次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全国知识分子代表在御前集会，宣示儒学的特殊地位，讨论佛、道两教教义的高下，虽然允许三方代表辩论，但终于在574年宣布禁止佛教。此时佛教僧侣力争，基于公平考量，北周武帝乃同时查禁佛教、道教，下令和尚、道士一律还俗，成为政治干预宗教的另一典型事例。

虽然如此，北周武帝禁教的打击力量主要是针对佛教。577年北周灭北齐后，更延伸到原北齐境内。在禁教下大批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烧，三百万以上佛教出家人还俗，寺庙有四万所以上被赐给王公作宅第，寺院财物发给群臣，寺院奴婢全部释放。然而宗教问题毕竟不能用政治力量解决，578年北周武帝死后，佛、道二教很快恢复，都并未受到不可逆的打击。581年杨坚篡北周建隋朝，北朝结束，中国北方胡汉之争泯灭，宗教与思想上回到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

北朝道教

道教在北朝有重大改变与发展，与寇谦之这位道教的改革者有关。

道教本产生于南方，但到北朝初年，北方的道教已很盛行。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为追求长生而笃信道教，他设立炼丹基地，称为“仙坊”，聘请道士主持，称他们为“仙人博士”，炼制长生丹药。结果可想而知，

他服食“仙丹”后中毒，性情暴躁，喜怒无常，被无法忍受的部下杀死。这种传统的寻求外丹的道术在当时十分普遍，并无新意，也限制了道教进一步的发展，直到道士寇谦之提倡革新，北朝的道教终于出现转机。

寇谦之（365—448年）在华山、嵩山修道，自称从太上老君处受封为天师，是天师张陵（张道陵）的继承者，道教正统领袖。他又说得到太上老君传授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制作口诀，主张服气导引，修守斋戒，并不重视烧炼药物制作的“外丹”，也反对专注男女性技巧的房中术。作为道教改革派领袖，寇谦之在基本的修身养性上提倡内省自修，一改外丹、房中术等外求的方式，确属不屑谄媚权贵，勇于改革，成为此后道教倾向清虚禁欲一派的开创者，其教派称为“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

面对社会与政治，寇谦之采用忠孝等儒家思想作为道士的行为准则，修订戒律、仪式以改革道教，符合宗教的本色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需求。自汉末以来，道教组织如五斗米道等都收取信徒的米粮金钱，而且组织中设有各级教职，世代继承，其实非常接近政府。寇谦之将这些一概除去，提倡信徒各自在家中立坛、虔诚礼拜就是上等功德，不必离家投奔道教组织。这种教义完全符合帝国统治者的要求，使皇帝与中央政府都不用担心道教组织会变成国中之国，势力坐大后出现割据甚至反叛等问题，所以北魏太武帝经崔浩推荐认识寇谦之后，立即大为崇信。太武帝在首都平城立天师道场，亲自莅临道场接受符箓，从此成为北魏历代皇帝的传统，北派天师道得到北魏政府支持，也在北方顺利传播。总之，胡人统治者的北魏太武帝、汉人世族领袖的崔浩与道教改革派领袖寇谦之三方面的合作，开启了北朝宗教、文化、社会与政治的新页，是北朝历史上的大事。

道教本来就是北朝汉人倾心的宗教，又得到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与提倡，势力膨胀，从此与佛教的对立趋向尖锐化，双方各自争取当政者，也各有所获，遂引起北朝时期两次灭佛教、一次灭道教的宗教冲突。然而寇谦之作为道教领袖，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却并不激烈，仅在言辞上攻击，并没有采取报复主义。439年，北魏灭北凉，俘虏北凉的僧兵三千人，北魏太武帝下令屠杀，寇谦之替这些僧人说情，使他们得以免死；反而是北魏太武帝灭佛时，崔浩主张大杀佛教僧侣，为此寇谦之还曾劝谏崔浩。或许是这种风格的影响，此后北朝的宗教斗争虽然激烈，因此死亡的佛、道出家人却甚为有限。北齐文宣帝灭道教，只杀掉不肯剃发的道士四人，北周武帝灭佛教，竟没有杀死一个僧侣。

北朝佛教

南北朝时中国与西域间陆上、海上的交通都已颇为发达，佛教就从这两条路线不断传入中国。河西走廊（凉州）是当时陆上丝路的必经之途，印度或西域的佛教僧侣前往中国，最先抵达的中国文化区域就是这里，常常在此先行停留，学习中国语文，适应环境，因此河西走廊成为北方佛教最发达的地区。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最接近西域，佛教也最盛，当地人熟悉佛教经典、仪轨，也擅长制作佛像，著名的莫高窟就在城外，从十六国时期起开凿，北朝时已具规模。敦煌是北凉国首都，439年北魏灭北凉，俘虏佛教僧侣三千人以上，将他们和北凉人三万户强行迁移到平城，结果造成北魏首都平城地区的佛教大规模发展。当时被俘的凉州僧侣领袖昙曜向北魏文成帝建议开山为佛窟，凿石为佛像，崇信佛教的文成帝采纳，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开凿，云冈石窟因此得以出现。或许在云冈石窟开凿的过程中，有经验的原凉州工人还是重要的技术人员呢。

北朝佛教派别不少，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也甚为重要。后来在中国最兴盛的两个佛教宗派净土宗与禅宗，都是从北朝起开始广泛传播，立足于中国。

净土宗属于大乘佛教，根源于净土信仰，专门修习往生安乐土（净土）的法门，方法是念佛修禅定，因念的佛号不同，分为弥勒净土、阿弥陀净土两派。所谓“念”包括“心念”与“口念”二者。“心念”就是全心全意想念佛的名号、佛的相（形状）好、佛的光明、佛的慈悲、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进入心里全无杂念的境界，所有相连续想念的全都是佛，据说功夫精进足够时，会在定中看到诸佛。“口念”就是口呼佛号，生时不断念佛，临死也要邀集同道，陪同不停高声念唱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名号，一直到病人断气为止，认为如此死者将往生乐土，在弥勒菩萨（未来的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座下修行，将来凭借佛的功德与愿力超脱轮回。净土宗认为造像建塔也是功德，这符合北朝富贵人家的意愿，于是他们大量捐献金钱、土地，造像建塔。可以说北朝出现大量精美佛教艺术品，就是净土宗盛行北方的证明。

净土宗的阿弥陀佛信仰在中国开展，北魏时期的僧人昙鸾（476—542年）贡献最大。他在山西玄中寺依据菩提流支所译的《观无量寿经》，致力弘扬阿弥陀净土的理念。昙鸾援引龙树的论点，将佛教的诸多法门概括为“二道二力”：“二道”为“难行道”与“易行道”；“二力”则为

难行道采行的“自力”和易行道采行的“他力”。他认为修习佛法者，在佛并未出世的年代，难以依自力证果，而应该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协助，将这种他力和自力结合，才能抵达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解脱的易行道。他因此认为信佛的第一要务就是持念阿弥陀佛，甚至恶人都能借由持念阿弥陀佛而得以往生。昙鸾确定了净土宗的基本理论与修炼法门，从此以后，一心持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信仰得以确立，并因修行容易，在中国广为传布。一般认为净土宗始祖为慧远（334—416年），其实其事迹难以考证；若论中国僧人对净土法门的贡献，应以昙鸾为第一，日本净土宗称他为净土宗的“初祖”，可见他如何受到尊崇。

禅宗是北朝佛教的另一大宗派。一般认为中国禅宗的初祖是菩提达摩，他从南天竺经海路到广东，辗转至南梁首都建康，与梁武帝相谈不投机，乃渡江到北朝，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开创禅宗一派，依时间推算，应在北魏宣武帝时（499—515年）。然而据《续高僧传》所述，佛陀禅师[4]才应是最早将禅宗法门传到中国的印度僧人。佛陀禅师修习印度佛教之禅观，曾历游西域诸国，后至北魏首都平城附近，受到孝文帝（471—499年）的崇仰。孝文帝在平城为佛陀禅师设置禅林，迁都洛阳后，又于少室山创建禅院，建翻经堂，请佛陀禅师住持，从事译经工作，其道场一直传承，即今少林寺。不论如何，佛教禅宗思想应该是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传入北朝的，而且不止一条途径。

禅宗法门主张修心，以明心见性、一切皆空为宗旨，要破除名相，忘言绝虑，跳脱空有，所以不重讲经，重视禅定。菩提达摩以面壁方式修行，称为壁观，意思是断绝诸般因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摩又主张忘言，只口头说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这种做法传承下来，使禅宗法门能够心无执着，涤荡一切执见，思想上解脱各种拘束。在北朝这个战火频仍，儒学与北天师道又都严格遵守礼教的时代，禅宗佛教提供给人们心灵上抛弃羁绊，进行深度探索的空间，还不需钻研佛学经典，故能受到重视与欢迎，广泛传布。

北朝文学

比起南朝，北朝的文学可谓黯然失色。北朝始终未曾完成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文人提笔写文章都在模仿南朝写四六骈文，却因程度所限，在辞藻华丽、对偶工整等方面无法企及，又因模仿的对象不同，到北齐时竟分为仿任（昉）派与仿沈（约）派。北朝每逢文人相轻，常分门别派，互相讥讽对方模仿剽窃南朝的名作，《北史·魏收传》就曾记载北齐两位著名作家邢劭和魏收互相讥讽的话。邢劭首先批评魏收说：

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

（译：江南的任昉，文章本来疏漏，魏收非但模拟，还大大剽窃。）

魏收听到后就反唇相讥说：

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

（译：他常在沈约的文集里做贼偷文，没想到反而说我偷任昉的。）

北朝文学在写作技巧上主要是模仿南朝，内容则与南朝文学不尽相同。北方历经战乱，被胡人建立的王朝统治，社会上各民族杂居，互相影响，使生活、心态与文化都不同于南方。以诗歌而言，北朝民歌歌词质朴，感情直接，已如前述，尤其是前期以鲜卑语唱出再翻译为汉文的，其歌词还谈不上文学性。北魏孝文帝南迁汉化以后，知识分子用汉文吟诗作词，又受到南朝文学的影响，终于产生了《木兰辞》这样的作品，成为探访北朝文学的必聆天籁：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

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这首长歌的背景是北朝的风土与生活，吟咏的是北朝女子的心愿，其中却出现不少对偶的句子，例如“黄河流水鸣溅溅”对“燕山胡骑鸣啾啾”；“朔气传金柝”对“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对“壮士十年归”；“策勋十二转”对“赏赐百千强”等，大部分还顾及平仄，可见其汉文韵文的写作，遣词炼字，已甚有功力，写情写景，也见精彩。结尾的一段以兔喻人，更深得《诗经》“比兴”的宗旨，显示不论作者是谁，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极深的影响，方能在北朝有此成就。

北朝后期，因为政局与战争的推移，有些南方知识分子被迫长期留在北方的西魏—北周。时间既久，他们带来的南方文化渐渐散发出影响，成为北朝后期北方西半部文化增进的种子。南梁文学家庾信在战乱中遭西魏扣留，不得已长居北方，曾对自己的命运呼号“天何为而此醉？”，却因此笔下融合南方文章的华美与北方风格的刚健，为中国文学注入新气息，开启唐代的诗风。庾信《哀江南赋》中有这样的句子：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

显然与绮靡的南朝文风已有巨大差异，甚至可以隐约感觉到有点“诗史”杜甫的先行跫音，难怪杜甫要在《咏怀古迹·第一》中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北朝书法与魏碑

北朝的书法与南朝不同。南北朝带来文化的分裂，书法也分为南北两派，各有独特风格。北朝书法传承汉代隶书，笔画清楚，字体方正，给人严肃古拙的感觉；南朝书法继承东晋，笔画流动，字体曼妙，给人潇洒妍丽的感觉。

现存的北朝书法大都保存于碑刻中，称为“北碑”，因以北魏时期的碑刻为代表，故通称“魏碑”，其书法的体裁称为“魏碑体”。这些碑刻有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题记四种形式，其上文字的书写者大多是民间人士。此因晋室南渡时许多世家大族也举族南迁，留在北方的知识分子多属社会基层，只能遵循汉代书法遗规，自行摸索，到北朝时遂形成此种书体。北朝书法笔画棱角分明，线条粗犷，刻上石碑时也是大刀阔斧，不加修饰，正反映出北朝质朴剽悍的文化特色。魏碑向前直接继承汉代隶书，向后开启唐代楷书的道路，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质书法体系，因此兼有隶书与楷书的神韵。

魏碑体在北朝以后长期不受重视，一直到清朝中叶嘉庆、道光年间，才被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重新肯定与推崇。从阮元、包世臣到康有为，都给予魏碑书法超高的评价，这些学者们更将龙门石窟中的二十块魏碑定为“龙门二十品”，认为是魏碑书法的精华。兹举以下二例，从这两篇短短的铭文，我们可以体会魏碑文字的特色，还可以看出北朝民间的风俗习惯和当时人对于死后的希望。

“龙门二十品”铭文举例

“步辇郎张元祖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5]

铭文：

太和廿年，步辇郎张元祖不幸丧亡，妻一弗为造像一区，愿令亡夫直生佛国。

“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6]

铭文：

大代太和七年，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区，愿国祚永隆，三宝弥显。有愿弟子荣茂春葩，庭槐独秀，兰条鼓馥于昌年，紧晖诞照于圣岁。现世眷属万福云归，洙输叠驾。元世父母及弟子等来身神腾九空，迹登十

地，五道群生，咸同此愿。孟广达文，萧显庆书。

石窟寺艺术

北朝佛教盛行，连带使佛教艺术发达。当时出家人修行与信徒礼佛还愿，多选择在山边岩壁开凿石窟，建为佛寺，称为石窟寺。石窟寺有大有小，大抵石窟内空间越大的，能够容纳的佛像也越大、越多，必须饶有财力，才能开凿完成，当然，最雄伟的石窟，就是皇帝发动全国力量开凿的。石窟大到一定程度后，为增加内部支撑力，也为增加装置佛像的空间，常在内部空间中心留下一根石柱，称为中心柱。石窟里的佛像通常凿石而成，在石质松散脆弱的地方，则改为泥塑，窟壁上还会以彩色绘画作为装饰，构成独特的北朝石窟寺艺术。

北朝石窟往往成群出现，现在依照开凿时间的先后，探访几处北朝石窟寺艺术的瑰宝。

敦煌莫高窟（千佛洞）

佛教从印度经过西域传入中国，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必经之路，中国石窟寺的概念因此最早在此出现。印度佛教早有开凿石窟之举，印度西部的阿旃陀石窟从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开凿了；西域的龟兹国笃信佛教，拥有大量石窟，其中最大的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

敦煌附近有石窟群数处，以莫高窟为最重要，其中最早的一座，据记载开凿于4世纪十六国时期的366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年），为僧人乐僔所开，由此可见石窟寺随着佛教传播，从印度到西域再到中国一脉相承的发展。

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端的断崖上，区内存在壁画和塑像的洞窟达492座，总计有泥质彩塑2 415尊，壁画面积4.5万平方米。这些洞窟中，北朝或更早建立的有36座，最早的可能建于北凉时期（401—439年）。莫高窟全为私人开凿，并无皇帝以政府的力量推动，故能充分反映历代中国民间佛教艺术的风貌，其价值与云冈、龙门石窟又不尽相同。

现存石窟36座，以数量言并不算多，然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十六国时期与北朝是中国石窟寺历史的初期，这时开凿的石窟还常保有原来的西域风貌，而且时间越早越浓厚，历史价值甚高。例如此时期石窟的壁画，起初是以土红色为底色，配上青、绿、白、赭等色的图画，色彩斑烂绚丽，属于西域风；经过一段时间后，到北朝后期，底色则改为白色，画面看来素雅不少，已经是中原风格了。下面介绍两座最具代表性的北朝石窟，将来大家若能实地探访，是了解北朝文化不容错过的机会。

莫高窟第285窟是莫高窟中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洞窟，开凿于538年，完成于539年，是西魏时期开凿的。此窟同时具有礼佛与禅修二种功能，南北两侧各开四个仅能容纳一人坐禅的小石室，属于“禅窟”。从窟顶到墙壁满布壁画，内容主要是佛教故事与各种神佛，包括佛教的诸天与中国的伏羲、女娲、雷公、雨师等。印度的诸天与中国的神明在此共守一窟，这正是佛教进入中国，逐渐中国化的早期象征。

莫高窟第428窟是莫高窟最大的中心塔柱窟，开凿建立于北周（557—581年）时，洞窟主室平面呈方形，中轴线后方留有中心塔柱，塔柱四面各开一佛龛。此窟壁画中佛教故事甚多，如“舍身饲虎”等，常以连环画的方式表现，各情节间以山峦、树木、房屋等间隔，其中人物形象、衣冠服饰均为中原形式，是佛教中国化的又一项证明。窟中另绘有约1 200身供养人的画像，是敦煌石窟中供养人最多的洞窟，为首的供养人还身着王公服饰，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此窟是由北周时敦煌地区各界人士通力合作完成，也不妨想象一下当时在当地最高长官的提倡下，众信徒一呼千诺，出钱出力建窟的情景。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周山北崖上，现存四十余个主洞，佛像繁多，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群开凿甚早，最宏大精美的部分是北魏建都平城时代的作品，以政府力量开凿；迁都洛阳以后仍未停止，但已成为民间开凿，属于小型石窟。总计现存45窟，大小窟龛252处，石刻佛像51 000尊以上，最大者高17米，最小者仅有几厘米。

460年，北魏文成帝命令凉州来的沙门统昙曜统筹开凿5个大石窟，即现存石窟的第16至20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此后陆续增开，佛像也变得更大，最大的佛像就在孝文帝时开凿的五窟中。

最早的昙曜五窟系参照外来的形式开凿，有共同的规格，其中佛像大都是厚唇、高鼻、大耳、长目、丰颐、宽肩的形貌。世传五尊大佛系仿照北魏前期五位皇帝的相貌雕凿，即文成帝（第16窟）、追封的景穆帝（第17窟）、太武帝（第18窟）、明元帝（第19窟）、道武帝（第20窟），其中第18窟主佛像身披千佛袈裟，世传是太武帝因灭佛而忏悔。以北朝佛教流行的程度而言，统治者将自身相貌比附为释迦，以设教治国，这种说法不无可能。

云冈石窟内自大佛以下，还有各种其他石像，依其重要性决定大小，再配以为大佛服役的飞天和侏儒，构成完整的宗教体系。飞天容貌美丽，衣着飘逸，手执乐器，翱翔天空，献歌献舞；侏儒身材矮小，躯干健壮，雕刻在龛基、座础、梁下、柱顶等处，形状为正在用力举起重物，都神情欢喜，表示在大佛身边的喜乐。有人将此体系做政治性的比附，认为大佛代表皇帝，侍者代表群臣，侏儒与飞天则代表男女百姓，是否同意，就请参访的朋友自行判断吧。

北魏南迁后云冈石窟仍在开凿，即今西区的第21至45窟，以及一些未编号的小窟小龛。其中造像变得较为清瘦，神态文雅，衣服褶纹重叠，汉文化风格浓厚，十分接近龙门石窟的雕刻，正代表北魏汉化后文化的改变情形。

龙门石窟

494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继续在首都郊外开凿石窟的传统，于是有了洛阳龙门石窟。洛阳南边有伊水流入，接近洛阳的一段是两边壁立的谷地，称为伊阙，西岸是龙门山，东岸是香山，都由坚硬的石灰岩构成悬崖，形势险要，战国时曾是秦、韩、魏三国的古战场。495年，北魏宗室比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石窟，称为古阳洞，为龙门石窟的开端。到宣武帝与孝明帝期间，皇室贵族笃信佛教，竞相建寺造塔，也不惜花费巨资，连续在龙门开凿许多石窟。此后直到东魏末年，龙门石窟陆续开凿，历经北朝五十余年营造，龙门石窟群刻满佛像，再经过隋唐盛世，总计有窟龛两千一百多个，佛像九万七千余尊，最大的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2厘米，另有碑刻题记三千六百余品，遂与莫高窟、云冈窟并列，成为中国三大石窟之一。

龙门石窟群中凿于北朝时期的最大洞窟称为宾阳洞。“宾阳”意为迎接初升的太阳，宾阳洞为北魏宣武帝为他父亲孝文帝做功德而建，由太

监刘腾主持，原计划开南北一线三座洞窟，但仅完成中间的一座，就已经历时24年，动用人工达八十万余，可见规模之大、投注资源之多。北魏时期人体审美观念崇尚瘦长，宾阳洞中主佛释迦牟尼面颊清瘦，颈项细长，体态修长，其服饰一改云冈石窟佛像偏袒右肩的印度式袈裟，成为宽袍大袖的袈裟，同样是佛教中国化的表征。

古阳洞因开凿最早，成为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留下碑记甚多。清代学者选择古阳洞中的碑记十九品，加上慈香窑中的一品，取名“龙门二十品”，认为是魏碑书法的精华，已如前述。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这座山因外形像一座麦草垛而得名，石窟开凿于山体西南、南、东南三侧的峭壁上，洞窟之间有栈道相连，现存各代石窟198个[7]，雕像、塑像共12 182身，包括泥塑7 866身、石雕3 995身、石胎泥塑312身、木雕9身，另有壁画1 065平方米，石碑18座，题记222处。麦积山石质不适合雕刻，故佛像以泥塑为多，其和泥技法高超，泥塑坚硬如石，经过千余年都未溃毁。

此群石窟最远约可追溯至十六国后秦时期，北朝期间石窟大量增加，现有70%以上的石窟为北朝时期所建。最大的塑像高15米以上，最小的塑像仅有20多厘米，可称中国佛教塑像大展览馆，有“东方佛教雕塑陈列馆”之誉。

北朝石窟还有不少较小的，散布在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甚至不排除还有埋没迄今的北朝石窟，有待探访北朝历史的人发现。

北朝历史文献

北朝人的著作崇尚务实，因此留下不少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前此已经介绍过《洛阳伽蓝记》与《齐民要术》，就文化的内容与特征而言，《水经注》与《颜氏家训》更是北朝代表性的作品，因其资料完备、特色鲜明而流传千古。

《水经注》

《水经》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流水系的专书，著者和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争议颇多，有郭璞[8]撰、郭璞注与桑钦[9]撰等三种说法，一般认为桑钦是著作人。《水经》简要记述中国137条主要河流的水道、水系情况，原文仅一万多字，内容简略，且缺乏系统，对各河川流域的地理状况记载仍不够完备。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为《水经》所做的注解。郦道元字善长，范阳郡涿县[10]人，从政是清官，不畏权势，因此得罪权贵，被汝南王元悦用“借刀杀人”之计陷害，死于反叛的雍州刺史萧宝夤之手。郦道元曾行遍北方各地，以亲身见闻扩充《水经》的内容，加入各河川流域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民谣逸事、神话传说等，撰成《水经注》。这部书记载河流水道一百二百五十二条，依地理方位分为40卷，总计三十万余字，全文超过《水经》本文二十余倍。书中随着河流所经，还记下各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景观，前者计有五百多处湖泊和沼泽、两百多处泉水和井水等地下水、三十余处伏流、六十多处瀑布、四十六处岩溶洞穴、三十一处温泉，后者计有各种桥梁九十座、津渡九十余处、古塔三十多处、宫殿一百二十余处、陵墓二百六十余处、寺院二十六处以及若干碑刻等。

书中对地理现象的观察仔细，记述客观，包括河谷的宽度、河床的深度、水量和水位的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等，如叙述洞庭湖是“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也”，黄河孟津河段[11]的冰层厚度则是“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等，又详细记载了各河川流域的地质、矿物和动植物。出现在书中的岩石有十九种，金属矿物有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

石英、玉、石材等二十余种。《水经注》还记载了古生物化石，甚至包括渭水上游成纪县[12]僵人峡的古人类化石。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有系统的地理著作，其文笔绚烂中带着清丽，也具有文学价值。书中引用大量文献，引书多达437种，这些原书很多都在后世战乱中散失，所以《水经注》还在不知不觉中保存下不少亡佚古书的原文，别具意义。

郦道元的足迹最南只到过淮河一带，故记载南方水系都比较简略。他描写长江三峡颇为精彩，有学者认为这些描写其实是参考袁山松的《宜都记》。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即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与青藏高原的河流，《水经注》因采取《尚书·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的说法，大多与事实不符，例如以岷江为长江源头，显然就是没有赴青海实地考察的结果；而继续抱持“黄河源出昆仑，潜行地下三千里”之说，将黄河源头设定在比帕米尔高原的葱岭更西北的地方诚然是谬误，却也显示这位北朝地理学家对黄河的向往与推崇。下面就让我们选读《水经注》的几段原文，一探这个被北朝知识分子接受，却是中国传统的谬误地理观念。

《水经注》选读[13]

卷一 河水一

> 昆仑墟在西北，三成为昆仑丘。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14]

卷二 河水二

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

>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15]之国，葱岭之上……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水西径休循国南，在葱岭西。……月氏之破，西君大夏，塞王南君罽宾，治循鲜城。土地平和，无所不有。金银珍宝，异畜奇物，逾于中夏，大国也。山险，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径月氏国南，治监氏城，其俗与安息同。……[16]

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

> 河水又东与于阗河合。南源导于阗南山，俗谓之仇摩置。自置北流，径于阗国西。治西城，土多玉石。……其国殷庶，民笃信，多大乘学，威仪齐整，器钵无声。……又西北流注于河。……又曰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会流东逝，通为注滨河。注滨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扜泥城。……土地沙卤少田，仰谷旁国。国

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国在东垂，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故彼俗谓是泽为牢兰海也。……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水）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17]

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隐沦之证，并间关入塞之始。自此，《（水）经》当求实致也。河水重源，又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东北历敦煌、酒泉、张掖南。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张掖，言张国臂掖以威羌狄。……河径其南而缠络远矣。河水自河曲，又东径西海郡南。汉平帝时，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远方，讽羌献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筑五县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纷乱，郡亦弃废。河水又东径允川，而历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钟存所居也。……按段国《沙州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桥在清水川东也。[18]

以下这段文章是典型的郦道元笔法，将一段河道边的历史故事尽可能说清楚：

卷十 浊漳水

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又东过武安县南。……又东出山，过邺县西。

……漳水自西门豹祠北，径赵阅马台西。基高五丈，列观其上。石虎[19]每讲武于其下，升观以望之。虎自于台上放鸣镝之矢，以为军骑出入之节矣。漳水又北径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20]

……又慕容儁投石虎尸处也。……漳水又对赵氏临漳宫，宫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月，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今地有遗桑，墉无尺雉矣。

郦道元在此面对五胡十六国时的遗迹，发出与《诗经·王风·黍离》相似的感叹，历史意味十足，表现出人文的关怀。

《颜氏家训》

南北朝后期动乱不止，不但南北持续争斗，双方内部也都在分裂对抗。这种乱世使当时的人备感痛苦，却造就出一部不求虚名、不唱激情的务实名著——《颜氏家训》二十篇。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当年在出版“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丛书时介绍这部书，用的副标题是“一位父亲的叮咛”，确能提纲挈领，一语道出《颜氏家训》的风格与精要。这位在一千四百

多年前的乱世著书为训，苦心叮咛后辈子孙的父亲、家长名叫颜之推。

颜之推本是南梁人，博学有见识，却在西魏攻破江陵的战争中被俘入关中。他不愿做敌国的臣属，找寻机会率领妻、子浮黄河东下，奔逃到北齐，在北齐做官。不料，北齐不久又被北周灭亡，他为了生活，只得再做北周的官，后来再经历隋篡北周，至隋文帝时病死。他晚年在《观我生赋》里说，自己一生三次成为亡国之人：第一次是侯景杀梁简文帝篡位，第二次是西魏宇文泰破江陵杀梁元帝，第三次是北周武帝灭北齐。其实隋文帝篡北周还可以算作第四次。

命运多舛的颜之推累积在南北两地生活的经验，深知南北俗尚的特色与弊病，洞悉南北学术的短长，努力要将这些在痛苦中累积的知识与经验遗留给后代。因此他的《颜氏家训》立论平实，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也注重工农商贾等技能，不流于南方的浮华，也不陷入北方的粗野，可称知识分子在乱世中持身的规范、自保的守则与处世的良轨，故能切中人心，历久弥新。

《颜氏家训》以汉人知识分子在北朝政权，尤其是北齐之下的生活为背景，由于北齐的文化政策是崇胡抑汉，颜之推面临此种环境，自然产生恪守汉文化的立场，也会发出对北齐时某些汉人见风转舵的感叹，千载之下，赢得明末民族主义大儒顾炎武的称赞。然而也有人因此认为，颜之推将家训写得道貌岸然，他本人的经历却并非一切都符合民族大义，有表里不一之嫌。

“道貌岸然”的颜之推确实曾在四个彼此敌对的政权做过官，其中还有两个是北朝政权。这种情况一方面显现中国士大夫家族必须借出仕以取得生活资源，并保持家族地位的实况；另一方面也提示历史的探访者，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借维系家风传承以保持中华文化于不坠，可能比几朝几代的政权更迭更为重要。当然，如果有人要说维系文化只是颜之推以及这类文人的借口，也无不可；或许，必须在乱世生活下去的颜之推本人，在这点上都不容易说得清楚。

《颜氏家训》中有许多篇幅记载南北双方的社会与文化差异，成为认识南北朝的重要资讯来源之一，兹选录数段，以见北朝文化的特色与南北文化的不同，又因此书文言文不深，就不再提供逐句的白话文翻译，请各位自行阅读体会，相信大家随本书探访南北朝至此，必能理解这些内容。

《颜氏家训》原文选录

教子篇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21]

后娶篇

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癣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斗阋之耻。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衣服饮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身没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22]

治家篇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

河北妇人，织纴组 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23]

太公曰：“养女太多，一费也。”陈蕃曰：“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吾有疏亲，家饶妓媵，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体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使人不忍闻也。[24]

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宠婿，则兄弟之怨生焉；虐妇，则姊妹之谗行焉。然则女之行留，皆得罪于其家者，母实为之。至有谚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报也。家之常弊，可不诫哉！

婚姻素对，靖侯成规。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25]

……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26]

省事篇

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諠动女谒。拜守宰者，印组光华，车骑辉赫，荣兼九族，取贵一时。而为执政所患，随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微染风尘，便乖肃正，坑阱殊深，疮痏未复，纵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脐，亦复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不能通达，亦无尤焉。[27]

止足篇

……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吾近为黄门郎，已可收退；当时羁旅，惧罹谤讟，思为此计，仅未暇尔。自丧乱已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28]

对北朝生活与文化的探访至此告一段落。下一章，也是本书最后的部分，我们将进入连串的政治斗争、文化选择与战火横飞的历史现场，一探在北朝后期的分裂与动乱中，一股新生力量如何春云乍展，以浴火凤凰之姿终结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分裂，引领中国走向隋唐盛世。

【注释】

[1] 指佛教。

[2] 指儒、道。

[3] 伏羲氏、神农氏。

[4] 又称拔陀、觉者。

[5] 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即496年。

[6] 刻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

[7] 麦积山洞窟数据已有更新，现称存洞窟221个。

[8] 郭璞（276—324年），晋代学者、方术家。

[9] 桑钦，东汉后期人，生卒年不详。

[10] 今河北涿州。

[11] 今河南孟津。

[12] 今甘肃静宁县。

[13] 《水经》原文为黑体字，《水经注》本文为楷体字。

[14] 以上部分《水经注》文字省略。《水经》以昆仑开篇，可见这个半神话、半实际的地方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

[15] 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西北。

[16] 此处《水经注》认为黄河有三处源头，最西边的一处发源后从葱岭向西流，应该是将中亚流向西北注入咸海的阿姆河误为黄河的上游；唯其记载大月氏的地理资讯有参考价值。

[17] 此处认为黄河另一发源为于阗河，误。以下叙述的其实是塔里木盆地中的塔里木河、孔雀河等内陆河流，因其向东注入罗布泊，更容易被误认为黄河上游；唯其记载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地理资讯有参考价值。

[18] 此处认为黄河注入罗布泊后潜入地下，到河西走廊以南，今青海东北部积石山附近才又露出地表。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可能是古人观察到河西走廊并无自西向东流的河川，既然相信塔里木河是黄河上游，则面对罗布泊并无河道流出的事实，只得异想天开地认为“黄河潜行于地底”。黄河主流出积石山后向东北方向，流至青海东北部，对此，中国古人已很熟悉，而青海省东北部距离河西走廊也不远，于是附会这里就是黄河潜行地底后的出口。从此以后，《水经注》对黄河的叙述就与实际相符，是有价值的地理资料了，例如对黄河桥的描述，如在眼前，更可以由此了解北朝时的造桥工法。

[19] 五胡十六国后赵皇帝。

[20] 西门豹故事省略。

[21] 这是《颜氏家训》中最常被引用的一段，是中国知识分子家族珍惜传统文化的象征，同时反映北齐时对汉化的反动，鲜卑文化当道的状况。

[22] 北朝重视家族传承，嫡出、庶出之分变得比南朝重要，却因此引起不少家庭问题。我们可以想见北朝时那种前妻之子说后妻是妾、异母的弟弟诬指哥哥是佣人的状况，想必北朝官府也必须处理许多这类兄弟反目争产的案件。

[23] 北朝长久被胡人统治，沾染胡人风俗，妇女积极主动，抛头露面，勇于任事，女性的社会地位显然高于南方。出门办事的女性必须盛装打扮，所以北朝的女红优于南朝，这样一来，北朝的女装业与首饰业想必也比南朝发达。

[24] 杀婴这种社会现象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又因重男轻女，被杀的女婴比男婴多很多，北朝也不例外。《颜氏家训》明确记载这种现象，使我们对北朝社会的了解更加清楚。

[25] “落索”意为冷落萧索，“阿姑”是北朝对丈夫之母的称呼。做婆婆的吃饭时冷冷清清，正是媳妇受到虐待后的报复。这两段记载加上前一段，使我们认识到北朝社会的阴暗面。

[26] 北朝自北魏推行均田政策以来，走的是小型自耕农自给自足型经济路线，一个家庭如果能巧妙利用政府的授田，则生活所需几乎都可以自行生产，不假外求，只有食盐因产地所限而例外。这种经济现象被从小生活在南朝的颜之推观察到并记录下来。南北双方经济形态的差距，也是我们探访南北朝时应该注意之处。

[27] 这段是典型的乱世处世守则，适用于北朝，也适用于任何地方。北朝后期政治斗争频繁，政治变动剧烈，“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过程为时很短。花钱买名，卖身投靠固然可以迅速发达于一时，却也随时有“树倒猢狲散”的危险；属于被统治者的汉人需要当心，从南方来的“新住民”汉人尤其要有警惕。这是颜之推的肺腑之言，由衷之语，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处乱世原则，在北朝后期的《颜氏家训》中得到最好的发挥。

[28] 这是北朝乱世之中维持一个中产阶层政府官员家族的典型写照：中等品级的

仕宦之家，约有二十人聚族而居，拥有良田十顷、奴婢二十人，家中有车有马，还积蓄铜钱数万枚。男主人做官时只求品级中等，考绩平平，以韬光养晦的心态，维系家门于不坠。“卓、郑”指西汉时蜀地的富翁卓氏、郑氏，见《史记·货殖列传》；“颜、原”指孔子的学生颜回、原宪，二人皆生活清贫，见《论语》。北朝汉人的此种心态与因此而产生的文化氛围，是北朝主流胡人文化的直爽质朴、勇武刚健以外，同样值得做历史探访的领域。

第六章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北朝终篇

大魏声威不再隆，宇文高氏各西东。

和合共济开周土，狂乱相残起邺宫。

关陇集团成本位，兰陵入阵化虚空。

武川胡汉相融日，南北烽烟可待终。

我们已经接近探访北朝的终点，北朝最后的时光，将在此展现。这段48年间（534—581年）的历史就是北朝从分裂到再统一的过程，其间变动剧烈，高潮迭起，让人目不暇给。中国历史上最残暴、荒淫、狂乱的皇室在此时出现，使北方东部发生南北朝最后一次民族歧视与文化歧视，可谓从光明走向黑暗的阶段，当地的一群统治者将本来大好的形势轻易断送，落得身死国亡。

就在同时，中国经过民族杂居与政治分裂将近四百年后，时间终于开始抚平巨大的民族与文化伤口，修补长期的心理与观念鸿沟。北朝分裂后，北方西部原属偏远的地区，此时居然出现了一个气象一新的新政治军事团体，他们不再区分胡、汉，反而通婚融合，大家和衷共济，以新风气、新社会、新制度、新文化为特色与号召，向统一北方、平定天下的方向努力进发。577年，他们达成统一北方的初步目标，581年调整内部，北朝到此结束。589年，他们终于消灭南朝，完成统一天下的最后目标，一举结束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与纷乱。

这是一段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我们探访南北朝至此，也终于可以发现，即使大乱四百年，民族仇杀、身份歧视、文化差异、宗教争端……是如此的严重，愚昧、腐败与残暴是如此的普遍，人类社会中原来不同的人毕竟还是有互信互谅、精诚合作、团结奋斗的可能。这样的一群人在北朝最后的黑暗中乘着曙色，将迎向一片由他们主导，供他们驰骋的灿烂中华大地。

晋阳已陷休回顾，疯狂残暴几君王：狂乱皇朝北齐

问题的提出

北齐（550—577年）是北魏分裂出的皇朝之一，也是最被人诟病的政权。这个政权的皇室以凶狠残杀、淫荡无伦、奢侈浪费、童 荒唐著称，他们的倒行逆施使大好的形势轻易逆转，结果被原本居于劣势的北周消灭。然而北齐的皇室为何如此狂乱？北齐的内部有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北齐被北周灭亡又具有何种历史意义？这些都有待我们去探访、解答。

北齐篡东魏建国，故论北齐应先述东魏。

东魏（**534—550**年）

南北朝时期北魏分裂后出现的王朝之一，只有孝静帝元善见一个皇帝，共存在17年。东魏得到北魏土地的大半，立国在北方的东部，领有今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地区。

北魏末年的战乱中，鲜卑化的汉人军阀高欢势力最强，他拥立北魏孝文帝年仅11岁的曾孙元善见称帝，是为孝静帝，建都邺城，与宇文泰所掌控的西魏对抗。东魏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由高欢掌控整个政局，并以高欢大丞相府所在地的晋阳为别都。高欢表面对孝静帝甚为尊崇，名义上的皇帝与实际上的霸主间颇能相安无事；但高欢于547年病死，其权势由长子高澄继承，继续掌控东魏政权。高澄当政期间颇有武功，击败南梁，收复河南，拓展国土到淮河流域。他大展国威后就打算逼迫东魏皇帝“禅让”，不料遇刺身亡。高欢的次子、高澄的同母弟高洋接着控制大权，于550年逼迫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位，自立为帝，东魏亡。

北齐初年

550年，高洋篡东魏建国，定国号为大齐，仍建都于邺，以晋阳为别都，史称北齐或后齐，以别于南齐，因皇室姓高，又称高齐。这个政权历经文宣帝高洋、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

幼主高恒六帝，577年被北周消灭，立国28年。北齐继承东魏控制的地区，与其大致同时并存的王朝有西魏、北周（取代西魏）、梁（包括后梁）、陈（取代梁）。

北齐初年曾于552年起连续击退库莫奚、契丹、柔然、山胡等北方游牧民族，又曾大破南梁，取得淮南，势力一直延伸到长江北岸，国力达到鼎盛，可称形势大好。

北齐的诸般面貌

北齐据有黄河中、下游的大平原，这是北朝生产力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故这个国家比同时存在的陈、北周都富庶，其制度也甚为完备，文化发展很高，可说是直接继承了孝文帝汉化后的北魏。

北齐继续推行均田制，农业发达，产业繁荣，制盐、冶铁、陶瓷器制造业等手工业都相当兴盛。此时陶艺发达，陶器的釉色已达双色以上，白胎陶器开始发展，绘画品质也很高，太原的娄睿墓壁画为其代表作。北齐的陪都晋阳[1]是当时陆上丝路贸易的起点，市面繁荣，还有西域胡人居住。

北齐的律法在当时各国中最为完善，制度也最为完备，有些制度一直沿用到隋朝和唐朝，例如中国传统的“官署印制度”就从北齐开始。南北朝以前，中国官署一直以官职印为正印，印随官动；从北齐起，政府单位的印出现——“官署印”，印文就是该机构的名称，印永远留在官府机构内。此种变革的政治意义是令政府公权力从此属于机构，而不是机构的长官，可说是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变革。隋朝肯定这种制度，将官署正印从官职印改成官署印，延续迄今。北齐初创之际，兵制继承北魏，兵民分离，以鲜卑人为兵。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时开始用汉人当兵。到564年，北齐政府将兵役与均田制结合，成为对自耕农的普遍征兵制，也是隋朝府兵制的来源之一。

北齐政府抑制道教，于是佛教盛行，建寺、凿窟、造像成为流行风气，中国佛教艺术得以充分发挥，造出不少中国历史上最精致的佛像。北齐的石窟艺术以响堂山石窟为代表，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始凿于东魏晚期，主要洞窟完成于北齐时期。北齐文宣帝高洋欣赏这里的山清水秀、景色优美，遂在此广设宫苑，凿窟建寺。此后隋、唐、宋、明各时期均有续凿，现存石窟16座，其中10座为北齐所凿，计有造像4 500余尊，并有大量的刻经和部分摩崖造像。

北齐皇室乱象

这样的一个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三国鼎立中本来占有优势，结果却成为最先被消灭的一方，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只有从北齐本身，尤其是领导它的皇室探索，才能找到答案。

从中国文化的观点看，北齐皇室可谓全无教养。这个高姓家族只有高欢正常，其后几代人都凶淫荒唐，所作所为简直是暴君小说情节。这一家族持续疯疯癫癫，有人认为是精神病基因遗传的结果，然而即使他们真有精神病遗传，其发作状况也必然与文化背景及生活状况有关。无论是否有精神病，北齐皇室的乱象，应是汉人选择胡化，却导致过度表现的结果，亦即唯恐胡化不足，有意加强，结果出现的反而是胡人文化的阴暗面，恰与北魏孝文帝汉化运动后，学习汉人世族唯恐不及的鲜卑贵族成为两个极端的对比。

当然这个家族并非没有出过比较符合传统中国理想的君主，例如废帝高殷与孝昭帝高演，但是家族的风气与传统使这样的人难以立足。历代皇帝都有测验太子的嗜好，高洋的做法却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作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测验太子高殷的方法，竟然是当场要高殷拿刀砍人的头。高殷心怀不忍，几刀都没把头砍下，故高殷虽被立为太子，却被他的父亲高洋和一批亲戚看不起，理由是他太仁爱柔弱。由此可见，北齐皇室高氏家族的主流与传承作风，就是“残暴必须，残暴有理，残暴是常态”，这种家庭教育自然教出连续的暴君。在他们的统治下，随他们高兴判刑定罪，北齐的法治完全被破坏。

放荡的北齐皇室

北齐皇室的放荡是多方面的，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程度剧烈，身兼昏君、乱君、暴君者比比皆是。

北齐的皇帝几乎都酗酒，酒醉后失去理智，往往继之以胡乱杀人，尤以文宣帝高洋与武成帝高湛最甚。他们的奢侈浪费也达到高峰，动辄大兴土木，奢华装饰。

北齐皇室的淫乱史不绝书。中国古代虽可纳妾，但夺人之妻必遭非议，而不论辈分，父子通妻、兄弟通妻则属逆伦行为。这些情况在北齐皇室却屡见不鲜，甚至父子兄弟同行奸淫，皇室淫乱成为常态。

从高欢起，高氏家族的男女与家庭观念全部来自胡人，认为胜利者

就应该占有失败者的女眷，子承父妾、弟承兄妻更是理所当然。高欢掌权后，陆续将北魏孝庄帝皇后（尔朱荣女）、建明帝皇后（尔朱兆女）、广平王妃郑大车、任城王妃冯氏、城阳王妃李氏等宗室之妻妾纳入后宫。在这种观念下，高氏家族代代如此，性关系极为混乱。高欢生前，郑大车即已私通其子高洋；高欢死后，其妻柔然公主被其子高澄所奸，还生下一个小孩；高澄的皇后又被高洋所奸；高洋的妻子再被高湛所奸。高湛的皇后胡氏，与大臣和士开奸淫，再通奸沙门昙献，最后改嫁。高澄14岁就和高欢妃郑大车私通，又想强奸功臣高慎的妻子，迫使高慎叛逃至西魏。高洋称帝后就强奸了哥哥高澄的妻子元氏，说："从前我哥哥奸污我老婆，现在我要回报。"他又纳大臣崔修之妻为嫔，娼女薛氏也被纳入宫内为嫔。他在位后期酗酒无度，异想天开起来就在宫中集合高氏宗族妇女，让她们与近臣卫士集体相奸。高洋之弟高湛则逼奸高洋的皇后李氏和众嫔妃，还把东魏孝静帝及几个功臣的女儿都招入宫中宣淫。

北齐残杀前代皇室极为激烈而彻底。北魏宗室元韶娶高洋长姊，高洋曾问这位姊夫："汉朝为何可以中兴？"元韶回答因为王莽建立新朝时，没有将汉朝刘姓宗室杀光，后来才有刘 、刘秀等起来革命。高洋认为有理，于是他上位后立刻下令诛杀北魏宗室25家全部人口，囚禁19家。此案总计杀死3000余人，仅在东市就斩杀721人，3000多人的尸体全部投入漳水。说话不小心的元韶也被囚禁，后被饿死。

北齐在这样的皇室统治下，大约有一半的时间中皇帝无视制度与法律，全凭个人喜恶或当天的心情下令办事。北齐的君主甚至可以荒谬到完全忽视基本情势与事理逻辑的地步，因而严重影响到国家大事。最有名的是在对北周的战争军情紧急之际，后主高纬为等候爱妃冯小怜前来观战，竟然在北周军渐渐不支，北齐军即将获胜之际下令停战，荒唐地轻易放弃了胜利的机会。

以下让我们探访一些历代北齐皇帝残暴荒唐的实况，请先有心理准备，这又是一连串会使正常人不愉快的画面。

文宣帝高洋（526—559年，得年34岁，550—559年在位）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高氏家族中的背景，颇类似西晋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他们都是军事强人家族的第三任领袖，前两任已经建立起家族势力，掌握国家大权，但并未篡位，他们接任后则不再客气，都立即篡位自立，建立新王朝。新王朝建立初年，他们也都有一些武功，接着却都

迅速陷入荒唐的生活，带给刚建立的国家严重危机，果然也都使国家寿命短促，更使当时广大的人民受苦受难。

高洋是高欢次子，幼时其貌不扬，沉默寡言，曾是兄弟嘲笑、玩弄的对象，其实他大智若愚，聪慧过人，胸怀大志。高欢曾经交给诸子每人一堆乱丝，要他们整理清楚，就在众兄弟“理还乱”时，高洋抽出佩刀把乱丝一斩而断，说：“乱者须斩。”高欢认为甚获己心。高欢“文试”后继之以“武试”，命令诸子各带一队兵出去，而暗中派将军彭乐率领武装骑兵假作攻击，以测验他们的反应。结果长子高澄等都震怖屈服，只有高洋率众和彭乐格斗，彭乐脱下头盔说出真相，高洋还把彭乐抓住送给父亲，由此可见他倔强与决绝的个性。

倔强与决绝的个性使高洋在位初年兢兢业业，留心政务。他削减州郡，整顿吏治，训练军队，加强边防，北齐初年因此甚为强盛，比陈、西魏都富庶。高洋随即出兵进攻柔然、契丹、高句丽等国，都大获全胜，北方边境得以安定。

若是一个正常的北齐皇帝，这时就应该考虑下一步是先吞并西魏，还是趁着侯景之乱拿下南方，决定以后立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外交布置，并展开宣传，寻找契机。然而高洋却是志得意满，开始沉湎于酒色与豪华之中。酗酒使他失去理智，经常举止荒唐，滥杀无辜。高洋的荒唐行为包括：兴建高台时，曾独自爬上最高处，看到的人都胆战心惊；时常出巡，在街道裸露身体，寒冬不变；等等。甚至有次喝醉酒，他说要将母亲娄太后嫁给北方蛮族，母亲气到怨叹自己怎会生出这个禽兽不如的儿子。高洋略为清醒后，想逗母亲开心，却失手将母亲摔伤，完全清醒后才发现自己的错，于是令人痛鞭自己，下决心戒酒，但是坚持了一下就松懈下来，仍无法戒除酒瘾。

高洋曾有一名受宠爱的薛嫔，原为歌伎，后来他忽然怀疑薛嫔与清河王高岳私通，于是下令命高岳自杀。薛嫔当时怀着身孕，分娩后，立刻遭到斩杀肢解，高洋还将头颅放在衣袖里，回到宫中就大宴宾客，宴会上突然将人头丢出，众宾客吓得四散逃避，他则不慌不忙地取出薛嫔的髀骨[2]当作琵琶，边流泪边吟唱：“佳人难再得！”[3]薛嫔下葬时，高洋却披头散发，在车后步行跟随，大声号哭。

对高洋等北齐君主的评价，历代史家都认为是负面样板，大张挞伐，柏杨甚至以“禽兽王朝”来形容北齐。近年对北齐高氏家族的研究，则趋向从异常人格发展的观点切入，研讨这些昏暴君主异常人格产生的

原因。就高洋而言，他出身于一个充满权力、阴谋、战争、杀戮的显赫家族中，接受的是以铁石心肠、铁血手段掌握军政大权的教育，加上饱受既是兄弟手足又是零和竞争者的亲人的嘲讽与轻视，人格极易扭曲。高洋34岁时因酗酒放纵损及健康而死，他荒唐残暴的一生，可说是一个异常人格发展的典型案例。

废帝高殷（545—561年，被杀，得年17岁，559—560年在位）

北齐文宣帝高洋嫡长子，母亲是皇后李祖娥。年6岁被立为太子，性格敏慧柔懦。高洋死，高殷即位，时年15岁。他在位时期由叔父高演当政，叔侄二人关心民生，减徭役，命使者巡查四方，探访民间疾苦，军事上淘汰老弱，制定军官60岁退伍制度，使北齐得以保持军事力量，也使高洋统治后期的危险局面得到纾缓。

但高演位高权重，开始觊觎皇位。560年，太后李祖娥与高演的矛盾白热化，高演发动政变，高殷被废，其祖母娄太皇太后命高演发誓决不伤害高殷性命，但高演还是将高殷秘密杀害，娄太皇太后也变回皇太后。

孝昭帝高演（535—561年，得年27岁，560—561年在位）

北齐第三任皇帝，高欢第六子，高洋同母弟。他是高氏家族中的异类，为人有气度，长于政术，善于理解事情的细节，曾屡次进谏沉湎酒色的高洋。高洋临终时，表示必要时皇位可以相让，唯不可伤害高殷。废帝即位后，高演独揽朝政，不久发动政变称帝。

高演留心政事，任用贤能，关心民生，轻徭薄赋，对外曾亲自出长城北征库莫奚，将其驱离并大获牛马。北齐六帝之中，只有他称得上是德才兼备的明君，但天不假年，高演在位第二年就因坠马重伤而死。鉴于自己所作所为，为保住儿子的性命，高演临终时宣布废掉年幼的太子，传位于弟弟高湛。

武成帝高湛（537—568年，得年32岁，561—565年在位）

北齐第四任皇帝，高欢第九子，高演之同母弟。北齐传承到他时，大致都是兄终弟及，此因北齐的君主全部短命，嗣子年幼，在这样一个唯力是视的家族，权力自然会落到已经成年的叔父手中。

武成帝高湛是真正昏庸无能的皇帝，整天沉湎酒色，不理国事，北齐从此江河日下，逐渐陷入危局。高湛貌美，但性格非常残暴荒唐。他早年就曾向哥哥高洋进谗言，烧死同父异母的兄弟高浚。高湛好色，包

括男色。他最宠爱高孝瑜、和士开，高孝瑜是他的侄子，而和士开是胡人，不仅是高湛的男宠，还与高湛的胡皇后私通。高湛继位后，逼哥哥高洋的皇后李祖娥与之相奸，恐吓她："如果你敢不从，我就杀了你儿子。"李皇后只得依从，还颇受宠爱。不久她怀孕了，一次儿子太原王高绍德到她的宫殿，她避不见面，高绍德便怒言："做儿子的难道不知道吗？您是肚子大了，所以才不见儿子吧。"李皇后羞愧难当，等到生下一个女儿后，在又羞又怒之下，她将这个刚生下来的小公主杀死。高湛见女儿被害，怒不可遏，将高绍德捉到宫中，举刀怒骂李祖娥道："你杀我女儿，我为何不杀你儿子？"高绍德惊慌求饶，高湛又骂高绍德"想当年我被你父亲毒打，你也没来救过我！"，当场将高绍德杀死。李皇后大哭，高湛更加愤怒，将她的衣服脱光，鞭打一顿，再将她装进绢袋，丢到渠道，随水漂流，被救回后，许久才苏醒，最后高湛又用牛车把她送到妙胜寺出家为尼。北齐灭亡时，她还被北周俘虏到长安，隋朝时才得以回归故乡。

565年，高湛认为做皇帝太麻烦，就传位于太子高纬，自任太上皇。三年后，高湛因酒色过度而死，年仅32岁。与高湛同样身为亡国之前的君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4]曾说过："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这句话也正是高湛的写照。

后主高纬（556—577年，被俘投降后被杀，得年22岁，565—577年在位）

北齐第五任皇帝，武成帝高湛嫡长子，标准的纨绔子弟，喜好醇酒美人、声色犬马，过着豪奢浪漫的生活。他最宠爱的妃子冯小怜，也是个只知享乐、不懂天高地厚的少女，这对少年夫妻创造出一段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荒唐事迹，对此我将另行叙述。高纬即位时，北齐政权已经好景不再，被北周追上，但他毫无所觉，仍然只知荒淫与内斗，导致北齐政治腐败，国力迅速走向下坡。他又因少年即位，既无文韬，又无武略，故极为猜忌，唯恐臣下坐大谋反，几年之间连续诛杀名将兰陵王高长恭、斛律光、段韶等，北齐从此失去有能力抵抗北周的将领。北周武帝听说斛律光被杀，等于北齐自毁长城，竟宣布全国大赦，以示庆祝。

577年，北周军大举进攻，北齐军大败，京师邺城失陷，高纬慌忙传位给8岁的儿子高恒，是为北齐幼主，然后带着幼主高恒等十余人骑马南奔，准备投降陈朝，但逃到青州[5]被北周军俘虏，北齐灭亡。高纬不久被杀死，终年22岁。

中国历史上有四位后主：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北朝北齐后主高纬与三国蜀汉后主刘禅。他们都是中国分裂时期的末代皇帝，最后也都被强大的敌国俘虏，然而李后主文才高妙，所作的词名垂千古；陈后主也擅写宫体诗，虽然颓废，却也绮靡；三国蜀汉的刘后主，因“乐不思蜀”而出名，但至少还有点文化程度；只有高后主文化程度最低，以致几乎毫无名声，被埋没在历史中。北齐皇室家教之差，由此可见。这也反映出北齐时文化上的弃汉化回归鲜卑的现象，成为探访北朝末期必须注意的地方。

北齐皇室乱象与北朝末期文化氛围

魏晋南北朝时代天下大乱，胡汉杂居。汉朝用以维系政权、社会与文化的儒家思想没落，礼教与伦理道德松动，社会约束力降低。胡族原属游牧文化，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与中原不同，所以在胡族控制地区，胡族与汉族社会较低阶层的人，难得受到中原传统礼教的限制与伦理道德的熏陶，行为多较为率性，男性如此，女性亦然。皇族因拥有政治力量，更容易自以为是，行为失控。

北魏前期皇室因面对各地分裂割据，始终在争战创业中，子弟尚可。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义无反顾、不留退路的汉化，结果这批新贵很快学会了汉人的糟粕，随即腐化，并与汉人世族结合成为掌权集团，使得汉化的中央统治集团与未汉化的边疆地区格格不入。边疆胡人文化区在备受轻视之余产生心理上的反弹，故六镇之变以来，随着胡人集团掌控国土，中国北方出现一种轻视与反对汉文化，以回归胡人本色为尚的风气。六镇之变后，汉化比较浅的六镇部将再度推广使用鲜卑语，中国北方掀起由上而下的鲜卑化运动，是以《颜氏家训》才会记载有的汉人谄媚当道者，要儿子去学习鲜卑语及弹琵琶。

从北魏后期六镇之变起，北魏中央的汉化集团与边疆的胡人文化集团发生冲突，战乱不断，直接冲击到北魏中央的世族集团。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残杀官员二千余人，多属世家大族，此时原来北魏属于汉人文化的高门大族遭到严重打击，等于创造了胡人文化复辟的土壤。

北齐创建者高欢的祖先虽是汉人，但其家族早已和鲜卑人通婚，其妻与诸多儿媳都是鲜卑人，高欢自己也以鲜卑人自居，成为完全鲜卑化的汉人。他一旦当权，在文化上自然以胡人文化的保卫者与推广者自居，唯胡风是尚，其子孙则延续了此种风气。到北齐孝昭帝时，杨愔[6]

等世族汉臣被杀，从此汉人世家一蹶不起。

北齐到后主时期，朝廷中“大鲜卑主义”“鲜卑本位主义”盛行，掌握实权的多是昔日六镇边区低级军士出身的鲜卑人或胡化汉人，性格慓悍，作风粗鲁，毫无文化修养，只知战斗、杀戮与享乐，他们彻底轻视汉人文化与其代表的昔日元魏门阀和汉人世族。北齐皇室作为他们的领导者，遂走上回归鲜卑本色的道路，其行为一如五胡十六国政权中那些完全率性而为、不理其他的胡人统治者。从北齐皇室一些成员对汉文化的不屑一顾看来，北齐皇室的作为实可视为当时胡汉文化矛盾之一环，也是南北朝末期胡人文化恶劣面的回光返照。

在中国历史上，北齐是一个奇特的政权。一方面它的君主与统治高层放荡胡为，政治斗争极为激烈，杀戮不停；另一方面它的制度良好完备，经济繁荣昌盛，文化发达，佛教艺术造诣很高。从传统历史叙述的观点看，二者似乎格格不入。所以近年史学界对这种现象提出解释，可称对北齐的新理解。

若探寻北齐在与北周竞争中失败的原因，可以发现北齐始终未能将全国力量做有效的整合。手握大权的高层山头林立，互相猜忌，内部斗争不断，杀戮严重，以致力量互相抵消。唯此种持续性的争斗与动乱，主要发生在鲜卑文化统治集团的内部，并非来自胡、汉的差异。大量被统治的汉人在鲜卑的强势武力下，大致采取颜之推式的对应方式：不与当政者直接抗争，担任政府中的事务官，保持家族文化传承。在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下，北齐缺乏上下一致认同的立国精神与国家目标，无法有效整合全国力量。鲜卑化的上层既然崇尚暴力，保持草原游牧民族的家庭伦理，则必然无法确立稳定的继承法则与继承制度，因此中央政治始终不上轨道，内斗成为常态；多数被统治的汉人则对此漠不关心，等到中央的力量因内斗而自我减损后，面对强力的敌人北周，自然无法抵挡。

北齐的对手北周则在融合胡汉、建立中央制度与规则等方面都甚为成功，故能有效整合国内力量，逐步发展，终于获得胜利。

补充知识

兰陵王典故

以“兰陵王”著称于世的是北齐皇室大将高长恭（？—573年），名高肃，长恭为其字。他是高欢之孙，高澄第四子，母亲不详。有些传说认为高长恭的母亲是一名女尼，遭高澄逼奸生子，所以史官不加记载。

高长恭相貌柔美，但勇敢善战，为冲锋陷阵时威吓敌人，故佩戴狰狞的面具上阵。564年底，北齐、北周爆发洛阳邙山之战，北周攻下洛阳附近地区，包围洛阳城，却未攻下，北齐派段韶、斛律光与高长恭领兵前往救援。高长恭率领五百名骑兵冲破北周军队阵地，直抵被围的金墉城[7]下，自身也被包围。当时北齐守军不能确定这戴面具的将军是敌方还是我方，于是高长恭在城下脱下面具，露出俊美面容，北齐军才派出弩手迎接。

金墉城因高长恭的英勇奋战解围，北周军队匆忙撤退，北齐转败为胜。战后北齐士兵们为歌诵他的英勇，编出《兰陵王入阵曲》，以歌唱与戴面具的男子独舞赞颂兰陵王。此歌舞剧在唐朝甚为流行，后来还传到日本。

邙山战役胜利使兰陵王威名远播，却功高震主，尤其他清廉自持，爱护部下，反而更引起北齐后主高纬的猜忌。573年，后主派使者送来一杯毒酒，兰陵王万念俱灰，毅然喝下毒酒，时年约三十岁，死前还把所有别人欠他钱的借据烧光。高长恭之死，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案例，他死后四年，北齐被北周灭亡，高氏子孙几乎全遭屠戮。

北朝宫廷豪放女

北朝宫廷女性特征

依现有历史记录看，身为后妃的北朝宫廷女性有两大特征：

一是人生起伏极大，被杀、改嫁、出家十分常见；二是感情与性关系复杂，拥有情夫十分常见，往往还不止一个。这种特征与她们的丈夫相似，共同构成北朝宫廷特色。比较起来，北魏与北齐的宫廷女性上述两大特征明显，北周的宫廷女性则大致已回归中原传统。

北魏（386—534年）及分裂后的东魏（534—550年）、西魏（535—557年）三个朝代中，历史有记录的宫廷女性共二十八人，其中被杀九人，暴死三人（也可能是被杀），出家为尼三人，改嫁三人，其余十人即使全部假设为毕生过着正常中国传统宫廷女性的生活，且自然寿终，也仅占三分之一强。

北齐（550—577年），历史有记录的宫廷女性共十八人，其中被杀两人，改嫁四人，改嫁者中后来一人自杀。

北周（557—581年），历史有记录的宫廷女性共十二人，其中出家为尼五人，改嫁一人。

北朝宫廷女性在皇帝丈夫外另有情夫者，可谓比比皆是。

面对此种现象，如果仅仅对当时“伦理沦丧，道德低落”的现象大加挞伐，并无助于大家深入理解。实际上乱世中连续而普遍发生的乱象，

背后一定有社会与文化的原因有待发掘与解释。换句话说，我们探访这段历史，就必须回答“北朝时代为何宫廷中如此混乱”的问题。

北朝宫廷女性的行为特征与胡人文化有关。原来草原地区自然条件苛刻，游牧民族的全体人口都必须为生活努力，许多必要的工作如挤奶、捡拾牛粪等更几乎是专属妇女的工作，妇女既然对物资生产有贡献，其地位就比农业地区的女性高，发言权较大，也更能自我表现。魏晋南北朝时代大批胡人进入中原，许多成为各国的统治阶层，给宫廷中带来浓厚的胡人风俗习惯。胡人妇女的地位相对较高，身为统治者又使她们自我表现的机会大增，当然容易找寻入幕之宾。这种风俗的影响长久存在，故宫廷之中也常有女性干政或当政之事，当然也使得北朝宫廷女性常常卷入政治斗争、阴谋与杀戮中。

若论北朝宫廷女性的当政成绩，可谓好坏杂陈，成败并见。她们有的既具备政治理想，又有执行的能力，而且知人善任，政绩比男性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国家贡献很大；有的则限于能力与操守，也跟男性昏君一样昏庸奢侈，把国家带向分裂与混乱之途。但无论如何，北朝宫廷女性追求自我、表现自我的精神，为唐代前期之外中国历代后宫女性难以企及者。至于她们的私人生活，则因当时汉化尚浅，即使出身大族，也大多率性而为，不太在乎礼法，拥有地位与权力后，拥有情夫者自然十分常见。今举数例如下述。

成功的北朝宫廷豪放女

北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442—490年）

前已叙述，兹不赘。

高欢妻娄昭君（北齐追谥明皇后，501—562年）

高欢出身寒微，他的发妻娄昭君却是六镇豪族之女，在南北朝时二人本不可能结婚，但娄氏慧眼识英雄，终于打破阶级限制成婚。历史记载娄昭君曾拒绝许多豪门的婚约，却一见在城上服役的高欢，就认定非他不嫁，居然派婢女私下致意，又暗中拿出私房钱交给高欢当作聘金，她父母最后不得不同意。

婚后娄昭君成为高欢绝佳的内助，对丈夫的事业贡献良多。高欢创业期间有许多密谋会议，娄昭君大多参加。一次，高欢将率领东魏军与西魏交战，临出发前娄昭君恰好分娩，还是一男一女的双胞胎，一度难产，情势危急，身边侍从请求赶快报告已封王爵的高欢，娄昭君坚决拒

绝，说：“大王正统兵外出，怎可轻易离营？我死生有命，他来做什么？”

东魏与西魏征战连年，537年东魏在沙苑[8]之战大败，被西魏俘虏七万人，损失惨重。战后大将侯景屡次自告奋勇，请求率领两万精锐骑兵突袭西魏，吹嘘必能将西魏灭掉。讲得多了，高欢高兴起来，觉得不妨让他试试，就先回家和妻子商量。

娄昭君一听，立刻反对，说出一针见血的敏锐分析：“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难道他还有回来的道理？得到宇文泰却失去侯景，还有何利益可言？”以娄昭君的出身和那时书籍流通的状况，我们可以相信她没有读过《三国志》，不会了解司马昭派钟会率领大军灭亡蜀汉，钟会却想乘机割据自雄的典故。娄昭君对侯景的怀疑，可说是出自她天纵英明的政治敏感与作为高欢之妻的政治经验。

在这方面，同样碰上侯景的梁武帝显然瞠乎其后，政治形势研判简直不及格，比起娄昭君差得太远。

作为高欢的贤内助，娄昭君节俭持家，亲自纺纱织布，不论是否己出，高欢的每个儿子都得到过她手制的衣服、裤子。作为宫廷女性，她又毫不忌妒。当时游牧民族柔然（蠕蠕）强盛，西魏已经联合了他们，正准备组织联军攻打东魏。高欢听说就派人出使柔然，为世子高澄求婚，以化解此事，柔然可汗却说：“高王爷自己娶才可以。”高欢闻报犹豫难决，娄昭君说：“国家大计，希望你不要犹疑。”高欢听从，果真娶柔然公主郁久闾氏为王妃。

公主到达时，娄昭君让出正室给公主，身段可谓柔软已极。这位当时15岁的柔然公主也是草原女杰，性格刚毅，在东魏完全不说汉语，高欢都很怕她。或许娄昭君对郁久闾公主早就做过研究，公主宁折不屈的性格与背后的柔然的强大势力，正是娄昭君愿意忍辱负重的原因。

娄昭君有三个儿子做皇帝，却未曾为娘家人讨过官职爵位。不论就胡人或汉人的文化而言，她都是理想的妻子与家族的女性领袖。从娄昭君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的女性如何在传统中开拓自己的前途。

失败的北朝宫廷豪放女

北魏孝文帝幽皇后冯氏、北魏孝明帝太后胡氏

前已叙述，兹不赘。

北齐武成帝皇后胡氏

她是武成帝高湛的皇后，后主高纬的母亲，后主时的太后。这位女士在性关系上是真正的豪放，一生私通不断。

双性恋的武成帝高湛有个男宠和士开，擅长握槊[9]，常在宫中与胡皇后玩握槊，二人因此奸通。高湛死后，胡氏成为太后，常出宫拜佛，又与僧人昙献通奸，布施金钱无数，还把丈夫武成帝用的家具搬到昙献的屋里。后来她变本加厉，竟然在内宫中招来一百名僧人，托辞讲经，日夜跟昙献混在一起。她儿子后主高纬听到有关太后的风言风语，起初还不相信，后来去朝见太后，看到太后宫中有两个美貌的少年女尼，后主高纬像其父母一样淫乱成性，把这两人找来要逼奸，却发现他们是男人。后主大怒，把昙献等全部杀掉。从此这对母子互相猜忌，儿子不敢吃母亲送的东西，只怕母亲痛下杀手，把他毒死。

作为顶层统治阶级的女性，胡氏平生只知追求富贵与快乐，为所欲为，却也没有干涉朝政。北齐灭亡后，她与后主皇后穆黄花等被俘至北周，死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许多网络资料说胡太后与穆皇后在北周不能过清贫生活，遂在长安为娼，大受欢迎，胡太后还有“为后不如为娼”的感叹。此说法各正史皆不载，是出于近代人蔡东藩所撰之《南北朝演义》七十九回，只能当作野史小说家言姑妄听之。唯胡太后在北周与隋朝时仍有活跃的性行为，则因史有明文，应为事实。

北齐后主淑妃冯小怜

这是一位不知人情世故的北朝宫廷率性女，她因为唐朝大诗人李商隐的这两首诗而大大有名：

北齐二首

唐 李商隐

其一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其二

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诗说得不错，北齐后主高纬与他的淑妃冯小怜，夸张一点是可以称为“玩完一个帝国的一对童 少年男女”。

冯小怜，北齐后主高纬的妃子，有姿色，擅琵琶，工歌舞。她自幼入宫，充当后主穆皇后的侍女，穆皇后后来失宠，其侍女冯小怜取而代之，从此获得后主专宠，先封淑妃，不久晋封左皇后。“左皇后”这个头衔出现在北齐宫廷，正是北齐胡化的象征。中国汉文化的皇帝后宫中只有一位皇后，其他都是嫔妃，北方游牧民族领袖则可能同时有好几位“阏氏”[10]。

冯小怜可说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更完全不知天高地厚的率性宫廷女子，遇上同样生于深宫之中的后主高纬，二人彼此相爱，却由于大权在握，导致他们但凭童 之心做出的荒唐决定都会被当成圣旨执行。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决定为北齐带来极大的灾难。以下就是她和北齐后主最极端的一段事迹：

当时北齐、北周正在激烈的战斗中，北齐围攻北周的晋州[11]城，后主高纬带着冯小怜前往督战。北齐军冒死冲锋，已攻破对方据守的城墙一段，后主大喜，想要在冯小怜面前表现一下，就派人请冯小怜来观看齐军破城，同时竟下令暂缓进攻，专等冯小怜来。等到冯小怜梳妆打扮好，姗姗来迟时，北周守军已经用大木将城墙缺口补好，奉命停攻的北齐军为之目瞪口呆，士气涣散，遂无法攻下，晋州这个军事要地因此再也不属于北齐。北齐终被北周所灭，与此有关。

北齐灭亡，冯小怜也被北周军俘虏，送到长安。她先是在高纬恳求下被送还，亡国之君高纬却在不久后被杀，冯小怜并未殉夫自尽或出家为尼，而是辗转两次被送给胜利方的高官做妾，因向新夫说他正妻的坏话，遭到报复，被迫穿着布裙舂米。她仍然这样过下去，最后被逼自杀。对于冯小怜，若说她无耻亦可，若说她生命力顽强亦可，但她成长在北齐宫廷那样的地方，其人格与人生观正反映出北齐宫廷文化可能对人造成的影响。冯小怜在长安战俘生涯中曾因弹琵琶断弦而吟出一首诗：

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

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

这可说是她的绝笔，却也显示出她其实很有才华，与高纬的爱情也确实纯真，纯真到即使助推了北齐的灭亡，仍然让她念念不忘，至于北齐为何灭亡，当然仍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掌控后宫实务的女性：陆令萱

电视剧中的人物“陆贞”的原型应当是北齐时期的女侍中、北齐后主高纬的乳母陆令萱。《北史》中记载她原是高欢部将骆超之妻，因夫谋反而被配入掖庭，成为后主高纬的乳母。陆令萱为人机智精明，办事干练，说话得体，善于奉迎武成帝高湛及胡皇后，很快在宫中得到信任，确立地位。《北史》说：“令萱奸巧多机辩，取媚百端，宫掖之中，独擅威福。”几经转折，竟成为北齐后宫中掌握大权的总管。565年，武成帝高湛禅位给后主高纬，胡皇后升格成胡太后，后宫仍由陆令萱独大。陆令萱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将妃子穆黄花认作干女儿，设计使穆黄花当上皇后；又设法揭发胡太后与人私通的丑闻，小皇帝大怒，将母亲胡太后幽禁。这些北齐宫闱中微妙的斗争与变动，背后都有陆令萱这个中年妇女精明狠辣的影子。北齐末年，她以皇帝奶妈、皇后干妈的双重身份，官至女侍中，宫中称为“太姬”，一时真有权倾天下之势。

577年，北周军攻克邺都，北齐灭亡。陆令萱在其子降周后，被迫自杀。从陆令萱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甚至中国历代后宫运作的方式。

终于等到胡汉融合：西魏、北周关陇集团的形成与兴起

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终究会有一个结局。

胡人与汉人长期杂居共处，终究会找到彼此可以长久相处之道。

经过近四百年的分裂、对抗、冲突之后，结束这一切乱象，并开创新局的力量，来自西北地区。北朝后期在西魏、北周的锐意革新之下，关中地区胡汉融合，出现一股新生力量，具有质朴、尚武、民族平等合作等特色。这股胡汉融合后展现的新生力量，很快征服黄河流域东部与长江中下游的两股分属胡汉但都已告衰朽的传统势力，统一中国，并将四百年来不同族群共同累积的力量提供给它的继承者，发扬光大，终成大唐盛世。

所以大唐盛世，实际上是继承西魏–北周的传统而来。北朝探访至此，且让我们先了解西魏、北周的政治概况。

西魏（535—557年）概况

南北朝时期北魏分裂后出现的政权，由鲜卑人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帝，与高欢所掌控的东魏对立，建都长安。至557年被北周取代，经历两代三帝，享国23年。西魏从始至终都是关中豪门宇文家族的傀儡政权，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任皇帝，这三个人却刚好代表傀儡皇帝的三种心态与表现，值得玩味。

西魏皇帝概况

文帝元宝炬（507—551年，得年45岁，535—551年在位）

虽是傀儡皇帝，却也是西魏的开国君主。元宝炬534年跟随孝武帝元修进入关中投靠宇文泰。不久孝武帝被宇文泰杀死，535年宇文泰领导的关陇在地集团和入关集团达成妥协，元宝炬被拥立为帝，号称继承北魏，史称西魏，此政权实际上是宇文泰的傀儡。551年三月，元宝炬死，善终。

西魏文帝可谓历史上的“模范傀儡皇帝”。他非常清楚宇文家族取代

魏室的趋势，故采取无条件合作，以求自保的态度。

历史上傀儡皇帝很多，傀儡皇帝对自己的处境可能出现三种反应。第一种是消极对待，听天由命，最后难免被权臣篡位，通常随后不久就被杀死“以绝后患”。第二种是直接反抗，例如曹魏废帝曹髦、北魏孝武帝元修，这种态度将立刻使政坛的幕前和幕后之间爆发生死存亡的零和冲突，迫使操纵者采取激烈行动，结果傀儡必然失败身死，操纵者也必须付出代价。元宝炬采取的是第三种，积极、全面配合操纵者的政治运作，忠实扮演好傀儡的角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承认现实，保存性命，尤其在傀儡还有些微实力时，更具有鲜明宣示不抵抗的用意，容易达到目的。实权操纵者最喜欢这样的傀儡，往往不会夺走他们的生命，这样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是双赢。就西魏而言，元宝炬的政策使北魏孝武帝带来的入关集团在大致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融入关中在地集团，宇文家族对西魏政权的掌控也在和平中完全确立，说不定他们内心深处还会有点感谢元宝炬。

废帝元钦（525—554年，被杀，得年30岁，551—554年在位）

西魏第二任皇帝。文帝元宝炬长子，母为乙弗皇后。

535年他11岁时，父亲元宝炬登基为西魏皇帝，元钦也被立为皇太子。不久丞相宇文泰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也是在傀儡皇帝或傀儡皇太子身上必然发生的事。551年，文帝死，元钦继位。553年，宇文泰主动辞去丞相之位。同年十一月，尚书元烈密谋诛杀宇文泰，事迹败露，被宇文泰处死。此后元钦对此事常有怨言，自己也想要诛宇文泰，竟异想天开，秘密结纳宇文泰的三个女婿，也是他的连襟们起事。结果三人告密，554年初元钦被宇文泰废掉，改立其弟元廓为帝，不久之后，走直接反抗路线的元钦当然被宇文泰毒死。

恭帝拓跋廓（537—557年，被杀，得年21岁，554—557年在位）

原名元廓，西魏第三任皇帝。文帝元宝炬第四子。

他因兄长被杀而继位当傀儡皇帝，复姓拓跋，已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听天由命而已。556年十二月被迫禅位于宇文觉，西魏灭亡，557年他也被杀。

北周（557—581年）概况

北周继承西魏，是北朝后期分裂出的政权之一，由宇文氏篡西魏建

立，定都长安。北周的奠基者是宇文泰（507—556年），字黑獭，代郡武川[12]鲜卑人，在北魏后期的动乱中据有关中地区，成为一方之霸，与高欢东西对峙。他一手控制西魏，掌权22年，任用苏绰等人进行改革，西魏因此强盛。宇文泰的政治、军事才能甚强，在北朝后期的东西对抗中，以寡击众，以弱敌强，曾三次战役都大败东魏，又抓住南方侯景之乱，南梁内斗的时机出兵，夺得南梁荆州、四川的地盘，俘虏梁元帝，威名远播，也使西魏的领土大举扩张，逐渐在南北朝后期的三国鼎立中占有优势。

556年，宇文泰过世，由其子年15岁的宇文觉继承，大权落入觉的堂兄宇文护（513—572年）手中，随即逼迫西魏禅位。557年北周建国，西魏恭帝被杀。

北周初年，政治情势非常诡异。开国皇帝孝闵帝宇文觉（542—557年，557年在位）身为奠基者宇文泰之子，却毫无实权，是堂兄宇文护的傀儡。他对这种情况无法忍受，密谋诛杀宇文护，却被部下告密，自己被宇文护废掉后杀死。宇文护改立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534—560年，557—560年在位）做第二个傀儡皇帝，结果如出一辙，三年后又把他杀掉，再立宇文泰的另一个儿子宇文邕（543—578年，560—578年在位）做第三个傀儡皇帝。宇文护执政期间总计杀害西魏恭帝、北周孝闵帝、北周明帝三位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弑君者。然而宇文护完全没有料到，他认为已经吓破胆，只会乖乖听话的第三个傀儡皇帝，竟会乘他不备从背后偷袭。

武帝宇文邕（543—578年，得年36岁，560—578年在位）

北周第三任皇帝，宇文泰第四子。这是一个深谙“稳、准、狠”三字真诀的政治人物，也是英明的君主。他原是权臣堂兄宇文护的第三任傀儡，前面已经有两个哥哥被杀，严峻的政治环境使他深沉、勇敢而有谋略。从即位起，十三年间，他都在韬光养晦，每天写写文章，听听音乐，下下棋，朝廷大事完全配合宇文护的意旨，以松弛宇文护的警觉。直到572年，宇文邕把握宇文护朝见太后，身边无人的机会，暴起发难，亲手用沉重的玉版捶击宇文护后脑，将他打昏后杀死，从此大权在握，成为真正的皇帝。

宇文邕在位期间生活俭朴，身穿布袍，精简后宫，关心民间疾苦，整顿吏治，北周因此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国势强盛。他曾大举灭佛，兼及道教，捣毁全国佛塔、佛寺，严令僧尼、道士还俗，已如前

述。这固然导源于佛、道二教的竞争与冲突，但也有借打击宗教以增加政府财源及兵源的意义在内。北周在他的统治下日益强盛，575年，他率军大举进攻北齐，577年灭北齐，统一北方。南北朝后期突厥兴起，北齐、北周不得不争相拉拢，负担甚重，突厥可汗甚至声称北齐、北周是他的两个儿子。北方统一后，北周已无敷衍突厥的必要，578年武帝宇文邕决定亲自征伐突厥，不料在出发前病死，得年36岁。

宣帝宇文赟（559—580年，得年22岁，578—579年在位）

北周武帝宇文邕长子，北周第四任皇帝。此人集北朝昏君、暴君、乱君的各种恶行于一身，沉湎酒色，凶暴残虐，滥施刑罚，又喜好奢华，大肆装饰宫殿，这可能与父亲武帝对他的管教过分严格有关。在他成长期间，武帝曾派人监视他的言行举止，只要犯错就严厉责打。宇文赟在父亲死后毫不哀戚，抚摸着脚上被杖责的疤痕，大声对武帝的棺材喊道：“死得太晚了！”

579年，21岁的宣帝做皇帝做得厌倦了，就禅位于长子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次年去世，北周至此已注定灭亡。

静帝宇文衍（573—581年，被杀，得年9岁，579—581年在位）

本是父亲宣帝的傀儡，父死后变成权臣杨坚的傀儡。581年，杨坚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北周灭亡，北朝也随之结束，这个年仅9岁的北朝最后一位皇帝不久被杨坚派人杀死。

问题的提出

北魏分裂后演变成黄河流域东部的东魏、北齐，对抗西部的西魏、北周。分裂开始时西魏、北周的领域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少，军队少，客观上居于不利地位。所以西魏、北周的胜利，是历史上政权相争中少数以小破大、以弱胜强的案例，值得研究。

然而从上述西魏、北周的皇室与宫廷看，其夺权斗争之惨烈、皇帝遭杀戮之众多，比东魏、北齐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传统史观，常以皇帝的所作所为与皇室的运作状况为标准，评价历朝历代，将治世、盛世归功于皇帝的品德高尚、勤劳节俭，而将乱世归咎于皇帝的懒惰奢侈、猜忌杀戮。在这种观点下，西魏、北周皇室猜忌杀戮不断，显然可以归入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之林，其朝廷在权臣长期当政下，也属于君不君、臣不臣之列。可是西魏、北周皇室的斗争并未影响国

家，其内部大致安定，并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下层社会或秘密宗教反抗起事等问题，国势还一路向上发展，终于消灭北齐。这就使吾人探访北朝后期时，不得不追寻其强盛的真正原因，其实这才是当时必须注意的大事。

追寻西魏、北周强盛的真正原因，就必须从“关陇集团”探访起。

关陇集团

“关”指关中，“陇”指陇山。“关陇集团”是西魏时期在宇文泰规划下建构成的政治团体，以当时关中及附近西北地区的原北魏六镇武将与贵族、豪强为成员，不分胡汉，消除民族隔阂，结合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军事指挥与政治统治集团。参与此集团的大家族分享武力与政权，而以武川镇的鲜卑及胡化汉人贵族为核心。此名词最早由二十世纪历史学大家陈寅恪提出，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四代政权的特点及其一脉相承的关联性，陈寅恪观察到此集团有两大特征：

1.“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2.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西魏、北周在北方分裂开始时固然是弱势的一方，但其领域内胡人文化的影响较大，许多汉人已经胡化，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传统不像东方或南方那样深，中央政府推行政令时阻力较少。西魏政府在宇文泰领导下面对此种形势，遂产生新思维，实行新政策，平等对待胡汉，在此基础上容纳双方的贵族与豪门，建立民族融合的新统治集团。宇文泰当权后推动胡汉融合政策，做法是扬弃北魏孝文帝鲜卑人改汉姓的做法，全面恢复鲜卑旧姓。他先将西魏皇族元氏恢复为拓跋氏，再授给汉人家族胡姓，例如杨忠[13]改为普六茹氏，李虎[14]改为大野氏等。

这些武将家族全部成为胡姓后，以汉人居多的部属及士卒也跟从主将的胡姓，于是最高统治圈中的汉姓消失，融合成一个向心力极强、文武合一的武装统治集团，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统治集团就是“关陇集团”。

宇文泰、苏绰推行府兵制，使府兵将领与关中土地发生关系。府兵将领都有赐田与乡兵，于是他们变成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地主与豪族的群体。将领与关陇豪族的混而为一，使这个集团得以在关中生根。

此新统治集团在政治号召与文化政策上煞费苦心。他们推陈出新，

扬弃两汉、魏晋乃至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声称周朝才是中国真正的道统渊源，故尊崇以周朝为代表的“真正”中国文化，国家典章制度完全仿效《周礼》设立，宇文氏以“周”为国号，正是此种政策的反映。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切实执行均田制与府兵制，使国家很快安定富强，族群也融合团结，在南北朝末期以焕然一新之姿，创造出从前在胡汉仇杀、世族专权时无法想象的新气象。关陇集团成立后，以其力量打破行之四百年世家大族掌控一切的传统，消除旧有的门阀特权。北周就凭借此种新生力量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也从此奠定了隋朝统一天下及其后大唐帝国声威远播的基础。

关中本位政策

这是关陇集团建立后所推行的政策，也是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学说，伴随关陇集团理论，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四代政权及其政策的特点。关陇集团的统治与关中本位政策起源于西魏，大行于北周，后为隋、唐两代承袭，直至武则天时代，以进士科取士的方式为统治集团引进新的山东世族与部分平民，才逐渐打破这个集团的势力，但也逐渐使唐朝本身与中国文化发生根本的改变。

北魏后期六镇鲜卑化集团反对汉化政策导致北方混乱，各地出现回归鲜卑本色，反对汉化的潮流，宇文泰和高欢则都是乘此机会兴起的人物。然而宇文泰掌控的地盘、资源与人才起初远远不及高欢，在劣势下与高欢对抗，必须有高明的号召。这种号召一方面必须顺应当时的大环境，也进行鲜卑化；另一方面则要与高氏的鲜卑化不同，要比他们更高明，才足以号召天下，胜过东魏、南梁，于是这又必须采用汉文化。这两个原则看似矛盾，却并非没有解法。宇文泰的办法是，一方面建立大致归属鲜卑文化的关陇集团作为统治核心；另一方面派苏绰、卢辩等汉人大臣以《周礼》比附鲜卑部落旧制，建立国家制度。所以这个政权在文化与形象上内外有别，成为政府高层鲜卑化、国家形象中原化，两面都容易被接受的状态。更巧妙的是，其“中原化”又不是采取汉、魏以来的中原文化，而是直指周朝的传统，于是轻易在孔子以来崇古成风的中原文化圈取得文化的制高点。

基于此种指导思想，西魏—北周开始推行一连串政策，将关中地区建设为国家的根本与重心，之后一直延续到唐朝前期，此种政策称为“关中本位政策”。在关中本位政策下，西魏、北周有不少特殊的制度，说明如下：

八柱国制

“柱国”为西魏、北周“柱国大将军”的简称。八柱国的设置表面上系传承鲜卑拓跋部的“八部制度”，实际上是在建构新的贵族统治集团。西魏迄550年，共有八个人获得柱国大将军这一称号：宇文泰[15]、元欣、李虎[16]、李弼[17]、于谨、独孤信[18]、赵贵、侯莫陈崇，他们的家族号称“八柱国家”。其中宇文泰总领诸军，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元欣为西魏皇族，代表傀儡皇室，不掌兵权；剩下的六人依照《周礼》“天子治六军”之意，每人统领两名“大将军”，即西魏—北周府兵系统中的“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导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领一军，共二十四军，这就是西魏—北周府兵的建置与指挥系统。

从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家族中，新一代门阀贵族产生。西魏、北周、隋、唐的皇室与许多后族都出自这些家族：柱国宇文泰子孙为北周皇族，柱国李虎子孙为唐朝皇族，大将军杨忠子孙为隋朝皇族，北周皇族、唐皇族与隋皇族也是姻亲。北周历代皇后多在这些家族中产生，隋文帝的皇后与唐高祖李渊之母都是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这些家族后来的盛况，都可以追本溯源至南北朝末期乱世中这些名将的丰功伟绩。兹介绍几个重要的八柱国家族：

八柱国之独孤信家族

中国历史上有三位独孤皇后，她们是：北周明敬皇后[19]，隋文献皇后[20]，唐元贞皇后[21]，她们为同父所生，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独孤信（504—557年），云中[22]鲜卑人，本名独孤如愿，少年时风度过人，好勇任侠，后投入六镇军首领葛荣帐下。独孤信在军中对着装、修饰都非常重视，征战时仍然风度翩翩，有“独孤郎”之称。葛荣败亡后，独孤信跟随尔朱荣征战各方，积功升至将军，甚得北魏孝武帝看重。孝武帝入关时，独孤信辞别家人，单骑追上魏帝相随，成为一时美谈。独孤信与宇文泰是同乡，自小相识，故入关之后也得到宇文泰重用。后来独孤信攻下东魏的荆州，东魏派大军反攻，独孤信不敌，奔入南梁，三年后才回归西魏，其忠心如一，甚至得到梁武帝称赞。回到北方后独孤信进位柱国大将军，最后因他人谋反受到牵连，为宇文护所逼自尽。

独孤信形象鲜明，为官时又能安抚地方，照顾百姓，死后长久被人怀念，又因女儿们皇后的地位，使他的名誉很快恢复。

八柱国之李虎家族

李虎（？—551或554年）是陇西成纪人，宇文泰手下大将、柱国大将军、陇西郡公，于北周篡西魏之前去世，其子李炳也随后早逝，由时年七岁的李渊袭爵。李渊之母是独孤信的女儿，故李渊深受其姨母，即隋文帝独孤皇后喜爱，隋炀帝是他的表兄弟，这使李渊一族在隋朝更加显赫，得以在隋炀帝南巡时，担当镇守山西的重任，李氏家族建立唐朝，就是在此时打下的基础。

八柱国之李弼家族

李弼（494—557）是辽东襄平[23]人，少有大志，膂力过人。北魏末期的动乱中，原来隶属尔朱集团，在战斗中常常担任先锋，冲破敌阵，所向披靡，当时有“莫当李将军前也”之语。

尔朱氏败亡后，在动乱中李弼投奔宇文泰，于537年的沙苑之战中击败东魏高欢，后进位为柱国大将军。他的次子李晖娶宇文泰女义安长公主，长子支系的一位曾孙，就是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李密（582—619年），是瓦岗军领袖，李渊义弟。李弼在关陇集团中有其特殊性与代表性。他并非六镇人，不是关中宇文泰的老干部，也不属于北魏孝武帝的入关队伍，甚至还曾与宇文泰对敌。但他看清大势所趋，适时投奔宇文泰，又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可靠，建立功勋，照样能够加入关陇集团，参与统治核心，还娶了西魏文帝的女儿安乐公主。

由以上几个八柱国家族的成员与事迹，可以明显看出这组统治族群的特色：不分胡汉，不论籍贯与出身，确实效忠宇文泰，建功立业，互相通婚，关系紧密，而又都以位于关中的西魏—北周政权作为家族资产、官爵与声望的来源。

府兵制

这是北朝后期到唐朝前期的军制，创建于西魏，废止于唐玄宗天宝年间。

府兵制创建初期，全面模仿鲜卑部落制度，以军事单位代替部落，以将领代替部落酋长，兵士及其家属全面改从将领的姓，以代替部落人民。这种做法等同部落酋长的将领直接统辖其单位，单位内部的各级军人与其家属听命于将领，一如部落内成员听命于部落酋长。各同级单位彼此不互相统属，兵士们分别属于各将领，除皇家卫队外，不直接隶属

于君主。府兵由六柱国分别统领，以下的各级单位是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四十八仪同，由各级长官平均统领，即各柱国统辖两大将军，各大将军统辖两开府，各开府统辖两仪同，每一仪同领兵一千人，总计西魏至北周前期，府兵总数略多于四万八千人。

府兵制开始创立时，任何隶属府兵系统的军人都是特殊阶级，其来源包括原北魏六镇的胡人或胡化汉人、北魏孝武帝入关时带来的武人，以及在关陇地区收编招募来的人，但限于中等以上家庭出身，总之绝无下层社会的平民参与。府兵制在创建初期，采取兵农分离制。府兵有自己的户口，与农民百姓不同，而且没有税负。府兵由军事行政机构兵府管理，平时一边农耕或放牧，一边接受军事操练，有战事时出征。府兵制也是一种选择性征兵制，即在西魏—北周胡汉融合区实行中等阶层以上的兵役，且胡汉兵、将混合编组，由驻扎地的兵府负责征集、训练与档案资料控管。府兵受到国家重视，自许甚高，朴实耐劳，操练扎实，又彼此熟识，战斗力极强，是对外争战、对内控制国家的利器，也是北周、隋唐军力强大的根源。

到北周后期，周武帝推行中央集权，变更府兵的部署观念，改军士为“侍官”，全部隶属于君主，又扩大府兵规模，招纳愿意从军的百姓加入府兵，改民籍为军籍，府兵因此渐趋普及化与平民化，此后成为隋与唐朝前期的定制。

模仿《周礼》的官制

宇文泰文化政策的考量已如前述，其实行方法则是号称复古，依照儒家心目中周朝的制度《周礼》，订定政府组织与规范，以因应关陇集团胡汉共处的现状，实行胡汉共治。他任用苏绰、卢辩等汉族知识分子官员，将官制改为模仿《周礼》的古制，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为“六官”，即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皆由柱国大将军担任，大冢宰由宇文泰自任。这种组织若以现代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有些类似集体领导的内阁制，宇文泰就是西魏的内阁总理、执政集团领袖，西魏皇帝则是虚位元首。

以此为基础，西魏—北周的朝廷礼仪、典籍文书、官服、公务车辆、器物等，大多照抄《周礼》的规制，国家的公文书则回到《尚书》的形式，读起来就像这样：

> 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

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度。[24]

然而这种模仿《周礼》的做法，仅是表面遵循《周礼》而已，实际的目的在于利用其名号，以暗合当时政治现状。也因为如此，西魏依《周礼》改变的官制，大致仅限于中央政府的文官，地方政府仍是郡县制，并未如周朝将大片土地用于封建诸侯。军制更是典型的例子，从表面看，以六柱国领军，是采用《周礼》的“天子六军”制度，但因未曾遵循周朝制度封建诸侯，故《周礼》中的“大（诸侯）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制度也全无踪影。

等到宇文泰统治后期，西魏已经能够立定脚跟，以大致均等的力量与东魏—北齐抗衡后，官方典籍文书的体裁就渐渐回归南北朝的文体，初期模仿周诰的风格也渐渐消失。宇文泰死后，其子孙更不能奉行这种仿古的制度，北周时即已逐渐回归汉、魏制度，北周并吞北齐后，更采用了部分北齐的制度。总之，宇文泰依《周礼》改制，其实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既非全面，也并未长久采用，这种表面文章，在阶段性任务达成后自然功成身退，宛如船过水无痕。

“中兴永式”与西魏施政纲领

宇文泰在西魏推动各方面的改制，其真正目的在建构关陇集团与关中本位制度，扭转北魏孝文帝汉化以来的认同门阀的倾向，建立一个以民族融合、尚武、质朴等为领导原则的国家。为达成此目的，西魏政权建立后，立即颁布二十四条新法制，后又增加至三十六条，称为“中兴永式”。主要内容为：严禁贪污、裁减官员、置立正长[25]、实行屯田、制定计账[26]和户籍等制度。苏绰将其总结为六条原则：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宇文泰对此非常重视，以西魏皇帝名义颁行政府各级机构，作为施政纲领，并要求官吏学习，规定不通晓这六条及计账的人，不能当官。其实这些才是宇文泰施政的重点，所以西魏—北周能够转弱为强，制度面的原因在此，与依《周礼》改制并无多少关系。

西魏、北周的和亲外交政策

西魏、北周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北与蒙古高原上的柔然、突厥，西与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接界。对于这两方强大的外族，西魏—北周政权采取和亲方式应对。由于西魏—北周政权披着将汉人胡化的外衣，

以此为号召，其和亲外交推行顺利，也使西北方边境相对安静。

和亲外交著名的案例包括：西魏宗室千金公主出嫁突厥沙钵略可汗，西魏文帝元宝炬的两位皇后乙弗氏、郁久闾氏分别来自吐谷浑与柔然，北周武帝的一位皇后阿史那氏则来自突厥。古代公主出嫁，随嫁人员甚多，从这几位外族皇后嫁来的事迹可以得知，必有相当数量的吐谷浑、柔然与突厥随嫁人员留在西魏、北周的宫廷与朝廷中。由此可见西魏—北周统治阶层中的胡人并不只限于鲜卑族，除当年五胡的后代外，还包括之后才加入中国历史的其他胡人族群。这使得这个政权的民族融合政策，更加名副其实。

西风压倒东风，北风压倒南风：南北朝终局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是句老生常谈，大家耳熟能详，却适用于中国历史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有其特色，我们如果仔细观察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将会发现，从184年起，东汉帝国的崩溃是非常迅速的。黄巾起事后不过几年时间，帝国内部就出现了几十股地方军阀的割据势力，中央政府瓦解，大分裂开始。此后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原来统一的国家迸裂成几十块，想要将这些碎片拼拼凑凑，缝缝补补，再变回一片，就会极度困难。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东汉迅速崩溃以来，要花上四百年时间，才能见到隋唐。

分裂导致法律无用，秩序丧失，社会进入唯力、唯诈是视的原始丛林状态，人与人之间充满差异与冲突，而且冤冤相报，仇恨一代代累积。到这种地步时，要大家捐弃成见，放下仇恨，忘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度承认属于同类，合而为一，可想而知有多困难。所以分裂容易，统一难，而有可能弥平分裂鸿沟的，一是时间的沉淀，二是至少一部分人的觉悟。东汉帝国瓦解后的持续分裂与混乱中，曾出现几次统一的尝试，有的表面上已经成功，如西晋；有的也很接近成功，如前秦苻坚。但它们在时间沉淀与人心觉悟的条件上都不足，以致最终都失败了，而且失败后必然导致再次大分裂，也使分久必合的时间拖得更长。

在这个反复痛苦的过程中，南北朝（420—589年）的出现，代表四百年大分裂进行到一半以后，从分裂到再统一的漫长工作，终于已经进行到一半，表现为中国境内只剩两个政权。南北朝的历史进行到6世纪中叶时，中国北方因胡汉文化的差异，出现大分裂期间最后一次躁动与不安，开起历史的倒车，一分为二，东西对立。但也就因为对立起因于文化差异，一旦有一方参透玄机，以实际行动提倡族群融合，并以新文化为号召，则在团结之下，终能跳脱宿命，终结四百年的分裂，开创辉煌的未来。

南北朝的终局就在时间沉淀足够，关陇集团参透玄机之后来到。作为分裂动乱的时代，要结束它的基础固然在于文化，但执行层次仍离不开铁与血。关陇集团结束南北朝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经过北魏末年起

的分裂后，由北周灭北齐从而统一北方；第二步是取代北周的隋朝消灭南方的陈而统一天下。这种过程可称为“西风压倒东风，北风压倒南风”，亦即源自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生力量，合并了东部与南方，结束了四百年的大分裂格局。因此在讨论到南北朝的终局时，必须回答为何是西风压倒东风，西部合并东部，北风压倒南风，北方合并南方。

北周胜北齐的原因

北魏自534年起分裂成东魏与西魏。东魏的实际当权者是高欢，西魏的实际当权者是宇文泰，双方皆以北魏的正统自居。东西魏分裂之初，东魏在领土、人口与资源各方面都处于优势，但经过43年的东西对抗后，577年，北齐却被北周所灭。依据吕春盛的研究，南北朝后期北方东、西对抗的过程中，双方力量的消长情形为：

534—554年：东魏、北齐优势。

555—573年：双方均势。

574—577年：北周优势。

北齐建国于550年，可见北齐建国后不久，其原有的优势就开始减退，这当然与皇帝高洋的转变有关，然而北齐篡东魏，是将高欢与东魏孝静帝保持十余年的微妙的政治平衡打破，从此北齐内部各种势力竞相争夺，造成皇室杀戮不断，胡汉矛盾凸显，权力转移的危机始终无法克服，内部力量互相抵消。北齐朝廷中，鲜卑人经常钳制汉人，然而山东汉人世族势力亦颇为庞大，故二者往往发生冲突，汉人即使无法以武力应对，也普遍消极抵抗。总之，北齐在皇族教养、政治权力分配、族群问题、文化认同问题等各方面都处理失当，遂促使其势力不断削弱，终于不敌北周。

北齐的统治者缺乏自觉，也没有发现当时新生力量可能出现的来源与开发应用的方法。这个皇朝对政治、社会事务的处理方式，仍是遵循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来的老套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血腥斗争；国内实行九品中正制，将世家大族收入旗下，希望再通过他们控制全国，世族则持续维持既得利益，也有一定力量抗衡中央。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统治者本身清廉努力，则尚可维持，如北魏孝文帝时代，但若统治者纵欲胡为，则上行下效，将很快动摇国家基础，因为国之将亡时，以维持家族既得利益为先的世家大族显然不会关心国家前途。这样的国家，即使开始时拥有较好的立国条件，如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发达

等，但是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一成不变，新生的力量无由出现，腐朽的中央无法更新，自然经不起无谓的消耗。

反观西魏—北周，艰困的环境促使统治者自我觉醒，统治集团不分胡汉互助合作，开发出新生力量，最终扭转局势，以弱胜强。宇文泰任用苏绰、卢辩等人进行改革，建构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将胡汉融为一炉，使统治阶层不分彼此，同心协力；又设置府兵制，建立职业军人系统，维持尚武精神；更以继承周朝为文化上的号召，巧妙兼顾胡汉文化，使全国上下团结，充满新气象，力量迅速累积。西魏—北周君臣的作为，说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先有开创性的蓝图，再配合具有道德观与责任感的执行者持续推动，方能成功。

北周胜北齐的主要原因已如上述，但其成功还有许多条件的配合，诸如：

领导人

宇文氏内部争权杀戮也很激烈，但时间短、范围小，对国家影响不大。宇文泰与周武帝宇文邕都为人英明雄伟，努力从公，而且当政时间长，使西魏—北周有较长时期的稳定。北齐则有一半时间是疯狂或童 的皇帝在位，对国家伤害极大。

宗教与经济

北周武帝曾经灭佛、灭道，使国家资产、税收、劳动力和兵力大增，国势强盛也与此有关。禁佛、禁道后，北周的僧尼、道士还俗者在三百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超过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北齐则上下崇佛成风，人口、土地与金钱大量流入寺院，影响到税收与兵源。

外交

西魏—北周外交灵活，先以和亲安抚柔然、吐谷浑，稳定后方；进攻北齐时又通过和亲请突厥助战，同时结好陈国，怂恿南陈出兵北伐，使北齐陷入三面作战的困境，可谓善于运用国际局势。

道教与谶纬的支持

东魏—北齐是鲜卑化政权，宗教政策受鲜卑本位主义影响，崇尚外来的佛教，压抑由汉人创造的道教。其境内的道教被迫反抗，方式则是诉诸天命，利用秦汉以来具有悠久历史的谶纬预言，频频发出对北齐不

利的预测，这对饱受鲜卑压迫的低层汉人影响不小。

姜望来对此的研究指出，原来西魏—北周自我认定在五行系统中属于水德，国家颜色为黑色；高洋篡东魏建北齐，认为北齐在五行系统中属于木德，将国家颜色定为赤色，即火的颜色，取“木生火”之意。然而五行系统中水克火，于是就给了道士们制造谶纬的机会，出现“亡高者黑衣”的“黑衣之谶”，流布于天下，矛头直指高氏政权与佛教，预言他们必被西魏—北周所灭，道教则随之压倒佛教。高洋篡东魏建北齐，开国年号为“天保”，不久就有流言：

> 天保之字，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过十乎。[27]

这种拆字游戏是谶纬的惯用手法，可见北齐政权之不得汉人民心，宇文氏政权则正好加以利用。

北方胜南方的原因

中国北方被起自西北的新生力量统一后，南朝自然岌岌可危，其命运也走到尽头。南朝的人口数量与经济能力本来就远不及北方，而且传统作风更强，世家大族的地位比北方更加巩固，加以曾饱受侯景之乱的破坏，难以恢复，显然更无法对抗甫经统一、锐气正盛的北方，故即使没有陈后主，陈也势必被隋所灭。

当6世纪中期中国西北地区胡汉融合，出现充满朝气的新生力量后，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便注定在西风压倒东风、西部合并东部，北风压倒南风、北方合并南方中走入终局。

终篇语

> 故事钩沉得几行，残篇古迹望苍茫。
> 风流原是南朝梦，肃杀应推北国章。
> 粉墨轮流悲起落，干戈激荡叹兴亡。
> 君知两卷当年史，多少芜城映夕阳。

我们对南北朝的探访在此告一段落。作者谨以这首诗与诸位读者共同回顾这段历史，希望参与这次探访的诸君，在深刻玩味、体会南北朝历史后会发现，历史的真相比想当然的小说、戏剧精彩千万倍，其启发性与应用性也比小说、戏剧高千万倍。在这传播工具高度发展、充斥虚幻的“历史故事”的时代，举世滔滔中，真实历史、深度历史的魅力，仍

然永远在呼唤着我们。

【注释】

[1] 今山西太原。

[2] 即大腿骨。

[3] 这句歌词出自汉武帝时宫廷音乐总监李延年制作、演唱的歌曲《北方有佳人》。

[4] 路易十五（1710—1774年），1715—1774年在位。

[5] 今山东青州。

[6] 出身弘农杨氏。

[7] 今河南洛阳东北。

[8] 今陕西大荔南。

[9] 古代一种游戏，又名双陆。

[10] 皇后。

[11] 今山西临汾。

[12] 今内蒙古武川。

[13] 隋朝皇室祖先。

[14] 唐朝皇室祖先。

[15] 唐太宗李世民外曾祖父。

[16] 唐高祖李渊祖父。

[17] 隋唐之际人物李密曾祖父。

[18] 隋文帝杨坚岳父，李渊外祖父。

[19] 独孤信长女，嫁宇文泰的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

[20] 独孤信第七女，嫁隋文帝杨坚。

[21] 独孤信第四女，嫁李虎之子，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唐代追谥。

[22] 今山西大同。

[23] 今辽宁辽阳。

[24] 这篇以西魏傀儡皇帝口吻发出的文告，出于苏绰手笔，是宣示官方标准文体的官样文章，请与《尚书·康诰》比对，不用翻译了。

[25] “正”即闾正、族正，“长”指保长。保、闾、族为地方基层组织名称。

[26] 预计次年赋役的概数，即国家收入预算。

[27] 天保这两个字，是“一”“大”“人”“只”“十”，皇帝大概不会超过十年吧！

后记

1973年初夏，我是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二年级的学生，我很彷徨，所以去见林瑞翰老师、逯耀东老师。

在史书里我读到，东晋偏安江南时，曾几次尝试北伐，但皆未成功。我也读到当时从北方逃到南方的家族称为“侨姓”，南方本地家族称为“吴姓”；控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是世家大族，包括侨姓与吴姓，较低阶层的人被称为“寒门”“寒素”或“小姓”；政府官员里还有文官、武将之分。既然以上各种人依晋朝政府流亡到南方的时间，都可以区分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等，那么不同身份与世代的东晋人士，对北伐的看法与做法，究竟有什么差别？例如第二代以后的侨姓世族还会坚持北伐吗？身为吴姓寒门的武将也会自愿到北方作战吗？

我知道本来想命名为《东晋的北伐之议》的这篇毕业论文可能惹来麻烦，却实在喜爱这个构想，舍不得放弃，只得抱着困惑，去请教那时曾在台大历史系开过魏晋南北朝史课程的两位老师：林瑞翰先生与逯耀东先生。

林老师首先答应指导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但他随即指出，我的程度太差，基本功不足，要我把整部《晋书》与相关年代的《资治通鉴》点读过，才能谈到研究。接着他又表示，为使论文的内容充实，写作顺利，并避免可能遭遇到的政治风险，应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晋朝的世族政治，从西晋写到东晋，还要带到一部分南朝。治学严谨、为人方正、不苟言笑的林老师那天的话有点严厉。但我告辞出来时如释重负，因为我知道，林老师已经以他的学术与人生经验，为我的构想指点出一条实际可行之路。

第二天我去找逯老师。听完我的叙述后，逯老师深深点头，他告诉我：“林老师训你训得对，你要做完基本功。这个题目可以写，可是要很小心。”接着逯老师起身，打开一座书柜，搬出一排书，从后面拿出两本书，郑重递给我，对我说：“这是大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晋朝的书，我从

香港回来的时候，藏在衬衫底下带进来的。你要好好看，虽然不见得同意，也要注意他们的看法。”那是我第一次看简体字的书，果然被逯老师料中，书中的看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却使我眼界大开，发现也可以用这种角度看历史，了解到研究任何问题，必须先认识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

经过林、逯两位老师共同指导，我的论文终于写成，也顺利毕业。我的论文题目叫作《两晋世族政治发展演变》，是个充满学术气氛、绝不起眼的名字，果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服完兵役后我投入新闻界工作，因缘际会担任过多种职务，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后，才体会到当年的肤浅与莽撞，也才更深深感念我的两位指导老师。第一天林老师严格要求我，使我了解原始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绝对重要的地位，还以四两拨千斤的高明远见，化解可能的政治风险于无形；第二天逯老师毫不犹豫地把当时犯忌的简体字书，借给第一次请他指导论文，还并不熟悉的一个学生，正显出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他坚持客观学术研究，尽力指导史学后进的努力，与他对我这样一个学生的人格的完全信任。

林老师、逯老师皆已仙逝，他们当年教导我史法，更以身作则显示我世法，他们是经师，更是人师，历史学的研究精神与风格，就如此传承下来。如今我居然也在台北市长官邸艺文沙龙、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敏隆讲堂等处讲授过魏晋南北朝史，距离最早修习林老师的魏晋南北朝课程，竟已整整50年。50年间我踏过的歧路众多，终于未曾亡失魏晋南北朝历史之羊，如今这部南北朝史书在我古稀之年出版，或许终于可以告慰二位恩师教诲我、保护我的苦心于万一。

叶言都于台北

附录一 参考资料

［唐］李延寿 《北史》

［北魏］崔鸿 《十六国春秋》

［北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

［北齐］魏收 《魏书》

［唐］李延寿 《南史》

［唐］李百药 《北齐书》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丘秀芷 《柏庄诗草、药帖：邱先甲、丘逢甲、丘念台遗墨汇集》

［北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

［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

［唐］令狐德棻 《周书》

［唐］释道宣 《续高僧传》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公共网

云冈石窟旅游网

［日本］平凡社 《书道全集6中国6 南北朝II》

［北齐］颜之推 《颜氏家训》

［后晋］刘昫 等 《旧唐书》

［唐］魏徵 《隋书》

［唐］李商隐 《李义山诗集》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

姜望来 《谣谶与北朝政治研究》

附录二 南北朝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420	东晋元熙二年 刘宋永初元年	北魏泰常五年	宋武帝刘裕篡晋建南朝宋，东晋亡，南朝开始。
422	刘宋永初三年	北魏泰常七年	宋武帝死，少帝继位。
423	刘宋景平元年	北魏泰常八年	北魏明元帝死，太武帝继位。
424	刘宋景平二年 元嘉元年	北魏始光元年	宋少帝被大臣所杀，文帝继位。寇谦之建北天师道。
426	刘宋元嘉三年	北魏始光三年	宋文帝杀徐羡之等大臣，亲政，整顿吏治。
427	刘宋元嘉四年	北魏始光四年	北魏攻陷胡夏首都统万城。
430	刘宋元嘉七年	北魏神䴥三年	刘宋北伐失败。
433	刘宋元嘉十年	北魏延和二年	宋文帝杀谢灵运。
436	刘宋元嘉十三年	北魏太延二年	北魏灭北燕。
437	刘宋元嘉十四年	北魏太延三年	北魏通西域。
438	刘宋元嘉十五年	北魏太延四年	刘宋开办儒、玄、史、文四学。
439	刘宋元嘉十六年	北魏太延五年	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朝开始。
440	刘宋元嘉十七年	北魏太平真君元年	北魏太武帝皈依道教。

续表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443	刘宋元嘉二十年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	北魏派员至大兴安岭嘎仙洞祭祀祖先，铭刻祝文。
446	刘宋元嘉二十三年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	北魏太武帝禁佛教。
450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北魏南征，攻至长江边。 北魏杀崔浩及汉人世族。
452	刘宋元嘉二十九年	北魏正平二年 承平元年 兴安元年	北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宗爱立拓跋余为帝，后又杀之，大臣杀宗爱，立文成帝。
453	刘宋元嘉三十年	北魏兴安二年	宋太子刘劭弑文帝自立，孝武帝击灭刘劭继位。
460	刘宋大明四年	北魏和平元年	云冈石窟开凿。
462	刘宋大明六年	北魏和平三年	祖冲之制定《大明历》。
464	刘宋大明八年	北魏和平五年	宋孝武帝死，前废帝继位。
465	刘宋永光元年 景和元年 泰始元年	北魏和平六年	北魏文成帝死，献文帝继位。 刘宋刘彧弑前废帝，即位为明帝。
466	刘宋泰始二年	北魏天安元年	北魏冯太后开始当政。
471	刘宋泰始七年	北魏皇兴五年 延兴元年	宋明帝大杀皇室亲属。 北魏献文帝传位孝文帝。
472	刘宋泰豫元年	北魏延兴二年	宋明帝死，后废帝继位。
476	刘宋元徽四年	北魏延兴六年 承明元年	北魏冯太后毒死太上皇献文帝。
477	刘宋元徽五年 升明元年	北魏太和元年	宋后废帝被杀，萧道成立顺帝继位。
479	刘宋升明三年 南齐建元元年	北魏太和三年	齐高帝萧道成篡刘宋，建南齐，刘宋亡。

续表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482	南齐建元四年	北魏太和六年	齐高帝死，武帝继位。
484	南齐永明二年	北魏太和八年	北魏推行班禄制。
485	南齐永明三年	北魏太和九年	北魏推行均田制。
486	南齐永明四年	北魏太和十年	北魏推行三长制、租庸调制。
487	南齐永明五年	北魏太和十一年	北魏破柔然。
490	南齐永明八年	北魏太和十四年	北魏冯太后死，孝文帝亲政。
493	南齐永明十一年	北魏太和十七年	齐武帝死，废帝郁林王继位。 北魏孝文帝推动迁都计划。
494	南齐隆昌元年 延兴元年 建武元年	北魏太和十八年	南齐萧鸾连废郁林王、海陵王二帝，即位为明帝。 北魏迁都洛阳，改革衣冠。
495	南齐建武二年	北魏太和十九年	北魏以汉语为国语，南征。
496	南齐建武三年	北魏太和二十年	北魏皇室改姓元，太子私逃被废杀。
498	南齐永泰元年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	齐明帝死，东昏侯继位。 北魏孝文帝南伐，败南齐。
499	南齐永元元年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	北魏孝文帝死，宣武帝继位。
501	南齐永元三年 中兴元年	北魏景明二年	萧衍起兵，立齐和帝，东昏侯被杀。
502	南齐中兴二年 南梁天监元年	北魏景明三年	梁武帝萧衍篡齐，建南梁，南齐亡。
504	南梁天监三年	北魏正始元年	梁以佛教为国教。

续表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06	南梁天监五年	北魏正始三年	梁北伐失败。《与陈伯之书》写作。
507	南梁天监六年	北魏正始四年	梁范缜著《神灭论》。 梁大破北魏军。
510	南梁天监九年	北魏永平三年	北魏铸五铢钱。
512	南梁天监十一年	北魏永平五年 延昌元年	北魏废除“母死子贵”制度。
515	南梁天监十四年	北魏延昌四年	北魏宣武帝死，孝明帝继位，胡太后掌权。
516	南梁天监十五年	北魏熙平元年	梁所建浮山堰崩溃。
523	南梁普通四年	北魏正光四年	六镇之变，破六韩拔陵起事。
525	南梁普通六年	北魏孝昌元年	柔然出兵助北魏，六镇之变结束，河北民变开始。
527	南梁普通八年 大通元年	北魏孝昌三年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 郦道元完成《水经注》。 达摩见梁武帝。
528	南梁大通二年	北魏武泰元年 建义元年 永安元年	北魏胡太后杀孝明帝，立幼主，尔朱荣起兵，攻入洛阳。 河阴之变，尔朱荣杀胡太后、幼主、大批官员，立孝庄帝。 南梁派陈庆之北伐，克洛阳。
529	南梁大通三年 中大通元年	北魏永安二年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 尔朱氏反攻，南梁北伐失败。
530	南梁中大通二年	北魏永安三年 建明元年	北魏孝庄帝杀尔朱荣等，尔朱兆杀孝庄帝，立长广王。
531	南梁中大通三年	北魏建明二年 普泰元年 中兴元年	尔朱兆杀长广王，立节闵帝，高欢立安定王为帝对抗。

续表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32	南梁中大通四年	北魏中兴二年 太昌元年 永兴元年 永熙元年	高欢平定尔朱氏，杀节闵帝、安定王，立孝武帝。
534	南梁中大通六年	北魏永熙三年 东魏天平元年	北魏孝武帝被高欢击败，逃往关中投奔宇文泰，被杀。高欢立孝静帝，东魏开始，北魏因分裂而结束。
535	南梁大同元年	东魏天平年 西魏大统元年	宇文泰立西魏文帝，西魏开始，与东魏开始长期作战。 西魏苏绰制定户籍法、记账法。
537	南梁大同三年	东魏天平四年 西魏大统三年	东、西魏沙苑大战，宇文泰击败高欢。
538	南梁大同四年	东魏元象元年 西魏大统四年	西魏与柔然和亲。
543	南梁大同九年	东魏武定元年 西魏大统九年	邙山之战，东魏大败西魏。
544	南梁大同十年	东魏武定二年 西魏大统十年	西魏苏绰制定六条诏书。 东魏检括户口。
545	南梁大同十一年	东魏武定三年 西魏大统十一年	东魏高欢娶柔然公主。 西魏苏绰仿《尚书》文体作《大诰》。
546	南梁大同十二年 中大同元年	东魏武定四年 西魏大统十二年	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赎金2亿钱。
547	南梁中大同二年 太清元年	东魏武定五年 西魏大统十三年	高欢死，高澄继承，幽禁东魏孝静帝。 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同泰寺。

续表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48	南梁太清二年	东魏武定六年 西魏大统十四年	侯景叛梁，攻入建康，围台城。 真谛至建康。
549	南梁太清三年	东魏武定七年 西魏大统十五年	侯景攻破台城，梁武帝死，侯景立梁简文帝。 东魏高澄遇刺死，高洋继承。
550	南梁太清四年 大宝元年	东魏武定八年 北齐天保元年 西魏大统十六年	北齐文宣帝高洋篡东魏，建北齐，东魏亡。 西魏行府兵制。
551	南梁大宝二年 天正元年	西魏大统十七年 北齐天保二年	侯景废杀简文帝，立豫章王，后篡位称帝，国号汉。萧绎自立为元帝。 西魏文帝死，废帝继位。
552	南梁承圣元年	西魏废帝元年 北齐天保三年	陈霸先等击侯景，侯景败死。
554	南梁承圣三年	西魏废帝三年 恭帝元年 北齐天保五年	西魏宇文泰废杀废帝，立恭帝。 西魏攻破江陵，俘梁元帝，占领荆州。梁元帝城破前大举焚书。颜之推被俘北去。 西魏皇帝复姓拓跋。
555	南梁承圣四年 绍泰元年	西魏恭帝二年 北齐天保六年	陈霸先立梁敬帝。 西魏立萧詧为帝于江陵，后梁开始。 北齐灭道教。
556	南梁绍泰二年 太平元年	西魏恭帝三年 北齐天保七年	西魏仿《周礼》设六官。 宇文泰死，宇文觉继承，宇文护掌权。

续表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57	南梁太平二年 南陈永定元年	北齐天保八年 北周孝闵帝元年 明帝元年	北周孝闵帝宇文觉篡西魏，建北周，西魏亡，北魏相关政权全部终结。 北周宇文护废杀孝闵帝，立明帝。 陈武帝陈霸先篡梁，建陈朝，南梁亡。
559	南陈永定三年	北齐天保十年 北周武成元年	陈武帝死，文帝继位。 北齐文宣帝死，废帝继位。
560	南陈天嘉元年	北齐乾明元年 皇建元年 北周武成二年	北周宇文护弑明帝，立武帝。 北齐孝昭帝废杀废帝称帝。
561	南陈天嘉二年	北齐皇建二年 太宁元年 北周保定元年	北齐孝昭帝死，武成帝继位。
565	南陈天嘉六年	北齐河清四年 天统元年 北周保定五年	北齐武成帝传位后主。
566	南陈天康元年	北齐天统二年 北周天和元年	陈文帝死，废帝继位。
568	南陈光大二年	北齐天统四年 北周天和三年	陈宣帝废杀废帝继位。 北齐太上皇武成帝死。
572	南陈太建四年	北齐武平三年 北周天和七年 建德元年	北周武帝杀宇文护等，开始亲政。
573	南陈太建五年	北齐武平四年 北周建德二年	北齐后主杀兰陵王。 陈派吴明彻北伐，败北齐，取淮南地区。
574	南陈太建六年	北齐武平五年 北周建德三年	北周武帝灭佛教，并及道教。

续表

公元纪年	南朝纪年	北朝纪年	历史事件
575	南陈太建七年	北齐武平六年 北周建德四年	北周大举攻北齐。
577	南陈太建九年	北齐承光元年 北周建德六年	北齐后主传位幼主，北周灭北齐，俘后主、幼主、冯左皇后等，北方统一。 南陈北伐，败于北周，丧失淮南地区。
578	南陈太建十年	北周建德七年 宣政元年	北周武帝死，宣帝继位。 庾信作《哀江南赋》。
579	南陈太建十一年	北周大成元年 大象元年	北周宣帝传位静帝。
580	南陈太建十二年	北周大象二年	杨坚为北周摄政，封隋王。 北周太上皇宣帝死。
581	南陈太建十三年	大定元年 隋开皇元年	隋文帝杨坚篡北周，建隋朝，北周亡。 北朝结束。
582	南陈太建十四年	隋开皇二年	陈宣帝死，后主继位。
587	南陈祯明元年	隋开皇七年	隋灭后梁。
588	南陈祯明二年	隋开皇八年	隋以杨广统军大举攻陈。
589	南陈祯明三年	隋开皇九年	隋攻入建康，俘陈后主，陈亡。 南朝结束，南北朝结束，中国复归统一。